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纪念真理标准问题讨论3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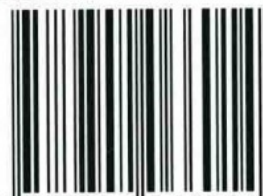
光明日报编辑部 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今年是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30周年。30年前，在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和支持下，在全国开展了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这场大讨论，对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对重大历史关头实现伟大转折，对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都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今天，我们纪念这场大讨论，就是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加自觉地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上架建议·理论

ISBN 978-7-80206-601-4



9 787802 066014 >

定价：48.00元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邓小平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一日

邓小平同志1988年5月11日为《光明日报》开展的真理标准讨论10周年
纪念活动和本报编辑部编辑的《真理标准讨论文集》的题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纪念真理标准问题讨论30年 / 光明日报编辑部编. —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7

ISBN 978-7-80206-601-4

I. 思… II. 光… III. ①光明日报社—新闻事业史—史料②真理的标准—研究
IV. G219.23 B02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95364号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编 者：光明日报编辑部

出 版 人：朱 庆

责任编辑：徐 晓 高 迟

装帧设计：|合|和|·蒋艳

责任校对：徐为正

责任印制：胡 骑

出版发行：光明日报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100062

电 话：010-67078234(咨询)，67078945(发行)，67078235(邮购)

传 真：010-67078227，67078233，67078255

网 址：<http://book.gmw.cn>

E-mail：gmcbs@gmw.cn

法律顾问：北京昆仑律师事务所陶雷律师

印 刷：北京新丰印刷厂

装 订：北京新丰印刷厂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开 本：787×1092 1/16

字 数：282千

印 张：20

版 次：2008年10月第一版

印 次：2008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06-601-4

定 价：4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光明日报

GUANGMING RIBAO 1978年5月11日 星期四 第10468号

圆满结束友好访问离开朝鲜国境时

华主席给金主席的感谢电

新华社新义州五月十日电 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离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境的时候，从新义州给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发了一封感谢电，电报全文如下：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同志：

在我们圆满地结束了这次友好访问即将离开贵国之际，我谨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在访问期间所受到的隆重、热烈的欢迎和亲切友好的接待，

极其生动地体现了朝鲜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兄弟般的深情厚谊，使我们非常感动。

我相信，通过这次访问，中朝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借此机会，再次向您，向朝鲜劳动党、政府和兄弟的朝鲜人民，表示良好的祝愿。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华国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日

满载朝鲜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华主席离平壤回国金主席到车站热烈欢送



五月十日，华主席圆满结束对朝鲜的正式友好访问，乘专机离开平壤回国。这是华主席在平壤向金主席告别时的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金主席向华主席赠送礼品

新华社平壤五月十日电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同志九日向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志赠送了纪念品。

金主席向华主席赠送礼品，金主席对此表示深切的谢意。

平壤群众在车站热烈欢送华主席回国。

新华社记者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本报特约评论员

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早经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解决了的问题。但是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和他们控制下的舆论工具大量的歪曲宣传，把这个问题搞得混乱不堪。为了深入批判“四人帮”，澄清其流毒和影响，在这个问题上就应正本清源，十分必要。

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怎样区别真理与谬误呢？一八四五年，马克思就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这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理论，是符合客观实际的真理，还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谬误，不能使他自己去证明，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

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毛主席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实践的检验，而依靠主观的臆断，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论》）这里说：“只能”、“只是”，就是说，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这是说，辩证唯物论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使他的自辩作为标准一样，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人的社会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实践具有把思想和客观实际联系起来的特性，因此，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科学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门捷列夫根据元素量的变化，制定了元素周期表，有人赞同，有人怀疑，争论不休。后来，根据元素周期表发现了钋和镭，它们的放射性恰好符合元素周期表的预测。这样，元素周期表就被证实了是真理。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在三百年里一直是一种假说，而当前虽然从这

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天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伽利略一八四六年确实发现了海王星这颗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才被证实了，成了公认的真理。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公认为真理，正是千百万群众长期实践证实的结果。毛主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规定这些学说的时候，而在于为后来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实践论》）马克思主义是工人运动中一个派别，开始并不出名，反动派围攻它，资产阶级学者反对它，其他的社会主义流派攻击它，但是，长期的革命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终于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

检验真理之正确与否，情形也是这样。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制订自己的路线时，当然要从现实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情况出发，使革命理论的指导并且加以论证。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个革命政党的路线是否正确，同样必须从社会实践来检验。二十世纪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俄国工人运动中，都发生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激烈斗争，那时第二国际的头面人物是考茨基，列宁主义者是少数，斗争持续了很长一个时间。俄国十月革命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证明列宁主义是真理，宣告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破产。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在一个时期内，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占主导地位，长期的革命斗争，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正确的，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错误的。标准是什么呢？只有一个：就是千百万人民的实践。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有的同志担心，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会削弱理论的需

要的意义。

“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鼓吹所谓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例如，他们炮制“天才论”，捏造文艺、教育等各条战线的“黑线专政”论，诬蔑老干都是民主派、民主派必然变成走资派的“规律”，胡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基础”的谬论，虚构假象于阶级斗争的无稽之谈，等等。所有这些，都曾被革命群众所不齿，所唾弃。所谓“理论”，谁反对，就会被扣上反对马列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帽子。但是，这些五花八门的谬论，根本经不起革命实践的检验，它们遭到“四人帮”的猛烈批判，一个比一个更快地被驳倒了。这个事实雄辩地说明，他们自欺自欺证明了真理，大谈特谈的理论证明了真理，强权证明不了真理。他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自居，强权证明他们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政治骗子。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有力量，正是由于它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客观真理，正是由于它高度概括了实践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并用来指导实践。正因为这样，我们要非常重视革命理论。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列宁选集》第1卷第241页）理论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来源于实践，又能正确地指导实践，而理论到实践是不是正确地指导了实践以及怎样才能正确地指导实践，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的检验。不管这个检验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不能真正发挥理论的作用的。

有的同志说，我们批判修正主义，难道不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衡量，从而证明修正主义是错误的吗？我们说，是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批判修正主义的锐利武器，也是我们论证的根据。我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去批判修正主义，这些基本原理是马、恩、列、斯和毛主席在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概括起来的，它们被长期的实践证明为不易之真理；但同时我们用这些原理去批判修正主义，仍然一点也不能离开当前的事实和过去的事实。只有从实践大量的事实分析，才有说服力。不研究实践检验，不从实践检验出发，是不能证明修正主义的错误的。

（下转第二版）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纪念真理标准问题讨论30年

光明日报编辑部 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目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3

本报特约评论员 / 1978年月11日光明日报

纪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30周年.....

纪念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30周年座谈会召开....15

在纪念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17

李长春 /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一场关系当代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大讨论....28

邵华泽 / 中国记协名誉主席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启示....32

邢贲思 /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求是杂志社原总编辑

继续解放思想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37

李景田 / 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

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41

王伟光 /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45

苟天林 / 光明日报社总编辑

历史的回顾

纪念真理标准讨论20周年....51

王晨 / 原光明日报总编辑

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序曲....56

——谈“实践标准”一文的写作、修改和发表过程

胡福明

走进新时代的序曲——真理标准讨论纪概....90

陶铨 张义德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组稿、修改和发表...150

王强华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写作和发表的经过...180

《光明日报》评论部

杨西光在真理标准讨论中...187

陶铨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亲历记...196

曹勇进

目录

附录

- 1978年1月14日的《实》文原文小样...208
- 1978年1月26日《实》文的第一次改样...216
- 1978年1月30日《实》文的第二次改样...224
- 1978年2月2日《实》文的第三次改样...232
- 1978年3月20日《实》文的第四次改样...238
- 1978年4月4日《实》文的第五次改样...246
- 1978年4月14日《实》文的第六次改样...254
- 1978年4月20日《实》文的第七次改样...264
- 1978年4月23、24日《实》文的第八次改样...278
- 1978年4月27日《实》文的第九次改样...292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304
- 1978年5月10日《理论动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本报特约评论员

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早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解决了的问题。但是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和他们控制下的舆论工具大量的歪曲宣传,把这个问题搞得混乱不堪。为了深入批判“四人帮”,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拨乱反正,十分必要。

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怎样区别真理与谬误呢?1845年,马克思就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这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

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毛主席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

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论》）这里说：“只能”、“才是”，就是说，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这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为标准一样。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人的社会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实践具有把思想和客观实际联系起来的特性。因此，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科学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门捷列夫根据原子量的变化，制定了元素周期表，有人赞同，有人怀疑，争论不休。尔后，根据元素周期表发现了几种元素，它们的化学特性刚好符合元素周期表的预测。这样，元素周期表就被证实了是真理。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在300年里一直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加勒于1846年确实发现了海王星这颗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才被证实了，成了公认的真理。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承认为真理，正是千百万群众长期实践证实的结果。毛主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

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原是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派别，开始并不出名，反动派围攻它，资产阶级学者反对它，其他的社会主义流派攻击它，但是，长期的革命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终于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

检验路线之正确与否，情形也是这样。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制订自己的路线时，当然要从现实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情况出发，依据革命理论的指导并且加以论证。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个革命政党的路线是否正确，同样必须由社会实践来检验。20世纪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俄国工人运动中，都发生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激烈斗争，那时第二国际的头面人物是考茨基，列宁主义者是少数，斗争持续了很长一个时间。俄国十月革命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证明列宁主义是真理，宣告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破产。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在一个时期内，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占主导地位。长期的革命斗争，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正确的，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错误的。标准是什么呢？只有一个：就是千百万人民的社会实践。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有的同志担心，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会削弱理论的意

义。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凡是科学的理论，都不会害怕实践的检验。相反，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够使伪科学、伪理论现出原形，从而捍卫真正的科学与理论。这一点，对于澄清被“四人帮”搞得非常混乱的理论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鼓吹种种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例如，他们炮制“天才论”，捏造文艺、教育等各条战线的“黑线专政”论，伪造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必然变成走资派的“规律”，胡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基础”的谬论，虚构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的无稽之谈，等等。所有这些，都曾经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所谓“理论”，谁反对，就会被扣上反对马列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但是，这些五花八门的谬论，根本经不起革命实践的检验，它们连同“四人帮”另立的“真理标准”，一个个都像肥皂泡那样很快破灭了。这个事实雄辩地说明，他们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大规模的宣传证明不了真理，强权证明不了真理。他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自居，实践证明他们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政治骗子。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有力量，正是由于它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客观真理，正是由于它高度概括了实践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并用来指导实践。正因为这样，我们要非常重视革命理论。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列宁选集》第一卷第241页）理论所以重要，就是在于它来源于实践，又能正确指导实践，而理论到底是不是正确地指导了实践以及怎样才能正确地指导实践，一点也离不开实践的检验。不掌握这个精神实质，那是不可能真

正发挥理论的作用的。

有的同志说，我们批判修正主义，难道不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衡量，从而证明修正主义是错误的吗？我们说，是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批判修正主义的锐利武器，也是我们论证的根据。我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去批判修正主义，这些基本原理是马、恩、列、斯和毛主席从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概括起来的，它们被长期的实践证明为不易之真理；但同时我们用这些原理去批判修正主义，仍然一点也不能离开当前的(和过去的)实践，只有从实践经验出发，才能使这些原理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我们的批判只有结合大量的事实分析，才有说服力。不研究实践经验，不从实践经验出发，是不能最终驳倒修正主义的。

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的，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就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研究新事物、新问题，不断作出新的概括，把理论推向前进。这些新的理论概括是否正确由什么来检验呢？只能用实践来检验。例如，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或少数国家可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学说，是一个新的结论，这个结论正确不正确，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一般理论去检验，只有帝国主义时代的实践，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实践，才能证明列宁这个学说是真理。

毛主席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7页）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

革命导师们不仅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亲自作出了用实践去检验一切理论包括自己所提出的理论的光辉榜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他们所共同创造的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文献《共产党宣言》的态度，就是许多事例其中的一个生动的例子。1848年《宣言》发表后，在45年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在用实践来检验它。《宣言》的七篇序言，详细地记载了这个事实。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他们又指出，“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8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新实践的不断检验，包括新的历史事实的发现，曾对《宣言》的个别论点作了修改。例如，《宣言》第一章的第一句是：“到目前为止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恩格斯在1888年的《宣言》英文版上加了一条注释：“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1页）这是因为，《宣言》发表以后人们对于社会的史前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特别是摩尔根的调查研究证明：在阶级社会以前，有一个很长的无阶级社会；阶级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并非从来就有的。可见，说“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并不确切。恩格斯根据新发现的历史事实，作了这个说明，修改了《宣言》的旧提法。

《宣言》还有一个说法，说到无产阶级要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以推翻资产阶级。1872年，两位革命导师在他们共同签名的最后一篇序言

中，明确指出：“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已有很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

‘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9页）列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说明十分重视，他认为这是对《共产党宣言》的一个“重要的修改”。（《列宁选集》第3卷第201页）

正如华主席所指出的：“毛主席从来对思想理论问题采取极其严肃和慎重的态度，他总是要让他的著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的考验以后再来编定他的选集”。毛主席一贯严格要求不断用革命实践来检验自己提出的理论和路线。1955年毛主席在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时候，写了104篇按语。当时没有预料到1956年以后国际国内所发生的阶级斗争的新情况。因此，1958年在重印一部分按语的时候，毛主席特别写了一个说明，指出这些按语“其中有一些现在还没有丧失它们的意义。其中说：1955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这样说不妥当。应当说：1955年是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以及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战线方面和政治战线方面，则或者还没有基本胜利，或者还没有完全胜利，还有待于尔后努力。”（《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25页）

革命导师这种尊重实践的严肃的科学态度，给我们极大的教育。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提出的理论是已经完成了的绝对真理或“顶峰”，

可以不受实践检验的；并不认为只要是他们作出的结论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不能改变；更不要说那些根据个别情况作出的个别论断了。他们处处时时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论断、指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毫无偏见。他们从不容许别人把他们的言论当作“圣经”来崇拜。毫无疑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必须坚持，决不能动摇；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关于哲学，毛主席曾经说过：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如果只有几篇原有的哲学著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那是不行的。实践、生活的观点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生活之树是常青的。正是革命导师的这种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才保证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而永葆其青春。

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

我们不仅承认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而且要从发展的观点看待实践标准。实践是不断发展的，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它既具有绝对的意义，又具有相对的意义。就一切思想和理论都必须由实践来检验这一点讲，它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就实践在它发展的一定阶段上都有其局限性，不能无条件地完全证实或完全驳倒一切思想和理论这一点来讲，它又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但是，今天的实践回答不了的问题，以后的实践终究会回答它，就这点来讲，它又是绝对的。列宁说：“当然，在这

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列宁选集》第2卷第142页）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关于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辩证统一的观点，就是任何思想、任何理论必须无例外地、永远地、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的观点，也就是真理发展的观点。任何思想、理论，即使是已经在一定的实践阶段上证明为真理，在其发展过程中仍然要接受新的实践的检验而得到补充、丰富或者纠正。毛主席指出：“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的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又指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强调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永远没有完结，就是承认我们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或最终完成。就是承认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我们的认识可能犯错误，需要由实践来检验，凡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或者不符合实际的东西，就应当改变，不应再坚持。事实上这种改变是常有的。毛主席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

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实践论》）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胡诌什么“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实践证明，他们所说的绝不是毛泽东思想的真理，而是他们冒充毛泽东思想的谬论。

现在，“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被摧毁，但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批评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种倾向依然存在。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四人帮”都设置了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对于这些“禁区”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科学无禁区。凡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确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有许多地方还是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我们要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勇于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现实的确切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才能够逐步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前进，顺利地进行新的伟大的长征。

（《光明日报》1978年5月11日）

纪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发表 **30** 周年

纪念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30周年座谈会召开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校、光明日报社2008年5月8日上午在北京联合召开纪念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30周年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他强调，今天我们纪念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30周年，就是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刻总结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在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中积累的丰富经验，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七大精神上来，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李长春指出，30年前，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是在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和支持下开展起来的。这场讨论，为我们党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转折、我国迈向改革开放新时期作了思想准备，为我们党在改革开放30年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李长春指出，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宝贵经验。这些宝贵经验，是我们党在解放思想中形成的认识成果，为我们继续解放思想提供了基本遵循，必须倍加珍惜、很好坚持，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今天我们党领导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正处于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决不能骄傲自满，决不能停滞不前。要通过继续解放思想，进一步增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好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动力；进一步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项建设，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进一步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全党同志特别是广大理论工作者、宣传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教育工作者，要继续发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优良作风，继续保持开拓进取、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勇于做解放思想的先行者、改革创新的排头兵，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锐意进取，不懈奋斗，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主持座谈会，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出席座谈会。

邵华泽、邢贲思、李景田、王伟光、荀天林等同志在座谈会上发言。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理论界专家学者近200人参加座谈会。

在纪念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李长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今年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30周年。30年前，在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和支持下，在全国开展了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这场大讨论，对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对重大历史关头实现伟大转折，对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都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今天，我们纪念这场大讨论，就是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加自觉地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30年前，中国正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举国欢腾，人心思变，百业待举。但许多人还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毛泽东思想，还不能正确区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历史功绩和晚年错误，“左”的思想的长期影响和“两个凡是”的禁锢依然是严重障碍，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前进中出现徘徊的局面。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这就为我们党实现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指明了方向。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不少老同志也逐渐从不同角度提出，要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正确认识与

把握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经胡耀邦同志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新华社向全国转发，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针对当时一些同志不理解甚至不接受、不赞成的情况，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这篇文章给予了充分肯定，一场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反映党心民心的大讨论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对党和国家的事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立和发展产生极大影响。

第一，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我们党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了这场讨论的重大意义。他说：“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我们党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晚年错误区别开来，明确了毛泽东思想永远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明确了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明确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由此，我们党恢复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彻底摆脱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为实现全面拨乱反正奠定了

思想基础，带来了我们党和民族的新的伟大觉醒，孕育了理论和实践的伟大创造。

第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转折、我国迈向改革开放新时期作了思想准备。在领导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邓小平同志始终着眼大局，把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这场讨论的落脚点，使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过程成为引导人们思考国家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的过程。通过这场大讨论，党内外思想日益活跃，出现了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以此为基础，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建国以来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邓小平同志在为这次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一极其重要的讲话，实际上是开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的宣言书。这次全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果断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这次全会实事求是地解决了一批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领导人的是非功过问题，对过去一些不符合客观实际的理论观点、形势估计和方针政策作了改变和调整，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增强党的团结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政策；这次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要求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继续打破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进一步解放思想，“开动机器”，推动工作中心的转变，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两年之后，邓小平同志再次评价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于我们这几年来在政治、经济、组织等各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对于我们在各条战线上取得显著成绩，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激发了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力，催生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实践，开启了中华民族振兴的新的伟大征程。

第三，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我们党在改革开放30年中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只能在艰辛探索中开拓前进。每前进一步都是靠解放思想，靠大胆创新，才不断开辟新路。正是不断解放思想，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党领导人民开辟了一条崭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30年来，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领域改革到其他各个领域改革，从沿海开放到沿江沿边开放，从东部开放到中西部开放，从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先行试点到逐步推开，这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变革，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极大地焕发了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30年来，我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居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一千多万，这一世界上少有的持续快速发展，深刻改变了我国的面貌，显著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30年来，从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从确立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到提出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这一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又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可以说，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历经艰辛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与始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密不可分的。不解放思想，就打不开思路，就找不到出路，就不能解决时代新课题，就干不出新的事业，就不会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30年来，实践上每一次创造、理论上的每一次突破、事业上的每一次进步，无不闪耀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光辉。

第四，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使我们党在改革开放30年中坚持解放思想，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宝贵经验。主要有：必须始终牢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我们适应新形势、应对新挑战、认识新事物、开拓新局面的根本思想武器；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把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在实践中认识真理、发展真理、检验真理；必须始终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必须坚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勇于开拓前进；必须树立世界眼光，以宽广的眼界观察和把握世界发展趋势，积极借鉴和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有益文明成果；必须坚持把大胆探索的勇气同科学求实的精神统一起来，充分发扬民主，鼓励畅所欲言，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努力在多元多样中立主导，在交融交流中谋共识；必须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这些宝贵经验，是我们党在解放思想中形成的认识成果，为我们解放思想提供了基本遵循，必须倍加珍惜、很好坚持，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今天我们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正处于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决不能骄傲自满，决不能停滞不前。面对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变化，面对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变革，面对实现人民群众新要求新期待的繁重任务，党的十七大突出强调要继续解放思想，并强调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这是有深刻含义的，也是有现实针对性的。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加速推进，世界的力量组合和利益分配正在发生新的深刻变化，我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日益提高，世界对我国的影响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直接而广泛。只有继续解放思想，进一步增强世界眼光

和战略意识，更好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才能趋利避害、争取主动，在深刻变动的国际格局中赢得更多的发展机遇，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取得更大的发展优势。我国改革发展正处于关键阶段，改革发展的任务艰巨繁重，既有巨大发展潜力和动力，又有各种困难和风险；既有难得机遇，又有严峻挑战。只有继续解放思想，勇于变革、勇于创新，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才能更好地解决我国改革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更好地巩固和发展改革开放已经取得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新世纪新阶段人民群众过上更加美好生活的愿望日益强烈，不仅要求物质生活更加富足，而且要求政治参与更加充分、精神文化更加丰富、社会生活更加安定和谐。只有继续解放思想，坚持以人为本，着眼全面发展，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想，才能更好地解决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使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新的历史起点上、新的发展进程中，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解放思想的重大理论意义、实践意义、现实意义、历史意义，紧紧围绕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作出的各项战略部署，在继续解放思想上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1. 通过继续解放思想，进一步增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30年来解放思想的最大成果，就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而不是别的什么旗帜，能够最大限度地团结和凝聚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利益群体的智慧和力量；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别的什么道路，能够指引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继续解放思想，首要的就是始终做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动摇。坚持不懈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继续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系统总结3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学

习、研究、宣传不断引向深入。特别是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紧密结合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紧密结合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实际，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努力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和实际运用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不断拓展的、开创性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性的理论体系。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仍然有许多未被认识或未被充分认识的领域和规律，仍然有待于我们继续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前进。继续解放思想，就要求我们围绕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重大问题，围绕群众生产生活中的紧迫问题，围绕党的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继续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不断以新的理论观点和科学思想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和理论体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越来越丰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越来越兴旺。

2. 通过继续解放思想，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好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提出后，得到广大干部群众衷心拥护，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同时也要看到，把思想真正统一到科学发展观上来还有大量工作要做，解决影响科学发展的矛盾和问题还有大量工作要做。继续解放思想，就是要进一步把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引导到科学发展观上来，深刻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切实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思想观念，进一步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全面发展的观念、协调发展的观念、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要不断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凡是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就全力以赴地去做，凡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就毫不含糊地去改，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

突出问题，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要提高运用科学发展观分析问题、指导实践的本领，把科学发展观转化为谋划科学发展的正确思路，转化为促进发展的政策措施，转化为领导发展的实际能力，转化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更好地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的质量与效益，努力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3. 通过继续解放思想，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动力。30年来，解放思想的过程始终是与改革开放的过程相伴相随的。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改革开放。通过30年改革开放的洗礼，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前进潮流、迎来了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已经被实践证明并将继续被实践证明的真理。同时应当看到，改革开放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形成一套比较完整、比较定型的体制机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是随着改革进入新的阶段，触及许多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大大增强，更需要坚定信心，付出艰苦的努力。对外开放要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地结合起来，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形成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都面临着繁重的任务。继续解放思想，关键就是在推进改革开放上迈出新步伐。要进一步统一改革思想，凝聚改革共识，坚定改革开放的信心和决心，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坚持用改革和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矛盾和问题。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各方面体制机制创新，不失时机地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的新突破，加快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要努力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做到理论准备更充分、政策思路更缜密、方法步骤更慎重，降低改革代价，提高改革效率。要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树立全局眼光和战略思维，加强对改

革的总体指导和统筹规划,进一步协调改革思路、配套改革措施、规范改革行为,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改革有机衔接、协调推进。要坚持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切实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群众的可接受程度统一起来,使改革进一步兼顾各方面利益、照顾到各方面关切,始终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中央决定举行隆重纪念活动,中央有关部门还将举办理论研讨会。我们要通过深入的理论研讨,把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巨大成就、成功经验、前进方向总结好、阐述好、宣传好,继续解放思想,推动理论创新,努力营造坚持改革开放的良好思想理论氛围,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4. 通过继续解放思想,进一步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项建设,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30年来,解放思想的历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不断发展与完善的历程,就是人民生活总体上逐步达到小康水平并向更高水平小康社会迈进的过程。同时应当看到,我们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巩固和提高目前达到的小康水平,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任重道远。党的十七大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规律,对我国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继续解放思想,就是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更加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节能环保水平、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

荣；就是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着力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要求，不断探索和解决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努力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更加牢固的基础。

5. 通过继续解放思想，进一步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30年来解放思想的进程，是在我们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展开的，我们党自身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党的建设取得丰硕成果，党的执政能力不断提高。同时应当看到，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决定了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既十分重要也十分紧迫。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成为带领人民团结奋斗的坚强领导核心，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能够通过坚持不懈的改革创新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中央反复向全党同志强调，一个政党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不是一劳永逸的，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继续解放思想，就是要深刻总结我们党自身建设的宝贵经验，紧密联系新形势下提出的新课题新挑战，以改革的思路寻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新途径新办法，以创新的举措推动各项制度、机制和工作方式的健全和完善。要按照党的十七大的要求，紧紧围绕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这条主线，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加强思想建设，以造就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为重点加强组织建设，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30年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推动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大发展，这是我们得出的重要结论。今天我们党号召继续解放思想，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这是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30年坚持解放思想的最好纪念。全党同志特别是广大理论工作者、宣传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教育工作者，要继续发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优良作风，继续保持开拓进取、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勇于做解放思想的先行者、改革创新的前头兵，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锐意进取，不懈奋斗，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在“纪念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场关系当代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大讨论

邵华泽 / 中国记协名誉主席

一个伟大事件对历史的影响,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显示出来。回顾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进程,展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未来前景,我们深深感到,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30年前在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和支持下,全党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一场大讨论。就其内容而言,这场讨论不过是重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常识,即真理不是自封的,也不是谁认定的,一个认识、一种理论或根据这种认识和理论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不是正确,归根到底要由实践来检验。但由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核心观点,体现着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论;更由于这场讨论是在粉碎“四人帮”,但“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的动乱遗留下来的政治、思想、组织和经济上的混乱还极其严重这样一个特殊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当时我们党正处在如何认识过去、总结过去,认识未来、规划未来,把中国引向何方的关键时刻,人民企盼着改变危难局面、开辟新的征程,历史呼唤着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却极力阻碍党和人民反思过去,继续维护党在一段时间里指导思想严重偏离科学社会主义的错误和在实践上造成的严重后果,因而这场讨论就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更具有了特殊重大的政治意义。

共产党人改造世界是否成功,从一定意义上说,思想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性的因素。因为正确政治路线的制定要以正确的思想路线为前提。这已为我们党80多年历史所反复证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实质上就是两条思想路线之间的争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坚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主张“两个凡是”,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坚持唯心主义的思想路线。一个常识性问题之所以成为我们党和国家当时的一个重大课题,是由其实际上承担的作为重新确立正确思想路线、制定正确政治路线的突破口这一神圣使命所决定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直接的意义和最大的贡献就在于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冲破并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大大解放了被长期禁锢的人们的思想,从而为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奠定了极其重要的思想和理论基础。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不要小看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争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一场解放思想的运动,也是一场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动,其涉及主题之重要,规模之大,意义之深,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史和我们党的历史上,都是值得大书一笔的。这场讨论给了我们许多重要的启示。

一、重视正确理论在社会发展和变革中的先导作用。以极大注意力关注理论,在理论原则问题上旗帜鲜明,积极推进理论建设和理论创新,保持理论的先进性,是我们党领导人民不断夺取胜利的关键。

二、树立实践标准的权威性。密切关注实践的进程,时刻倾听实践的呼声,充分依靠亿万人民在实践中的创造,坚持任何理论和认识都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是我们党科学决策的前提和完善政策、创新理论的基础。

三、用科学理论武装群众。正确的理论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但这种理论只有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为广大群众所理解和掌握,变为自觉指导自己思想和

行动的武器,才能发挥其最大的效能。

四、创造理论探讨的良好氛围。理论探讨需要思想活跃,需要独立思考,需要畅所欲言。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万马齐喑的窒息空气是理论创造的大敌。因而,形成和保持民主和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对激发理论创造的活力至关重要。

今年,也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30周年。联系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程,联系我们党在这场新的伟大革命中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境界的历程,更加深切地体会到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深远意义和影响。30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恢复并丰富发展了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始终保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表现出来的为了人民的利益无所畏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一切从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否定错误的理论,抛弃不合时宜的观念,不断打破阻碍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前进的束缚,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不断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在新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一理论体系的形成,是党和人民之大幸,国家和民族之大幸。30年来,正是由于理论上的与时俱进,我们党才能够保持并不断增强对改革发展各项指导的正确性和权威性,调动和汇聚蕴藏在亿万人民中的积极因素和创造活力,成功地应对各种严峻考验,使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历史性变化。党的理论越来越符合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越来越符合时代的潮流和人民的要求,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去取得胜利的可靠保证,也是今后顺利发展的最大希望所在。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

很多,困难不少,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繁重。按照党的十七大精神,珍惜、坚持并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去夺取党和人民事业的新胜利,就是我们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最好纪念。

(在“纪念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启示

邢贲思 /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求是杂志社原总编辑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30周年。30年前这场席卷全国的大讨论,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扫清了思想障碍,为改革开放铺平了道路。

一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四人帮”被粉碎,广大群众欢欣鼓舞,他们对未来充满期待,希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从此峰回路转,迎来一个重大转机。但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同志却抛出了“两个凡是”的口号,强调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要“坚决维护”、“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意味着我们党过去所犯的错误,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都不可能得到彻底纠正。而且,当时的现实情况也令人十分担忧:“文革”虽结束但各项工作持续徘徊,“天安门事件”得不到平反,连清查“四人帮”时也不忘提出继续“批邓”。这一切引起了党内外群众的极大不满。“两个凡是”成为套在人民头上的紧箍咒,成为妨碍中国社会进步的绊脚石。不破除“两个凡是”,党没有希望,社会主义没有希望,中国没有希望。于是一场针对“两个凡是”的大讨论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这场讨论之所以选择“真理标准”这个哲学命题作为切入点和突破口,是因为“两个凡是”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重挑战。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任何一种认识,包括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决策和指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证明其是否正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石。而“两个凡是”实际上把毛泽东同志的决策和指示当作了真理标准,它无需接受实践的检验,相反,实践倒要受到它的裁定。这就完全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弄颠倒了。毛泽东思想是科学真理,但真理和真理标准不是一回事,真理是正确的认识,真理标准则是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依据,两者不能混为一谈。说毛泽东思想不是真理标准,丝毫也没有否定它对实践所起的伟大指导作用。把毛泽东思想当作真理标准,表面上是对它的尊重,实际上却是对它的歪曲和损害。

真理标准虽是一个哲学问题,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决不只是一场理论是非之争。它关系到我们党应当执行一条什么样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还是一切从本本出发;它也关系到我国的社会主义今后将怎样发展,是沿着“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道路继续走下去,还是弃旧图新,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意义远远超出理论本身的范围。

在讨论中,《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旗帜鲜明地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胡耀邦同志主持下的中央党校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引导这场讨论始终朝着正确方向发展的则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特别是邓小平同志。是邓小平首先提出要“准确、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体系;是他最早在党内批评“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是他明确地提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问题”;也是他指引这场讨论既批评了“两个凡是”又维护了毛泽东思想,解决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问题。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一次思想大解放,它使人们从迷信盛行、思想僵化的状态下解脱了出来,使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并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

力。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大成果。在这条思想路线指引下,我们党作出了工作重点转移和实行改革开放这两大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战略决策,从此,我国社会主义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二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虽已过去了30年,但它在当时所引起的思想震撼,使人至今记忆犹新,这说明一次大的思想解放确实能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在新时期,我们一定要用好这个法宝,而要用好它,就必须正确认识它。

首先要认识到解放思想不能和实事求是相脱离,二者是统一的整体。邓小平同志说得很清楚:“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指出:“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一致的,应一以贯之。不解放思想,教条主义盛行,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离开实事求是,脱离实际,脱离亿万群众的创造性实践,不是真正的思想解放。”可见,解放思想决不是脱离实际的空想。有人把解放思想归结为一个“破”字,这种认识不全面。照这种说法,只有破是解放思想,立就不是。其实,只要符合客观实际的要求,无论是破还是立,都是思想解放的表现。我们既要有摧毁旧事物的勇气,也要有创造和发展新事物的勇气,两者都是解放思想所必需的。

回顾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既有大破,也有大立。我们破除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并逐渐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正在扬弃结构不合理、效益低下、资源消耗严重、容易造成环境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逐步向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经济 development 方式转变;我们纠正了片面强调发展速度的不正确观点,确立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整个改革开放过程,就是一个破旧和立新相统一的过程。改革

开放不能没有破,更不能没有立。改革开放中最重要的立,就是几代中央领导集体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的理论创新,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当前,解放思想的首要任务,就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认真总结实践经验,破其所该破,立其所该立,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其次要认识到解放思想不能和解决问题相脱离,二者也是统一的整体。邓小平同志说:“解放思想必须真正解决问题。”他指出,思想解放不能停留在讲现成话、讲空话上,而是要仔细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切实地想办法使我们的步伐快一些,使生产力发展快一些,使国民收入增加快一些,把领导工作做得更好一些。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论述,对我们理解解放思想同样十分重要。现在,解放思想是一个热门话题,各行各业的人都在谈论,但关键是要把功夫用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因为口头上谈论解放思想易,而扎扎实实地解决实际问题难。而且,不解决实际问题的解放思想,又怎能算得上是真正的解放思想呢?毛泽东同志多年前就曾说过:“实践出真知。”因为只有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才能了解事情的真相,知道问题的所在,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获得真知,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本质体现,是党的思想路线的必然要求,也是解放思想的必由之路。与其关在书斋和办公室里冥思苦想地探寻解放思想的门径,不如到实际中去,听一听群众的呼声,也许打开解放思想之锁的钥匙就在其中。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一切工作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结点。解放思想对于我们党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通过解放思想,能够切实推进工作,真正解决问题,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离开这个基点,所谓的解放思想,就成了一句毫无意义的空话。

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结合起来,把解放思想和解决问题结合起来,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就是今天我们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最好的纪念。

(在“纪念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继续解放思想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李景田 / 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

30年前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呼唤伟大变革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对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今天我们纪念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30周年，最重要的是继续解放思想，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一

30年前，中国正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虽然粉碎“四人帮”，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但“两个凡是”如同一道无形的枷锁紧紧地束缚着我们的手脚。国家在徘徊中前进，人民在困惑中思索。这种矛盾，最终以思想路线的冲突尖锐地表现了出来。1978年5月，由胡耀邦同志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和《光明日报》先后发表，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和支持下，一批具有政治胆识和理论勇气的党的领导干部、理论和新闻工作者担当了这场大讨论的先锋，很快形成了一场影响全国的思想解放运动。

回顾总结邓小平同志领导和支持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历程，我们可以看

到，他倡导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为了推动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是为了推动全党全民族把意志和力量集中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最大的实践上来。他不是就历史问题谈历史问题，而是以团结一致向前看为讨论历史问题的出发点；他不是就解放思想谈解放思想，而是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为解放思想的着眼点；他不是就思想理论问题谈思想理论问题，而是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思想理论上拨乱反正的落脚点。因此，这场讨论实际上就成为一场呼唤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形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为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提供强大精神动力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场讨论从当时看，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从长远来看，为完成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30年来，我们党每一次推进思想解放，都牢牢把握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牢牢把握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牢牢把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根本任务。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及之后30年的思想解放，给我们一个十分重要的启示是，解放思想必须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展开，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这是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成功经验和规律性认识。

二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今天，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一方面，面临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另一方面，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和各方面体制改革进入关键的攻坚阶段，面临更多更加复杂而又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党的伟大事业，必须继续解放思想。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继续解放思想，要紧紧围绕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这个中心来进行，要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服务。在一定意义上说，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过程就是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继续解放思想要贯穿于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切实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这是继续解放思想的根本任务。

围绕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要在以下三个方面下功夫。

一是要立足基本国情，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是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客观依据。围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必须从这一基本国情及新的阶段性特征出发。比如我们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要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兴起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要处理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等，都要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解放思想，科学决策，谋划发展。

二是要着眼于新的发展，做到“三个解放”。面对新情况、新任务、新要求，围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就要按照党的十七大的要求，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既要以辩证态度看待历史成就、历史经验，又要以创新精神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尤其要打破常规，突破前人，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与科学发展观不相适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形形色色的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冲破一切妨碍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的思想观念，改变一切束缚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的做法和规定，革除一切影响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的体制弊端。

三是要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以人为本的理念，一方面揭示了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也就是为了谁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揭示了社会发展的主体和根本动力，也就是依靠谁的问题。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归根到底是为了人的解放和发展。那种只重GDP、“见物不见人”的片面发展，忽视生态文明，忽视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发展指标，甚至直接损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不仅是一种“短视”，也是没有出路的。围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要始终关注民生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始终把提高人的素质包括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作为改革和发展的重要任务，最大限度地把人的积极性、创造性调动和发挥出来。

三

中央党校作为党的重要思想理论阵地，改革开放30年来始终高举解放思想的旗帜，密切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新的实践、新的进步和发展，以及新的经验、新的思想和理论，始终把推进思想解放和党的理论创新作为不懈的追求和光荣的任务。

在轰轰烈烈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中，中央党校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将坚定地、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高度一致，进一步营造更加有利于解放思想的氛围，把学习、研究、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科学发展观作为党校工作的中心内容，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学员头脑，指导党校工作，为党的干部教育事业和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做出新的贡献，为继续解放思想、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做出新的贡献。

(在“纪念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

王伟光 /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解放思想引导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促进思想解放。二者相互作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

一、思想解放是社会变革的先导，是改革开放的火车头

思想是行动的先声，思想解放是社会变革的先导。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首先归功于解放思想的强大威力。邓小平同志提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了，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能否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重大转折，两次思想大解放，两次转危为安：一次是遵义会议；一次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每次转折都是解放思想开路，实事求是，从错误路线指导转到正确路线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从挫折走向成功，从低谷走向高潮。

遵义会议是挽救中国革命于危难之际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中国共产党人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从“左”倾错误路线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挽救了党和军队，挽救了革命。遵义会议与延安整风运动，是彻底的思想解放运动，使中国共产党人彻底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思想枷锁，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和正确的政治路线，推动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挽救社会主义于存亡之时的又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中国共产党人从“左”的理论和路线的束缚中再次解放出来，挽救了党和国家，挽救了社会主义，成功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30年前，中国共产党人肩负着带领中国从“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走出来，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重任。要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领导全国人民做两件大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的唯一出路。要推进改革开放，首要的任务就是拨乱反正。邓小平同志领导和支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解放了人们被束缚已久的思想，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行了理论上、路线上和实际工作上的拨乱反正，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正确路线，为实行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拨正了航向、开辟了道路。

二、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思想解放的历史， 改革开放离不开解放思想

30年来，解放思想贯穿于改革开放全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每前进一步都是靠改革开放取得的，改革开放每前进一步，都是靠解放思想推动的。我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就是改革开放的过程，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思想解放的过程。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谋求发展的历史。

我国改革开放历程中的重大思想解放，都极大地推动了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发展。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不仅推动了全面拨乱反正，还进一步引发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的思考，从而开启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序幕，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

革，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改革乃至全面改革，从封闭到开放，闯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每走一步，都涉及到检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思想政治路线正确与否，都涉及到衡量改革开放成功与否的判断标准问题。在1992年初南方谈话中，邓小平突出强调“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并做了深刻阐述。他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中，最根本的还是生产力标准。树立实践标准主要是针对“两个凡是”的僵化观点，恢复和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划清了辩证唯物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的界限，是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三个有利于”标准主要是针对“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这种判断姓“资”姓“社”的固定僵化的思维模式，恢复和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和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的界限，是又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

三、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改革开放，需要继续解放思想

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思想的大解放，带来改革开放大发展，带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发展。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这应成为今天继续解放思想的重要着力点。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就在于是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一方面，改

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经济社会正处于发展的黄金期；另一方面，一系列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日益显现出来，经济社会发展又处于矛盾的凸显期。如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传统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诸多社会矛盾、社会难点和社会问题凸显，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依然存在。处于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共产党人，正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十分艰巨的改革攻坚任务，面对诸多新矛盾、新问题，迫切要求通过解放思想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解放思想，必须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党针对我国发展实际，总结我国和世界发展经验，关于发展问题的理念和思路的重大创新，也是思想解放的结果。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改革开放必须集中破解“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时代课题，解放思想也必须破解“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时代课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摒弃一切影响发展的传统观念、传统方式和传统做法，破除一切影响发展的思想观念障碍和体制、机制性障碍，改变一切不符合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的认识、观念和做法，不断创新发展理念，不断创新发展思路，不断创新发展模式，不断创新发展方法，切实推进改革开放，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走出一条科学发展、社会和谐之路。

30年前，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广大理论工作者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以科学求实、勇于探索的精神和巨大理论勇气，积极投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今天，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上，我们要继续解放思想、开拓进取，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深化理论研究，推进理论创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作出理论界新的贡献。

（在“纪念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

苟天林 / 光明日报社总编辑

30年前，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对全党全国工作大局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支持下，这场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和个人崇拜的禁锢，为我们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了思想上、舆论上的准备。

邓小平同志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最坚定的支持者、最有力的领导者。1977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应该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党的工作，并多次同党内同志谈话，说明“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经胡耀邦同志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后，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支持这篇文章，支持这场讨论。他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邓小平同志还专门为光明日报题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始，我们党重新确立并在实践中始终坚持和发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江泽民同志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是保证我们党永葆蓬勃生机的法宝”，“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统一的，就是要求我们的思想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冲破落后的传统观念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改变因循守旧、不接受新事物的精神状态”。胡锦涛同志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我们适应新形势、认识新事物、完成新任务的根本思想武器”，“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

30年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生动实践中，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探索、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总结、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党的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华民族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上迈出了坚实步伐。

今天，我们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新目标、新任务，面对国内外形势广泛而深刻的新变化，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的科学论断，并强调继续解放思想，意义十分重大。历史和实践都证明，只有解放思想，才能面向世界，顺应时代和历史潮流，不断前进；只有解放思想，才能面向实际，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只有解放思想，才能面向未来，紧紧抓住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在纪念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30周年的时候，我们深深感到，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牢记“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对于我们做好党的新闻工作、办好报纸十分重要。

一是要遵循客观规律，坚持正确导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新闻媒体的宣传报道，遵循客观规

律，导向就正确；违背客观规律，导向就错误。30年前，我们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发生了严重失误和曲折。如何清醒认识和遵循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正确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成为一个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成为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撰写和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是遵循这一客观规律，坚持正确导向，服务党和国家的大局所需，顺应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我们做好新闻工作、办好报纸的前提和基础。

二是要面向实际，坚持“三贴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和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发表的大量文章，所关注的是当时党和国家面临的重大实际问题，所阐述的是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希望倾吐的心声、需要回答的疑问，因而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引起全国各地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族群众的热切关注和共鸣。今天，我们要增强党报的影响力，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仍然是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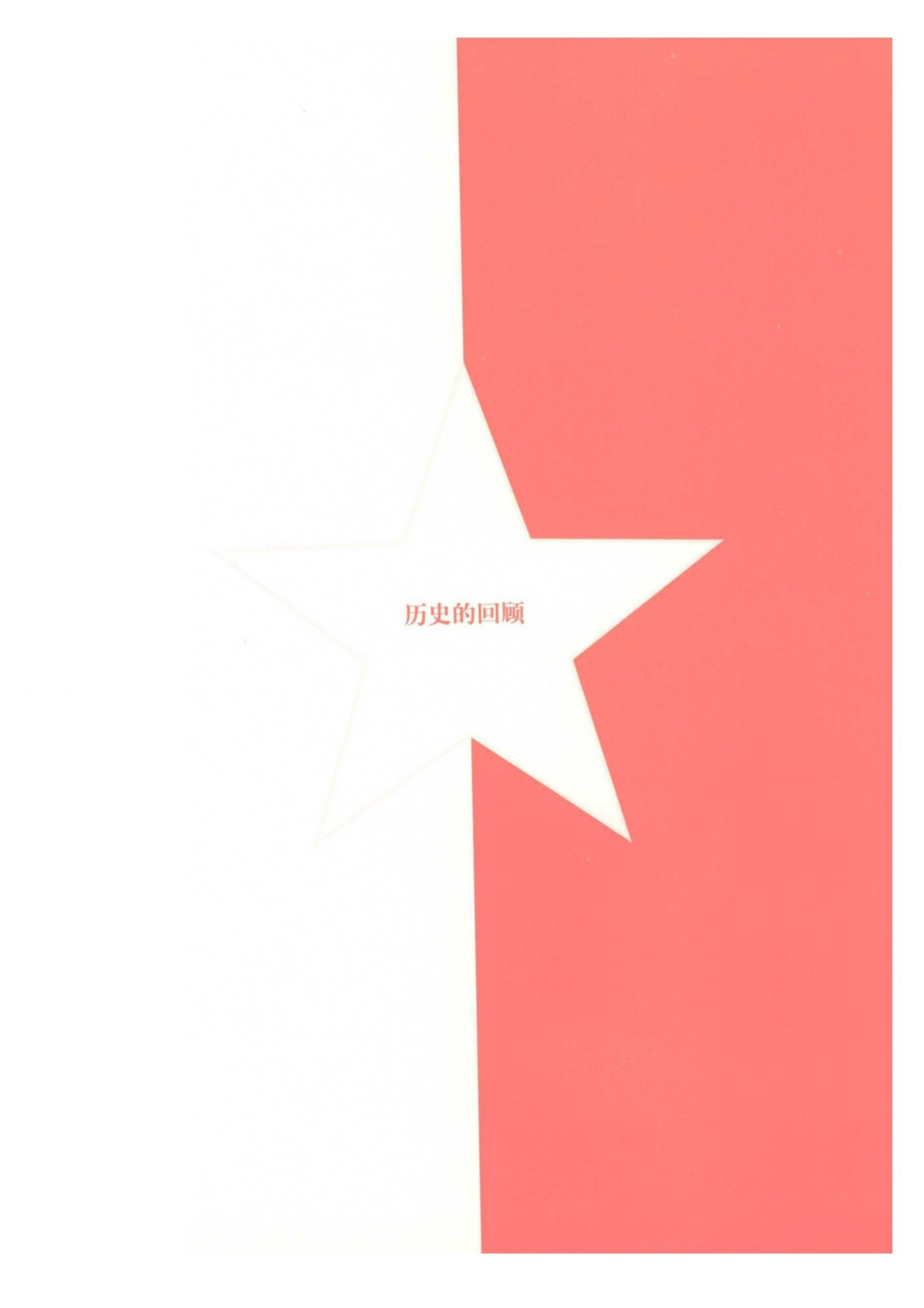
三是要突出特色，注重质量。光明日报是以文化为特色的中央党报，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阵地，是党联系广大知识界的桥梁和纽带。刊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是光明日报的职责所系、特色所在。在这篇文章组稿和刊发过程中，报社的同志和作者以及中央党校的理论工作者，历时半年，前后修改10次，字斟句酌，使这篇文章成为新闻、理论宣传中的一篇代表之作。今天，我们要增强报纸的活力、提升报纸的品位，突出特色、注重质量仍然是十分重要的。

四是要牢记使命，增强责任感。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刊发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党的新闻工作者、理论工作者等相互支持，密切配合，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理论勇气，撰写文章，投入讨论，积极宣传正确观点，严肃批评“两个凡是”，为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大力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作出了自己的

贡献。这种精神和品格是党的新闻工作者、理论工作者的优良传统，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坚持解放思想，我们取得了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成就；继续解放思想，我们将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我们一定要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继续解放思想，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努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在纪念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历史的回顾

纪念真理标准讨论20周年

王晨（原光明日报总编辑）

20年前，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在一版显著位置，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引发一场席卷神州大地并在世界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和个人崇拜的长期禁锢，打破了思想僵化、教条主义的沉重枷锁，为重新确立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奠定了理论基础，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理论和舆论上的准备。三中全会是一次历史性转折。从此，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开辟了新的时期，走上了新的道路，创立了新的理论，开始了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原因的。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向何处去？这是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一个严峻问题。这个问题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如何从十年内乱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中摆脱出来？另一方面，在我们关起门来折腾时，周边国家和地区迅速发展，我们再也不能耽搁了，怎样加快发展，迎头赶上？然而，历史在徘徊中前进。而前进中的种种障碍，有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两个凡是”。主张和坚持“两个凡是”，实际上就是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依然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搞个人迷信和教条主义。这样，我们的党和国家就没有

生机，没有活力，就会停滞不前。很显然，要前进，要发展，就必须“让思想冲破牢笼”，坚决反对“两个凡是”。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主张“两个凡是”的论争，就这样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敬爱的邓小平同志是真理标准讨论最为坚定有力的支持者和领导者。1977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应该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党的工作，并多次同党内同志谈话，说明“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在受到许多人赞同的同时，也受到坚持“两个凡是”的领导人的压制。在讨论面临夭折危险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伟大气魄，旗帜鲜明地支持了这篇文章，支持了这场讨论。他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引导、推动讨论在全国范围逐步展开。特别是在那篇实际上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邓小平同志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来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又说：“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这个评价，深刻阐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这场讨论的实质内容和重大意义。

在20年前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讨论中，党的新闻工作者、理论工作者、科学工作者等相互支持，密切配合，在邓小平、胡耀邦等领导人的领导支持下，顶住沉重的压力，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极大的理论勇气，撰写了包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内的数百篇文章，积极投入讨论，宣传

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严肃批评“两个凡是”等错误思想及其造成的危害，努力恢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为这场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在20世纪的历史上包括思想史、新闻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从真理标准的讨论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特别是在重大历史关头，在党和国家的全局工作中，新闻工作具有极端重要并且不可替代的作用，肩负着澄清理论是非，划清重大界限引导社会舆论，引导人民群众的重大责任。什么叫政治家办报，什么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什么叫与党和人民休戚与共，真理标准讨论中的新闻工作者以自己无私无畏的精神和坚定果敢的行动作出了回答，向党和人民交了一份合格的答卷。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为真理标准讨论作出特殊贡献的已故本报原总编辑杨西光同志，并代表光明日报社全体员工表达对他的崇高敬意和深切怀念。

真理标准讨论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回首20年，可以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都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密切相关，也可以说，都与真理标准讨论带来的思想大解放密切相关。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改革、建立经济特区、开发浦东，到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公有制实现形式及其分配方式的多样化，等等，无一不是冲破了各种思想束缚，坚持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尤其是在怎样认识社会主义，如何建立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在改革开放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上，在如何评价改革的得失成败的问题上。在坚持什么样的学风，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重大问题上，我们每前进一步，提高一步，都伴随着思想观念的新突破。如果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保证，就不会有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不会有今天经济的繁荣发展、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也不会有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的显著增强

和社会的全面进步。20年的伟大实践充分证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实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所在，是使我们党焕发蓬勃生机与活力的法宝，是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须臾不可离开的锐利武器。这正是真理标准讨论20年来给予我们的最可宝贵的启迪。

在纪念真理标准讨论20周年的时候。我们高兴地看到，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就举世瞩目，我们伟大的祖国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一个发展时期，亿万人民正满怀信心准备跨入新世纪。然而，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由于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已到关键时期，长期困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尚未完全解决，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中某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问题有待彻底突破，各种思潮也会有所表现。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始终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我们必须全面深入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高高举起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更加自觉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尊重实践，尊重群众，理论联系实际，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发展，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全面推向前进。作为党的新闻工作者，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新闻的党性原则；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全面深入宣传“十五大”精神，掀起邓小平理论学习新高潮；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加油鼓劲；满腔热情地弘扬社会正气，生动有力地宣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坚持正确导向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新情况、新问题，开拓创新，把报纸办得生动活泼，富于特色。我们要牢记新闻事业的神圣使命，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更好地为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服务，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为高举伟大旗帜、推进伟大事业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和智力支

持，创造新业绩，作出新贡献，迎接新世纪。这也是我们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最好纪念。

(此文为《光明日报与真理标准讨论》一书的序，
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出版)

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序曲

——谈“实践标准”一文的写作、修改和发表过程

胡福明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来，已经有不少同志写文章，谈论这篇文章的写作、修改和发表过程。由于各人知情程度不同，所处地位不同，也由于出发点不同，所以议论也不尽相同，许多情节各谈各的，也有一些是道听途说、想当然的言论。于是有同志劝我，也出来讲讲这篇文章写作、修改和发表过程的真实情况。我想讲讲情况也好，让读者了解得更多些。不过，第一，我只讲自己亲身经历的事，讲我想的，讲我做的，讲我亲身听到的，不是我亲自参与的我不讲；第二，我想着重讲讲文章主题、观点、内容的形成过程。这一方面，似乎还无人讲过。虽说今天看来，文章的主题、观点、内容，是很浅显的、容易理解的。但在我当年构思该文时，却是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研究的。报纸上一篇文章引起那么大的轰动，是罕见的；事隔多年，人们对这篇文章的写作、修改与发表过程，有那么大兴趣，也是很少有的。我希望，文章中谈到的同志，出来纠正我的不实之词。

一

(一)我怎么会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粉碎“四人

帮”，举国欢腾，中国人民感到又一次解放了。此景此情，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能体会到。“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给党、国家、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四人帮”恶贯满盈，人民异常痛恨“四人帮”，自觉奋起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

我也积极参加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我当时是南京大学哲学系的助教，吃尽了“文革”的苦头。1966年6月，我就被打成“匡亚明黑帮”的一分子，此后的遭遇，大家清楚，批斗、游街、扫厕所，祸及全家。

所以，从“文革”开始，我就是“文革的对象”，而不是“文革的动力”，当然没有资格参加“造反派”，也没有参与造反活动。我当时31岁，历史清白，家庭出身下中农，只有穷亲戚。由此，我算作“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高校恢复招生后，我继续教书，负责全系的教学工作，在“批林批孔”中，又成为“复辟回潮”的典型被批判。当然，那时我还幼稚，也受“左”的影响，讲过违心话，做过违心事。但我始终不理解为什么要搞“文革”，始终怀疑“文革”的合理性，认为林彪、江青一伙才是野心家。以上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些老师是清楚的。

由于上述原因，我积极参加了批判“四人帮”的斗争。我在南京大学揭批“四人帮”的第一次大会上发言（《人民日报》有报道），我在江苏省揭批“四人帮”的第一次万人大会上，第一个发言，揭批“四人帮”及其在江苏的代理人（《新华日报》有报道）。从1977年12月起，我在《南京大学学报》连续发表多篇文章，批判“四人帮”，有《评张春桥的“全面专政”》《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论》，后一篇文章曾在《人民日报》1978年3月摘要发表（约2500字）。我着重于从政治上、理论上揭批“四人帮”。

（二）1976年底，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如何从根本上批判“四人帮”，以推动拨乱反正。林彪、“四人帮”的罪行罄竹难书，他们篡改、歪曲、伪造马列主义的谬论数不胜数，他们的罪行与谬论不可分割，他们是适应“文革”

的需要窜上政治舞台前沿的，他们是推行“文革”的理论、路线、政策的急先锋。大家心里明白，批判林彪、“四人帮”必然要牵涉到“文革”，批判“四人帮”是平反冤假错案、拨乱反正的需要。因而要动员广大群众干部一起批判林彪、“四人帮”。同志们从各个方面批判林彪、“四人帮”，推进拨乱反正，是必要的，但要抓住一个根本问题批判林彪、“四人帮”。抓住了这个根本问题，就能发动群众以破竹之势揭批“四人帮”，彻底进行拨乱反正。这个根本问题是什么呢？我苦苦地思索着。

“两个凡是”成为进一步深入揭批“四人帮”，为南京1976年3月悼念周总理群众运动、为天安门“四五”运动平反的严重障碍。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的《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突然降温、刹车，根子就在当时中央推行“两个凡是”的方针。

粉碎“四人帮”后，我以为“文革”要结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要开始了，中国历史发展要出现重大转变。“两个凡是”出来后，问题复杂了。“两个凡是”的本质是维护“文革”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当时，我认为，中国已处于重大历史关头：要么坚持“文革”的理论、路线、政策，那么中国人民将陷入苦难深渊；要么改弦更辙，否定“文革”的理论、路线、政策，重新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党、国家、民族处于十字路口。我作为一个党员，一个理论工作者，理所当然地反对第一种前途，争取第二种前途。至此，我认识到必须批判“两个凡是”。中国的出路就在否定“两个凡是”。否定“两个凡是”，才能彻底拨乱反正。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摸索，到1977年3月初，我才找到了拨乱反正的根本关键：批判“两个凡是”。

（三）我找到了阻挠拨乱反正的根子：“两个凡是”。如何批判、否定“两个凡是”呢？当时，此事还真不好办。今天，“两个凡是”已是“老鼠过街，

人人喊打”了。可在当年，它是1977年2月两报一刊社论的主题，是当时中央的方针。没有一个报刊能发表公开批判“两个凡是”的文章。怎么办呢？我认为，要“绕弯子”，找个“替身”。这个“替身”就是林彪的“天才论”、“顶峰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谬论。我认为，“两个凡是”与“天才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谬论，是一脉相承的，是一个东西，只是说法不同而已。所以，拿“天才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来作“两个凡是”的“替身”，予以批判，是可以的。虽然比较含蓄，但人们也会看明白，而批判林彪的谬论是无人可以反对的。

（四）批判对象确定了，究竟怎么批判呢？写篇批判“句句是真理”的文章，这种文章太多了，难以使人们获得新意，不会起多大作用，达不到否定“两个凡是”的目的。怎样才能有力地批判“两个凡是”呢？怎样才能使人抛弃“两个凡是”呢？必须提出科学的论点，与之对立。虽说，“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但“破”并不等于“立”，“破”了也未必就能“立”；而没有“立”，“破”也“破”不成。必须要提出一个与“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两个凡是”针锋相对的科学论断，这样有破有立，才能给人们以启发，才能否定“两个凡是”。提出什么观点，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呢？当然是提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哪一个基本观点呢？这又是个难题。

我认为只有剖析“天才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两个凡是”的内容、本质，才能确定与之对立的观点。“两个凡是”，无非是说，毛主席的指示、决策，都是先验地正确的，不需要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因而必须始终遵循，必须永远维护，毛主席是超越人类认识规律的。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是唯心论形而上学的变种。

弄清了“两个凡是”的本质，再探索与之对立的正面观点就容易了。这时，我有两个选择：一是宣传“实践论”；一是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经反复研究，我选择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论点，批判“两

个凡是”。因为，实践论题目太大，内容太广泛，一篇文章容纳不了，同时，广泛的内容会淹没实践标准，冲淡主题，磨掉文章锋芒。提出真理的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对立，针对性强，切中“两个凡是”的要害，对读者来说实践标准比较新鲜，有吸引力。我认为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作为基本观点，是无懈可击的，是保险的，因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同时，我认为，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科学观点，又可以帮助干部群众运用这个科学观点去分析研究“文化大革命”，推动平反冤假错案、拨乱反正。以正面立论为基础，批判“两个凡是”可以脱出大批判文章的窠臼，也更有力量。今天看来，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批判“两个凡是”是很自然的，是简单的。但在当年，我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分析研究、反复比较后，到1977年7月初，才确定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作基本论点，来批判“两个凡是”。

(五)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作为题目，文章怎么写呢？我再次阅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标准的论述，重读了《实践论》。真理的实践标准有两方面内容：一是“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任何理论是否正确，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作结论；二是实践标准的辩证法，即实践标准的相对性与绝对性、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这篇文章的任务是否定“两个凡是”，因而重点论述前一方面，对后一方面点到即止，以防止片面性；理论联系实际是一个重要原则，也要提到，但不展开。

(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鲜明地针对“两个凡是”。然而，论述实践标准的一般理论，我总觉得针对性还不够强，还不够尖锐。因为，人们并不一般地否认真理的实践标准。有些人口头上承认真理的实践标准，但是认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决策，天然就是正确的，无需经过实践的检验，实践标准对毛主席不适用。我相信，写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同志，就是这种人。因此，要突出强调伟大导师的认识也受人类认识规律的制约，不能超越人类认识规律，他们的理论、观点是否正确也必须经过社会实践的反复

检验。但是当时明确地这么说不行，一些人恐怕接受不了。我终于想出了一个论点：马克思恩格斯是自觉运用实践标准检验自己的理论，以证实、修正、发展自己理论的典范。马克思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导师，他们的个别观点有失误，也要修正，而且是自觉地根据实践检验进行修正。马克思恩格斯是这样，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当然绝不应有例外。

(七)至此，我以为分量还不够。于是强调一切理论，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经证实后才成为真理，没有例外。所以，“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没有其他标准；另一方面，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没有一种真理可以不受实践的检验证实而成了真理。自然科学的假说，是经过实践的检验，证明其正确后，才成为真理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真理，也是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检验，证明其正确后才成为真理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就在于经过实践的检验证明是正确的。

(八)从各方面论述了实践标准后，进而批判“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这方面，主要是剖析“句句是真理”等谬论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本质及其荒谬、危害。对于理论联系实际，我有个看法：理论联系实际，首先在文章基本论点的针对性，要直接针对所要否定的对象，抓住对象的要害。在论述基本观点后，分析批判对象的本质进而强调肃清“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流毒。所以，理论联系实际是体现在整篇文章中的、体现在文章的基本观点和每一个论点中的，不仅仅在于剖析错误观点本身。

(九)这篇文章的主题是树立真理的实践标准，否定“两个凡是”。表面上看这是哲学理论的文章，实际上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极为敏感。如何选择组织材料，实在是个复杂问题。我确定了一个原则：打语录战。这是当时通行的方法。主要论点，都引用马列著作的原文，完整准确。我引用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引用《实践论》的一段话，来阐明“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观点；我用了《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用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话，来说明他们自觉运用实践标准来检验自己的理论，修正自己两个不正确

的观点；我引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二章中，恩格斯关于哥白尼太阳系学说由科学假说通过天文观察证实为科学理论的论述，等等。论点出自马列著作，论据也出自马列著作。这是当时写文章的通行方法，也是容易说服人的方法。大家知道，当时教条主义盛行，不得不用这种方法。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十)到1977年7月上旬，文章的主题、观点、布局已基本形成，正要动手收集研究材料、拟定提纲时，妻子检查出肿瘤，要住院开刀。经多方奔走，于7月上旬，妻子住进省人民医院。全家都忙起来了。岳母操持家务，女儿14岁，儿子10岁，下午要到医院陪妈妈，而我白天去采购西瓜、鱼虾。当年买西瓜也是件费力的事，采购鲜活鱼虾更难。晚上我去医院值班。高温酷暑，无法睡觉，也没有地方睡觉，脑子里又记挂着写文章。于是，就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和《毛泽东选集》拿到医院，就着走廊上的灯光阅读，挑选语录、资料，蹲着身子在椅子上草拟文章提纲。写出每一部分的论点、语录、论证材料，记下引文的出处。写得很细，改了又改。瞌睡了，就把三张椅子拼起来睡一会。经过了五六天，提纲写成了，妻子也出院了。这时已是暑假，我坐下来整理提纲，大约用了一周时间，写成初稿，这时已是7月底了。我的习惯是，稿子写好后，放几天，然后再修改。经三次修改后，于9月初寄给《光明日报》哲学组王强华同志。这期间，开了第十一次全国党代会，我发现，党代会的报告，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肯定“文革”，维护“文革”的理论、路线和政策，而且说“文革”要七八年再来一次。因而我觉得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更迫切了。

教员搞理论研究，是很辛苦的。教员的主要任务是教书、上课、辅导。当时我是系副主任，主管全系教学科研工作，很忙，搞科研只能见缝插针。而且，当年教员少，也不提倡科研，搞科研更难。写这篇文章正好遇上暑假，是个好机会。

(十一)我认识王强华同志是在5月份。那时，南京召开理论讨论会。大会

讨论在一个问题上发生了争论：有同志认为：“唯生产力论”是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观点，应当批判；我则认为，“唯生产力论”是历史唯物论的根本观点。“唯物论”仅说物质是世界的本源，并不否认精神的存在和巨大反作用，

“唯生产力论”仅说生产力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动力，并不否认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在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指出生产力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正是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论的出发点。所以反对“唯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论。“文革”中批判“唯生产力论”是为了搞阶级斗争为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全国人民的头等任务。在这次讨论会上，争论得很热闹，我曾两次上台发言。王强华同志参加了这次讨论会，但当时我们并不认识。散会后，有同志为我们作了介绍，在会场上谈了一会。强华同志对这场讨论很有兴趣，似乎赞成我的观点。他约我为《光明日报》写稿，我答应了。他没有向我提出任何题目，仅仅是约我写稿。在我写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文章后，想起了王强华同志的约稿，于是在1977年9月初，就把稿子寄给《光明日报》哲学组。

(十二)这篇文章，是我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自己选定的题目，自己形成的主题，自己提出的观点，自己寻找的材料，自己拟定的提纲，自己撰写的文章。这期间，没有人知道我在写这篇文章，我也没有找人讨论过。南京大学的政治气氛是很好的，在1976年清明节前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南京革命运动中，南京大学的师生是带头的，而哲学系的许多师生又是骨干分子，曾受到过“四人帮”的迫害。粉碎“四人帮”后，批判“四人帮”的热情很高，要求拨乱反正的愿望十分强烈。这种愿望当然也鼓舞着我积极参加批判“四人帮”的斗争。然而，我撰写真理标准文章的过程中，没有与其他同志讨论过。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章，确实如许多同志指出的，没有理论上的创造，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高校的每个哲学教员，都通晓这个

基本观点，更不用说理论家了。那么，我于1977年夏天写作实践标准的文章，有什么特点呢？第一，我于1977年6月间抓住了阻挠拨乱反正的主要障碍——“两个凡是”，这“两个凡是”是当时党中央的方针，而这“两个凡是”又是盛行多年的“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翻版，流毒很广很深，是束缚人民的精神枷锁，也是政治枷锁；第二，我找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批判“两个凡是”；第三，我以马克思恩格斯自觉运用实践标准检验自己的理论，证实、修改自己的某些观点作典范，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导师所说的也不是“句句是真理”，他们的理论也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才是真理，以此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批判、否定“两个凡是”；第四，我阐明一切理论，都必须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才成为真理，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第五，我认真对待这个问题，抓住这个问题，于1977年6月至8月，写成了七八千字的文章，并于同年9月及时寄给了《光明日报》；第六，我力图通过这篇文章，把实践标准作为人民群众参加拨乱反正的理论武器。推动我这样做的原因，是“文革”给人民、国家和党造成的巨大灾难，启迪我的是人民、广大党员和干部要求拨乱反正的强烈愿望。这篇文章确实没有创造。按照传统的看法，理论上的创造、发明权属于伟大领袖或权威部门，一般干部、理论工作者只有积极宣传的资格，似乎现在还有这种看法。不管怎样说，人民群众有许多杰出创造，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然是经过了加工的，但发明权仍属农民)，发展乡镇工业；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上，理论界贡献颇多。群众的这些创造，今天看来都已不新鲜。问题恰恰出在“时间问题”上。一切社会活动都在时间中进行，从而构成历史。凤阳农民是在1978年搞包产到户的，万里同志在当时就支持农民的创造；苏南农民是在“文革”期间创办乡镇企业的，那里的各级干部是在当时情况下支持乡镇企业的。时间，是个严肃的问题，写新闻首先要写明时间，交待事件是何时发生的。国际上评诺贝尔奖，也要审查某项发现或发明的时间，何时何人首先取得某项发现或发明。把时间搞错了，把时间抹掉了，

历史就弄不清了，因此，不应模糊“时间”。

二

(十三)文章寄出后4个月没有消息。1978年1月19日，王强华同志给我一信。随信寄来两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小样。他告诉我：“我去年9月离京，到上海、南京出差，12月刚回来。”他说，曾到南京大学找过我一次，刚好我不在学校。他信中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已粗粗编一下，主要是把原稿第一部分压缩了。突出后两部分，但似觉长了一些。是否请您看看可否再删一些，有些地方，文字的意思有些重复，可否精练一些。另外，这篇文章提的问题比较尖锐，分寸上请仔细掌握一下，不要使人有马列主义‘过时’论之感的副作用。文章请尽快处理寄来，争取早日刊用”。从信中看出，王强华等同志是支持这篇文章的。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已经意识到“这篇文章提的问题比较尖锐”，因此要我在“分寸上再仔细掌握一下，不要使人有马列主义‘过时’论之感的副作用”。他们的可贵精神也在于，看到“这篇文章提的问题比较尖锐”，而敢于始终如一地坚持发表这篇文章。

如果文章宣扬马列主义“过时”论，那是必须坚决反对的。如果文章“使人有马列主义‘过时’论之感的副作用”，也是原则性的重大错误。我认真地、反复地研究了文章。自认坚持马列主义，没有错误，没有片面性，不会产生副作用。但我明白，文章本身很尖锐。一是提出真理的实践标准，反对两报一刊社论提出的“两个凡是”；二是坚持真理的实践标准，揭露“文革”的错误，推动拨乱反正，重新研究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但这是文章本身的主题，是文章的基调和目的。所以，我对文章修改得很少，只是尽可能把话说得周到些，文章的主题、基本观点不能修改。编者要求我再删掉一些，我也没有进一步论述。

在2月、3月、4月，强华同志都给我寄文章的小样，让我修改，然后寄去，我都照办了。这几次修改，改动不大。《光明日报》哲学组的同志对修改

文章没有提出进一步明确要求。修改的目的，似乎在使文章全面正确，无懈可击，不给人以把柄。我也感到奇怪，为什么一篇理论文章反复修改，而迟迟不予发表？

(十四)3月13日，王强华同志又给我一信。他说：“您说要来北京开会，不知何时可到京？”“您的文章，基本上已定稿，但现在看来，联系实际方面的内容较少，原想等您来京时面商，可老等也不见您来，只好再把小样寄给您，请抓紧补充，以便早日刊出！”

“您的文章立意是很清楚的。但为了使文章更加(具有)战斗性，请适当增加些联系实际部分。由于‘四人帮’多年来抓住片言只语吓唬人，束缚人们的思想，致使一些同志至今仍不注意实践经验，不从实际出发，而是从定义出发，从概念出发，离开具体条件硬套某个指示，结果‘心有余悸’，许多工作搞不好。请考虑能否把这样意见的话加上。”

这封信表明，《光明日报》理论部的同志认识发展了，要求加强理论联系实际。于是，我在文章最后，加了一大段话，这里摘录一部分：“十年间，‘四人帮’主观唯心主义横行……他们抓住片言只语吓人打人，到处设置禁区，给人套上枷锁。所以，至今仍有一些同志，做工作，解决问题，既不总结实践经验，又不倾听群众意见，从概念出发，从原则出发，不问具体历史条件，把个别词句奉为教条，生搬硬套，明知不符合实际，也不敢从实际中引出新结论；遇到新情况下的新问题，不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进行调查研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是翻书本、找语录，把个别词句作为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管是否符合当前实际，不问能否做好工作；判断是非，不以实践为标准，不拿事实作根据，而用片言只语作准则，总之，心有余悸……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深入揭批‘四人帮’，肃清其流毒，解放思想，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冲破‘四人帮’设置的禁区，把我们的革命工作做好。”从1977年夏天做真理标准的文章，到1978年3月，批判“四人帮”的斗争毕竟在继续深入，我们的认识也在

不断深化，所以会加上这么一段话。但是，在《光明日报》4月2日的大样上，还是删掉了最尖锐的几句话：“判断是非，不以实践为标准，不拿事实作根据，而以片言只语作准则，总之，心有余悸。”大家可以看到，这几句话，正是批评“两个凡是”的。我们应从当时的政治环境出发看问题，理解编辑的苦衷：既坚决支持实践标准，批判“两个凡是”，又不便于把话说得太明白。

(十五)4月，《光明日报》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态度有了重大变化，主导者是新任总编辑杨西光同志。

4月中、下旬，我与南京大学哲学系两位同志一起，到北京左家庄朝阳区委党校，参加哲学研究所召开的全国哲学讨论会。当晚，《光明日报》就把我接去，参加一个会议。

王强华同志向我介绍了背景。他说：您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文章，本已定稿了，并已排出清样，在4月2日刊出(后来他把4月2日的清样给了我)。因为有不同意见，有争议，所以送给新任总编杨西光同志审阅。杨西光同志看了文章后很高兴，很赞赏这篇文章。他认为，这篇文章放在哲学版发表，可惜了，要放到第一版去，作为重要文章发表，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文章还要修改，要加强联系实际，更有战斗性。原来想约你来北京修改，现在你来北京开会，正好来修改文章。

在《光明日报》总编辑办公室，我见到了杨西光同志、马沛文同志、孙长江同志，在座的还有王强华等同志。杨西光同志说明了意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章，我把它从哲学版上拿下来，要作为重要文章放到第一版发表，因此，要进行修改，请大家提修改意见。他说，已同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联系，理论研究室也在研究这个题目，因此请孙长江同志来参加讨论，帮助修改。当时，大家提了一些修改意见。归纳起来说，有几点：第一，要加强理论联系实际，批判“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冲破“四人帮”设置的禁区，打碎“精神枷锁”，宣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加强针对性、战斗力，对准“两个凡是”。第二，文章的论述要更充分一些，再深一些，同时理论上

要更严谨、更完整一些，不能授人以柄。讨论结束时，杨西光同志要我按照大家提的意见，继续修改。这次会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理论部主任马沛文同志的发言。马沛文同志主张公开点名批判“两个凡是”。

当时，我正参加全国哲学讨论会。讨论会中的一个重点题目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集中表现为阶级斗争。一种观点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集中表现为阶级斗争，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阶级斗争的根源。我的观点与此相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是阶级斗争的根源，不表现为阶级斗争，因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人民民主专政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体现为人民内部矛盾。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的阶级斗争是剥削阶级残余、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国外敌对势力，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我的这种观点，被称为“脱钩论”，实际上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阶级斗争。我认为现代化建设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头等任务。当时，我积极参加讨论，讨论会结束时还作了大会发言。我的发言写成文章，发表在1978年《哲学研究》第6期上。

白天参加哲学讨论会，晚上则修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章，哲学研究所的邢贲思、陈筠泉、李今山等同志，都知道我在修改文章。同宿舍的周抗(上海社科院)、黎克明(华南师范学院)、张明(曲阜师范学院)同志，也知道我在修改文章。南京大学哲学系的李华钰、马淑鸾同志，更知道我在修改文章，还读过我的修改稿。那时，我晚上修改好文章，第二天早上《光明日报》通讯员就把稿子拿走，傍晚又把修改后的小样送来。这样往返了三四次。关于修改的内容，在后面一并叙述。

哲学讨论会结束后，杨西光同志又接我到《光明日报》招待所(在光明日报社西边)。当时他和夫人也住在这个招待所。西光同志曾多次来看我，同我谈了多次，谈话内容下面再说。

在修改过程中，我曾去了《人民日报》理论部，见到了何匡、汪子嵩同志。他们看了文章的小样，认为文章很好，有说服力。何匡同志说：“文章有

战斗力，《光明日报》如果不用，我们《人民日报》发表。”

按照杨西光同志的嘱咐，我去中央党校看望吴江同志，听取吴江同志的意见。吴江同志充分肯定了文章，向我谈了修改意见，他的基本观点是：加强理论联系实际，论证充分一些，文章写得周密一些，以增强战斗力。他的意见很好。在他桌子上，放着杨西光同志给他送去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一份小样，吴江同志在上面写了几句话，我随即在《光明日报》的稿纸上记了下来：

“杨西光同志：

写得不错，是一篇有力的说理文章。

吴江4月22日”

这张稿纸，我还保留着，用科学方法当可鉴定《光明日报》当年的稿纸与我当年的字迹。

三

（十六）“五一”节快到了。我到北京已十多天了，学校工作很多，想节前回校。我向西光同志谈了想法。杨西光同志与我作了一次长谈。他说：“文章已改得差不多了，你要回去也可以，下面就交给中央党校的同志帮助作点修改了。”

杨西光同志很真诚，与我谈了很多。他说：“不久前，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杨西光同志‘文革’前是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学习结束时，胡耀邦同志找我谈话，要我到《光明日报》工作。耀邦同志说，北京四大报刊，二比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是积极揭批‘四人帮’，推动拨乱反正的，《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是执行‘两个凡是’的，现在要你去《光明日报》工作，就是要去改变《光明日报》的面貌，把二比二变成三比一。”他又说：“《光明日报》改变面貌，要抓文章。他们给我送来了你的文章。我看了文章，内容很好，很重要，放在哲学版可惜了，要放到第一版去。

《光明日报》改变面貌就从这篇文章开始。”

杨西光同志接着说：“这篇文章，要请胡耀邦同志审定。他站得高。他在中央党校成立了理论研究室，办了个内部刊物，叫《理论动态》。发表在《理论动态》的文章，都要经过胡耀邦同志审阅批准。所以，我们这篇文章要交给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修改，请胡耀邦同志审阅，先在《理论动态》发表，《光明日报》第二天就公开发表。《理论动态》是逢五逢十出版，他们五日刊出，我们六日见报。他们十日刊出，我们十一日发表。”至此，我才懂得，杨西光同志为什么要找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帮助修改文章，文章为什么先要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刊出，然后《光明日报》公开发表，是为了请胡耀邦同志审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杨西光同志能不能审定这篇文章？以他的政治理论水平，完全有能力审定这篇文章。那为什么要请胡耀邦同志审定？因为这篇文章很重要，是批判“两个凡是”的，所以杨西光同志要请耀邦同志审定。

杨西光同志还同我商量了一个问题。他说：“福明同志，我要跟你商量一个问题。这篇文章发表在第一版，不以你的名义发表，而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这样可以加重文章的分量。我们没有约你写这篇文章，但是现在我们聘请你作《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你就是《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你看行不行？”我爽快地表示：“行。”我说：“我写这篇文章，是为了批判‘两个凡是’，为了拨乱反正。文章发表后，能起更大作用就好。”当时，我只考虑如何批判“两个凡是”，推进拨乱反正。到4月底，在文章的小样上，都署我的名字，文章发表时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让人觉得这篇文章来头很大，特别引人注目。这正是运用“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所希望达到的效果。以上情况，《光明日报》的同志，大概是知道的。我想，聘请《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应该是总编辑杨西光同志职权范围内的事。

杨西光同志还跟我谈了文章发表的计划。他说：“发表这篇文章，已作了安排。先由《理论动态》内部发表，第二天《光明日报》公开发表，然后《人

民日报》《解放军报》第三天转载，新华社向全国发稿。我们已经商量好了。要批判‘两个凡是’，推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这时我才知道，围绕真理标准这篇文章，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计划。这已经超出了《光明日报》发表一篇文章的范围。

(十七)我是1978年4月29日离开北京的。在这以前，同志们只是对文章提意见，由我修改文章，《光明日报》编辑作过修改，主要是文字修改，其他同志还未动手修改。我离开北京后，才由孙长江老师动手修改(到孙长江老师手里后，理论研究室究竟有几位同志参与讨论、修改，我不清楚)。为了使读者了解修改情况，我先把文章第一个小样的主要内容介绍一下，然后把几次修改的内容介绍一下。当然，最好把原稿小样印出来，但是太多了，难办。

《光明日报》1978年1月14日的小样是：《哲27一哲(四五—)七八、一、十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送审稿)胡福明》，稿子是由王强华同志1978年1月19日寄来的，他信上说：只是对第一部分作了压缩，突出后两部分。编者并未增加内容，可以说完全是我的观点。那么，我文章的内容是什么呢？

第一，文章主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批判“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唯心论形而上学。

第二，文章论述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观点，说明没有其他标准。

(1)文章说：马克思于1845年创立新世界观时，就提出了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文章引用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文章分析说：“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对象，不能靠理论争论解决，只能靠社会实践的检验来解决。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它的一个特征。”实践标准区别真理与谬误，证实真理，否定谬误。

(2)文章说：“实践标准也是辩证的”。文章引用了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的一段话。文章对此作了介绍。然后强调“任何理论，是真理还是谬论，归根到底要由实践来检验。社会实践是真理与谬论的试金石。只

有社会实践才能彻底粉碎唯心论、不可知论和一切谬论。只有社会实践才能树立真理的权威。因为，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理论与客观事物相比较，判别理论是否符合事物的本质。”

(3)文章说：“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文章说：“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大规模的宣传证明不了真理，许多人的赞成证明不了真理，强大的权力证明不了真理，而且已被过去的实践证明了的真理，也不是今天检验真理的标准。因为，任何事物都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文章对于已有的真理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用认识史上的材料作了大量分析。因为教条主义的手法之一、“两个凡是”的手法之一就是“从马列主义著作、毛主席著作中摘取片言只语，作为论证的工具。文章说：“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科学原理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因为它还是在理论的范围内，不能回答理论是否符合客观存在的客观对象的问题。”

(4)文章以科学史说明只有社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管是自然科学理论，还是社会科学理论，都必须经过实践证明，才算真理，才算科学，否则是不算的。”这里引用了《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7页的一段话。文章说，哥白尼学说在300年里一直是科学假说，只是当加勒于1846年发现了海王星时，才被证实为科学真理。文章强调：马克思主义“同样必须经过社会实践检验，而且确实经过了千百万群众的长期实践的检验，才成为真理”。文章分别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指导广大群众的长期革命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的，才成为真理，才战胜反动派的围攻，才战胜机会主义。

第三，文章说：马克思主义导师是自觉以革命实践检验自己的理论的模范。文章说：“马克思主义的导师提出了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并自觉运用实践标准检验自己的理论，发展理论，以至修改个别结论。”文章以马克思恩格斯对待《共产党宣言》的态度作说明。文章说：“1848年《宣言》发表后，他们在四十五年中一直根据实践来检验《宣言》，《宣言》的七篇序言是生动的说明。”文章引用《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的一段话，说明经过25年阶级斗

争的实践证明,《宣言》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还是完全正确的。随后,文章说马克思恩格斯自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修改。文章引用了恩格斯在《宣言》1888年英文版上加的一条注释,修改《宣言》第一章第一句话:“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文章说:“这个为恩格斯后来多次谈到的重要修改,把上百万年的无阶级社会与几千年的阶级社会区别开来,说明了阶级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对《宣言》的科学态度,表明了他们是怎样严肃地对待自己的学说的。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学说一开头就是完美的,决没有把它看作‘绝对真理’,而始终用辩证法观点看待自己的学说,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他们虚心吸取别人的科学成果,包括资产阶级学者所提供的材料。他们提出了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并身体力行,始终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证实、丰富、修改自己的观点。他们毫无偏见。尊重实践,尊重事实,尊重科学,是他们唯一的态度。马克思主义首先是科学,所以才能成为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态度。马克思主义与任何盲从、迷信,是水火不相容的。哪里有盲从,哪里有迷信,哪里就没有科学,哪里就没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就是承认我们的认识可能犯错误,需要由实践来纠正。如果认为认识是不犯错误的,也就取消了实践标准。”文章还引用了《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9页的一段话,说明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理论的错误。

第四,批判“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文章说:“神学家是公开宣传宗教教条,王明、林彪、‘四人帮’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宣传宗教教条。他们都否认马克思主义来源于实践,否认马克思主义要在实践中受检验,在实践中丰富、发展。”文章批判了王明的教条主义,引用了《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8页的一段话,文章继而批判林彪的“天才论”。文章说:“叛徒林彪鼓吹天才论,否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源于三大革命实践,宣扬‘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否认毛主席的指示需要到实践中检验、丰富、发展,反对实践标准”。文章最后批判“四人帮”的唯心论、教条主义,“一

句话，他们鼓吹主观唯心论，反对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否认真理的实践标准”。文章说：“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科学，还是把它当作宗教教条，这是一个根本的分歧。”文章认为：“‘四人帮’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宗教教条，跟王明把马列主义当作宗教教条完全一样，‘四人帮’背叛实践标准，迷信‘强权即真理’，‘造谣一千遍就是真理’的法西斯哲学，使用他们控制的宣传机器，大造反革命舆论，把实践中证明了的真理攻击为修正主义，把在实践中破产了的东西吹捧为真理；全盘否定解放后17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篡改历史、颠倒是非、捏造罪名、制造谣言，陷害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革命同志。”最后说：“但是，实践标准是客观的，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不仅是证实真理的最有力的手段，也是宣判修正主义和一切谬论死刑的权威。”文章第三部分集中力量批判了教条主义。

文章的上述几方面的观点，都是第一稿的内容，至此，还没有人提过修改意见。大家知道，这是《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基本观点，读过这篇文章的同志，当然回忆起当时所抓住的、所运用的观点，也是这几个基本观点，至今还有印象的也只是这几个观点。其他的论述不过是为这几个观点论证、服务的，想来已经淡忘了。

(十八)1978年1月至3月间，又改过几次小样。但我手头只有一份小样：《哲27—哲(四五一)七八、一、十四，一、二十六改，一、三十，二、二三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送审稿)胡福明》。这份小样是1月份寄给我的。

在这份小样上，我加了联系实际的话：“十年间，‘四人帮’主观唯心主义横行，搞乱了理论，毒化了思想，严重破坏了党的优良作风；他们抓住片言只语吓人打人，帽子乱扣，棍子横飞，到处设置禁区，给人套上枷锁。所以至今仍有一些同志判断是非，不以实践为标准，不拿事实作根据，而用片言只语作准则，总之，心有余悸，必须继续深入揭批‘四人帮’，肃清其流毒，解放思想，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理论与实践结合，实

事求是，冲破‘四人帮’设置的禁区，把我们的革命工作做好。”

在以后一稿《哲4》的清样上，加了一个前言：“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个问题早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解决了的。但是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的破坏，特别是他们控制下的舆论工具进行了大量的歪曲宣传，把这个问题又搞得混乱不堪。为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有必要重温革命导师的有关论述，学习革命导师的伟大实践，批判‘四人帮’的反动理论，进一步提高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这里概括地点出了文章的基本内容。

在《哲4》的另一份清样上，把文章由三部分改为四部分。这次修改，本着这样的要求：增加材料，进一步论证基本观点；深化观点，突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态度问题；进一步联系实际，加强针对性，批判“两个凡是”。这次修改较大，增加了约1500字。修改中，除了解释什么是真理、实践如何检验理论以外，补充了一些内容。第一，进一步揭露“四人帮”炮制“天才论”，捏造文艺、教育等各条战线的“黑线专政”论，伪造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必然变成走资派的“规律”，胡诌社会主义制度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基础”，捏造儒法斗争贯穿到现在的无稽之谈等等。第二，突出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把这作为文章的第二部分。在这部分中，强调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真理，就在于经过社会实践反复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是否正确，各国革命的路线是否正确，也必须由社会实践来检验。“凡是经过实践证实，推动革命发展的路线，就是正确路线；凡是在实践中破坏革命的路线，就是错误路线。”文章分别叙述了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经实践证明正确而取得胜利的历史，突出强调了毛泽东思想在斗争中经实践证明正确而取得胜利的历史。这一部分集中谈了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识问题。第三，为了进一步论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增加了门捷列夫化学元素周期表被科学实验证明的例子。特别是增加了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对《共产党宣言》作的一处重要修改，并引用列宁的话评价这个“重要的修改”。第四，文章补充了已有的真理不是

检验新的理论的标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指南，不是论证的工具。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发展，新的理论观点是否正确，不能用书本上已有的结论作为检验标准，而必须由实践来检验。文章以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的理论 and 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由实践证明其正确来说明，并以牛顿力学不能检验量子力学是否正确来说明。第五，文章最后加了一段话：“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至今仍有一些‘禁区’。所谓‘禁区’，就是不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事求是研究的问题，不能用科学方法去分辨是非的问题，而只能靠‘信仰’去解决。这是完全错误的，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面前，没有不可以研究的问题，没有任何‘禁区’。凡是‘禁区’，就没有实践标准，就没有科学，就没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盲从。”这次修改，肯定是在周扬同志在全国哲学讨论会讲话之前，因为，还没有加周扬同志提出的“科学无禁区”的论断。当时讲的“禁区”，就是指的“两个凡是”。

这次修改后，肯定还修改过几次。例如，《哲学十五之三末》这份清样上，我补上了“科学无禁区”这个论断。这个论断与我讲的“凡是有‘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是一致的。在这次修改中，我又加入了两句话：“是否完整地准确地掌握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要由实践来检验。是否正确贯彻了马克思主义路线，也要由实践来检验。实践标准是客观的，你否认它，它仍然存在着。”

这几次修改，强调几点：一是注重为实践标准增加有力的论证，同时说明什么是实践标准；二是增强理论联系实际，进一步论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都是经过实践检验而证明的真理；突出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批判两个“凡是”。我以为，讲真理的实践标准，就是要树立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反对迷信盲从。

(十九)我于1959年9月至1962年11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读书。孙长江是我的老师，给我们讲先秦哲学的一部分——《周易》。当我在杨西光

同志办公室见到他时，很高兴，我仍称他孙老师。此后，我们又见了几次面。他曾同我一起去中央党校看望吴江同志，还曾邀我到他家作了一回客。孙老师告诉我，他在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与吴江同志在一起。孙老师告诉我胡耀邦同志交给他们一个任务，要写一篇关于真理标准的文章，他们正在研究。他说，现在有了你的这篇文章，就不用再写了。可以肯定，当时中央党校还没有写成关于真理标准的文章，如果已写出真理标准的文章，就会立即送胡耀邦同志审阅。既然是胡耀邦同志出的题目，耀邦同志当然会立即定稿，并在《理论动态》发表。但是没有发生这回事。理论研究室写好了文章既不送耀邦同志审阅，又不发表，而要等一篇事先并不知道、外来的真理标准的文章，再把两篇文章合起来，然后发表，这种事是没有的。但是，由于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在研究耀邦同志交给的任务，所以修改我的文章就较顺手。

孙长江老师下了很大力气，修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这里谈谈他作的修改。

第一，把文章梳理了一下。我修改后的文章是四部分。孙长江老师对四部分作了调整。第一部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集中阐述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观点。第二部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批判“四人帮”的谬论，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经过实践检验证明了的客观真理，对实践有巨大的指导作用，而是否正确指导实践，仍需经过实践检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批判修正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就因为它们是经过长期的实践证明了的真理，而且用马列主义原理去批判修正主义也不能离开实践；实践是不断发展的，从实践概括出的新理论是否正确，也只能用实践来检验。第三部分：“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这里用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党宣言》的两处修改作说明，并引用了列宁的评价。孙长江老师增加了一个毛主席修改自己文章的例子。这点下面再说。第四部分：“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讲了真理标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讲了认识的不断发展问题。最后强调冲破

“四人帮”设置的种种“禁区”，“科学无禁区”。

第二，对文章的观点作了分析发挥。如孙长江老师对“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观点作了发挥，指出“只有”、“才是”就表明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以说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孙老师还具体说明了为什么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标准的理由，即分析了实践的特性：“人的社会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对实践标准的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统一，孙老师也作了发挥，指出任何思想、任何理论必须无例外地、永远地、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的观点，也就是真理发展的观点；任何思想、理论，即使是已经在一定的实践阶段上证明为真理，在其发展过程中仍然要接受新的实践的检验而得到补充、丰富或纠正。孙老师还引用了毛主席的话：

“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改变。”

孙老师的分析，发挥了文章的观点，加深了对真理标准的认识，是很好的。

第三，孙老师的修改，使文章精练了，去掉了一些重复的词句。

老实说，这篇文章，从写初稿到成稿寄往《光明日报》，送到《光明日报》后，到公开发表，究竟修改了多少次，究竟有几位同志提了意见，究竟有几位同志作了内容到文字、标点的修改，修改中有多少反复，现在已说不清了。修改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否每处修改都得当，也说不清了。这不是自然科学的论文，不是技术科学的论文，而是社会科学的论文，并且是政治性、现实性、针对性极强的文章，可以说怎么样修改都会有不同的看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经过许多同志提意见、反复修改，是完全正常的，十分自然的。一方面文章本身确实不完善，不是尽善尽美，可以而且需要修改；另一方面也在于这篇文章是不出名的人物写的，而且又是在当时国内政治形势十分复杂的情况下，事关全国大局的，在我国历史发展重要关头出

现的政治性、现实性、针对性极强的文章，对这篇文章不但会有各种态度，而在支持者中也会有各种修改意见。可以说，没有胡耀邦同志审阅定稿，还会不断继续修改，直至有个权威审阅定稿。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理论观点是正确的，社会效果也是好的，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但文章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修改也不是无可批评的，不但今天看来，有可修改之处，在当时，我对几点修改，也有自己的看法。原稿中有这么一段话：“马克思、恩格斯对《宣言》的态度，给我们以很大启发。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学说，一开头就是完善的，决没有把它看作一次完成的‘绝对真理’，而始终用辩证法观点严肃地看待自己的学说，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他们并不认为凡是自己讲过的话都是真理，也不认为凡是自己的结论都要维护。他们处处以实践来检验自己的学说，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尊重实践，尊重事实，尊重科学，毫无偏见，是他们唯一的态度。他们虚心吸取别人的科学成果，包括资产阶级学者提供的事实材料。马克思恩格斯对待《宣言》的态度告诉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指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基本理论和立场观点方法，并非维护每个词句和每个结论。事实上，要维护马克思恩格斯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结论，必然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强调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永远没有完结，就是承认我们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就是承认由于历史的、认识的和阶级的局限性，我们的认识可能犯错误，需要由实践来检验或纠正。如果认为认识是不会犯错误的，也就取消了实践标准，结果必然要犯更大的错误。不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还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这段话，孙老师在修改时，保留了基本观点，但勾掉了“他们(指马克思恩格斯)并不认为凡是自己讲的话都是真理，也不认为凡是自己的结论都要维护”这句话。这句话是鲜明针对“两个凡是”的。孙老师换了一句话，保留了一点原意，但大大淡化了，我理解他的用意，措词缓和一点。但原文这两句话是无可挑剔的，后来我在读《“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一

文时，发现邓小平同志正是这样讲的，只是语句有差别。同时，孙老师还勾掉了“他们(指马克思恩格斯)虚心吸取别人的科学成果，包括资产阶级学者所提供的事实材料”这句话。当时，迷信盛行，把革命导师神化，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讳言马克思主义继续了前人的文化遗产，讳言导师们向别人学习、特别是向资产阶级学者学习，因而我写了上面几句话被勾掉，可惜了。当时，我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是个根本问题，提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就是要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反对个人迷信与教条主义。因而我用大段文字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基本原理与立场、观点、方法，而不是指坚持每句话、每个结论；我还强调了人的认识受历史的、认识的和阶级的局限，人的认识可能犯错误，因而要坚持实践标准。可是这些观点，都给勾掉或淡化了。

另一处修改，我觉得也可以讨论。孙老师加了这么一段话：“1955年毛主席在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时候，写了一百零四篇按语。当时没有预料到1956年以后国际国内所发生的阶级斗争的新情况。因此，1958年在重印一部分按语的时候，毛主席特别写了一个说明，指出这些按语‘其中有一些现在没有丧失它们的意义。其中说：1955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这样说不妥当。应当说：1955年是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以及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方面，则或者还没有基本胜利，或者还没有完全胜利，还有待于今后的努力。’《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25页。这是孙老师修改时增加的唯一的重要材料，以说明毛主席与马克思恩格斯一样，自觉依据实践检验来修改自己的观点。毛主席确实一贯严格要求不断用革命实践来检验自己提出的理论和论点，这在毛主席的伟大革命实践与理论创造的历程中，有许多生动的事例。孙老师强调这点我是赞成的。但是对孙老师选取的这个例子，我有保留。我以为毛主席1955年在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写的按语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而1958年重印部分按语时写的上述“说明”，却是在1956年波兰、匈牙利事件影响下，在整风反右斗争后，认识上夸大社会主义阶级斗

争，特别是突出思想政治战线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离开了实际，而不是更符合实际。大家知道，毛主席以后的思想发展，正是沿着这个“说明”走下去的。1977年我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批判“两个凡是”，目的是推动拨乱反正。1978年4月，我在全国哲学讨论会上，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集中体现为阶级斗争，实际是进一步表示否认阶级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所以，我于1977年写文章时，看到了毛主席1958年写的这个“说明”，而没有采用。

整个说来，孙长江老师在修改文章上，花了很大功夫，提高了文章的质量，作出了贡献。这是不容抹杀的。但是，文章的主题、基本观点、主要内容和主要材料，没有变化，没有增加重要论点，没有改正错误观点，因为原文没有错误观点。这个修改，是在原文的基础上的修改，是在原文基础上的提高，所以，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理论动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后面注明：“《光明日报》社供稿，本刊作了些修改。”1978年底，中央召开全国理论务虚会，于光远、杨西光、胡绩伟、穆青、吴江等10位同志有个联合发言，谈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时说，这篇文章是以南京大学哲学系胡福明的稿子为基础修改的。1982年，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编辑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文集》（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之后，也有一个说明：“《理论动态》1978年5月10日。《光明日报》社供稿。作者：南京大学胡福明。本刊发表时作了较大修改。”这是实事求是的介绍。

这里讲个插曲。《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书中有段话：“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用笔名发表的文章；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成了拥邓力量的第二次呐喊。文章的作者胡福明当时是南京大学哲学系老师、中共党员。后来他自称，1977年秋他把这篇文章送去发表，反对‘两个凡是’完全是自己主动做的，因为他意识到，如果不驳斥‘两个凡是’那样的教条，邓就没有重新掌权的希望。”这段话，讲了我写真

理标准一文的目的、意图，是符合实际的，因为S·施拉姆先生采访过我(他的文章发表于《中国季刊》第99期)。该书又说：“这篇文章也许是胡福明自己想写的，但刊登出来的文章却以胡耀邦领导下的中央党校的两位理论家的意见为基础进行了大量的修改和深化。”这是不真实的。理由上面已说明了。《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注释说：“胡福明的原标题是‘实践是真理的一个标准’。”首先，迈克尔·舍恩哈尔斯先生向哪些人作调查的，至少没有向我调查过。调查一篇文章的产生的过程，能真实到什么程度，可想而知。可惜还有一些人写这篇文章产生过程时，也从未向本人调查过。其次，我从没有用过“实践是真理的一个标准”这样的题目，我最初的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第三，我曾把题目改成“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并非其他同志改的，也从没有人用过“实践是所有真理的标准”这个题目。迈克尔·舍恩哈尔斯先生向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提交的研究报告就是如此。

在文章修改的问题上，我还要作三点说明：

第一，“唯一”二字，据我所知，是杨西光同志加的。文章题目，经过了几次变动。我最初定的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后来，我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以后我又把“一切”二字圈去，仍恢复原先的题目。最后，杨西光同志加上“唯一”二字，成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以看到，文章题目的基本精神没有变化；而从文章的内容来看，自始至终坚持检验真理只有一个实践标准。杨西光同志在题目上点明了这点。

第二，“科学无禁区”这个论断，来自周扬同志。周扬同志在全国哲学讨论会结束时作了讲话，提出了“科学无禁区”这个论断。我很受启发，认为与我的文章精神一致，当即把“科学无禁区”的论断补充到文章中去，加以发挥，批判蒙昧主义、教条主义。

第三，在我修改文章的过程中还吸收了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孙长江、吴江等同志提的意见。

(二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能够发表，能起重大反响，

《光明日报》哲学组、理论部的重要作用不可抹杀。今天看，发表这篇文章，批判“两个凡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但是在1977年，多年的教条主义与个人崇拜盛行，在“两个凡是”统治下，许多同志心有余悸，不少人还模模糊糊，对这个问题还未考虑。而《光明日报》哲学组的同志已经意识到这篇文章的针对性、尖锐性，敢于支持，抓住不放，力求发表，做了大量工作。这种胆识，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杨西光同志在发表这篇文章上面，起了巨大作用。理论部把文章的清样送给他审阅，他没有否定，没有简单地同意发表，而是大做文章，决定把它放到第一版作为重要文章发表。为此，他组织了修改，与中央党校联系，向胡耀邦同志请示，与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合作，研究发表文章的计划，亲自推敲修改文章。这一切都是为了批判“两个凡是”，推动拨乱反正。杨西光同志的政治眼光是很敏锐的，思想理论水平是很高的，以很大的勇气、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担当这项任务。

胡耀邦同志在这篇文章的发表上，起了关键作用。他十分重视思想战线上拨乱反正的任务。他主持中央党校工作后，成立了理论研究室，创办了《理论动态》，并亲自审阅在该刊发表的文章。他于1978年初首先提出，要使高级干部根据实践研究“文革”，并要求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撰写真理标准的文章。他挑选杨西光同志去《光明日报》工作，端正了《光明日报》的方向。他亲自审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批准先由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然后由《光明日报》公开发表，继而由《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新华社向全国发稿。没有胡耀邦同志的审阅批准，这篇文章可能胎死腹中。

(二十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与真理标准大讨论有联系，又不是一件事。这篇文章引发了真理标准大讨论，但是从文章发表到真理标准大讨论是一个飞跃。

邓小平同志领导了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邓小平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他的革命实践中贯穿着实事求是的红线。早在1977年4月，邓小

平同志就针对“两个凡是”，提出“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1977年5月24日，小平同志进一步指出：“‘两个凡是’不行”，“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以上引文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8、39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后，立即得到广大党员和群众的共鸣和支持，一场如火如荼的思想解放运动迅速兴起，但也遭到一些同志的激烈反对，他们罗织了几大罪状，指责这篇文章是“砍旗子”、“丢刀子”。这可是弥天大罪。这确实是一场大是大非的争论，是坚持实事求是，拨乱反正，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开拓前进，还是搞“两个凡是”，维护“文革”的理论，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正是在这个重要历史关头，邓小平同志于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党有很多同志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很好的，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4页。小平同志从历史上回顾了毛泽东同志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斗争历程，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同上）。特别是，

邓小平同志多次引用毛泽东同志的文章、讲话以阐明“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最后，邓小平同志尖锐指出：“同志们请想一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是不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呢？这种根本观点有没有过时，会不会过时呢？如果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从实际出发，反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那还说得上的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呢？那会把我们引导到什么地方去呢？很明显，那只能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能引导到工作的损失和革命的失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8页。邓小平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坚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尖锐批评了“两个凡是”，担负起领导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历史重任！

在1978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讨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这个重要讲话，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准备，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讨论，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决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提出了改革的任务。

后来，邓小平同志在谈到海军进行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时说：“关于真理

标准问题，《光明日报》登了一篇文章，一下子引起那么大的反应，说是‘砍旗’，这倒进一步引起我的兴趣和注意。”小平同志指出，海军考虑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很重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

“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实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所以，不要小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上引文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0、191页。邓小平同志亲自领导了真理标准讨论，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二十二)真理标准大讨论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领导的，是全党全国人民进行的，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权威，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树立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三次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延安整风运动和真理标准讨论。这三次思想解放运动是互相衔接的，一次比一次深刻。

“五四”运动是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以科学、民主、爱国为旗帜，反迷信、反封建、反帝国主义，既是思想解放运动，又是民族民主革命运动。

“五四”运动开始时是在学生、知识分子中开展的，而后发展到工人、工商界人士中去。“五四”运动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社会条件，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五四”运动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揭开了序幕。

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为内容，主要是反对教条主义，确立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学风。而从政治上、组织上否定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任务早已完成，1935年遵义会议已经

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袖地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也早已确立。这次整风运动是在党内进行的一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通过共产党端正学风以影响全民族。这次整风运动达到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为党的“七大”准备了思想基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准备了思想条件。整风运动把“五四”运动深化了。

以真理标准讨论为内容的思想解放运动，与“五四”运动、整风运动是一脉相承的，都以科学精神、民主精神为精髓。真理标准讨论与整风运动相似，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反对蒙昧主义和教条主义。但是真理标准讨论有其特点：第一，真理标准讨论既是思想解放运动，又是现实的政治斗争。它否定“两个凡是”，批判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准备了思想条件，以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时以实践标准直接批判“文革”“左”的指导思想，否定“文革”的理论、路线与政策，推动拨乱反正，直接推动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面，推动了确立正确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延安整风运动是为已经确立多年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奠定牢固的思想理论基础，或者说确定实事求是的学风以保证贯彻正确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第二，真理标准讨论为改革开放准备了思想基础和理论武器，恢复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经验，推动了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致力于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推动了改革开放，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的和逻辑的起点。如果说，“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延安整风运动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准备了思想条件，那么，真理标准讨论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序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准备了思想条件。第三，真理标准讨论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强大动力。全党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就是发扬党内民主、发展人民民主的运动。广大党员、广大人民从来没有如此自觉地、意气风发地参与党和国家重大问题的讨论。真理标准讨论推动全国人民从个人崇拜和教条主

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推动人民群众和广大干部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推动中国人民研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大事，推动人民群众独立思考和当家做主，从而推动了社会主义精神的发扬。科学与民主，从来都是密切联系的，互相促进的。破除迷信，树立科学态度，能够推动人们独立思考，发挥积极性、创造性，推动民主建设；发扬民主，有利于人们独立思考，破除迷信、盲从。迷信有利于专制，专制需要愚昧盲从。真理标准大讨论是在党领导下进行的，又是党员、干部、群众自觉参加的，允许人们保留自己的观点，允许认识有先后，不搞人人过关。第四，真理标准的讨论，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斯大林领导苏联时期，有巨大功绩，也犯了肃反扩大化等“左”的错误，那时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盛行。斯大林逝世后，纠正这些错误，克服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都是必要的。但是，赫鲁晓夫以秘密报告形式，对斯大林进行攻击、咒骂、诽谤，全盘否定斯大林，丑化苏共和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运动中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为西方反动势力提供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炮弹，也未能真正克服斯大林时期的错误，未能消除制度上的弊端。这是惨痛的教训。我们党在纠正“左”的指导思想、拨乱反正中采取了科学的态度和方法，领导全党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讨论，推动全党全国人民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实践标准否定“两个凡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革”。坚持经过中国人民的实践反复证明了的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高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加强了党的领导，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以真理标准讨论为内容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完成伟大历史转折、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第二次飞跃的契机。

由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是一场破除迷信、树立实事求是的科学思想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全党全国人民参与国家和人民前途与命运大讨论的民主运动，是全党全国人民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领导下端正历史发展方向的革命运动，因而成为历史上辉煌的一页，成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

统和宝贵精神财富，铸入了中华民族之魂，融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现在，重要的是继续努力，使全党全国人民进一步深入地、牢固地掌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树立科学精神，增强民主意识，自觉遵循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为振兴中华，建设现代化的、民主的、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原载《走向思想解放之路》，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走进新时代的序曲——真理标准讨论纪概

陶锐 张义德

第一章 历史的转折与哲学的反思——真理标准讨论背景

1. 走出十年动乱：10月的胜利与11月的沉寂

当代中国人，包括关心中国政局的当代外国人，都已经十分熟悉“十月的胜利”，知道粉碎“四人帮”的迅雷不及掩耳，知道当时每个中国人无法掩饰的喜悦。

紧接着11月呢？还沉浸在欢欣鼓舞余波中的中国人的心上，不免重又布满焦虑，结束了一个时代的中国如何走向一个新的时代呢？

一个多月过去了。11月18日，当时分工主管宣传工作的一位中央负责人，在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上，作了一个讲话。他把邓小平1975年的所作所为说成是：“不听毛主席的，还是搞他过去那一套。”而且斩钉截铁地反对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主张继续办“四人帮”那样的样板学校——朝阳农学院，要求继续放映“四人帮”炮制的以批邓为主题的电影《决裂》……据说这都是“主席讲过”的，“是毛主席的指示”。

宣传工作会议的精神不久即照原样出现在最高权力机构。1976年11月30日，副委员长吴德在四届人大常委会三次会议上讲话：“凡是毛主席指示的，

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他认为：“天安门事件中反‘四人帮’是错的，那时他们还是中央领导，那是分裂中央。”“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

这就是狂欢之后的那个阴沉沉的年底，人们的心紧紧地收缩了。

转眼间到了1977年1月。不仅北京，几乎全国人民都对一年前那寒冷的祭奠记忆犹新。充斥人民内心的，不仅是悼念，更多的是抗议。这一点，从上到下本来是十分清楚的，但当《人民日报》就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宣传问题请示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央负责同志时，他规定只准发四五篇纪念文章，不准老同志用个人名义写回忆周恩来的文章，不准提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准周恩来的纪念展览对外开放，不准《人民日报》发社论。还说，对周恩来的评价不能超过悼词，因为悼词是主席审查过的。他还质问《人民日报》写纪念社论的人，“是不是要给总理另外作一篇悼词”。

1月8日，首都群众再次涌向天安门。这一场面，童怀周是这样描述的：

今年1月8日，天安门前，缅怀周总理的人民群众，自由地登上观礼台，放上精心制作的花圈。入夜，天安门广场，华灯齐放，泪眼模糊的革命人民，也能清楚地看见总理微笑挥手的遗容，墙上革命的诗篇，台上肃穆的花圈，灯下绚丽的花篮。报纸上也报道了激动人心的纪念场面。

诗词、标语，再次出现在天安门广场。这次人民的要求，已经集中在这样两个问题上：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

几乎与此同时，对“四人帮”的批判碰到了麻烦。《红旗》杂志打报告请示：“张春桥在1975年春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两篇文章是否可以点名批判”。在这份报告上，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央负责同志作了这样的批示：“这两篇文章是经过中央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看过”的，只能“不点名”批判文内的错误观点。

2. “两个凡是”的提出：历史发展的障碍

这接踵而来的冲击，引出了2月7日的“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人民日报》以通栏大字标题，全文排四号宋体字，加框刊出，署名：《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首都其他报纸同一天用同样的规格转载。

“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论是“文革”以来的一大创造，通常表明这是在传达最高司令部或最高统帅的声音，极具威力。

社论中所谓抓住纲，是指揭批“四人帮”。社论说：

当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集中表现为我们党和“四人帮”的矛盾。深入揭批“四人帮”，这就是当前的主题，就是当前的纲。紧紧抓住这个纲，斗争的大方向就掌握住了，各项工作就有统属了。

最后，社论用了650多字的长段向全国发出号召：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领导我们奋战了半个多世纪，经历了十次重大的党内路线斗争。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我们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遵循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胜利；什么时候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失败，就受挫折。毛主席的旗帜，就是胜利的旗帜。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我们团结战斗在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下。现在，毛主席逝世了，我们更要高高举起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是我们8亿人民、3000多万党员的神圣职责，是我们继续团结战斗的政治基础，是我们进一步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华主席领导我们，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进行了并在继续进行着粉碎“四人帮”的斗争。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又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经过这个斗争，捍卫了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保证我们国家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续前进，这是华主席的伟大历史功勋。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领导下，

我们踏上了新的征途，正在做继往开来的伟大工作。我们肩上的责任很重，我们面前还有不少困难。我们有勇气、有信心，挑起重担，战胜一切困难。毛主席曾经号召我们：“团结起来，以大局为重，焕发精神，努力工作。”让我们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注：着重号为引者所加），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紧跟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一切行动听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同心同德，步调一致，牢牢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去夺取天下大治的新的伟大胜利。

今天可以奉告读者的是，这篇社论，“两报一刊”没有任何人参加起草或讨论，不但他们的负责人不知道有这篇社论，就连当时的中央宣传口（“文革”中，中央宣传部被称为“阎王殿”而解散，粉碎“四人帮”后成立了中央宣传口）也不知道。它是由李鑫领导的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的。李鑫曾长期担任康生的秘书。康生死后，他担任了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负责文件的起草工作。2月4日，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央负责同志在这篇社论的清样上批示道：

“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同志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

当这篇文章发到中央宣传口后，中央宣传口负责人耿飚曾找几个负责宣传工作的同志讨论。耿飚在擒拿“四人帮”第二天，奉命迅即接管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后来又调至中宣口主持工作。他在讨论中直言道：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去办，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但因为这篇社论是中央批发下来的，各报只能照登。

值得回味的是，这篇社论发表的时间，正是1977年中央3月工作会议的前夕。当时全国人民都希望邓小平赶快出来工作。然而，“两个凡是”的提出，使人立刻回想到1976年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时间，读者纷纷打电话、写信到报社，责问为什么要发表这篇社论。

3. 出现转机：华国锋讲话与邓小平的信

3月工作会议如期召开了。在这次会上，华国锋讲话基调虽然未变，还是强调“两个凡是”（其实，2月7日社论中的“两个凡是”正是把讲话的内容提前拿出去宣传），但一种新的气息已经透出。因此这个讲话是自相矛盾的。他认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但明言：“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他又一次重复“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制造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但补充说：“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

在这次会议后，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党中央，提出：“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如果说在这封信里还没有明确批评“两个凡是”的话，5月24日，邓小平在谈话里，则说得几乎不会使任何人产生误解：“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就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那时，邓小平的职务还没有恢复，只有他这种性格的人，才会在处于那样微妙的位置上的时候如此直率地讲话。中国人被“礼”束缚了数千年，很少有政治家能表现他们个人的性格魅力。然而邓小平其实1975年就已经表现过了，使亿万人的心头为之一暖。

4. 历史的死结：是或不是伟大领袖的指示

几乎就在此时，中宣口简报刊登了一份《人民日报》提供的材料，引起了毛泽东著作编辑办公室一位副主任的相当不快。他当即给朱穆之、胡绩伟挂了电话，明白说“不应该登”。他的愤怒与担忧不是没有来由的，这份材料涉及的问题太重要了，直接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全面专政”这一重大的理论和路线问题。

当时人们都确认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定的，“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而那份材料却道出了真相：1977年5月，《人民日报》查对了文革时期1967年11月6日“两报一刊”编辑部纪念十月革命节文章的原稿，证明文中第一次提出的关于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6个要点，都没有经过中央正式讨论，是由起草人商量、根据康生讲话，由陈伯达、姚文元修改完稿的。其中关于“全面专政”的提法，也不是毛泽东的原话，而是陈伯达、姚文元写上去、排成黑体字，遂成了“毛泽东指示”的。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78年春，四川、安徽两省传来令人欣喜不已的消息：自留地、集市贸易、自主权等等终于给农民饥饿的脸抹上一层血色。对此，《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纷纷报道。当时主管农业的陈永贵急了，认为这样做是“右”倾。山西省委也跟着说，这是在“宣传资本主义”、是“同学大寨对着干”。

如果再加上那急待安置的百万待业大军，急待纠正的自1966、1959、1957以至1953年以来留下的涉及亿万人的冤假错案，急待恢复的上万家企业……可以说，整个中国处在一团巨大的乱麻中，而那梳理的端头只有一个——认识。

对历史、对革命、对理论、对体制科学而非“信仰”的认识。

第二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1. 毛主席指示——片言只语，毛泽东思想——整个体系

邓小平的职务是在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的。在这次会议上，他阐述这一思想的语言已经更为规整，强调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他认为张春桥等“引用毛泽东同志的某些片言只语来骗人、吓唬人”，只有就“一个领域、一个方面的问题”，“准确完整地理解”方能与其针锋相对。

他特别举了知识分子这个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一谈就将陷入自我矛盾僵局的“毛主席的主张”。他说：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同时也非常注意知识分子要好好改造世界观。这是从爱护出发，是为了更好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作用，使他们能够好好地为社会事业服务。“四人帮”把知识分子一概作为“臭老九”，并且还说这是毛主席说的。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曾经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这样的话我们现在不能继续讲。但是从整个革命和建设过程来看，毛泽东同志是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的。他在1975年，还针对“四人帮”的污蔑，提出“老九不能走”。

紧接着，也许出于冷静的判断，也许出于多年夙愿，一上任，邓小平就自告奋勇抓科学、教育工作。在8月8日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讲了6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关于对17年的估计问题”。

这里应该提醒读者注意的是，自从1966年开始对刘少奇的全面批判，直到这“八·八”讲话之前，还没有任何人敢对“17年”说一句好话。邓小平所说的：“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对科学研究工作、文化教育工作的系列指示，基本精神是鼓励，是提倡，是估计到我们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是好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或者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在1957年以

后讲过一些过头话，但在60年代初期，他还是支持科学14条，高等学校60条这些的。“……对全国教育战线17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以及：“科研工作、教育工作是脑力劳动，脑力劳动也是劳动嘛。”在当时真是振聋发聩。

但细心的读者会看出，他只是把他认为正确的毛泽东谈话重复一遍。毛泽东是不是也曾讲错与做错过什么，那又怎么办呢？

当时主管教育工作的刘西尧发表的感慨是：“八·八”讲话，感到“震动很大，赶超有望”，但是——“心有余悸”。为什么？就是因为“两个估计”虽然已被邓小平触及，但并未正式推翻。

所谓“两个估计”，是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的两个政治结论，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根本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要命的是，这个文件是毛泽东画了圈的。按照“两个凡是”的原则，是不能动的。

这一情况的出现，显然促使邓小平决心索性把话说个明白。9月19日，他直截了当地对刘西尧等人说：“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不能简单地处理。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关于我的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同志也是画了圈的。天安门事件涉及那么多人，说是反革命事件，不行嘛！说我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其实，当时我已经不能同外界接触了。《纪要》引用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话，有许多是断章取义的。《纪要》里还塞进了不少‘四人帮’的东西。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

“‘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17年培养出来的？……”

邓小平还要求刘西尧，要“独立思考，不要东看看，西看看”，不要“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

2. 澄清“只言片语”：对迟群笔记本的披露

他们的东张西望不但可以理解，应该说，可看可望的还真不少。1977年11月18日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第十二期，发表一篇教育部大批判组的题为“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抛出了当时所谓的“重炮”：

“四人帮”的“两个估计”，与毛主席1971年对文化大革命前教育战线情况和知识分子情况的估计完全相反。“四人帮”长期严密封锁了毛主席的指示，同毛主席的指示唱对台戏，直到他们的灭亡……

毛主席指示的精神是：

(一)17年的估计不要讲得过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的路线，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

(二)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

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

“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还是认得的，就是爱面子，当人的面不认，背地里还是认嘛，只不过有资产阶级思想，过后还是认的。

(三)高教60条。总的还有它对的地方嘛，难道就没有一点对的地方？错误的要批，批它错的东西。人家是教师，还要尊重他嘛。一讲不对就批评，哪能都讲对呀，讲不对没关系，讲错了没关系，大家共同研究，怎么能一下子都讲对，不可能嘛！

当时，读者一下子就从文章中嗅出“指示”不同于寻常文件的用语，也没有“选集”中那种文章的气势。最后才知道，这个被“四人帮”封锁了6年之久的毛泽东的指示的记录，是在迟群的笔记本里找到的。有了这篇指示，教育部大批判组才如此理直气壮，知识分子才从“两个估计”的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

但人们再往下追：要是“四人帮”把毛泽东这个指示封锁得更严密一些，使得后人永远不能知道，又怎么样呢？了解内情的人更进一步议论：如果迟群把笔记本毁掉了，又怎么样呢？难道中国知识分子就永远背着这个沉重的“两个估计”的包袱吗？当时需要拨乱反正的问题还很多，束缚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不少，如果都要从毛泽东的言论里面找根据，那么找不到怎么办？找到的根据相反又怎么办？人们在思考：拨乱反正的根据应该是什么？分清是非的标准应该是什么呢？

3. 黑线重提：文艺界哗然

数日之后，《光明日报》在二版头条通栏标题《打好文艺战线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下，刊登了文艺界知名人士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前面加了一个“编者按”，其中说：

17年的文艺战线，黑线是有的，这就是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这条黑线，对我国文艺事业确实有过相当严重的干扰和破坏。但是，总的说来占主导地位的是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

此论一出，舆论哗然。尤其是文艺界，更是不满。读者可以想象，《光明日报》这种斩钉截铁的论断，不可能是自家的创造，必是“紧跟”的结果。紧接着，1978年《红旗》杂志第一期刊登了署名“文化部批判组”的文章《一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斗争——批判“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文章说：

17年中，文艺战线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不断地对文艺战线进行干扰和破坏。但是，17年的文艺历史，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战胜修正主义路线的历史，是无产阶级文艺战胜资产阶级

文艺的历史……建国以来，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下，对《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每次都严重地打击了资产阶级，大大巩固和加强了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

毛主席在1963年和1964年对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中，严厉批判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文艺工作的干扰破坏……

按照这个说法，17年在文艺领域进行过的历次批判、斗争，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都是完全正确的，不能有任何怀疑的，因为这些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可见，这里的立论根据仍是“两个凡是”。

一篇篇重头文章令本来就心怀忐忑的读者目不暇接。纷乱之中，历史正越过充满迷乱与期待的丁巳蛇年，进入当代中国思想史上咆哮奔腾的戊午马年。

4. 问题终于提出：《人民日报》小试锋芒

在坚持“两个凡是”和冲破“两个凡是”的交锋中，《人民日报》走在前边。1978年3月26日该报在第三版发表了一篇思想评论，题目是《标准只有一个》，署名：张成。

文章一开头就明确提出：“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这个科学的结论，是人类经过几千年的摸索和探讨，才得到的。”它特别引用了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的一段话：判断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文章没有避开当时论争的锋芒，点出了：“有的同志不愿意承认或者不满足于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科学结论，总想在实践之外，另找一个检验真理的标准。”

这篇思想评论很短，通篇只有1000多字；文章发表的位置也不甚突出，只在第三版的左中部位。即便如此，当时《人民日报》还是收到了20多封读者来信，提出了一些问题，包括在理论上需要进一步阐述的问题，与作者探讨。写这些信的人大多不是理论工作者，而是基层的干部、群众。《人民日报》理论部汪子嵩把这些信转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邢贲思，请他对这些信中提出的问题写篇文章加以答复，于是有了1978年6月16日发表于《人民日报》的邢贲思文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读者在后边将会看到。

第三章 本报内部消息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的前前后后

1. 《哲学》专刊第77期大样

1978年4月上旬的一天，在《光明日报》社，一张刊有《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哲学》专刊第77期大样，由理论部送到新任总编辑杨西光手中。按工作常规，他将履行最后裁决权，审定之后于4月11日见报。

当时，谁都没有想到，这份实际上并没有出刊的《哲学》第77期会被人不断地提起：10年、20年……因为——它代表了一个开端。

读这篇5000字的文章，杨西光用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不是通常的一目十行，简直就是“十目一行”——经他之手，文章将在《光明日报》一版发出。

到那时为止，以中、高级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光明日报》只有29年的历史。报龄不算长，经历的坎坷却不算少。甚至可以说，从她出世以来，就一直处在中国思想运动的风口浪尖上。

创办《光明日报》的是40年代末异常活跃的中国民主同盟。当中共首脑机关还在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村时，毛泽东便慨允进城后民盟办一张报纸，并同楚图南、沈钧儒就此商定。新中国尚未成立，民盟就在北平接管了旧《世界日报》的厂房，设备、班底，打出了有着著名民主斗士沈钧儒题写报头的创刊

号，那时正是渡江战役已经结束，而紫石英号还困在东江未能逃走的6月。第一任社长是章伯钧，第一任总编辑是胡愈之。办报宗旨：民主、和平、独立、统一。为报纸创刊热情命笔的人很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李维汉、郭沫若、翦伯赞、陈叔通、徐悲鸿等。29年过去了，他们都已相继辞世，《光明日报》还承载着他们“民主光明”、“替人民说话”的嘱托。

1953年，《光明日报》转为由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合办。当家的社务委员会，由各民主党派宣传部负责人和报社负责人联合组成。中国共产党当时在报社没有委员会，也没有党组；共产党员们以编辑记者的身份活动，他们的组织生活不能说在“地下”，但确实是工余时间在党员家里过的(这种状况到1954年才有了改变)。

1957年，由于统战部传达了毛泽东主席那个可以说颇具历史戏剧性的意见——《光明日报》要和《人民日报》唱对台戏，以办《观察》而险些被蒋介石捉去坐牢的储安平接受各民主党派推荐，就任总编辑。作为这张报纸的第四任总编，他只当了不到3个月。便在“大鸣大放”中遭到最严厉的批判。在暑气开始蒸腾的1957年6月，储安平“向人民投降”了。

1957年下半年，新的社委会成立，编辑方针的第一条即为“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和统一战线工作部的领导下”。杨明轩接替章伯钧任社长，陈此生接任总编，82岁的沈老重新题写报头。给人的总的印象是，这张知识界的日报从此万象更新。

“文化大革命”开始，《光明日报》虽然如该报1984年35周年纪念册上所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光明日报》受到了周恩来同志的关怀与支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继续出版”。但也仅仅是天天有报而已，自稿有限；尽管有“梁效”之类不时身影一闪，但与“两报一刊”相比，气势已差得远。第六任总编(当时叫临时领导小组负责人)莫艾最后挣了一下，发出那篇《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作者梁效)，但这已意味着他必须立即离任。

第七任总编(当时是接管小组负责人)刘西尧于1976年10月8日，即“十月

胜利”的翌日“受命于危难之时”。《光明日报》的拨乱反正从他手里开始，整套班子的清理安抚也在他素有的稳健做派下完成。刘西尧不是报人，他的任职明显是过渡性的。但就这倏忽间的过渡，刘西尧也逃不过任何报人都必须承受的在关键而敏感的问题上亮相：1976年末，编辑提出为总理周年祭辰组织文章。他犹豫了好一阵。后来，在纪念周总理逝世1周年时，《光明日报》还是刊登了不少好文章。

刘西尧很快就被调到更需要他的位置上，由范戈接任。这位第八任总编辑是军人出身。他显然没有也不屑于学人们预言事物发展、冲破现行规矩的思维定式。他习惯于服从命令。刘、范两届总编的任期加起来不足一年半，是继储安平之后，在任上第二短与第三短的两任。

杨西光是第九任。他是在1978年4月中央党校结业之后立即到任的。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版：集中宣传科教文战线的拨乱反正和新事物，努力恢复报纸的“知识性”的声誉。

杨西光那年62岁。文教工作对他来说并不陌生。从穿着草鞋的解放军踏上南京路，他就接管上海同济大学，后调至福建任省委宣传部长一段时间，又回到上海管文教。他担任过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担任过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解放日报》总编，“文革”前夕是上海市委书记处分管文教的候补书记。多年的文教工作，使他对思想理论战线颇为知情，对文化界、知识界的人头也很熟悉。“文革”刚开始他就被“揪”了出来，与陈丕显、曹荻秋并称上海三大“走资派”。1977年他到中央党校学习，恰逢胡耀邦主校，当年12月，党校在研究编写文化大革命中的路线斗争问题时，胡耀邦提出了编写要求：一是完整地、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一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党校的不少高、中级干部进行了讨论。在胡耀邦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的鼓舞下，党校思想相当活跃，在一部分同志中还提出了拨乱反正的一系列问题，进行讨论。杨西光当时正在党校学习，也参加了这场讨论。

读毕大样，杨西光走到窗前。窗外，楼下的槐树，正吐出青春的小芽。应

该说,《哲学》专刊上的这篇文章,远不是哲学学术问题,但在历史幽暗隧道端头发出第一道闪光的,又只有哲学,恰如笛卡儿一句“我思故我在”,结束了长期统治欧洲的宗教蒙昧。

这个主题在他胸中酝酿已经很久,当他被提上台子“示众”的时候,当他在被监禁而读书、反思的时候,当他喘着粗气在工厂干活的时候,而最后,在党校臻于成熟。抛出一颗石子,击起一场时代大波,这是一份夙愿、一个诱惑,任何报人都无法拒绝。而在一份全世界发行的报纸的总编辑任上,它突然变得那么清晰、那么具体、那么切近。当然,它还差着那么一截,拿在手上,就像孙悟空接过敖广赠的那柄画杆方天戟。

“文章从专刊上撤下来,组织力量修改,加强现实针对性,放在一版发!”杨西光说。

2. 文章修改的前前后后

这篇文章,本是理论部的约稿。1977年8月,江苏省南京地区理论界召开旨在从理论上批判“四人帮”的讨论会。报社理论部应邀派哲学组组长王强华前往参加,并相机组织稿件。

在会上,王强华听了当时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的发言,认为颇具解放思想的勇气,便在会后与他交谈,约他为报纸的《哲学》专刊撰稿,没有给他出具体的题目。

两个月后,即1977年10月,胡福明稿寄到,共两篇:一篇是批判江青的;另一篇是阐述真理标准问题的,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王强华看中了后一篇。

文章开头引了马克思在《费尔巴哈提纲》中关于思维的真理性的一段话,接着用四五百字的篇幅对这段话加以解释。

王强华和理论部的编辑认为,文章的引文和对引文的解释虽然相当多,但文中明确提出了拨乱反正,检验真理的标准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具有现实意

义。他们决定编发，并报告了当时主管理论部工作的报社负责人之一马沛文。

马沛文是个思想活跃的文武全才，还在念初中时就因闹学潮被除了名。就算不计他在延安鲁艺读书的那3个年头，他到那时，也是34年的老新闻了。当时，这老新闻心里正憋着一口气。好像欢呼“十月胜利”的那口热浪还没痛痛快快地吐完，就被“两个凡是”给堵回去了……他当时已经有点丧气了。他在1959年曾因“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被在“党内严重警告”，他知道“谔谔”的只有彭老总一士，“诺诺千夫”是安全且前程远大的。他不知道这硕大的精神磨盘还会在头上压多久，也许在他的有生之年，就这么“凡是”下去了。

读过编好的胡文，马沛文心头一亮——就从这里开始！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正如菩萨的救命毫毛，将它化作蔑片绵绳金钢钻，把那阴阳二气瓶钻上一个洞。

理论部立刻着手对文章做手术。他们把头一大段引文的阐述性文字全部删去，只保留原文和简要解释，并立刻寄还胡福明征求意见。胡复信表示同意，理论部于1978年1月14日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原题发排了。

发排稿是这样开头的：

1845年，马克思在创立新世界观时，就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

紧接着，第一部分，阐明任何理论，是真理还是谬论，归根到底要由实践来检验。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大规模的宣传证明不了真理，许多人的赞成证明不了真理，强大的权力证明不了真理，而已被过去实践证明了的真理，也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第二部分，举例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导师提出了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并自觉运用实践标准检验自己的理论，发展理论，以至修改个别结论。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才是科学真理，才能不断发展，永葆青春。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

的态度。马克思主义与任何盲从、迷信，是水火不相容的。哪里有盲从，哪里有迷信，哪里就没有科学，哪里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坚持实践标准，就是科学态度，否认实践标准，就陷入蒙昧主义。

第三部分，批判“四人帮”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宣传宗教教条，批判他们否认马克思主义来源于实践，否认马克思主义要在实践中受检验，在实践中丰满、发展。指出他们把毛主席的一言半语与毛泽东思想体系割裂开来；抛弃毛泽东思想体系，任意摘取片言只语，把它当作宗教教条，到处吓人、打人。

1月14日发排打出清样后，1月26日、1月30日、2月2日、3月20日、4月4日又作了5次修改。几次修改，总的结构未变，在文字上作了较多的加工。第4次改样上，在第3部分结尾增加了一段反对教条主义、冲破禁区的内容：

10年间，“四人帮”主观唯心主义横行，搞乱了理论，毒化了思想，严重破坏了党的优良作风，他们乱扣帽子，乱打棍子，到处设置禁区，给人套上枷锁。所以至今仍有一些同志，做工作，解决问题，既不总结实践经验，又不倾听群众意见，从概念出发，从原则出发，不问具体历史条件，把个别词句奉为教条，生搬硬套；遇到新情况、新问题，不去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进行调查研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个别词句作为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敢从实践中，引出新结论；判断是非，不以实践为标准，不拿事实作根据，而用片言只语作准则，总之，心有余悸，忘记了毛主席谆谆教导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为了个别词句而牺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根本，搞坏了工作，损坏了革命。因此，我们必须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继续深入揭批“四人帮”，解放思想，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理论与实践结合，实事求是，把我们的工作做好。

在第5次改样上，最后一段又重新写过：

现在“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被彻底摧毁，但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四人帮”在革命队伍中间造成的心有余悸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毛主席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曾经批评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教条主义倾向依然存在。我们有些同志在工作中碰到了问题，往往不是去研究实际而是从革命导师的著作中寻章摘句；我们有些同志阅读一篇分析实际情况得出正确结论的文章时，往往因为文中没有引用革命导师的某些话而怀疑文章是不是有问题；我们有些同志在办事的时候，往往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概念出发，从原则出发；等等。因此，我们应当重温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应当着重学习革命导师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教导，重温毛主席关于要从小处出发的教导，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坚持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逐步地、彻底地肃清“四人帮”主观唯心主义造成的种种影响和流毒，以便真正能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为完成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

第5次改样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由马沛文、王强华定稿后拼在《哲学》专刊大样上，5000多字的篇幅，占半个版。

杨西光看到的就是这一稿。“从《哲学》上撤下来放到一版！”他说。他特别强调要针对理论和实践关系问题上的一些混乱思想，作比较充分的论证，使文章更有指导意义；要进一步触及当时影响拨乱反正、冲破禁区的一些现实问题，提到思想路线上来批评、阐述。

按照这个意见，文章要作很大的改动，然而，这是一篇个人署名的文章，除非由作者本人修改，否则由别人修改得面目全非，就不能再由作者来署名了，而作者却远在千里之外的南京。

怎么办？恰巧这时胡福明从南京来到北京参加一个理论讨论会，报社决定请他本人来修改。恰在这时，杨西光的得意门生、复旦大学毕业的江春泽，抽调到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筹备组工作，江春泽前来给杨西光通风报信，说中央党

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正在着手撰写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于是决定请孙长江、胡福明一起来商讨。

1978年4月13日晚，在《光明日报》总编辑办公室，杨西光、胡福明、孙长江、马沛文、王强华围坐在一起，议论风生。胡福明和孙长江二人，看上去年龄相差甚大：胡的头发已花白，有的牙齿已脱落；孙是一头黑发，显得年轻。其实，二人年岁差不多；胡福明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新闻系并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学习时，孙长江已在研究班毕业留校任助教了。所以胡福明见到孙长江时，常常要叫一声“孙老师”。可惜，当时没有派员作记录。不过，王强华当时还是在笔记本上记下了杨西光的发言要点：

完全、准确毛泽东思想体系。

从马克思主义开始就有。我们党的历史上王明路线。

提高一些。

毛——想继承符合马列原理。

同时也是发展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本身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理论本身的作用也要讲。

指出寻找真理的明灯。途径。

本身不是检验标准。

理论本身。理论实践关系。

本文讲了三部分：

①理论；

②本身；

③现实。

可以讲得更明确些。结构。

最后一部分放在什么地方。

高潮。

在揭批“四人帮”中间出现的问题。

流毒的尾巴仍在最后。

①

②例子本身少一些，论述多一些。

例子太长，就有些沉闷。

如何对待经典著作。

联共党史的话。真理、路线与实践。

明朗：真正高举毛主席旗帜。

注意：完整、准确毛——想。

二条符合基本原理。

实践检验。

怎样研究探讨毛——想。

两个凡是。

理论作用。

这记录虽然残残缺缺，但看得出来，思路还蛮清晰和完整的。

大家商定，稿子仍由胡福明自己修改。他于4月15日把改写的稿子送到了《光明日报》，就回南京去了。这可算是第六次修改了。所改的稿子增加了批判“四人帮”的内容，增加了阐述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的内容，但文章仍保留了原来的三大段结构，没有能充分把4月13日大家议论的意见反映出来。马沛文、王强华只好在4月28日又修改出一个稿子，即第7稿。这一稿将文章的结构由原来的三大段改为四大段。

第一段：论述检验真理的标准是社会实践。

第二段：论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第三段：论述马克思主义的导师怎样用实践检验自己的理论。

第四段：论述是否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是否正确执行马克思主义路线，都要由实践来检验。

修改过程中，曾一次次打出小样，每次小样都在理论部部分同志中传阅、征求意见。当时不同意发表这篇文章的只有一人。他认为，“观点我同意，但是不能发，发出去就会引起意想不到的后果。”

据马沛文后来说，当时这批编辑真理标准文章的人，自己也正处在探求真理的激情里。这个意见没有影响文章的发表。只是提醒我们把文章改得再好一些，改得无懈可击。

4月23日、24日，杨西光、马沛文再次讨论了20日的改稿，并作了修改。这已是第8次修改。第七第八两次修改的稿子都送给了中央党校的孙长江和当时的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

第七第八次修改的稿子，基本上反映了4月13日晚大家讨论的意见：

——文章从题目到内容都明确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别无其他标准。与此同时，孙长江也在20日的改稿上把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把题目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主题进一步深化了。

——文章突出了邓小平关于要完整地、全面地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的观点，批判了“两个凡是”的观点。20日修改稿的第三部分，在谈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发表后45年中，一直根据实践来检验《宣言》的时候，增加了这样的话：“他们并不认为凡是自己讲过的话都是真理，也不认为凡是自己的结论都要维护”。后来考虑到当时的情况，在23、24日的改稿中，改得比较含蓄：“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讲过的一切定论都是真理，也不认为自己作出的结论都不能改变”。

——文章阐述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指出了理论的巨大作用，又强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有力量，正是由于它们高度概括了实践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并用来指导实践。

——文章的结尾部分明确指出，“科学无禁区。凡是有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强调现在确有“禁区”，有待于我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来把它冲破。

在第八稿送给当时任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的吴江和孙长江之后，杨西光又到中央党校与吴江、孙长江交谈，之后三人对文章的基本观点认识一致，都说修改后的第7、第8稿写得有勇气，但理论逻辑上差些，要把它理好，并加以提高，还要进一步突出马克思主义有生命力，要永葆青春的思想。接着商定，为扩大文章的影响，定稿后，先在中央党校主办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因为凡是在《理论动态》上发表的文章，都要经过胡耀邦的审阅。第二天再由《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见报。这个意见后来由吴江请示了胡耀邦。胡耀邦爽快地答应了。当时，中央报纸上许多重要文章，如以社论或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要送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央负责同志审阅，那就很难通过；而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可以避免送审。而且，这个名义还隐含着文章出自某权威人士之手的意味，很受读者注意。再者，文章论及的是如此重要的问题，再用个人署名就不合适了。

与此同时，杨西光又分别拜访了首都新闻界的负责人胡绩伟、曾涛、华楠，向他们通报了这篇关于真理标准的文章，得到了这几位同行的支持。并商定：《光明日报》发表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第二天转载，新华社转发通稿。

随后，孙长江在吴江的指导下，以第8次改稿和他们原拟写的文章的构思为基础，并根据这次讨论的意见，又作了一次修改和润色。这已经是第9次修改了。这次修改，与第8次修改比较，改动的地方有：

对第8次改稿作了较多的文字删削，约有一半多的段落是改写和重新调整过的，使文章的逻辑更加清楚，文章叙述更加精确流畅；

对真理和社会实践作了简洁说明，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人的社会实践是改

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

增加了毛泽东在1958年修改他3年前写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按语中个别提法的例子。这个论据的补充，不仅使文章的说理更显充分，而且显得无懈可击；

加写了文章的最后一段，指出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确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强调不能“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要求大家“要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研究新问题，进行新的伟大长征。

文章还分段加了小标题，使读者一眼就能抓住每段的中心。

——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

——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

——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

孙长江修改完毕后，吴江在阅完此稿时又作了一些增改，并于4月27日在稿子第一页的天头上注明：“请即排印十五份〔送胡(耀邦)、杨(西光)、作者——航空发出〕五月十日那期用。”

胡耀邦审完后，5月10日的《理论动态》第60期就全文发表了。原来文末注有“《光明日报》社供稿，作者胡福明，本刊作了些修改”字样，并照此印发一部分。在印的过程中，中央党校有同志提出意见，认为文章不少段落已经重写，修改过程中胡福明又没有参加，听取他的意见也来不及了，而且其中有些重要观点已是历次修改人的，再署原作者名字已不恰当。经再三斟酌，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决定将原注改为“《光明日报》社供稿，本刊作了些修改”。

1978年5月11日，这篇历时7个月，前后修订10次的文章在《光明日报》一版下辟栏位置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出。

第四章 一石激起千层浪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起的反响

1. 一个严厉的电话

文章发出的当天，新华社向全国播发。5月12日，在首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在地方，《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福建日报》、《河南日报》等4家省报以及广州的《广州日报》、武汉的《长江日报》也全文刊载了。

5月13日，《河北日报》、《山西日报》、《陕西日报》、《内蒙古日报》、《辽宁日报》、《大众日报》、《安徽日报》、《甘肃日报》、《湖北日报》、《江西日报》、《南方日报》、《贵州日报》、《云南日报》、《西藏日报》15家报纸转载；此后，5月14日《新疆日报》，5月15日《青海日报》，5月17日《天津日报》，5月18日《吉林日报》，5月20日《湖南日报》，5月23日《黑龙江日报》，5月27日《宁夏日报》，6月10日《浙江日报》，6月14日《北京日报》，8月9日《广西日报》陆续转载。

《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由新华社当天播发全文，第二天及以后首都及地方多家报纸转载，而且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这在近年来甚至在历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这无疑是在说明，这篇文章所具有的分量，在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所占有的位置。也许，在5月11日那天，不很细心的读者，在看《光明日报》时，也只是浏览了一下文章的内容，没有用更多的时间去揣摩它。但当第二天，打开《人民日报》等多家报纸，看到这篇文章赫然在目，且在文末的括号内看到注明“新华社五月十一日电”时，脑海中便会升起多年来流行的一种思考方式：这篇文章恐怕有什么来头。于是便另眼相待了。

对于盼望天安门事件很快得到平反，尽快冲破“两个凡是”的读者来说，读了这篇文章自然是欢欣鼓舞的。他们希望这篇文章能成为大旱之年天空中的

一片云霓，随之而来的是甘霖普降，将“两个凡是”冲刷，使拨乱反正名副其实。因而不少读者投书报社，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然而，像对任何一件事情的反应一样，总不会是异口同声的。有异口就有异声。有些人在仔细咀嚼着文章中的每一个段落，每一句话，不时地总觉得如芒刺在背，骨鲠于喉。怎么回事？经过一番回味，悟出来了。原来文章提出的理论问题并不新鲜，可对现实却非同小可。

就在《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的当天晚上，11时，在报社上夜班的《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接到一个电话，胡绩伟同通话人“文革”前在《人民日报》共事，他的电话自然受到胡的重视。胡绩伟手执耳机，边听边记：

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

文章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文章说马克思主义要经过长期实践证明以后，才是真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可以取得革命胜利的学说，只有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实践以后，才能证明是真理。就是说列宁提出这个学说时不是真理，一定要等到23年以后，实践证明了才是真理。那么，人们怎么会热烈拥护，会为之贯彻执行而奋斗呢？文章是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开初提出时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后才是真理。这是原则错误。

文章在政治上很坏很坏。作者认为“四人帮”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不是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而是死抱着毛主席的教条不放，因而现在主要不应反“四人帮”，反修正主义，而是应该反教条主义。如文章所说的，要粉碎人们的精神枷锁，就是要反对“圣经上说了才是对的”，所谓要冲破禁区，就是要冲破毛泽东思想。文章结尾认为当前要反对的就是“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革命实践”，就是要反对所谓教条主义，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

文章用很大篇幅讲马克思、恩格斯如何修改《共产党宣言》，毛主席如何

修改自己的文章，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想，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确的地方，认为不能把主席指示当僵死的教条，不能当圣经去崇拜。很明显，作者的意图就是要砍旗。文章批判林彪“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难道一句顶一句也不行？难道句句都不是真理才对吗？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团结的基础，如果都去怀疑主席指示有错，认为要修改，大家都去争论哪些错了，哪些要改，我们的党还能团结一致吗？我们的国家还能安定团结吗？所以这篇文章在政治上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是很坏很坏的。

后来，他在一次会议上说，胡绩伟的这个电话记录，不是他的原话，而且对他的主要意思也记录得不准确。所以，他又按照自己的记忆复述了他打电话的内容：

（一）这篇文章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原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常识，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文章中既然提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应当全面地阐述理论和实践的相互关系。可是文章只强调了理论来源于实践并受实践检验，而没有充分说明理论是实践的概括和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没有像十一大制定的党章那样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就割裂了毛主席在《实践论》中关于理论与实践相互关系的学说的完整性。文章的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因而在理论上是错误的。

（二）这篇文章在第一节中引用了《实践论》的话：“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但是，文章的第二节却改变了毛主席这个完整的观点，片面地说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或少数国家可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学说，只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实践之后，才证明是真理。按照文章的这个观点，列宁在提出这个学说时不是真理，不是分析帝国主义的特性和总结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实践的科学结论，也就是说，一个科学理论，只有实现了才是真理，还没有实现就不是真理。那么读者会提出这样的疑问：现在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科学理论是不是真理呢？一百多年来无数先烈和亿万人民为什么要为之英勇奋斗呢？全世界的共产党存在和他们进行斗争，岂不是没有根据，没有必要了吗？党的十一大提出的新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不是要等到23年后实现了四个现代化之后才是真理呢？按照作者的逻辑，全国人民热烈拥护四个现代化是不可理解的，我们党动员群众为之实现而奋斗也是没有根据的。文章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提倡怀疑一切，提倡不可知论，提倡相对主义，否认相对真理，这是严重的理论错误。

(三)这篇文章的基本内容，不是用实践标准来检验“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而是要检验和修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文章用很大的篇幅讲马克思、恩格斯和毛主席如何犯了错误和修正错误，接着就指出，不仅革命导师的个别论断要修改，而且他们的理论都可以修改，也就是说要修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虽然文章也提了一下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坚持，但这并不能掩盖文章的基本倾向是要修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文章提出这样的观点，会引起思想混乱，读者会提出：这究竟是要举旗还是砍旗？我不是说毛主席没有任何缺点错误。他的某些话，某些指示以至个别结论，如果已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或者已经不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当然应该修改。但这样做也要非常慎重，时机要适当，方式方法要适当。毛泽东思想是要发展的，它要随着三大革命运动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但是，作为一个思想体系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团结的基础。我们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应该按照党的十一大确定的那样，就是高举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像这篇文章那样公开在报纸上号召修改毛泽东思想，把干部和群众引到去争论毛泽东思想哪些是对

的，哪些是错的，哪些要修改，那么我们党还能团结一致吗？按照这篇文章的这些错误观点去宣传，会在国内引起很坏的反应，在国际上也会引起很坏的反应。

（四）这篇文章把“四人帮”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同毛主席过去批判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倾向，相提并论，这就混淆了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界限。按照文章的逻辑，“四人帮”似乎真的信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的错误只在于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教条，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而不是他们根本篡改和歪曲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修正主义，不是一伙反革命。文章认为，现在主要是批判教条主义，批判那些“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错误倾向。这就颠倒主次，方向错了，是不符合党的十一大提出的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的任务的。

胡绩伟在这之前将电话记录送给通话人时，就曾附了一封信，说明“你当时在电话上讲得很清楚，我也听得很清楚，我不会速记，记录中当然有不少不完全是原话，但你主要的话，主要的意思，我没有记错。”

胡绩伟与通话人虽然是老朋友，但因这个电话十分严厉，所以当通话人在电话里说这是他“个人的意见，不要外传”时，胡绩伟立即回答说：“既然你在政治上提得这么高，我必须和别人讨论你这些意见究竟对不对。”表示不能承担为这个电话保密的义务。

有意思的是，在这个电话之后，还有一个电话。那是5月13日，当时的《红旗》总编辑打电话给新华社社长曾涛，说新华社转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转发了一篇错误的文章。曾涛当时就表示不能同意他的意见。可他还是对别人说，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子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犯了错误”。

在这之后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历史研究》杂志在天津开学术讨论

会，主持会议的副主编丁伟志请《人民日报》的汪子嵩就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作一发言。汪子嵩在发言中透露了胡绩伟接到电话的内容，但没有指明电话是谁打的，但针对电话中所说“文章批判林彪‘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难道一句顶一句也不行？难道句句都不是真理才对吗？”这样的话，引了毛泽东的一句话：“陈伯达的扫帚不到，吴冷西的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这是1966年毛泽东派陈伯达到《人民日报》夺权时说的话。）汪子嵩说，难道这也是真理，也要照办吗？这时，听众才猜到打电话的人是吴冷西。

2. 上下左右，不同凡响

5月17日，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央负责同志在一个小会上说：“理论问题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要坚持、捍卫毛泽东思想。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当然，对于活跃思想有好处，但《人民日报》要有党性，中宣部要把好关。”

事实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胡耀邦是看过的；《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一文是邓小平、李先念审阅过的。现在，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显然是言重了。

就在这个讲话的第二天，5月18日，当时的中宣部部长，在中宣部召开的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各省市文教书记和宣传部长座谈会上，专门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讲了这样一段话：“我就听到了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说文章很好，另一种意见说很不好。我也还没有完全摸透。”

“大家可以看看，小范围可以议论议论，发表不同意见，不要认为《人民日报》登了，新华社发了，就成了定论。有不同意见是好事情，可以活跃思想，展开辩论。不仅这篇文章，还有另外的文章，《人民日报》批‘顶峰论’，还有一些文章，省市委同志有不同意见都可以议论，有不同意见可以向我们反

映，中宣部研究问题可以活跃些，对中宣部工作有帮助。毛主席生前对省市负责同志讲，不论从哪里来的东西，包括中央来的，都要拿鼻子嗅一嗅，对不对，不要随风转。”最后，他还特别向到会的人拱手说：“拜托，拜托！”

在社会上，对这篇文章的议论也很热烈。有个大学分歧意见就相当尖锐：赞成者说，这篇文章的作者应该提升为一级教授；反对者说，这篇文章的作者应该逮捕进监狱！

社会上一时流言四起，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有问题，《人民日报》也犯了错误，中央已经派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了。

7月份，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央负责同志到山东视察，在济南对山东省委负责同志讲了一番话，其中说到真理标准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8月份，中宣部部长去东北，在黑龙江、吉林、辽宁都讲了话。他避而不谈真理标准问题，使大家很失望。可是他在吉林讲的那番话却使人惊讶。他说：“国内外的阶级敌人，都在骂毛主席，恶毒地攻击毛主席。……人民内部呢，也有些思想动态值得注意。比如，在我们宣传战线上有个别人不承认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他说，有些外国评论家“说现在我们否认了毛主席是神，那意思是说我们原来把毛主席当作神了，那就是我们信仰毛主席是宗教信仰，把他当作神了，迷信了。这完全是污蔑。”他还说：“我们只能宣传一个领袖，过去宣传毛主席，现在宣传华主席。”

其实，早在7月21日，邓小平就给这位中宣部长打过招呼，在向他谈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经过后，要他不要再“下禁令”、“设置禁区”了。

邓小平是最早明确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的中央领导人。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针对“两个凡是”的思潮，精辟地阐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

8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核心小组负责人时又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是驳不倒的。

在关键的时刻，邓小平的一系列讲话、谈话，引导着真理标准讨论的方向，推动着真理标准讨论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展开。

第五章 众人拾柴火焰高

1. 自然科学家“敲敲锣鼓”

批驳反对者的观点的一篇重头文章，是《解放军报》发表的。这篇以“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署名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文章于6月24日发出之后，许多人都在细细咀嚼这篇文章，渗透文章所深涵的底蕴。思想理论界似乎出现了暂时的沉寂。这段时间其实非常短，也不过一周左右，但在那种节骨眼上，焦心地注视着事态发展的读者，就觉得这几天显得相当长了。

其实，对大家如此关切的问题，是不会沉寂的。随后，科学家们站出来了。用当时国家科委副主任童大林的话说，《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发表以后，有人主张不再讨论下去。他们想挂起免战牌，我们不能同意。真理标准讨论才刚刚开始，不能现在就停下来。

他敏感地意识到，我们正处于新的历史转折关头，解放思想特别重要。深入批判“四人帮”，就遇到了分歧，在很多问题上没有共同语言。现在迫切地开展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

还有，5月中旬，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党组在方毅主持下召开了联席会议，讨论真理标准这篇文章，并且做了支持这场讨论的决定：在这个问题上，要旗帜鲜明。童大林接着还说了一句笑话：“在这个问题上，自然科学界虽不是主力，但我们也要敲敲锣鼓。”

要理解这句笑话，必得了解中国国情——在20世纪中叶，中国仅只默许自然科学界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天经地义的命题。在这个领域里，属于“凡是”范畴的“真理”不多，曾有过的几个如摩尔根、李森科等，也为毛主席他老人家自己化解掉了。

童大林或许未十分留意，中国的自然科学界之所以得以安享这一命题而不必再花大力拼争——其实也未必，读者在下文将读到——是因为已经有过人类的代价，包括哥白尼终生的惕息、布鲁诺烧焦的尸身和伽利略高贵尊严的舍弃。哥白尼这位70岁的老人，面对教会酷刑，不再说“我已看到”，他说的是：“我一直相信，现在更加相信，神圣的天主教和罗马教会所主张告谕和教导的一切。亲自写下这份放弃异见的自白书”这种真理不必由实践检验的话。

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和中国科学院理论组出面，召开由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参加的讨论会，“敲敲锣鼓”。会议定名为“理论与实践关系讨论会”，7月5日在科学会堂举行第一次会议，以后再陆续举行。

自然科学家们用自然科学史上的大量事例说明，当原有的自然科学理论同新的科学实验事实发生冲突时，科学是如何突破旧理论而创立新理论，同时又在实验中得到证实的。例如，19世纪末，有位著名的物理学家开尔文，认为当时的物理学理论已是十分完善了，只是天边还有两朵小小的乌云。这指的是当时的物理学理论无法解释的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和黑体辐射实验。可恰恰就是这两个实验向经典物理学提出了挑战。如果把经典物理学当作一种教条和偶像，人们就将不会去理会这两朵小小的乌云。爱因斯坦和普朗克正是从这两个实验当中提出了狭义相对论和量子论。

在会上发言的汪容指出：自然科学理论刚提出时往往只是假说，只有当实践证明了以后，才承认它是科学理论。例如原子论，两千多年前古希腊的德谟克利特就提出来了，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假设。但只有到了近代，科学实验才证实了原子论。爱因斯坦的后半生，花了很大精力研究统一场论，要把自然界各种相互作用统一起来。很多人对此不理解，有的人就指责他。近年来的高能物理实验证实了弱相互作用和电磁相互作用统一的可能性，爱因斯坦的统一场论就又受到了人们的重视。（按：1979年有3位科学家因弱电统一理论而获诺贝尔物理奖。）

吴汝康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的研究员。他在发言中说

了这样一件事：1965年他参加过一个关于“东非猿人”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回国后写了一篇文章，提到人类历史有200万年。这本是根据“东非猿人”的发现的有关科学材料而产生的观点，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受到了批判，说这是“反毛泽东思想”。为什么呢？因为毛泽东在1964年说过人类的历史“大约100万年”，吴汝康的说法同毛泽东说的不一致。其实毛泽东本人也曾说过人类历史50万年，后来根据科学事实，改说100万年。

于光远发言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但是，现在就在这个常识上发生了问题，经济学也有这种情况，从去年开始，对按劳分配能不能产生新资产阶级的问題，讨论了一年。这也是一个很滑稽的问题。我们现在不得不在这些常识问題上进行讨论，可见我国理论混乱到了什么程度。既然在常识问題上不一致，我们就需要在这些问題上进行阐发，从而坚定人们对这些问題的信念。真理标准问题，不是纯粹的学术问题，是完成新时期总任务的关键性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会南其辕而北其辙。

当然，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当中，也确实有许多学术问题需要解决，对这些问题要进一步研究，这样可以把讨论深入下去，而不能仅限于常识问题。

吴江在发言中说：真理标准问题，是从我国政治生活中提出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个常识问题，为什么会有争论？这里涉及了一种思潮，一种政治思潮的问题。真理标准讨论的文章出来，有人看了不舒服，提出指责。我看也不怪他们，他也不是别有用心，这不代表他个人，而是代表一种思潮。

有人说，这是理论问题，讨论不要超出理论范围。小平同志在全军政工会议上讲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就有限制在理论范围。

吴江说，有的同志很激动，说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对“高举”不利。这个帽子较大。我说：你“高举”，我也“高举”。第一，我不跟着你糊里糊涂去“高举”，不跟你的指挥棒；第二，究竟是谁“高举”，还要用实践来检验。十多年来，理论被林彪、“四人帮”搞得面目全非，我们有一个恢复本来面目

的任务。大乱之后，不仅经济有个恢复工作，理论也有个恢复的任务。

2. 理论界的盛会

童大林的“敲敲锣鼓”终于引来了一阵紧锣密鼓。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编辑部，于7月17至24日邀请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党校、大专院校、哲学研究单位和中央机关、国家机关、解放军、新闻出版单位的有关人员160多人在北京朝阳区委党校开会，继续讨论理论和实践问题。时值盛夏，但会议气氛比天气更热。

17日上午，讨论会开幕式在中央歌剧院礼堂举行。天虽炎热，但能坐千人的礼堂挤得满满的。哲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孙耕夫主持大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力群首先讲话。他明确提出，这次会议所要讨论的问题是：理论和实际联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实践中形成的理论、见解、意见，还要回到实践中去，接受实践的检验，加以修正、补充和发展。

邓力群希望哲学工作者在这次会议上，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不要只停留在一般的哲学理论的阐述、宣传上，而要针对新的发展时期面临的许多新的问题，作些调查研究，使哲学研究工作出现新的局面。

邓力群强调：必须贯彻毛主席的实事求是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来研究和解决新问题。原理有了，具体政策、办法在主席那里找不到，就很需要探讨、讨论。这就要实行民主集中制，这个方针，在一定意义上更重要。周扬同志讲科学无禁区，讲得很好。书本上找不到，又需要探讨，就应当有不同途径，探讨错了，允许改，重新探讨。

邓力群说，要坚持“双百”方针、“三不”主义。他说，经过文化大革命，作了鉴定：社会科学的绝大多数人，是想搞马列主义、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证明我们这个队伍是好的。历史作了鉴定，我们是追求真理的。尽管我们犯了很多错误，但它教育我们更加坚定。

邓力群还说，同志之间，有不同意见，不但允许发表，而且允许保留。人

家打棍子时，你怎么办？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只要是同志，他打了棍子，我们也不打棍子。要造成一种风气，不要随便把一个人搞臭。固然打人要绝对禁止，随便把人搞臭，也要尽量避免。他打了棍子，我们还是要讲道理，以理服人。人家打棍子时，我们要不要想一想，我们是不是有缺点？要想一想：打棍子的人是不是同志，然后向他指出：你这样不对。我有这样的体会：打棍子的人，并不是自己有什么高明，只是表明他没有道理来说服人，只能用棍子、帽子来压服人。这些同志连起码的理论知识都没有，没有起码的调查研究。批评一篇文章，也没有通篇看一看，通篇考虑，而是抓住句把话，加上主观臆测。对这样的同志不用怕。

我不赞成鲁迅这样的话：“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也是鲁迅说的“自古以来，没有骂倒人的。”我相信鲁迅这话。不要以骂对骂。

邓力群最后说，今后理论研究应该面对今天新的问题。因为新的问题太多了。过去的问题，确实不是一篇文章一个时候解决得了的，这需要经过今后新的历史实践的检验，才能看得更清楚。

马沛文在大会上发言时介绍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修改和发表的经过，并讲了他对真理标准讨论的一些看法。马沛文不但介绍了情况，而且介绍了当时除了明确赞成和反对的两种人外，还有一些人的心态。比如，有的同志按他的思想倾向一定是赞成这篇文章的，但当你问他对文章的态度，他就笑而不答了；如果一定要他表态，他就会说：不了解背景，不好说。再比如，有的同志是适合写这类文章的，但当你约他写文章，他却不写了，理由是：你们这篇文章的观点我是支持的，但我不能写文章，因为我不愿卷入这场斗争的漩涡。

马沛文说，我们所以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个带根本性的理论问题，也是带根本性的现实问题，就是因为不解决这个问题，一系列问题都不能解决。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我们就不能从实际出发，就不能实事求是，就不能拨乱反正，就不能冲破“四人帮”设置的各种禁区，就不能砸烂“四人

帮”制造的精神枷锁，就不能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一句话，就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多少年来的实践，已经作了最有说服力的证明。

汪子嵩在大会发言中回顾了粉碎“四人帮”以后一年多来意识形态领域的情况。他说，一年前，人们曾形容当时的情况是：文艺发展，经济学繁荣，哲学贫困。那时哲学工作者开学术讨论会，讨论的是经济问题，似乎哲学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好讨论的。随着批判“四人帮”的深入，随着形势的发展，哲学问题终于被提了出来而为人们普遍关心了。真理标准问题的提出和讨论，使我国人民的思考提到了哲学的高度。现在，再也不是“哲学贫困”了，而是到了一个哲学活跃、发展的时期，是哲学工作大有可为的时期。通过真理标准讨论，哲学不但可以在拨乱反正、促进四个现代化中起到积极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哲学本身也可以得到发展。

李秀林在发言中着重从理论上阐明了实践标准和理论指导的关系。他指出：革命理论是探求真理的方法，而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圣药；革命理论指明了实践的方向，但不是卜卦算命；革命理论是破除迷信的思想武器，而不是禁锢人们头脑的精神枷锁；革命理论是动员群众的旗帜，而不是束缚群众手脚的绳索；革命理论是提高识别能力的认识工具，而不是检验真理的客观标准。最后，李秀林强调了彻底坚持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充分发挥革命理论的指导作用。

会议还就实践如何检验真理、实践标准和逻辑证明的关系、过去实践和当前实践在检验真理过程中的作用、实践标准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等问题展开了讨论。这是一次思想解放的大会，是理论工作者敢于拨乱反正、敢于冲破“禁区”、敢于研究、敢于探讨新问题的大会。

周扬以社会科学院顾问的身份在7月24日的闭幕式上讲话。他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意义重大。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关系到思想路线、政治路线问题，也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

问题。因为离开了实事求是，离开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离开了千百万人民群众革命实践的检验，就是离开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他说，现在，这个问题之所以成了问题，是因为有人不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似乎真理还要受实践的检验，真理就没有“绝对权威”了。这就足见林彪、“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了，但是他们的思想流毒还远没有肃清，他们的阴魂不散。我们要来做消毒工作，做驱散阴魂的工作。

对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会不会削弱或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问题，周扬回答说，不仅不会否定或削弱，而正是肯定和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问题是你所认为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是背诵它的片言只语，还是了解它的精神实质？是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发展的理论，还是看成是僵化的教条？这就是真假马克思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分水岭。我们应该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而不应当用片言只语来歪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体系。对于假马克思主义、假毛泽东思想，就是要否定，要揭露。

周扬强调科学无禁区。他说，如果给科学设置禁区，那就是扼杀科学，宣布科学的死亡，就是阻碍着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科学无禁区，是不是否定或削弱党对科学事业的领导呢？当然不是。开放禁区就正是体现了党对科学的正确领导。加强党对科学的领导，不是设置禁区，不是压制科学的自由讨论，而是给科学研究指明正确的方向，制定正确的科学政策，采取正确的方法来领导科学事业，包括开展学术的自由讨论，鼓励独立的见解、独立的创造，等等。

讨论会后，不少省市的代表回去作了传达，从而把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向了全国。

第六章 多事之秋

1. 《红旗》保持沉默

就在各界此起彼伏的讨论中，《红旗》一直沉默着——从春末到夏初，直到暑气蒸腾的7月。这是中共中央主办的理论刊物呀！究竟……读者纷纷投书，海内外一片疑虑，接着就是种种猜测。答案其实很简单：它的不置一词与《光明日报》当初的冲锋陷阵有着同样的成因——总编辑的主意。

熊复是5月17日到《红旗》接任总编辑的。在这之前，他在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任职。就在到任的当天，在同《红旗》的几个负责人见面时，他就针对《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直抒己见：在这里，我表明自己的观点，这些文章是有问题的，我是有不同意见的。有些报纸用一个版、两个版发表什么特约评论员文章，认为他们是代表中央讲话的，到底代表不代表很难说。他还说：现在是要强调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不是要强调发展和创新。这里有个维护毛主席旗帜的问题。有些人抓住实践和真理的问题大做文章，到底要干什么？！他又说：关于按劳分配问题，光讲马列怎样说是不够的，毛主席发展了嘛！不能离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来谈什么按劳分配。把按劳分配说得那么好，毛主席讲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还算数不算数？！

第二天，5月18日，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央负责同志找熊复同《红旗》前任总编辑谈话，谈交接工作的问题。他批评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说它是“针对着毛主席来的”，并说要“总结经验，统一认识，下不为例”。后来，各界都动起来了，真理标准讨论十分热火。他又对熊复说，“《红旗》要一花独放”，对真理标准问题“就是不表态”。

第三天，5月19日，熊复在《红旗》杂志向干部传达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央负责同志对《红旗》工作的指示，并谈了他的办刊指导思想：

“《红旗》的任务是完整地准确地宣传马列主义，着重从理论上完整地准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捍卫毛泽东思想，同各种离开毛泽东思想的倾向作斗争。”

“理论问题要慎重，这点特别要注意。在理论问题上，是捍卫毛主席的思想、路线呢？还是没有捍卫，这个问题是要很好考虑的。”

“要注意党内外的思想动向与理论动态。思想理论战线很活跃，需要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有什么倾向，离开毛泽东思想的倾向。”

这就是熊复到《红旗》后头三天的情况。

两个月过去了。这期间，各报发文，小平讲话，科学家们表态，全世界都在关注……熊复坐不住了。7月底，他终于布置写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并且把这件事交待给当时的一位副总编辑。怎么写呢？8月份，他在一个小会上说：“关于实践标准的文章，要写，但要注意现在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应强调发展和创新，不应强调用新结论代替旧结论，而应强调坚持和维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

读者在这里肯定已经注意到了“不应强调发展和创新”，这句话出自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之口，本身就已经是“发展和创新”。其实，除了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教会，世界上很少有哪个学派强调自己是不可以发展与创新的，就连对《圣经》的这种“捍卫”也是徒然，还是出了路德，出了加尔文，出了拥有数亿信徒的新教。

根据这个调子，执笔的那位副总编辑经过一个月的苦战，于9月11日写出了初稿。全文共分六大部分，两万多字。从9月11日到19日，经过几次修改，拿出了第三稿。这中间主要的修改之点是：

初稿的标题是：“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熊复说，他请示过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央负责同志，他开始不同意写这篇文章，后来同意了，但认为文章的标题要改，改成“《实践论》的认识论”，只讲一般的认识原理，不专门讲实践标准问题。因执笔者不同意这样改，所以，将标题改为：

“重温《实践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

初稿第一段中曾有这样几句：“同志们反映这是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我们认为，这次讨论不仅有利于弄清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观点，而且关系到我们党的整个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问题，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熊复说，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央负责同志认为这样讲估计太高了，不是什么关系国家命运前途的大事，只能说是有利于开展百家争鸣，活跃思想。于是这几句话就改为：“出现了敞开思想，勇于争鸣的新气象，我们认为，通过这次重温毛主席的《实践论》，弄清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以利于在政治思想领域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具有重大意义。”

初稿在第三部分批判“四人帮”的“阶级标准”时说：“我们向来认为，一切客观真理的本身，不论是自然领域的，还是社会领域的，都没有阶级性，它以实践为检验自己的唯一标准，而不以任何人或任何阶级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熊复则坚持社会领域的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并说《五·一六通知》中关于真理阶级性和批判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话是毛泽东加进去的，批这两句话就是批毛泽东。因对此有不同意见，所以确定不写真理有无阶级性，但对“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还是批了一下。

初稿第四部分，在批判林彪的“句句照办”时，指出了“今天也还有些好心人受了他们的影响，存在这种糊涂观念”之后，还有一句：“同时也不能排除今天或今后还会有个别别有用心的人继续袭用这个老谱。”在熊复的坚持下，后面这句话被删掉了。

初稿第四部分原来的结语是这样的：“由此可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标准，反对唯心主义的主观标准或二元论的主观标准加客观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举旗’而不是‘砍旗’；相反，坚持唯心主义的主观标准或二元论客观标准加主观标准，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标准，那就不论你的主观动机如何，归根到底，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砍旗’而不是‘举旗’。”这一段被熊复全部砍去。

此外，还砍去初稿中批判王明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整整一段。

这就是第三稿，也叫9月19日未定稿。

这个未定稿的六部分的小标题是：

(一)当前重温《实践论》，讨论实践标准问题的重大意义

(二)重温《实践论》，坚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三)彻底批判林彪、“四人帮”搞乱真理标准的罪行

(四)正确认识理论指导与实践标准的关系

(五)对怀疑论、不可知论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

(六)从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指导下不断攀登真理的高峰

从这六个小标题当然看不出文章的是与非，如果照录原文，又太长，颇费读者时间。那么，还是摘录其中的一些段落吧：

由于实践发展的有限性，带来了实践标准的相对性和“不确定性”，这表现为三种情况：第一，实践在一定条件的范围内，只能相对正确地检验某一认识的真理性的……第二，实践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不能对现有的一切理论和观点都作出正确的判断……第三，在某些实践中，由于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在起作用，使实践结果带来局限性……

历史上的进步阶级，在一定时间和一定程度上是促进社会发展的，所以能在一定的限度内认识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真理，并在一定程度上拥护真理。只有近代无产阶级才能充分认识和完全拥护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真理。这是因为，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阶级立场是同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趋势完全一致的，是同客观真理的本能的要求(主观要符合客观)完全一致的。这也就是说，无产阶级的阶级性(革命性)与科学性是完全一致的，所以也只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才敢于公开宣布自己的学说是具有阶级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只能是无产阶级及进步人类的认识工具。在这个意义

上，说什么“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完全错误的。当前正在进行的这场有关真理标准的讨论，关键在于弄清理论的指导与实践的检验作用的关系。

至于革命导师的片言只语的问题，我们应该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要把它的基本原理、个别结论既作统一理解而又有所区别，把它的片言只语与它的精神实质既加以联系而又有所区别。

上面已经提到，林彪、“四人帮”搞乱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特别是搞乱是非标准所带来的严重毒害和影响之一，就是在不少干部和群众中引起了一股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的思潮。

可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真正的“海外奇谈”。谈些什么呢！他们说我们是在“打破永不犯错误的神话”；是要“改变一直讳言犯错误的做法”；是要克服什么“晚年”的“僵化”。“解脱几十年来中国人奉若圣旨的被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条的束缚”；是要搞清文化大革命中“直接间接的责任问题”；等等。看来，他们是在把问题引向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轨道。

现在实践已经证明，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已经找到了反修防修的对症良方……像文化大革命这样伟大的历史事件，只有站在珠穆朗玛峰的高度才能总结出正确的经验的；局限于一时一地的狭隘眼界，都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

批评家的袭来，对我们倒是一个有益的警告。它告诉我们，当我们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的时候，阻力和干扰是不会少的。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擦亮眼睛，克服阻力，排除干扰，坚定地走自己的路！……

迎接一个新的光辉的日出！

这个稿子曾以《红旗》杂志社党委的名义于9月20日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征求意见，哲学研究所经部分同志阅读和座谈，于24日提出六条意

见退给《红旗》杂志社党委。

六条意见是：

一、文章的标题是《重温〈实践论〉——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这个问题很重要，题目抓得是好的。但对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所反复强调的关于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阐述得不够，不是说文稿中没有讲这个问题，也不是说文章的大小标题上没有突出这个问题，然而，从文章所阐述的具体内容上看，从整篇文章所阐述的着重点看，对于实践是“第一的和基本的”这个根本观点的阐述，是不够的。与此相联系，对于毛主席所一贯倡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个根本观点，也讲得很不够。我们认为，这是文稿的一个根本缺陷。

二、文稿中提出了“同怀疑论、不可知论等等错误思潮进行坚决斗争”的口号，并把这种思潮同林彪、“四人帮”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主观标准”并列作为我们必须与之进行坚决斗争的“摆在我们面前的严重任务”，而这种怀疑论、不可知论的“思潮”又是存在于“不少干部和群众”中的“普遍思潮”。对于这种“普遍思潮”的具体内容，文稿中前后讲法也不甚统一明确，有时是指文化大革命中的“路线斗争不可知”，有时又似乎是指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怀疑”，又有时同文稿第六部分所批判的“海外奇谈”紧紧相连。上述这些，不知客观根据为何？我们建议在修改时作重新研究、考虑。

三、文稿中对于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那种思潮，即那种割断历史，脱离实际，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那种只能照抄照搬、搞本本主义、不从实际出发的错误倾向，批判很不得力，实际上也没有用很多篇幅来批判这种思潮。而同时，文稿中则提出了“怀疑论”、“不可知论”这种在我们看来文稿中的前后讲法并不一贯、政治界限并不清楚，而文稿又认为是存在于“不少干部和群众中”的“普遍思潮”，用大量篇幅加以批判。对于这种做法，我们不能理解，因而是无法赞同的。

四、关于如何对待片言只语，文稿中提出了对片言只语也“应该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这样的论断。说：“我们应该肯定，经典著作中的词句是很重要的，有的时候个别词句甚至是关系重大的，我们只有通过认真钻研经典著作中的词句，才能领会革命文献的精神实质，这是不言而喻的”。

什么是片言只语？什么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搞片言只语？这本来是有它的确定含义的。比如，林彪、“四人帮”搞片言只语，指的就是他们出于反革命的需要，肆意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歪曲它的内容和精神实质而又用片言只语来吓人、骗人。对经典著作搞片言只语，同时就意味着对它的精神实质的阉割、歪曲。这是不言而喻的。在林彪、“四人帮”对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搞了多年的“片言只语”之后，我们今天正在批判这种罪恶行径的时候，对“片言只语”问题作上述的那种“具体分析”，文稿的另一处，还提出了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要“把它的片言只语与它的精神实质既加以联系而又有所区别”这样的论断，这些我们以为都是极不合适的。

五、文稿的最后部分，所引用的“海外奇谈”，均是恶毒攻击的言论，请点明出处并集中给予回击。如果不注明出处，则容易造成国内人民之间的相互猜疑，这种做法，我们以为不利于安定团结。

六、关于经典著作的引用，也有不符合原意的地方。例如，恩格斯的原语是这样的：

“……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不过是这一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而已。诚然它也有保守的方面：它承认认识和社会的每一阶段对自己的时间和条件来说都有存在的理由，但也不过如此而已。这种看法的保守性是相对的，它的革命性质是绝对的——这就是辩证哲学所承认的唯一绝对的东西。”（《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

集》第4卷，第213页。)

文稿是这样引用的：“恩格斯说过，‘辩证哲学所承认的唯一绝对的东西’，就是‘认识和社会的每一个阶段对自己的时间和条件来说，都有存在的理由。’”这里，可以看出，文稿在引用时把恩格斯原话中紧接着“存在理由”之后的“但也不过如此而已”一句话和以下的话删去了，把“理由”之后的逗号变成了句号，在句号外边打的引号。这无论从词句和意义上，都是和恩格斯的原意不符合的。

由于哲学研究所的这六条意见既尖锐又中肯，加之当时各方面对《红旗》杂志意见纷纷，因此，此文一直没有能刊用。后来，到11月份，又作了一次修改，删去了五、六两节，只留下前四节，准备作为纪念毛泽东85周年诞辰的文章，在第12期发表，并已列入选题计划，这就是12月9日的修改稿。因为真理标准讨论的深入和明朗化，《红旗》已完全陷入被动，此文终于流产。

这篇文章虽未发表，却由此而引发了理论务虚会的召开。九月下旬，《红旗》杂志社收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对《重温〈实践论〉》一文的意见后，就将此文及哲学研究所的意见上报中央政治局常委。叶剑英看后，提议中央召开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这就是1979年年初那个有名的理论务虚会的来历。

2. 谭震林加入

就在熊复挣扎于《重温〈实践论〉》的同时，《红旗》又发生了一件引人注目的事件，这就是阻止谭震林文章的发表。

1978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85周年纪念日，12月出版的第12期《红旗》自然要有纪念文章。8月份编辑部就积极筹划，约请谭震林写一篇回忆毛泽东当年领导井冈山斗争的文章。

谭震林在“文革”中曾因坚定地抵制林彪、江青的作乱而被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后又被诬陷为“叛徒”，长期遭摧残。在《红旗》编辑部派人向他约稿时，他斩钉截铁地说，写文章不能只讲历史，要从现实着眼，要我写文章，我就要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明毛泽东思想是从实践中来，又经过革命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

10月下旬，谭震林文章的初稿送到《红旗》编辑部，熊复看后认为文章第四部分讲的都是有关真理标准的问题，应删掉。责任编辑认为，文章是谭震林写的，以个人名义发表，要尊重作者的意见，不能强加于人，不能删。

有意思的是，这边的争执还未定局，谭震林又送来了新的修改稿，把第四部分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进一步加强了，并且给《红旗》编辑部写信说：“文章只作了一点小的修改，主要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这一点原文上是有的，只是不够突出，不够明确，我把它加强了。”“如果你们认为还有什么修改，请想好后，到我家来当面商量。”

熊复看了谭震林的信和改稿哭笑不得，但仍坚持要删去文中有关阐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那一部分，并且写了一个条子，讲了两点处理意见：一、先派人去同他谈，说明中央给《红旗》的方针是不介入讨论，请他考虑删去有关段落；二、如谭不同意删，就照他的意见印出送中央常委审查。

11月14日，编辑部派人去见谭震林，转述了熊复的意见。谭震林当即鲜明地表示，文章中的材料可以动，观点不能动。实践标准的讨论是全党的大事。告诉熊复，这样做丢不了党籍，住不了牛棚。有谁来辩论找我好了。对这篇文章我想了两个月，想出了两句话：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改正。

熊复拗不过谭震林，在无可奈何之中，于11月16日将谭文送审，并给汪东兴写一报告：

汪副主席并华主席：

我们请谭震林同志写了一篇纪念毛主席诞辰八十五周年的文章，准备在十二期发表。谭震林同志强调要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这篇文章的指导思想，这就要使《红旗》卷入这场讨论。我们建议他修改，他表示不同意，就要请中央主席审查。现送上这篇文章，请审定。

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看后同意《红旗》发表谭文。邓小平、李先念还写了批语。邓小平写道：“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改了一点，如《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李先念在19日写的批语是：“文章确长，没有时间看，反映对《红旗》意见不小。”在21日，他看了这篇文章后，又写道：“我看了这篇文章，谭震林同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当登，不登《红旗》太被动了，《红旗》已经很被动了。”

在接到这些批语之后，熊复依然不敢做主，又跑到汪东兴那里问怎么办。汪东兴也无可奈何，只好说，那只好这样。至此，谭震林的文章送新华印刷厂发排，于12期刊出。

3. 《红旗》的编辑不打算再保持沉默

熊复在此期间所唱的一系列“反调”，并不代表《红旗》的编辑们。《重温〈实践论〉》那篇文章，照理是编辑部哲史组的事，但文章的起草、修改均未让哲史组的编辑们插手。对《红旗》所发生的一些不正常的现象，一些人蒙在鼓里，洞观的人则是憋着一肚子火。随着形势的发展，《红旗》愈来愈被动，这股火也越憋越大，然而只能“在地下运行”。运行了半年之后，终于冲破地表，喷焰而出了。1978年11月23日，在《红旗》杂志社院内，王忠明、邢雁二人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提出了对《红旗》杂志当前一些问题的看法，要求迅速改变《红旗》的面貌。大字报立即在社内外引起轰动，《红旗》的人也感到舒心。

大字报有关真理标准讨论问题是这样说的：

作为党中央理论刊物的《红旗》杂志，理所当然地要大力参加这一讨论。但是《红旗》杂志至今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保持沉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我们从熊复同志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可以找到答案。熊复同志不止一次地表白，他并不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没发表过文章，也没作过讲演。事实并不如此。他刚来《红旗》不久，就在一次会上针对《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说：“我是有不同意见的，在这里表明我自己的观点，这些文章是有问题的。”最近熊复同志在召集一些同志座谈宣传问题的会上，当有的同志提到《红旗》没有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很被动时，熊复同志很激动地说：“你被动什么，我并不感到被动”，“这没有什么关系，不要怕这种人，”“有人跳得很高，其实，他作了些什么，中央很清楚，我今天不点他的名。”我们要问熊复同志，这难道不是反对吗？

熊复同志还表白说，他授意一位同志写过文章，我们看看写的这篇“重温《实践论》”是一篇什么样文章呢？这篇文章全文两万多字，除了教科书式的毫不联系实际地讲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外，很大篇幅是驳所谓“怀疑论”、“不可知论”和“海外奇谈”（请同志们读一读这篇文章，看是不是讲的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这种文章实质上是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唱反调的。

发生在1976年清明节的天安门事件是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反映了亿万人民的心愿，熊复同志对这个事件抱什么态度呢？今年第十期《红旗》登载的《评姚文元》一文中的第二部分“用笔杆子杀人”，原来上海写作组同志写的全部内容是揭露“四人帮”怎样歪曲天安门事件的事实真相，制造白色恐怖，经过熊复同志的手，把它砍掉了，这是为什么？现在华主席、党中央为天安门事件完全彻底平反了，这是我国人民政治

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但是，至今没有看到熊复同志的态度，他既不传达中央的指示，也不组织机关同志学习，这又是为什么？从这里可以看到熊复同志对敬爱的周总理是什么感情？前一个时期，机关批判姚文元和他的亲信利用《红旗》反对周总理的罪行，同志们要求曾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熊复同志讲一讲周总理的丰功伟绩，但他一再推托，根本不讲。

6月中旬，在一次揭批“四人帮”的核心小组扩大会上，熊复同志用嘲讽的口吻说：“有人竟用老干部的名义，发表给青年的复信，说过去上当受骗是难免的，这是什么话，这不是明目张胆地鼓吹投降主义，鼓吹投降有理吗？”说“那封信是错误的”，是“根本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大家知道，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位老干部给青年的复信，是胡耀邦同志写的，熊复同志对这样一封信竟破口大骂，其用意何在？在这次会上，熊复同志还耸人听闻地说：“现在思想理论界很混乱，有些人不是不懂理论，为什么提出一些怪问题？”还说：“这样严重的情况，不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吗？”熊复同志在这里这样提出问题，不知为什么？

熊复同志还多次在会上说：“现在文章中为什么不提走资派呢？不是有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吗？”在7月3日的全社大会上，他竟然号召全社同志要对付可能出现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在目前情况下，提出这样的问题，其用意何在？

这张大字报贴出后的第三天，即11月25日，熊复在大字报旁边贴了一张小字报：

为大字报的出现而欢呼

读了王忠明、邢雁同志的大字报，我非常高兴，为这张大字报欢呼。

王、邢两同志对我的工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总括起来就是《红旗》的运动和工作落后于当前的形势，而这是同我的领导思想和工作作风分不开的，我要负完全的责任。我认为，这样的批评是中肯的。我诚恳地接受王、邢二同志

的批评。

可以看出，王、邢二同志的批评是善意的。因为他们提出的问题，是要迅速改变《红旗》的落后面貌，紧紧跟上新长征的步伐。这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尚未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全社同志都来思考这个问题，研究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至于我，从王、邢二同志的大字报得到很大的启发。我这个人的缺点是很多的，几个月工作中这样那样的错误也是有的。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我现在还来不及总结我在这个时期的工作，而在适当的时候是应该作出总结，取得教训的。错了就改，我有决心改正工作中的错误。希望同志们在这方面帮助我，督促我，有以教我！

熊复

1978年11月25日

4. “救救《中国青年》”

粉碎“四人帮”以后，一些在“文革”中被迫停刊的报纸、杂志陆续复刊。“文革”前在青年中有广泛影响的、深受青年们喜爱的《中国青年》杂志拟定于1978年9月复刊。在这之前，成立了共青团“十大”筹备委员会，着手召开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新的团中央委员会，恢复在“文革”中被“砸掉”的团的中央机构，开展正常的团的工作。《中国青年》的复刊工作置于团“十大”筹委会的领导之下，而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央负责同志又是中央分管工、青、妇工作的，团“十大”筹委会当然由他来直接联系和领导。

复刊后的第一期《中国青年》定于9月11日出版。第一次征订，即达200万份。9月6日、7日，《人民日报》、新华社先后发了复刊消息；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第一期目录。全国青年翘首以待，渴望能早日看到他们自己的刊物。

9月10日，北京承印的60万份《中国青年》第一期已全部印完，全国其他7

个代印点也大部分印完。北京地区已有4万多份通过邮局送到读者手里。这一期登有介绍在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中同“四人帮”作斗争，在迫害面前坚强不屈的青年工人韩志雄的事迹的文章《革命何须怕断头》，选登童怀周编辑的《天安门诗抄》。在群众迫切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当时，《中国青年》推出这样的文章，自然受到了读者的欢迎，争相阅读这一期杂志。

不料，10日下午，共青团“十大”筹委会负责人韩英接到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央负责同志的一个电话。他提出了四点意见：

一、《中国青年》第一期为什么只有叶副主席题词，没有华主席题词。

二、《革命何须怕断头》所宣传的韩志雄，你们了解清楚了吗？这个人有问题。

三、童怀周的《天安门诗抄》怎么又出来了。

四、没有纪念毛主席逝世两周年的文章。

当时，韩英即将上述意见传达给《中国青年》编辑部，并宣布刊物停印停发，等研究处理。

编辑部当即作了认真的研究，感到这四条意见并没有什么道理。他们认真回顾了刊物编发的情况：第一，关于没有华国锋题词的问题，他们早在7月份就分别给华国锋及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邓小平写信，恳请他们为《中国青年》复刊题词，并希望能在8月底交编辑部，以便能赶在9月2日付印。付印前，又曾几次催问，当时只收到了叶剑英的题词，而这时华国锋又正出访在外。怎么办呢？在两难之中，他们想到，《中国青年》过去宣传舍身救人的青年军人王杰时，也曾请中央领导人题词，当时，毛泽东未题，只有周恩来等几位领导人题了。刊登以后，并无什么不好的影响。鉴于已有这样的先例，他们认为没有华国锋的题词，只有叶剑英的题词，不影响大局。第二，宣传韩志雄，是北京市公安局推荐的；而且，北京团市委已经作出了向韩志雄等人学习的决定，他本人也已被推选为出席共青团“十大”的代表；而事迹是经过编辑部多方调查核实过的，一点虚假也没有，宣传这个人完全站得住。第

三，刊登童怀周编选的革命诗抄，其内容都是怀念周恩来总理、声讨“四人帮”的，这会有什么問題呢。第四，这一期没有纪念毛泽东逝世两周年的文章，是因为本来想刊登9月9日要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诗词手迹，后来因为赶不上付印时间，经过团“十大”筹委会同意，改发毛泽东1948年为《中国青年》复刊题词的手迹。而且，在这一期的复刊词中，已经说到“以表达我们对毛主席的深切怀念”。对纪念毛泽东并没有疏忽。

想来想去，编辑部的同志认定在编发这一期刊物的过程中，并无处置不当之处，对这四点批评难以接受。

9月11日，编辑部将自己的看法写信报告华国锋及其他几位中央副主席，并同时报给了团“十大”筹委会。

9月12日晚上，韩英找杂志社组长以上干部开会，传达他同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央负责同志商定的对这期刊物的四点处理意见：

一、由汪东兴去请华国锋题词(这时华国锋已出访回国)。

二、增加毛泽东的诗词三首及照片。

三、删去《革命何须怕断头》一文中“这场伟大壮烈的人民运动，被‘四人帮’无情地镇压下去了……”等段落。

四、删去《青年革命诗抄》的天安门题图和编者按。

韩英还特地念了1977年3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中有关天安门事件和“两个凡是”的段落，说以上两篇文章同华国锋讲话的精神不符，有损毛泽东的形象。

9月13日下午，华国锋的题词送到了编辑部。当晚，编辑部向团“十大”筹委会报告：华主席的题词收到了；已向外地发出电报，立即停印停发；北京印好的全部停发。可以增加华主席题词和毛主席诗词三首。但《革命何须怕断头》一文和《青年革命诗抄》以不改为好。因为这两篇东西内容并没有错，而且已有4万多份刊物发到了读者手中，改了以后将造成同一份刊物两个版本的局面，不但会引起读者的不满，若追问起删改原因，将无言以对，不利于安定

团结。遗憾的是：团“十大”筹委会没有接受编辑部的这个意见。

就在这前后，复刊第一期所遇到的种种磕碰传到了社会上，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不少读者提出，救救《中国青年》！

9月14日，编辑部再次上书华国锋及几位中央副主席，表示最好不要删改《革命何须怕断头》及《青年革命诗抄》。

当天晚上，主管的中央负责同志又把杂志社组长以上干部召集到人民大会堂开会。会议在紧张的气氛中从8点15分开始，一直开到午夜12点50分。

会上，他对编辑部干部的批评与指示，已经可以使用“申斥”这个字眼了。

他说：“中央叫我分管工青妇，这个你们知道不知道？我翻了这期《中国青年》的大概内容，没详细看，还以为是清样，不知道已经正式出版。如正式出版，就不是要我审查了。今天把口径统一一下。你们已经发出41000份，发都发了，怎么叫审查？如果你们认为我们没有审查的任务，那我们就不审查了。”

他说：“我现在分管，我就不能不提意见！出版《中国青年》是很重要的事情，涉及全国，发行200多万份，涉及的面是比较大的。出版就要考虑得周到点。《中国妇女》的出版是经过我批准同意的。《中国青年》送来了，我下午就打了电话，我并不慢啊。叫你们考虑一下，结果考虑出了这么大的风波。”

他说：“不要我审查，我不负责，我这个人好办。你青年社捅这个情况，离开了团‘十大’筹委会。你们直接写信给中央了，并没有通过筹委会转给我。不是和筹委会打官司，而是涉及到中央。天安门事件，华主席已经讲了。”

这时，他念了华国锋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中关于天安门事件和“两个凡是”的段落。

他接着说：“刚才第一个是讲出版的组织观念。第二个讲文章内容符不符

合华主席对天安门事件的估价。华主席在天安门问题上早就讲过，为什么有的人还在上面纠缠？这样行不行？嘴里讲，文章又那么写。现在还这样干，行不行？内容上有这个意见，叫韩英去谈谈，你们不改也可以。中央不知道，将来你们承担责任就行了。这期《中国青年》没经过中央审查。已经发了41000份，得到了赞扬，你们不要挑这个矛盾，好像中央不让出版，筹委会不让出版。”

他说：“你们的信，说不改为好。中央不承担责任，没让中央批准，筹委会审查，出了问题，你杂志社负责。你叫我提意见，又不让我提。你杂志有威信，你现在把中央的威信搞坏了。”

他说：“你叫我提意见我就提，第一期应该有毛主席的东西，应该考虑。华主席不在，叶副主席、聂帅题了字，我再给华主席讲讲，题个字嘛！毛主席逝世两周年，有总理的照片，主席的一个都没有，不考虑考虑？我说可以考虑一下。再有，我说里边有两篇文章内容与华主席讲话符合不符合，考虑考虑。再有，英雄人物不是不可以写，但是天安门事件的性质是已经定了的。是你们记者写的文章，与转载不一样。”

他说：“童怀周的大字报贴出来，说不让《中国青年》杂志出版。大字报可以写，但《中国青年》第一期到底发生什么影响？你们要考虑一下，如果你们认为这样行，就按你们意见办。”

他说：“毛主席诗词三首你们一首不登，高举毛主席旗帜，怎么举法！街上大字报说阻拦《中国青年》出版，怎么阻拦了？他自己要拼命发！今天说清楚，不是我阻拦，而是你们提前发。我就怕你们搞坏了。”

他说：“为什么不发华主席的题词？华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为什么不能等两天？”

他说：“一是不动了，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华主席题词也不登了。这是你们的意见。怕什么？最多只能说汪东兴讲的、韩英讲的、筹委会讲的都不灵嘛！最多说你们打了个胜仗。题词可以不登，主席诗词也不登。这一期中央没有

审查，就是中国青年社发出的。我声明，我没审查。第二条意见，把华主席题词、毛主席诗词三首和照片放进去，其他不动，因为动了也不行。我看就这两个意见，不可能有第三个意见。”

他说：“历史上有教训，凡是离开党的领导的，一事无成，会碰得头破血流。”

他说：“已发出41000份换回来。”

他说：“今天批评一下，说得不恰当，请你们原谅。我的心还是好的。不能说你对错了。都对。为什么没按时发？因为还有华主席题词、毛主席诗词三首、照片。分量提高了。这两篇文章一个字也不要改。”

总编辑关志豪是守纪律的。他火速派人赴印刷厂，以手工方式处理每册尚未发出的《中国青年》，复刊的第一期夹进了华国锋题词、毛泽东诗词，又尽力收回已发出的4万多份。

第七章 再升一级：各路诸侯表态

真理标准的讨论很快就从北京向四面八方辐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都在严肃地思考这个问题，有的脆快了当，有的颇费踌躇；这倒并不是因为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有什么深奥难通之处，关键在于“妾身未分明”——拿不准在政治上究竟采取何种态度为宜。当然，问题本身所牵连底蕴之深、所包容方面之广，也给这些在形形色色的战场上出生入死，翻上滚下的豪杰们一些为难。

在这个问题上最先明确亮出自己观点的，是当时的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和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

任仲夷在辽宁省委主办的理论月刊《理论与实践》第八、九期合刊上发表文章，题目是：《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

文章认为，“要不要实事求是，说到底，是搞唯物主义还是搞唯心主义的

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理论问题。”

文章说，“实事求是，这是一面照妖镜。在它面前，一切伪理论、伪科学、假左骗局，都会原形毕露。有了实事求是这个武器，禁区可以突破，思想可以解放，工作可以高速度地向前进。联系我们的实际工作想一想，实事求是这个问题，确实太重要了。没有实事求是，对‘四人帮’的许多假左真右的谬论就不能批、不敢批；没有实事求是，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文艺战线的‘黑线专政论’等等都不可能批倒；没有实事求是，干部政策无法落实，大量的假案、冤案、错案也不可能平反昭雪；没有实事求是，经济工作中许多正确的政策和措施都不可能实行。”

文章说，“坚持实事求是，必须承认实践高于认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不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尊重社会实践，那就不能坚持实事求是。强调实践高于认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不是贬低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呢？恰恰相反，这正是捍卫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有的同志认为毛泽东思想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8月初，中共黑龙江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学习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学习《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相继发表的三篇文章，认真地讨论了真理标准和民主集中制两个问题。

会议开始，杨易辰就宣布：要解放思想，畅所欲言，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这句话在不大熟悉当时历史情况的人看来，颇似几句新八股；但杨易辰在彼时彼刻所说，确实“言之有物”。不久前，他曾实实在在地顶了“两个凡是”一家伙。他明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黑龙江省委不是黑的，而是红的。在场的人个个屏神敛气。这在当时实在了得！因为“‘文革’前的黑龙江省委是黑的”，是“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定的！

但不是每个黑龙江的干部都如杨易辰。在粉碎“四人帮”一年多以后，解放思想仍然是一个现实问题，心有余悸仍然是前进路上的一大障碍。大家七嘴

八舌地为“余悸”画像。即所谓五顶帽子高悬，怕有朝一日被人扣到头上——“反毛泽东思想”、“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群众运动”、“否定解放军支左”、“否定新生事物”。大家认为，坚持实事求是，才可以破这“五怕”；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可以辨别真伪，分清是非。

新华社在8月3日详细报道了这次会议的内容，首都各报都在头版显著位置采用。

以后其他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那些或因为赫赫战功、或因为励精图治、或因为曾处在历史的峰口浪尖历百劫不死而早已为人民所熟悉的人物，纷纷在各种会议上发表讲话，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新华社播发消息，首都报纸则作为要闻争相刊登。

新华社报道的时间依次是：

1978年

- | | | |
|--------|-----|----------------|
| 8月27日 | 汪 锋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 |
| 9月10日 | 廖志高 | 福建省委第一书记 |
| 9月19日 | 习仲勋 | 广东省委第二书记 |
| 9月24日 | 铁 瑛 | 浙江省委第一书记 |
| | 李丰平 | 浙江省委书记 |
| 9月27日 | 江渭清 | 江西省委第一书记 |
| 10月3日 | 刘子厚 | 河北省委第一书记 |
| 10月5日 | 谭启龙 | 青海省委第一书记 |
| 10月8日 | 王铎内 | 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 |
| 10月11日 | 霍士廉 |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 |
| 10月12日 | 赵紫阳 | 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
| 10月14日 | 陈丕显 | 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
| 10月17日 | 陈伟达 | 天津市委第一书记 |

- 黄志刚 天津市委第二书记
- 10月21日 许家屯 江苏省委第一书记
- 10月23日 乔晓光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
- 10月26日 马 力 贵州省委第一书记
- 11月1日 白如冰 山东省委第一书记
- 11月3日 王 谦 山西省委第一书记
- 11月5日 宋 平 甘肃省委第一书记
- 11月7日 彭 冲 上海市委第三书记
- 11月13日 王恩茂 吉林省委第一书记
- 11月15日 安平生 云南省委第一书记
- 11月15日 任 荣 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
- 11月22日 段君毅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
- 12月6日 毛致用 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1979年

- 6月14日 万 里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 林乎加 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 10月9日 李德生 沈阳部队党委第一书记
- 10月19日 许世友 广州部队党委第一书记
- 向仲华 广州部队党委书记
- 10月30日 萧 华 广州部队第一政委
- 韩先楚 兰州部队司令员
- 11月10日 李志民 福州部队政委
- 11月10日 廖汉生 南京部队第一政委
- 聂凤智 南京部队司令员
- 杜 平 南京部队政委
- 11月22日 吴克华 成都部队司令员

孔石泉 成都部队第二政委

11月22日 刘志坚 昆明部队党委书记、政委

李克忠 昆明部队党委副书记、副政委

11月23日 刘 震 新疆部队司令员

11月24日 北京部队党委中心学习组和机关部门负责人一起座谈讨论
真理标准问题

11月24日 武汉部队党委常委学习讨论

由《光明日报》发起的一颗认识的火星，此刻已在中国大地上，燃成一片智慧、勇气与信心的燎原大火。

第八章 历史的结论——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

正在真理标准讨论的高潮中，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从1978年11月开到12月，历时一个多月。会议期间，根据中央的决定，北京市委宣布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决定。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长篇讲话。这个讲话是中央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实际上也是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一个重大的政策问题。不少同志思想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状态。不打破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接着，邓小平充分肯定了前一阶段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说：“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

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中央工作会议一结束，十一届三中全会就紧接着召开了。由于中央工作会议为这次全会做了充分准备，所以会议进行得很顺利，只一周时间，会议就结束了。

12月22日通过的全会公报说：“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而冲破“两个凡是”的樊篱，由三中全会作出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划出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使中国人民真正拨开了十年“文革”的迷雾，走上了阳光明媚的大路，走向了新的时代。

从此，解放思想成为中国人民思想乐章的主旋律；

从此，改革大潮在中国大地上涌动，其势不可阻挡。

一切都在变。天在变，地在变，人在变。在变革中反思，在变革中新生，在变革中奋进。而一切变革都在受到实践的检验。人们再也不相信空话、高调，而只尊重现实了。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人们就信服，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人们就摒弃。人们相信自己的观察、相信自己的思维，再也不信奉某个神明了。中国人从天空回到地上，从信神而信人，从空想未来的幻影而追求现实中美好的东西，这不是思想解放又是什么呢？脚踏实地，把多灾多难的中国建设得更美好，这就是实践标准讨论所引发出的巨大能量，这个能量随着思想的不断裂变而无限地释放，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组稿、修改和发表

王强华

1998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20年前的那次对中国历史产生极其重大影响的中央全会，对当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做了历史的总结，给予了很高的评价。20年后，为了纪念这场大讨论，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还出版了专著，不少论著都介绍了引发这场大讨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这些都是正常的，也是好的。但在少数论著中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简称《实》文)的形成和发表却有不同乃至截然相反的说法，以致使人感到迷惘和困惑。

南方一家发行量颇大的报纸，在发表一篇有关文章时在编者按中发出了如下的感叹：“今年(按指1998年)是真理标准大讨论20周年，各种纪念活动、纪念文章频繁见诸传媒。时间才不过20年，但引起当年大讨论的那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至少其作者和产生的真相都已模糊乃至失真。这或许是对‘实事求是’的一个嘲弄。”“这里刊出的，是文章执笔人×××的口述实录，相信有助于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谨以此纪念那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实》文是宣传“实事求是”的，研究和宣传《实》文著作和文章却不“实事求是”，的确是一个“嘲弄”，它反映了我国思想界、理论界存在着突出的学风、文风问题。那一家南方的报纸只说“至少”如何如何，那么“至

多”呢，本文试图用铁的事实来回答这个问题，剖析这种不正常现象。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也许《实》文的撰写、修改特别是发表有太多异乎寻常的偶然因素，使它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但也不排除存在一些人为的原因，使它复杂化起来。

《实》文最先是投给《光明日报》又是在《光明日报》首次公开发表的。作为当年这篇文章的直接参与者、《光明日报》的编辑，我有责任把文章的来龙去脉、修改经过告诉《光明日报》的广大读者和所有关心这篇文章的同志。

概括起来说，对这篇文章的形成和发表有三种说法：

一、“一次完成论”；

二、“合二而一论”；

三、“逐步形成论”。

笔者是持第三种观点的。

有什么理由和根据呢？

当年主持《光明日报》工作的已故总编辑杨西光同志，对这篇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以一个政治家的敏锐眼光，不仅在当年就深知文章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高瞻远瞩地察觉到文章发表的若干年后，可能对文章的形成、发表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不同说法，甚至真相将被歪曲，历史将被篡改。杨西光为了对党和人民负责，对《光明日报》负责，1985年虽疾病缠身，仍提出并召集报社的几名同志一起开会，根据当年掌握的资料，专门讨论了这篇文章发表的前前后后，他亲自逐字逐句地审定这次会议整理的一份《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写作和发表的经过》的材料，还决定把《实》文第一次发排的原稿(小样)和以后的历次改稿直至定稿作为附件附在后面，装订成一本《实》文“白皮书”存档。它是历史的见证人，是胜于各种雄辩的事实。

本文主要根据这本“白皮书”上的记载，结合自己亲身经历来撰写的，并以此纪念《光明日报》创刊50周年，缅怀对《实》文的发表作出巨大贡献的杨

西光总编辑。

一、《实》文是如何投到《光明日报》的？

《实》文的出现及其产生的重大影响，固然离不开人的因素，但归根到底它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时代需要所决定。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多次指出的，不是意识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意识。“意识总是反映存在的，这是整个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列宁全集》第14卷，第341页）、“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马恩全集》第1卷，第121页）、“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恩全集》第1卷，第462页）。

形势出宏文。今天我们重新回忆和认识《实》文时，应该首先分析当年出现这篇文章的形势和《光明日报》承担的历史任务。

《实》文的形成和发表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从最初约请作者胡福明写稿到《光明日报》《哲学》专刊定稿并被安排到第77期头条准备发表，是第一阶段；从《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决定把它从《哲学》专刊上换下来，提出要作重大修改后放在第一版突出地位刊出，到为此做了很多工作直至第二次基本定稿，是第二阶段；从把基本定稿送请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理论动态》）帮助修改，在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先行刊登，到《光明日报》首次公开发表，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中央和各省主要新闻媒体先后转播、转载乃至以后形成强大舆论力量，是第三阶段。这三个阶段的时间跨度从1977年7月开始，历时一年多。

那么1977年下半年至1978年的形势如何呢？

众所周知，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了祸害中国十年的“四人帮”。这是一次伟大的胜利，掀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但实事求是地说，这次的“一举粉碎”主要是政治上、组织上的，即把“四人帮”及其少数死党一网打尽。而被颠倒和搞乱了的思想、理论上的重大是非却没有也来不及

澄清，对林彪、“四人帮”多年散布的种种谬论也没有触及，更谈不上“粉碎”。

当时的局势具有诸多的双重性：

一方面，林彪、“四人帮”之所以能在“文革”中兴妖作怪、篡党夺权，除了不难理解的特定条件以外，还因为他们是一伙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野心家、阴谋家，他们利用伟大领袖的崇高威望和他们的特殊地位，制造个人迷信，颠倒思想、理论是非，严重禁锢人们的思想；另一方面，“文革”中某些既得利益者，出于各种情况，在提出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罪行的同时，仍在错误地肯定“文革”大方向，继续宣传“文革”中许多错误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制造新的个人迷信，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一方面，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提出“拨乱反正”的重大决策，要求解放思想，结合各条战线、各行各业的实际，批判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把颠倒了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然而“拨乱反正”进行了一段时间以后，人们愈来愈感到只从某个具体问题、只在某个具体事项上“拨乱反正”已经不够，必须从根本上即从思想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才“拨”得清楚，

“反”得彻底。但这时，人们却不同程度地感觉到仿佛有一个什么东西、一条无形的绳索在束缚思想，妨碍“拨乱反正”的深入进行；另一方面，尽管到了1977年下半年、1978年，林彪一伙宣传的“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已不再重复，但对毛主席特别是在“文革”中的“最高指示”、“英明决策”，不论是非曲直，不问实际效果如何，仍然照搬照用，不敢越雷池一步，加上政治斗争的需要，就出现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个后来被称之为“两个凡是”的论断，成为禁锢人们思想的“紧箍咒”，也就是前面提到的“东西”和“绳索”。

一方面，人们热情欢呼中国出现了一个被“伟大领袖”口授“你办事，我放心”的“英明领袖”，要求全党维护他的“绝对权威”；另一方面，人们又

失望地看到“英明领袖”的不少作为和言行与党心、民心相悖，日益成为社会前进的阻力。

饱受十年“文革”苦难的中国，就是在这样错综复杂、矛盾重重中徘徊，出现了许多难以说得清楚的事情。

在经济战线上，如农业方面，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大批促大干”为基本特征的大寨模式，实践证明是此路不通，但由于它是“伟大领袖”肯定的，不仅不能反对，反而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普及大寨县”活动。

在文教战线上，“黑线专政论”就是一条无形的“绳索”，使得人们批判林彪、“四人帮”举步维艰。比如，文艺领域是“文革”重灾区。但某些媒体在揭批“四人帮”在文艺战线上的罪行时，仍然肯定“17年的文艺战线，黑线是有的，就是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这条黑线，对我国文艺事业确实有过相当严重的干扰和破坏”。一方面要批判“四人帮”利用“文艺黑线”迫害文艺界的罪行，另一方面又承认对文艺事业起过相当严重的破坏作用的“文艺黑线”确实存在，这样的批判能够彻底吗？原因就在于毛主席曾经亲自修改审定并圈阅过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有一个论断：“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又如教育战线是“文革”的又一重灾区。既然文艺界是“黑线专政”，教育界焉能例外？“文革”期间，“四人帮”认为教育战线也是被黑线“专了政”；同时认为“文革”前的知识分子和17年培养出来的大学毕业生，“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就是有名的“两个估计”。“文革”结束以后，人们普遍认为实践证明这“两个估计”应该推倒，否则解释不了建国以来教育战线和全国各项建设事业取得的巨大成绩。邓小平同志曾多次提出这个问题，要求教育界组织力量撰文批判“两个估计”。但批判文章却迟迟发表不出来，原因并不是大家不明白这个道理，也不是没人愿出来写，而仅仅是，这“两个估计”是毛主席肯定过的。后来只是偶然发现了毛主席在一个内部谈话中说过，对教育战线问题的估计不要讲得过分；“文

革”前多数知识分子是拥护社会主义的。由于找到了这两句话，批判“两个估计”算是有了依据，批判文章才得以写成并公开发表。

在理论战线上，理论界普遍认为张春桥写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写的《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社会基础》是两篇“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纲领，必须深入批判。但由于这两篇文章据说都是被毛主席看过的，于是，文章中的错误论点可以批判，但什么人写的、写的什么题目却不许“点名”，于是出现了一些不知批什么人和批什么文章的“批判文章”。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揭开“文革”序幕或至少是为“文革”投石问路的一篇重要文章，其谬误和政治阴谋，“文革”以后已昭然若揭。但就是这样一篇批判姚文元的文章，长时期也无人敢写，直到1978年11月15日，才由当时在《光明日报》工作的苏双碧在报社的支持下，冒着风险撰文并在《光明日报》上公开发表，进行批判，原因也颇为简单，因为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是毛主席阅过并支持发表的。

总之，按照“两个凡是”的观点，即使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也不能批判和纠正，这样各条战线、各行各业批判“四人帮”、拨乱反正就深入不下去。思想理论问题况且如此，像允许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复出、平反天安门事件等更加重要和敏感的政治问题，按照“两个凡是”，更是一个也得不到彻底解决的。

当时的另一个大的形势，是邓小平多次强调要“完整地、准确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用“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的工作”。邓小平高屋建瓴地提出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反对用毛主席的“片言只语”来判定是非，也就是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加上当时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不断撰文或发表谈话，强调要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实际上也是对“两个凡是”的主观唯心论的批判。

再联系《光明日报》的具体情况来分析。1977、1978年。当时的中央大报仅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两家（《解放军报》除外）。《光明日报》是

一张以文教、学术、理论为重点、面向知识分子(特别是中上层知识分子)的有影响的大报。包括《哲学》专刊在内的几个学术性专刊是它的主要特色之一。当时党的中心工作是联系各条战线的实际,拨乱反正,深入批判“四人帮”,整张报纸要为这个中心服务,《哲学》专刊也不例外。哲学是关于世界观、方法论的科学,《哲学》专刊要围绕和配合中心工作,就必须从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来组织批判文章,批判林彪、“四人帮”多年来大肆鼓吹并以此当作一根大棒吓人、整人的“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等主观唯心主义,恢复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为此就必须摆正存在与意识、实践与理论、经济与政治的地位,搞清楚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谁决定谁,也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这就是当年《光明日报》交给理论部特别是《哲学》专刊的一项重大任务。

当时《光明日报》编辑部各部没有行政领导,日常工作由党支部负责。马沛文是分管理论部的报社“临时领导小组”成员兼理论部支部书记,我是支部副书记和哲学组组长,责无旁贷地要组织和采编这方面的文章。正好1977年7月,南京地区理论界在南京召开旨在“深入揭批‘四人帮’,划清理论是非”的理论讨论会,与会者有专业理论工作者和一些工厂理论小组的成员共200多人。这样的讨论会在当时是很少有的。我正好是南京人,在南京有母亲和两个女儿,我爱人因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在青海一所“劳改农场”工作,在北京只我一人。而我自1966年报社“文革”一开始(6月11日)就被打成“黑帮”,很长时间“劳动改造”,被限制人身自由,一个月内只准离开报社两次,一次到邮局寄母亲和女儿的生活费,一次上街理发。由于长期没有回过南京,报社就把我派到南京去参加这个理论讨论会,采写新闻,为《哲学》专刊组稿。

我之所以去参加讨论会,以及以后积极参与修改《实》文,除了工作需要以外,也与我在“文革”中的遭遇有关。我在“文革”中被全社大会批斗过九次,其中批斗我的头一条“罪名”就是我反对林彪的“活学活用”、“一用就灵”、“立竿见影”。过去我确实在私下说过,一个人的认识、观点的形成是

长期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哪能学了几句话第二天就“立竿见影”，改变看法，否定自己。当时我是从“检查”自己角度说的，认为我是知识分子出身，思想复杂，可能做不到，而工农兵对毛主席有深厚的朴素的阶级感情，他们能够做到。这个观点我不敢说一定正确，但在当时我确实没有反对林彪的意思，更不用说是“反对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了。然而在那“史无前例”的日子里，什么都能够成为罪名，为了这句话，我不知吃了多少苦头。这是在光明日报社经历过“文革”的同志中都知道的一段往事。我在报社工作了多年，缺点、错误也有，但我从来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可在“文革”中却成了“三反”分子。坦诚地说，正是有了这一段特殊经历，同时冷静思考了周围发生的种种怪事，使我对“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印象特别深，反感特别大。这正是我当年组织批判“四人帮”文章，签字发排《实》文并积极参与修改《实》文深层次的思想动因。我是这样，我认为其他参与《实》文工作的同志也会是这样。

《实》文最初的作者是胡福明。他当时是南京大学政治系(后来改为哲学系)的教师，是系总支(或支部)的书记(或副书记)。胡福明过去与《光明日报》没有发生过任何联系，与我也素不相识。但我为什么偏偏向他约稿呢？因为在那次南京地区理论讨论会上，他的一个发言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认为，“文革”中批判的所谓修正主义的理论中，“唯生产力论”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批“唯生产力论”就是批判马克思主义。这个观点在今天已经不成问题，但在粉碎“四人帮”不到一年、“两个凡是”仍在支配理论界的当时，提出这个观点在南京地区得冒一定的风险，殊属不易。果然，在胡发言以后，紧接着就有两三位同志发言批评胡福明，讨论会气氛骤然紧张，一次旨在批判“四人帮”的理论讨论会竟变成了与会同志之间的论争。会议主持人宣布暂时休会。这时，我走上前去对胡福明自我介绍是《光明日报》记者，二人从此才算认识。我在去南京以前曾参加过北京的一些批判“四人帮”的理论座谈会，听到北京一些著名学者、专家在发言中曾持有胡福明的这种观点。我把这个信息告

诉了他，说明他的论点并没有错。

会议恢复后，胡福明又第一个发言，重申了他的论点，并作了简要发挥。会议主持人宣布不再讨论这个问题，讨论会继续批判“四人帮”。

讨论会结束后，我再次找到了胡福明。我认为他当时的发言有勇气，反映了他思想比较解放，是较为理想的组稿人选，于是就约请他为《哲学》专刊写稿。

实事求是地说，当时我约请胡福明为《哲学》写稿，没有出具体的题目，胡福明确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题目完全是他自己定的，也没有向我说过。由于我和他初次相识，双方都不知根知底，我按照一般组稿做法，把当时的形势和报社派我来南京参加理论讨论会并组织从理论上拨乱反正、深入批判“四人帮”稿件的任务告诉了他，希望他能够协助我完成。

参加南京地区理论讨论会以后，我发了一条新闻，在《光明日报》8月11日头版头条刊用。这条新闻一方面揭批“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在政治与经济，革命与生产的关系问题上散布了许多谬论，把这个本来已经被革命导师明确论述过并为革命实践正确解决了的问题，弄得混乱不堪，给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很大损失。……为了澄清被‘四人帮’搞乱了的理论问题，就必须继续深入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准确地、完整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把‘四人帮’散布的谬论，一条条地痛加批驳，肃清它的流毒。”另一方面，又报道了与会代表“就政治与经济，革命与生产的关系问题初步地开展了讨论。”新闻中提道：“有一种意见认为，经济是基础、经济决定政治，指的是经济与政治谁是本源、谁决定谁的问题，即谁是第一性的问题。”还写了其他一些意见。这条新闻基本上反映了当时与会理论界的认识水平。尽管它没有点明实践与理论的关系问题，而且从现在来看，新闻中反映的观点有的尚可商榷，但它毕竟提出了要“准确地、完整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批判被“四人帮”搞乱的思想理论是非，指出“经济发展状况、经济关系”决定“政治制度、政治变革”，符合报社当时的宣传意图，所以报社

仍把它放在头版头条地位刊出。

据《实》文作者胡福明撰文说,《实》文初稿是1977年9月寄往《光明日报》《哲学》专刊的,而据报社记载,该文是1978年1月14日发排的,历时4个多月,其中原因除了客观上我出差在外地以外,还由于在处理中的反复。胡福明接受约稿后,同时投来两篇稿件,一篇题为“女人也是生产力吗?”。“文革”期间,江青大放厥词,认为女人能够生儿育女,子女成人后就是生产三要素中的第一要素——劳动者(劳动力),因此女人是天然的生产力。另一篇就是《实》文的初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两篇来稿寄到编辑部以后,我不在报社。《女人也是生产力吗?》这篇,由于它的“靶子”——江青的谬论是把人的生理特征生拉硬扯到生产力上,没什么理论可言,本身不值一驳,因此稿件很难展开,决定不予选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由于它以较多篇幅从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免不了要多引证一些马列原著及较多地对原著进行阐释,而被认为是一篇“纯理论”文章,缺乏与实际的联系,也决定弃置不用。由于这两篇文章是我在南京约的稿,而我又是《哲学》专刊组组长。可能是出于对我的尊重,两稿均未退回,而按照常情留存等我回来再作最后处理。

1977年12月我回报社后,阅读了这两篇文章,认为《女》文的确意思不大,在专刊上发表更加不宜,同意不用;而那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尽管理论色彩浓厚,引证马列原话及阐释较多,但它毕竟提出了一个在当时比较重大而又敏感的问题——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和真理标准的问题,批判了林彪、“四人帮”鼓吹的“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符合报社理论部和《哲学》专刊组稿的基本要求,只要把那些冗长枯燥的大段引证删去,增加联系实际的内容,不失是一篇好文章。于是我自己动手删去了一些我认为重复的文字,按报社正常发稿程序,于1月14日把它发排了,同时在排出小样以后,写了一封信,说明迟迟未予处理的原因,附上两份小样,寄给南京的胡福明。

我给胡福明一共写了几封信，已记不清了。但胡福明是一位“有心人”，他却把我给他的信至少保存了两封。这两封信反映了我当时的认识水平，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我的思想状况。

以下是两封信的摘要。

1978年1月19日的信：

我去年9月离京，到上海、南京出差，12月刚回来。

(来稿)已粗粗编了一下，主要是把原稿的第一部分压缩了。突出后两部分，但仍觉得长了一些。是否请您看看再删一些。有些地方，文字的意思有些重复，可否精炼一些。另外这篇文章提的问题比较尖锐，分寸上请仔细掌握一下，不要使人有马列主义“过时”论之感的副作用。文章请尽快处理寄来，争取早日刊用。

1978年3月13日的信：

您说要来北京开会，不知何时可到京？

您的文章，基本上已定稿。但现在看来，联系实际方面的内容较少，原想等您来京时面商，可老等也不见您来，只好再把小样寄给您，请抓紧补充，以便早日刊出。

您的文章立意是清楚的。但为了使文章更加(具有)战斗性，请适当增加些联系实际部分。由于“四人帮”多年来抓住片言只语吓唬人，束缚人们的思想，致使一些同志至今仍不注意实践经验，不从实际出发，而是从定义出发，离开具体条件硬套某个指示，结果“心有余悸”，许多工作搞不好。请考虑能否把这样的话加上。

据一篇文章披露，“胡福明按照《光明日报》编辑部的意见，在3月20日又(对文章)作了修改”，也就是在他2月2日改稿的最后，增加了一段大约400

多字的结尾。

二、《实》文为什么修改和怎样修改的？

过去和现在社会上对《实》文的形成和修改有多种说法，这里根据报社保存的原稿小样、历次改稿及定稿小样等原始资料，通过对比分析，看看究竟哪一种说法才是真正实事求是的。

胡福明的初稿、改稿到光明日报的改稿再到中央党校的改稿中间的变化。

(一)题目是文章的旗帜。胡福明稿(包括初稿和他的历次改稿，以下简称“胡稿”)原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光明日报》稿(以下简称“光稿”)开始为突出真理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这里就蕴涵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理，但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4月23、24日的改稿中，又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此改稿亦适时送到中央党校。4月27日中央党校改稿(以下简称“中稿”)上，标题也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不是不约而同，那就是“中稿”吸纳了“光稿”的提法，因为不可能23、24日的“光稿”会吸纳27日的“中稿”，那是违反事物逻辑的。

(二)基本框架是题目的具体展开。从胡的初稿到他最后一次改稿(第6稿)，全文均分为三节，第一节讲理论，明确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第二节讲历史，介绍革命导师是如何实践自己的理论，修改自己著作中的某些论点，强化了上述主题；第三节是批判机会主义者如何割裂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特别是林彪、“四人帮”是如何歪曲和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毛主席的一言半语到处乱套用以吓人、打人”。

“光稿”把文章由三节改为四节，第一节为“胡稿”第一节中的前面四段；第二节是第一节中的第五段即最后一段，这一节增加了许多“胡稿”中所没有的思想和观点，正是在这一节新增的内容中，第一次出现了“唯一标准”的提法(详情后面再分析)；“胡稿”中的第二节和第三节，在“光稿”中成为

第三节和第四节。

“中稿”在基本章节上对“光稿”未作变动，但把“光稿”分四个部分并改为有具体内容的小标题，即“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革命导师是坚持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

(三)“胡稿”初稿的开头和结尾。开头是：“1845年，马克思在创立新世界观时，就提出了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彼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不能在思维范围内解决，不能靠理论争论解决，只能靠社会实践的检验来解决。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它的一个特征。”

结尾是整个第三节。摘要如下：“机会主义以理论与实践相分裂为特征。在我党的历史上，王明、林彪、王张江姚‘四人帮’表现得尤其突出。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唱得最响，反对马克思主义最为猖狂。……他们都否认，马克思主义来源于实践，否认马克思主义要在实践中受检验，在实践中丰富、发展。(以下分别批判王明、林彪特别是‘四人帮’的谬论)尤其反动的是，‘四人帮’肆意歪曲和篡改毛泽东思想，把毛主席的一言半语与毛泽东思想体系割裂开来；抛弃毛泽东思想体系，任意摘取片言只语，把它当作宗教教条，到处吓人打人。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科学，还是把它当作宗教教条，这是一个根本的分歧。……‘四人帮’的真理标准就是他们的篡党夺权的野心。但是，实践标准是客观的，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不仅是证实真理的最有力的手段，也是宣判修正主义和一切谬论死刑的最高权威。在亿万人民的革命实践面前，‘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彻底破产了，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光稿”（20日稿）的开头和结尾。开头：“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个问题早被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解决了的。但是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的破坏，特别是他们控制下的舆论工具进行了大量的歪曲宣传，把这个问题又搞得混乱不堪。为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有必要重温革命导师的有关论述，学习革命导师的伟大实践，坚持实践标准，以区别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分清路线是非，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解放思想，冲破禁区，批判‘四人帮’的反动理论。”

结尾是：“现在，‘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被摧毁，但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四人帮’在革命队伍中间造成的心有余悸的问题，也远没有完全解决。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曾经批评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这种倾向依然存在。……我们应当重温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应当着重学习革命导师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教导，重温毛主席关于办事情要从实际出发的教导，完整地、准确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坚持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逐步地、彻底地肃清‘四人帮’主观唯心主义造成的种种影响和流毒，以便真正能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为完成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

“中稿”的开头和结尾。开头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早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解决了的问题。但是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和他们控制下的舆论工具大量的歪曲宣传，把这个问题搞得混乱不堪。为了深入批判‘四人帮’，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拨乱反正，十分必要。”

结尾是：“现在，‘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被摧毁，但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曾经批评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这种倾向依然存在……

“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确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有许多方面还是必

然王国。我们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我们要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勇于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现实的确切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够逐步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前进，顺利地进行新的伟大的长征。”

(四)关于篇幅问题。“胡稿”第一次发排稿是5320字，第六稿是5092字；“光稿”第一稿(即4月20日第7次改稿)是8296字，比第6稿增加了3204字，第二稿(即第8次改稿)是7714字；“中稿”第一稿(即第9次改稿)是6156字，第二稿(即第10次改稿亦即定稿)是6338字。

“胡稿”第6稿中谈理论与实践关系的一段是798字。“光稿”第一稿(即第7次改稿)把它扩充为第二节，明确提出并论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共2399字，比上一稿增加1596字。“中稿”的有关一节为1444字，基本论点与“光稿”基本相同。

以上是从文章的标题、框架(结构)和篇幅来进行对比。如果说这些都是文章的表现形式，批判“两个凡是”，强调“唯一标准”才是文章的核心内容和它的实质所在，那么，让我们根据《实》文的初稿、历次修改稿，直到定稿，就这两个问题再作一次对比分析，看看《实》文到底修改了些什么，又是怎么修改的。

关于“两个凡是”问题。

胡的原稿和历次改稿中没有出现批判“两个凡是”的字样，不仅没有两个“凡是”，连一个“凡是”也找不到。在我向他约稿时，在以后很长时间内多次当面交谈和信函往来中，我没有向他提出过此文的重点要放在批判“两个凡是”上，他也从来没有向我提出过这个问题。现在有不少论著，介绍他写作此文时的思想和内心活动，说他如何如何酝酿批判“两个凡是”，如何如何力求文章中选择什么角度体现批判“两个凡是”，等等，对此我不好妄加评论，也

许它们是真的；但我作为此文的约稿者、发排者和责任编辑，我得坦言，当时我感觉不出来，我不知道也从未与他人说过。我当了40多年编辑、记者，现在仍在做编辑工作，我知道，当年约稿或最初修改稿件时，如果我能认识到批判“两个凡是”的极端重要性，我会把它列为文章写作的重点，明确告诉作者，否则就是失职了。同样，我也认为，如果当年作者能认识到批判“两个凡是”的极端重要性，一般情况下他也会把它列为文章的重点，并明确告诉我，以引起我和报社对它的重视。可是上述这两个情况都没有发生，这只能说明，当时我们并没有这种意识、这个观念。这一点从上引的我当年给他的两封信中，我当年写的那条新闻(这些都是历史的记载)，以及以后本文还要介绍的情况中，都可以得到印证。

我们必须从当年的实际出发来认识和剖析这种现象。经过改革开放20年的实践证明，今天人们普遍认识到“两个凡是”的严重错误和当年批判“两个凡是”的重要性。可是在22年前即1977年，那时粉碎“四人帮”不到一年。原中央主要领导人提出“两个凡是”是1977年3月，以他当年的威望，以及人们当年思想解放的程度，那时能有多少人，特别是普通的人们有那么高的觉悟、那么大的胆量，能一眼洞穿并批判“两个凡是”的危害和提出“两个凡是”的原中央主要领导人的问题？邓小平同志以他那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敏感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洞察力，最早发现了这个问题，但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他没有也不可能向一般同志作普遍宣传，只是在会见个别党内高级领导干部时指出，因此，当时只有少数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知道。拿我当年任职的《光明日报》来说，尽管它是中央主要新闻机构之一，我也没听说过在哪怕是小范围内传达过，远离京城的一般人甚至包括领导干部，如果没有特殊的渠道，是很难得知这一高层的绝密信息的。

这里有必要追述一下当年发生的一个插曲。在《光明日报》1978年5月11日发表此文特别是“真理标准”问题展开讨论后，引起了各地党政军领导人的密切注视，有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领导人很快表态支持此文和这场讨论，

有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领导人迟迟不予表态，还有个别的领导人则多方打听文章的背景。当年胡福明所在的江苏省，省委第一书记许家屯就是属于多方打听背景的一个。那时，江苏省出于某种目的，与湖南省结为“互帮互学”的“姊妹省”。许家屯当时正在湖南省访问，他通过身边一位与我比较熟悉的同志，从长沙给我打来电话，说许书记要他给我打电话，询问此文发表的背景，包括文章最后由谁定稿的，等等。本来，在正常情况下，我是应该也可以如实相告的。可出于当年复杂的环境，杨西光做了一个规定，一般情况下只能回答是光明日报社自己定的稿，对什么人说什么要报告给他，由他决定怎么回答。我赶紧请示了杨西光。他说不要告诉许家屯发稿经过情况，就说在《光明日报》是总编辑定的稿。出于组织纪律性，我只好按照杨西光的吩咐告诉了我的那位朋友。

胡福明那时是南京大学政治系(或哲学系)的一位教师。江苏省的“一把手”当年都弄不清楚《光明日报》发表此文的背景，那么江苏省及南京市的干部、群众中能有多少人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尚未展开之前，就那么清醒地认识批判“两个凡是”的重要和在苦心思索撰写批判“两个凡是”的文章呢？

关于“唯一标准”问题。

如前所述，胡福明的原稿和历次改稿均无“唯一标准”的提法，他在第一部分中只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提法，以后的改稿中也是这个提法。

“唯一标准”的提法是《光明日报》4月20日改稿中增加的那一部分第一次提出的。请看原文：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别无其他标准。有人说检验真理有两个标准：一个是实践，一个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错误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科学真理，因为经过了长期实践的证明。……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的，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就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新事物、新问题，不断提出新的观点和理论。这些新的观点和理

论由什么来检验呢?不能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检验,而只能用实践来检验。……研究问题的指导思想与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一个问题是两个问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唯物辩证法反映了客观世界的普遍发展规律,对于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为科学发展指明了方向,但它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论证的工具。因为,世界上的各种事物都具有矛盾的特殊性,都有特殊规律,事物内部的特殊矛盾决定事物的本质,要认识事物内部的矛盾,只有依靠实践,要检验是否认识了特殊规律,只有依靠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就是坚持辩证唯物论。把检验真理的标准说成两个,就是二元论,实际上是唯心论。多年里,“四人帮”鼓吹主观唯心论,反对辩证唯物论,否认实践标准,摘取片言只语加以歪曲,以论证其反革命谬论。这种反马克思主义作风流毒深广,那种所谓的语录战就是突出的表现。

4月23、24日的改稿,不仅文内“唯一标准”的部分基本保留了,而且把标题也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使文章的主题更加鲜明、突出。

据我的记忆,把标题改为“唯一标准”是当时《光明日报》哲学组编辑张义德的建议。张义德是北京大学哲学系64届的毕业生,专业知识扎实,与哲学界联系密切,经常组稿、写稿。据说,检验真理的标准,到底是一个——实践,还是两个——实践和理论(主要指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界早有分歧。大家对“实践标准”没有不同意见,但对理论(主要指马克思主义)是不是检验标准存在不同意见,不少同志认为“是”,担心否认理论是标准会导致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但也有一些同志认为“不是”,理由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与作为真理的马克思主义及它的指导作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讲的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能用强调前一个概念否定后一个概念,同样也不能用强调后一个概念否定前一个概念。“唯一标准”的观点,今天看起来似乎平平常常,但在当年却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据说《实》文发表

后。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领导同志对“唯一标准”的提法非常反感，以后的“砍旗子”、“丢刀子”等说法也就纷纷出来，看来都与“唯一”两字有关。

其实，在《实》文发表之前，《人民日报》就发表过一篇署名张成的《标准只有一个》的文章，明确提出了这个观点。只不过这篇文章比较短，处理得不很突出，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它也说明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理论界的关注。

在“光稿”新增加的这一段中，还新增了“路线是非同样必须由社会实践来检验”的内容，而这是胡的初稿和历次改稿所没有的。它是为了体现4月15日杨西光召开的小会上的观点而增加的，对此本文后面还将论述。

那么，党校理论研究室改稿又改了些什么呢？

党校的确对《实》文做了若干修改，这是事实。但请注意：

第一，《光明日报》送《实》文到党校去，是请他们帮助修改的，《光明日报》不是也不可能是像党校理论研究室个别同志一再宣称的，请他们把胡福明撰写并经报社同志修改过的稿子与孙长江后来自称的稿子合二而一地“捏在一起”。道理很简单，《光明日报》当时根本就不知道胡福明的稿子以外还有什么另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成品稿件，更不知道这篇成稿竟然是孙长江写的，因为就在1978年4月15日杨西光召开讨论《实》文修改的小会上，孙长江应杨西光的邀请来报社参加讨论，他在会上以及在会后从来没有对我和报社的其他有关同志说过他已经有了一篇同一题目的成品稿件。我的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当杨西光在会议开始时，询问孙长江、胡福明，《实》文的重点应该放在哪里时，二人谦让了一下，就由曾经当过胡福明的老师(助教)的孙长江先说，《实》文的重点应该放在从路线上分清是非，而胡福明后来则说，重点应该是从理论上分清是非。接着孙长江说：“从路线和理论上一齐写。”由于他说的这个观点，我听了觉得不错，于是在我的笔记本上随手记了下来，这是历史的见证。从孙的这句话也可证明，直到《实》文公开发表以前

的不到一个月(4月15日),他对这篇文章到底怎么写、重点放在哪里,也还没有定论。

紧接着,杨西光又对孙、胡说,你们二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来写,写好了《光明日报》都给你们发表,谁的文章先写好,就先发表谁的。

读者可以冷静思考一下,在当时的情况下(请注意:在当时情况下,人们对《实》文重要性的认识没有今天这么深刻,对它产生的影响也没有像今天看得那么重大,现在有些文章把它“现代化”了),报社的总编辑亲自向两位作者组稿,言恳意切,《光明日报》又是一张有影响的大报,一般情况下,一般的作者能有如此良机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应该是求之不得的,怎么可能会不干脆呢?

由于胡福明早已成稿,所以在两天后即告知稿已改好,又是我去取回,以后经过报社几次修改,杨西光认为差不多,就要我去中央党校,把改稿送去,请当时的党校副教务长吴江和理论研究室孙长江继续帮助修改。

在我的印象中,党校的同志很快打来电话,说报社送去的稿子(4月20日改稿)有基础,他们准备放下手中的事情,包括正在撰写的同一主题的稿子,抓紧时间修改报社送去的稿子。当时报社的同志还对党校同志的这种顾全大局的精神表示欣赏呢!

第二,再从孙长江修改《实》文的事实来说,孙长江对《实》文的确是作了若干修改,包括内容的增删、段落的调整,一些地方改得确实比送去修改的改稿要好,还加了4个小标题,这些都应加以肯定,在上述“白皮书”中已经作了相当充分甚至过头的评价。但细心的读者在认真阅读过报社送去的稿子与孙长江改的稿子以后,不难发现:

(1)主题没有改变,从“胡稿”开始,主题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2)框架结构没有改变,“胡稿”是三大段,“光稿”是四大段,孙长江的修改稿(“中稿”)也是四大段。

(3)两个核心问题的基本论点乃至主要论述，孙长江的修改稿与“光稿”也没有什么重大的差别。

为了便于读者阅览，再把这两个核心问题的有关论述摘要如下(根据本报原稿小样摘录整理)。

胡福明初稿至4月14日第6次改稿：

马克思、恩格斯对《宣言》的态度(按：指修改)，表明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学说一开头就是完美的，决没有把它看作是一次完成的“绝对真理”，而始终用辩证法观点严肃地看待自己的学说，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尊重实践，尊重事实，尊重科学，毫无偏见，是他们唯一的态度。

《光明日报》4月20日改稿(附23、24日改稿)：

马克思、恩格斯对《宣言》的态度，给我们以很大启发。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学说一开头就是完美的，……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按：以上均按“胡稿”，以下是新增的)他们并不认为凡是自己讲过的话都是真理，也不认为凡是自己的结论都要维护。(23、24日改稿又把这两句话改为：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讲过的一切言论都是真理，也不认为自己作出的所有结论都不能改变，他们处处以实践来检验自己的学说，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按：以下又是“胡稿”)尊重实践，尊重科学，毫无偏见，是他们唯一的态度。

孙长江4月27日改稿：

革命导师这种尊重实践的科学态度给我们极大的教育。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提出的理论是已经完成了的“绝对真理”或顶峰，可从不受实践的检验，并不认为只要是他们作出的结论，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不能改变，更不要说那些

根据个别情况作出的个别论断了。他们处处时时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论断、指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毫无偏见。

再说一下“唯一标准”的提出。

“胡稿”的原稿、改稿、标题和内文均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光明日报》的4月20日改稿，第一次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别无其他标准”，认为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说成是“标准”，是错误的；在23、24日改稿中又将标题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光明日报》于当天或第二天把这两次改样急件专送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供他们修改时参考。

除了以上列举的材料以外，还可以从有关段落，报社送请修改的两份小样及与孙长江修改的小样对比中，了解他是怎么具体修改的(从本报原始校样中摘录)：

孙长江27日改稿及定稿：

有的同志问：我们批判修正主义，难道不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衡量，从而证明修正主义是错误的吗？我们说：是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批判修正主义的锐利武器。我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去批判修正主义，这些基本原理是马、恩、列、斯和毛主席从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中概括起来的，它们是被长期实践证明为不易之真理，同时我们用这些原理去批判修正主义，仍然一点也不能离开当前的(和过去的)实践，只有从实践经验出发，才能使这些原理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我们的批判只有结合大量的事实分析，才有说服力。不研究实践经验，不从实践经验出发，是不能最终驳倒修正主义的。

《光明日报》20日改稿：

当我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批判修正主义时，也就是用已有的实践经验去批判修正主义，而且这种批判还必须结合大量的事实分析，不仅是引证语录。光引证语录而不以事实作根据，不研究实践经验，是驳不倒修正主义的。

《光明日报》23、24日改稿：

当我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批判修正主义时，也就是用马、恩、列、斯和毛主席从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中概括起来的理论去批判它，用我们自己的实践经验去批判它。而且这种批判还必须结合大量的事实分析，才有说服力。归根到底，理论和事实都来源于实践。总之，不研究实践经验，是驳不倒修正主义的。

读者不难从中看出当年的历史事实究竟是怎样的，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

三、《实》文到底是怎么发表的？

关于《实》文的发表，社会上有种种说法，那么事实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

如前所述，当我1977年7月向胡福明约稿时，只是为了在《哲学》专刊上发表；1978年1月14日发排时，发稿稿签是“哲(四五一)”号，几经修改拼到《哲学》专刊大样上准备发表时，从来就没有想到会先提供给中央党校在《理论动态》上发表。据我所知，杨西光决定从《哲学》专刊上拿下来，目的是修改后放在第一版发表；决定请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孙长江到《光明日报》参加讨论修改，是因为他从他原来的学生江春泽那里了解到，吴江、孙长江正在撰写类似主题的文章；为了集思广益，多听取一些修改意见。杨西光是3月份正

式来《光明日报》的，作为刚刚上任的报社总编辑，他唯恐《光明日报》没有好文章，没有也不可能有把此文修改好先给其他报刊包括《理论动态》上发表的念头。

再说，《理论动态》系内部刊物，发行量很少，完全没有必要把文章提供它先登。但是，为什么此文却先提供《理论动态》刊登，然后第二天由《光明日报》公开发表，继而由新华社全文播发，又由《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刊(播)发呢？看来，一切是经过杨西光精心策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的，这里实在有当年难以披露的苦衷。

首先，这是当年的形势和新闻管理体制所决定的。杨西光组织来《实》文以后，当然希望它在本报发表并产生更大的影响。为此，他曾与中央几家主要新闻单位联系请他们转载、转播。在联系过程中，有的同志认为，按过去的规矩和惯例，历来是《光明日报》转载、刊用《人民日报》、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几乎从未发生过它们转载、转发《光明日报》的。要求它们转载、转发《光明日报》的文章，尽管它们愿意甚至希望这样做，但似乎有些“出格”，因此最好能请一位有影响的“人士”先审一下。而当时，《光明日报》属于中央宣传口，按组织系统上报肯定此路不通。于是就想到了胡耀邦同志。粉碎“四人帮”以后，胡耀邦曾担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他在真理标准问题上的态度，党内不少高级干部包括杨西光都知道。但那时胡已从中央党校调去中央组织部任部长。如果把文章直接送请他审阅，似乎又不“对口”。恰巧胡耀邦在党校时直接管《理论动态》，而他调中组部时间不长，党校日常工作他不管了，但仍挂了个“副校长”之名，《理论动态》他仍在管，而且听说《理论动态》发表的文章他都要审阅。于是，把此文转送到《理论动态》，这属于报刊之间的正常来往，再由《理论动态》按他们的惯例报请胡耀邦审阅，这样做虽然迂回曲折了一些，但能达到预定的目的，而又可以不违反组织纪律。再说《光明日报》在修改此文时，已多次与中央党校的吴江、孟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和孙长江有过来往，等于是大家共同修改，提供《理论动态》

这个内部刊物先行刊登，这也是符合常情的。

《光明日报》当年做出这样的决定，曾经引起社会上的一些同志的不理解，有人甚至传言，《光明日报》自己招惹了一件麻烦事，好不容易组织和修改了一篇大文章，却不敢用，拿到别的报刊上发表。据说杨西光的老战友、中央党校的孟凡在一次看望杨西光时就向杨反映了这个传言。杨西光听了以后很不高兴。他说，谁说《光明日报》不敢发表?!为了表明《光明日报》对此文的态度，也为了对此文负政治责任，杨西光提出，在《理论动态》发表此文时，在文末注明“《光明日报》社供稿”。这个建议已被中央党校采纳。请读者注意：《理论动态》60期刊登《实》文先后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文末注明的是“《光明日报》社供稿，作者胡福明，本刊作了些修改”，照此印了一小部分，后来党校有的同志提出意见，认为文章很多段落已作了重大修改，有的还重写，而在改的过程中胡福明没有参加，再署原作者的名字已不恰当，经再三斟酌，党校的同志决定将“作者胡福明”删去，仍保留“《光明日报》社供稿，本刊作了些修改”。这就是此文的“正本”。

两个版本略有区别，但谁“供稿”，谁作了“修改”，是没有变化的。怎么经过了若干年以后，《实》文又变成了由孙长江把他的稿子与“胡稿”“捏在一起”成为一个稿子，原作者却从一个人变成“两个人”，甚至扬言要追究《光明日报》的“侵权责任”呢？

现在社会上对此文的发表有种种说法，包括中央党校有的当年并没有参与文章修改的某教授，写文章、出专著，到处登台亮相，煞有其事地传播一些不实之词，甚至说什么，这篇文章本来就是党校理论研究室撰写的，《理论动态》率先发表，第二天由《人民日报》等转载，只字不提《光明日报》。他们对《理论动态》60期刊登此文时文末的“注”视而不见，讳莫如深，不知是出于何种心理？其实明白人一看即知，这个经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再三斟酌”的“注”，不是明明白白地写着“《光明日报》社供稿，本刊作了些修改”吗？“教授”能不明白吗？白纸黑字，谁供稿就是谁供稿，谁修改就是谁修

改，这个反映了当年事实的历史资料，不是任何一个能言善辩、妙笔生花的人士能够蓄意歪曲、篡改得了的。

听说，还有一位同志对这个“注”有另外一种说法，即当年注明“《光明日报》社供稿”是斗争策略的需要，因为此文是批判“两个凡是”和提出“两个凡是”的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而他正好又是中央党校的主要领导人，由中央党校办的一个刊物撰写一篇针对党校主要领导人的文章，不大合适，于是就注明“《光明日报》社供稿”。这种说法比前面根本无视“注”的存在略胜一筹，因为它毕竟承认供稿的事实。但这种说法实在不值一驳。且不论本文前面已经说明，文末的这个“注”中的“《光明日报》社供稿”并非是党校同志主动加上，而是杨西光明确提出要加的。即令这个说法成立，试问：一份由党校主办的《理论动态》，居然发表批判党校主要领导人的文章，就那么合适吗？任何人都知道，发表与撰写相比，发表更为重要。不管什么作品，好的还是坏的，写了出来而发表不出来，产生不了社会影响，作品的价值怎能得到体现。难道他们就不怕承担发表此文的政治责任吗？

四、我们应该树立什么样的学风、文风？

本文上面的介绍和分析，特别是本书第一次公开披露的13份原始材料，忠实地记录了《实》文从初稿到定稿的全过程和相关资料，人们从中不难弄清楚《实》文的来龙去脉，并对本文开始时南方某报发出的疑问作出明确的回答。

《实》文是形势和时代需要的必然产物。如果不是以特约评论员的形式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也会以其他形式，在其他报纸或者在别的什么场合上发表出来。

《实》文是在邓小平的思想和理论指导下发表的。如果没有邓小平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论述，没有他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光明日报》的领导和同志至少不会花那么大的力气组织和修改发表这篇文章。

《实》文是逐步形成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初稿好比是一座富矿，定稿好比

是一块纯钢。没有初稿的写作,《实》文就不会是现在的《实》文;同样,没有后来《光明日报》、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几位同志的精心修改,提炼加工,富矿也不可能铸炼成纯钢。胡福明是初稿的撰写人即《著作权法》规定的唯一作者,杨西光和胡耀邦分别是《光明日报》和《理论动态》稿件的定稿者,《光明日报》、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几位有关同志是修改者即《著作权法》规定的编辑。

《实》文特别是它的发表产生的重大影响,是新闻界和社会各界团结合作的结果。《实》文如果仅仅是《光明日报》一家发表,没有《人民日报》、新华社、《解放军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其他众多新闻媒体的转载、转播,没有《光明日报》和众多媒体组织的社会科学界、自然科学界和社会各界撰文支持和发挥,是难以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的。这里既凝聚了杨西光的心血和劳动,也含有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的贡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反映党心、民心所向,是建国以来少有的一次新闻界联合起来、协同作战的重大胜利。

这里,再着重剖析一下《实》文作者的问题。

首先,胡福明是文章初稿的撰写人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文章白纸黑字的确是他撰写并应约投给《光明日报》的。如果没有他的投稿,《实》文或类似《实》文的发表将不知推延到哪年哪月,历史说不定也将相应推延或改变。

但为什么后来又发生歧义呢?除了人为因素外,主要是《实》文的定稿与胡的初稿确实有了重大的改变,而其中有的并不是胡自己改的,甚至是在胡不知道的情况下改的。比如“唯一标准”提法的提出,批判“两个凡是”的明确和强化,基本框架的改动,等等。尽管有人说批“两个凡是”胡福明在撰写时早有“酝酿”,这可能是真的,但奇怪的是《光明日报》的同志包括我在内却认为胡的稿子中未曾明确体现批“两个凡是”,否则就不会发生杨西光召开4月15日小会及以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唯一标准”在《实》文初稿上也没有,而是后来在修改中才逐步加上和明确的。

然而,这些并不能否定胡的作者身份。主题是文章的灵魂,《实》文主题

是论证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主题在初稿中是明确的，而且贯穿始终。这就充分证明，胡福明是文章初稿的作者。

其次，《实》文作者不是两人(胡福明和孙长江)，它不是一部合作作品。所谓“合作作品”，有特定的含义，不能说参与编辑和加工修改的人就成了文章作者的合作者。“合作作品”必须有明确的合作伙伴，有表现出来的合作意向和合作事实。《实》文的开始写作，胡福明在南京，孙长江在北京，两人哪里来的“合作意向”，恐怕连交往都未曾有过。“合作事实”也不存在，胡福明的稿子，《光明日报》的同志看过、修改过，而孙长江所称的稿子特别是定稿，尽管言者凿凿，甚至在电视中还展示过有这个成品稿件，但坦诚地说，《光明日报》的同志不仅当时没有看过，连听说都没有听说过，听到的仅仅是“党校的同志正在(或准备)撰写同一主题的文章”，至于电视上展示的孙的“原稿”，据知情者说其实就是经修改的《光明日报》送去的稿子，该稿后来退回给报社，存档在报社档案室。其实，党校的同志与《光明日报》的同志一样，只是对《实》文作了修改工作。这一点，在党校出版的当年《理论动态》的“注”中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再次，既然如此，为什么会发生歧义呢？我认为说到底是一个学风、文风问题。

(一)《实》文的重大政治意义和它产生的如此巨大的政治影响，不是在组稿、写稿和修改、发表时所有的参与者(包括我在内)就认识到的，而且对它的认识，愈是上层、愈是高级领导干部，愈是能够认识深刻，因为他们身临其境，亲历其事。现在人们都承认，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对决定“文革”后的中国往何处走，具有重大意义；也承认引发这场大讨论的《实》文提出的不仅仅是一个理论学术问题，而主要是政治问题。这是正确的判断。但为什么会这样呢？仍然离不开对当时的政治形势的了解和分析。

“文革”以后，当时新的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由于他们的资历、影响远不如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之所以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说到

底是维护自己的“英明领袖”的地位，阻止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复出。而他们这样做将把中国引向歧路。这一点，在当时的高级领导干部中，特别是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中已经是心知肚明的。如何推倒“两个凡是”，解决这个问题？采取对付“四人帮”的非常办法，不行；要求中央召开合法的中央全会来讨论、决定，也不行，因为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不可能提议召开这样的中央全会，而在当时也只有他们才有这个权力决定召开全会。

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光明日报》发表了《实》文，等于是为推倒“两个凡是”和解决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复出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突破口，于是就发生了只有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可能发生并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猛烈抨击这篇文章，扼杀这场讨论；而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极力支持并高度评价这篇文章，发起和推动了这场讨论，二者形成了强烈、鲜明的对比。

矛盾和斗争公开化了，全国各地乃至各大军区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先后对这场讨论包括引发讨论的《实》文表态，支持这场讨论。这样做，既公开申明他们坚定地站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一边，反对提出“两个凡是”的领导人，又并不违反党纪国法。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此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正是在这样明朗化了的政治力量对比的情况下召开的，从而为顺利解决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重大政治问题，创造了政治基础和组织基础。推倒了“两个凡是”，确立了邓小平的领袖地位，“英明领袖”最终退出了中央领导核心，完成了历史性过渡，新中国从此走上了新的长征。

《实》文发表至今度过了21个春秋。今天对由《实》文引发的这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重大历史意义，已成了许多人的共识。但在21年前，真正能够认识到它的深刻意义的，可能只有少数领导干部，特别是像邓小平这样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包括我在内的普通的编辑、教师、研究人员是达不到也很难有这样的认识的。为什么原稿的作者、报社的编辑开始在处理此稿时，按常规处理，放到《哲学》专刊上以署名文章发表，而只是在杨西光的干预下

才把它从《哲学》专刊撤下来作重大修改后在第一版突出位置发表?除了反映了杨西光的丰富政治斗争经验和政治洞察力以外,还因为他作为高级领导干部能掌握上层动态,知道事情的意义及问题的深浅。

《实》文是宣传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一篇作品。宣传《实》文也应该实事求是。如前所述,从真理标准问题的起始到展开,以及这场讨论的影响所及、深远意义,都说明作为公开出版的全国性大报《光明日报》,在这一历史事件中建立的功绩是不会磨灭的。但我们必须冷静思考,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在邓小平同志支持《实》文,并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大讨论的情况下发生的。任何人都不能为了突出自己而无视事实,因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学风、文风。

总之,是初稿的作者就是初稿的作者,是文章的修改者就是文章的修改者,是一个人的作品就是一个人的作品,初稿写的什么问题就是写的什么问题,一切按事物的本来面目来认识。“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不过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朴素的了解,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39页),恩格斯这句人们熟知的经典名言,不仅对认识整个自然界有指导意义,对认识一篇文章——《实》文也有指导意义。

任何一个正常的普通人都应该这样,任何一名理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更应该这样,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学风、文风。

(1999年1月2日初稿,1月9日修改)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写作和发表的经过

《光明日报》评论部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新华社发了通稿。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报纸相继转载。文章发表以后，在全国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光明日报》的文章和后来的讨论主要是在邓小平同志完整、准确认识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反对“两个凡是”的思想指导下，以及胡耀邦同志在中央党校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评价党的历史问题推动下，针对当时思想路线上的斗争实际而发表和展开的。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同志在给中央写的一封信中就提出：“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1977年5月，小平同志在同中央两位负责同志谈话时，又说：“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1977年7月21日，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他又进一步提出：“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并且提出了坚持“实事求

是”的问题。

在这以后，1977年12月，中央党校在研究编写一个党史问题材料时，当时主持党校工作的胡耀邦同志提出了编写要求：一个是完整、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一个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在校的不少高、中级干部进行了讨论。那时，党校在耀邦同志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评价历史问题的鼓舞下，思想相当活跃，提出了拨乱反正的问题，并在一部分同志中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杨西光同志当时正在党校高级班学习，也参加了这些讨论。

在真理标准问题展开讨论以前，《人民日报》和不少报纸以及社会舆论已经就教育上两个估计问题、所谓文艺黑线问题、老干部和“走资派”问题、知识分子问题，特别是天安门群众运动等，强烈地提出拨乱反正的要求。老干部和“走资派”问题是在胡耀邦同志指导下，由中央党校组织讨论的。当时有的人则在阻止和妨碍这些讨论，并继续设置“禁区”。因此，当时已经在相当规模上展开了两条思想路线的争论和斗争。这个时期，有的文章也从理论上一般地论及了真理标准问题，比如《人民日报》1978年3月26日发表的一篇短文《标准只有一个》，中央党校有的同志写的文章中也提到过这个问题。

《光明日报》这个时期参加了争论。1978年3月，杨西光同志到报社任总编辑。他和报社其他同志在当时斗争形势的影响和鼓舞下，都感到有必要根据邓小平同志、胡耀邦同志的思想，写一篇比较全面的关于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文章，并且作了议论。4月初，理论部主任马沛文同志送给杨西光同志一份拟在4月11日刊出的《哲学》专刊的大样，上面有一篇署名为胡福明、题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文章。此文是报社理论部王强华同志约请南京大学胡福明同志写的有关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方面的文章。胡的稿子是1977年10月左右寄到报社的，原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后由理论部的同志做了修改，经胡福明同志看过后，于1978年1月14日发排，印出小样，后经过五次修改，第五次修改时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在五次修改过程中，第二和第五稿，是经胡福明同志看过的。其他几稿

是理论部的同志修改的。第五第六稿，是由马沛文、王强华同志修改、定稿的，最后的一段是新写的。这篇初步改定的文章既提出了真理的检验标准，也提出了马克思主义需要发展的观点，批判了“四人帮”，接触到拨乱反正的问题。杨西光同志审阅大样时，认为文章提出的问题很重要，但此文联系当时的实际还不够有力，要进一步触及当时影响拨乱反正的一些思想障碍，要提出冲破禁区这样的现实问题；而且认为真理标准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思想路线问题。因此，他给马沛文同志提出了两点处理意见：第一，文章要改，要针对在理论和实践关系问题上的一些混乱思想，作比较充分的论证，使文章更有指导意义；第二，这个问题大，和各方面都有关系，文章应当从《哲学》专刊上抽下来，再认真加以修改，改好后在一版上发表。

杨西光同志和本报其他同志着手改写文章不久，大约在4月10日，得知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孙长江同志正在写相同主题的文章。恰好这时胡福明同志也来京参加一个会议。4月13日晚间，杨西光同志邀请孙长江同志、胡福明同志、马沛文同志和王强华同志，共同讨论了这篇文章，认为要保持原稿的长处，并议定了修改意见。现在保存的当时杨西光同志的讲话记录(王强华同志在笔记本上记下的)，可供参考。以后发表的文章的观点，就在此次讨论中基本上定下来了。其主要内容有：

(1)宗旨是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解放思想，批评“两个凡是”，冲破禁区；

(2)从各方面充分论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切正确的理论都来源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阐述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检验理论的辩证关系；

(3)要充分论证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导师都曾经用实践来修正自己的观点，检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

(4)更加有力地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反动理论，鲜明地批判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宗教信条的愚昧思想，批判“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的教条主义倾向；

(5)真正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而且马克思主义要永葆青春，使理论更具有活力和指导作用。

这次讨论后，胡福明同志曾在4月14、15日改了一次，由于他急于离京，没有来得及把讨论的观点全部反映出来。马沛文、王强华同志后来根据杨西光同志和会议讨论的意见接手修改，才把上述观点基本体现出来了，这就是4月20日的改稿。这个改稿于21日送孙长江同志修改。后大约在4月23、24日，马沛文、王强华和杨西光同志又一次进行讨论，再次进行修改，又一次把改好的稿子送孙长江同志。

20日和23、24日的改稿比前几次的改稿增加了内容，为这篇文章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第一，文章结构由三大段改为四大段。全文论述了检验真理的标准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的导师怎样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是否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是否正确执行马克思主义路线，都要由实践来检验等四个问题。修改后篇幅增加了1/3。

第二，文章的思想性和针对性前进了一步。改样的题目和内容都明确地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别无其他标准。与此同时孙长江在送去的20日的改稿上，也把文章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主题一步一步地深化了。

第三，文章突出了邓小平同志关于要完整地、全面地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的观点，批判了“两个凡是”的观点。20日修改稿的第三部分，在谈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发表后的45年中，一直根据实践来检验《宣言》的时候，增加了这样的话：“他们并不认为凡是自己讲过的话都是真理，也不认为凡是自己的结论都要维护”。后来考虑到当时的情况，在23、24日的改稿中，改得比较含蓄：“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讲过的一切言论都是真理，

也不认为自己作出的所有结论都不能改变”。

第四，文章阐述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指出了理论的巨大的作用，又强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有力量，正是由于它们高度概括了实践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并用来指导实践。

第五，文章的结尾部分分量加重了。这一次修改，明确指出了“科学无禁区。凡是有‘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强调现在存在的“禁区”，有待于我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来把它冲破。

这个期间，杨西光同志还到党校同吴江、孙长江同志交换过意见。大家对文章的基本观点认识是一致的。吴江同志认为，4月20日的稿子写得有勇气，理论逻辑上差些，要理好，并加以提高。杨西光同志提出，要突出马克思主义有生命力、要永葆其青春的观点。之后，孙长江同志以原来文章与这次讨论的意见，和党校原拟写的文章的构思为基础(在3月间向马文瑞同志汇报过的)修改出稿子，再经吴江同志修改，于4月27日定稿，送胡耀邦同志审阅。

在此过程中，杨西光和吴江同志商定，为扩大文章影响，先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发表，第二天再由《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见报。这个考虑，经吴江同志请示耀邦同志，得到耀邦同志批准。

孙长江同志修改的稿子，与4月23、24日的改稿比较，保持了基本观点，质量上有了提高。

文章对原来的稿子作了不少删削，约一半多段落是重写的，对真理和社会实践作了定义式的简明界说，使逻辑和文字叙述以及定论都更加清楚，更加精确；

文章又加了毛主席在1958年修改3年前写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按语中个别提法的例子，使文章的论据增加了分量。

文章最后一段写得更加有力，提出要反对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并指出共产党人要有责任心和胆略，要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这就使现实问题的针对性有了加强。

文章还加了小标题，使主题和表述更加鲜明。文章在公开发表时，对超越实践设置“禁区”的现象又加重了批判，说这不仅造成蒙昧主义，还会变为“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此文经胡耀邦同志审定后，即在5月10日《理论动态》第60期上发表。原来文末注有“《光明日报》社供稿，作者胡福明，本刊作了些修改”字样，并按此印出一小部分。此时中央党校有同志提出意见，认为文章很多段落已重写，后来改的过程中胡福明同志没有参加，又来不及听取他的意见，而且其中有些观点是领导和其他同志的，因此再署原作者的名字已不恰当。经再三斟酌，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决定将原注改为“《光明日报》社供稿，本刊作了些修改”。

综合以上所述，这篇文章是耀邦同志支持并审查同意的。《光明日报》和中央党校上述的几个同志主持和参加了撰稿和编发，做了多次重大修改。胡福明同志是初稿的执笔者，孙长江同志最后执笔修改完稿。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发表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引起了有些人的反对和攻击，引起了一场思想路线的争论和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这篇文章不过只是开了一个头。邓小平同志1978年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进一步精辟地阐述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检验等思想，对违背这些观点的人提出了批评，有力地支持了这篇文章，实际上对文章作了肯定，使大家受到很大鼓舞。同时，在胡耀邦同志的支持推动下，《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新华社以及全国舆论界和各级党委广泛、积极地参加了讨论。这个讨论，罗瑞卿同志也进行了指导，并决定发表《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吴江同志撰写）。总之，从第一篇文章起，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是在邓小平同志思想指导下，由胡耀邦同志组织和推动进行的，正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五期上发表的胡耀邦同志的传略中说的：“他组织和推动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重新确立中共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做了理论准备。”

以上是根据《光明日报》的同志参照留有的小样、笔记进行回忆座谈，并根据现存原始清样，以及目前可能搜集到的写作和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情况，由《光明日报》评论部整理的。

(1985年1月20日)

杨西光在真理标准讨论中

陶锐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曾经引发了一场推动全民思想解放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是《光明日报》历史上光辉的一页。在纪念本报创刊50周年的时候，我们不由得缅怀书写这光辉一页的领头人，前总编辑杨西光同志。

是他，在邓小平同志完整、准确地全面理解毛泽东思想体系这一思想指导下，以高度的政治敏感和无畏的理论勇气，果断地组织修改并决定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是他，以对党的事业的强烈责任感与新闻界、理论界的同志密切配合，以这篇文章的发表为契机，揭开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序幕。他为思想解放，为拨乱反正，为改革开放，在思想上、舆论上作出了贡献。

一

杨西光同志是1978年3月由中央任命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这时，他还在中央党校学习，尚未结业。待到4月上旬，才结束党校的学业正式就任。他一上任，就着手报纸的改版工作。

改版是由胡乔木同志提出，经中央批准后确定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人民强烈要求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一心一意建设四个现代化。建设

四化从何着手呢?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同志提出:“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而科学、教育这两个领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破坏得最厉害的。因此,宣传、弘扬科学和教育,成为拨乱反正、推进四化建设的一个非常紧迫的任务。

《光明日报》有着宣传报道文化教育工作的传统。加强科学教育工作,宣传好科学教育,这一任务便更多地落在了《光明日报》的肩上。因此,中央决定将本报改成一张以报道科学、教育、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报纸,减少对一般国内政治、经济新闻的报道。

杨西光同志一到报社便全力以赴抓这件事。他的特点是工作起来颇有魄力。他提出,既然要改就不能迟疑,5月1日就改。这时,离改版时间只有半个多月了,他一方面组织撰写《为本报改版致读者》的社论,一方面在报社内部进行组织和人员的调整,加强教育、理论、文艺等部门的编辑力量,新组建科学部,并调整了专刊、副刊的结构和内容。在他的率领下,经过紧张的工作,1978年5月1日,《光明日报》宣布改版。

在《为本报改版致读者》的社论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改版以后,本报将作为一张以科学、教育为主要宣传内容的文化战线的报纸,以宣传科学、教育方面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主,积极反映国内外科学、教育方面的动态,大力普及科学知识,为了保持和发扬原有特点,还要兼顾社会科学和文化等其他领域的宣传,办好各种专刊和副刊。国内外政治,经济新闻,除特殊重要者外,一般将不刊登。这样一改,《光明日报》将成为一张既不同于一般性的综合报纸,又区别于一般科学技术专业报刊的报纸,具有鲜明的特色。

当时,人们对“文革”仍然心有余悸,提出一般国内政治经济新闻不登,这需要有相当的勇气,也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同时,社论提出,要恢复报纸传播科学知识的职能,为“知识性”恢复名誉。这也是拨乱反正,冲破禁区的重要一着,确实起到了振聋发聩的效应。

宣布改版以后,杨西光同志集中全力抓科学、教育、文化方面及知识分子

所关注的问题的新闻报道，使一版的面貌焕然一新，并且在二版连续以多块整版的篇幅介绍自然科学界各学科以及最新的科学成就。这些对当时关心科学、教育事业，渴求科学知识的读者来说，犹如雪中送炭，受到普遍欢迎。长期遭到压制、打击、迫害的知识分子，看到有了一张为自己说话，反映自己呼声和要求的报纸，也感到欢欣鼓舞。

改版后，杨西光同志还果敢地取消了“文革”以来报纸每天必在报眼中选登一条毛主席语录的做法，这在当时是有一定风险的，而当《光明日报》先这样做了以后，其他各报也相继仿效了。再者，把一般政治新闻，会议新闻，特别是中央领导人的活动、讲话压缩到最低限度，减少共性，突出个性，这在当时也是开了风气之先的。

《光明日报》从5月1日改版，到5月11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其间，时间是短促的，而大量的改版工作，可以说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做了很好的铺垫。对杨西光同志来说，组织改版以及组织修改，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其办报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二

改版后的《光明日报》不刊登一般国内政治经济新闻，并不等于就游离于国内政治生活之外。相反，它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仍发挥着重要的舆论作用。杨西光同志认为，这种作用主要是通过理论宣传(包括评论)来实现的。所以，杨西光同志在主政期间，一刻也没有放松加强理论、评论工作。他经常出思路、出题目，和理论部的同志商量，讨论，组织文章，活跃报纸的理论宣传。

改版之际，对要不要继续办理论专刊，也曾经有过不少议论，有主张继续办的，有主张不办的。杨西光同志考虑到本报专刊的历史影响，以及它对活跃理论学术空气，广泛联系理论学术界人士和有关方面的读者所起的作用，还是把它保留下来了，并且作了适当的调整和改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开初就是在《哲学》专刊上准备发表的一篇理论文章，后来经过精心修改移到一版发表的。现在看来，如果当时取消了理论专刊，也许这篇文章就不会到《光明日报》的编辑手中了。

1978年4月上旬的一天，载有胡福明同志撰写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哲学》专刊第77期大样，送到杨西光同志手中。这篇占上辟栏长达5000字的文章，他用了差不多1个小时才读完。读完这篇文章，他立即要我（当时是他的秘书）把此文的责任编辑、哲学组组长王强华同志找来。他对王强华说：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很重要，在《哲学》专刊上发，引不起注意，可惜了，把它撤下来，放在一版发表。他说：文章要进一步修改，要针对理论和实践关系问题上的一些混乱思想，作比较充分的论证，使文章更有指导意义；要进一步触及影响拨乱反正、冲破禁区的一些现实问题，提到思想路线上来批评、阐述。

文章经过修改后，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于5月11日在一版下辟栏发表，之所以放在下辟栏，是因为华国锋同志访朝回京的消息占据了上辟栏位置。文章发表后果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现在看来，这篇文章如果不是他做这样的决定，按原先的安排以胡福明同志的名义在《哲学》专刊上发表，是不会引发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

那么，他为什么会在1小时之内作出这样的决策呢？这并不是偶然的。

杨西光同志对理论工作，对文教工作，对知识分子工作相当熟悉。1949年他随解放大军进驻上海便以军代表的身份接管了同济大学，后调到福建省任省委宣传部长一段时间，又回到上海管文教工作。他先后担任过复旦大学党委书记、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兼《解放日报》总编辑。“文革”前夕任上海市委书记处分管文教工作的候补书记。多年的文教工作、思想理论工作、知识分子工作，使他对思想文化战线颇为知情，在文化界、知识界有很多知心朋友。

“文革”开始，他首当其冲，与陈丕显、曹荻秋并称上海三大“走资派”，被批斗，被打倒。复出后，担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1977年，到中央党校学

习，这时，他已知道邓小平同志对“两个凡是”曾提出批评，提出应该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党的工作。当年12月，中央党校在研究编写“文革”中党的历史问题时，其时担任副校长的胡耀邦同志提出了编写要求：一是完整地、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二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问题在党校的不少中、高级干部中进行了讨论。在胡耀邦同志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的鼓舞下，一部分同志中还提出了一系列与拨乱反正有关的问题。杨西光同志也积极参加了这些讨论，思想极为活跃，并有自己的见解。

可以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命题，在他胸中酝酿已经很久。在“文革”中他被打倒，被监禁，被下放到工厂参加劳动的时候，在他读书反思的时候，他都在思考这一命题，而最后在党校臻于成熟。到《光明日报》担任总编辑以后，随着改版，他对当时的拨乱反正做了大量的舆论引导工作，但“两个凡是”仍然束缚着人们的思想。他在苦苦探索着冲破禁区推动拨乱反正的有效办法，所以，胡福明同志的文章他一下就看准了，而且牢牢地把它抓住。

1985年，杨西光同志已退居二线，他在组织我们(当时的评论部)编写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写作和发表的经过》时，对于这篇文章发表的背景有这样一段叙述：

在真理标准问题展开讨论以前，《人民日报》和不少报纸以及社会舆论已经就教育上两个估计问题，所谓文艺黑线问题、老干部和“走资派”问题，知识分子问题等，特别是天安门群众运动，强烈地提出拨乱反正的要求。老干部和“走资派”问题是在胡耀邦同志指导下，由中央党校组织讨论的。当时有的人则阻止和妨碍这些讨论，并继续设置禁区。因此，当时已经在相当规模上展开了两条思想路线的争论和斗争。这个时期，有的文章也从理论上一般地论及了真理标准问题，如《人民日报》1978年3月26日的一篇短文《标准只有一个》，中央党校个别同志写的文章中也提到过这个问题。

《光明日报》这个时期也参加了当时的争论。1978年3月，杨西光同志到

报社任总编辑。他和报社其他同志在当时斗争形势影响和鼓舞下，都感到有必要根据邓小平同志、胡耀邦同志的思想，写一些比较全面的关于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文章，并且作了议论。

从以上这段叙述，也可以印证杨西光同志对真理标准问题是思考已久的。

三

这篇文章从《哲学》大样上撤下来后，杨西光同志和理论部的同志即着手修改。4月10日左右，杨西光同志得知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孙长江同志也在酝酿写相同主题的文章。恰好这时胡福明同志来京参加一个会议。4月13日晚，杨西光同志约请孙长江、胡福明、马沛文和王强华四位同志，在他的办公室共同讨论了修改意见。最后他综合大家的想法，对如何修改好这篇文章，提出了如下意见：

(1)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要批评“两个凡是”解放思想，冲破禁区；

(2)要阐述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检验理论的辩证关系；

(3)要充分论证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要在实践中不断经受检验，永葆青春，更具活力和指导作用；

(4)更加有力地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反动理论，鲜明地批判教条主义倾向。

由是，后来发表的文章的观点以及所要表述的内容，在这次会议上由杨西光同志归纳后，就基本上定下来了。

这次讨论后，胡福明同志在4月14、15日改了一次，由于他急于离京，没有来得及把讨论的观点全部反映出来。马沛文、王强华同志后来接手修改，才把上述观点基本上体现出来了，而且在文中鲜明地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这就是4月20日的改样。这个改样送给了孙长江同志，请他进一步修改。与此同时，杨西光同马沛文、王强华同志一起，又修改了一

次，并将文章的标题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改样也送给了孙长江同志。现在有的同志一口认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唯一”二字是党校在改稿时才加上的，《光明日报》送去的文章的标题只是“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我看，这样的疏忽是不应该有的。好在当时的清样还在，并已收入本书，无需再多费笔墨。在孙长江同志修改稿件期间，杨西光同志又到党校与吴江、孙长江同志交换意见。大家对文章的基本观点认识是统一的。吴江同志认为，4月20日的文章写得有勇气，理论逻辑上差些，要理好，并加以提高。杨西光同志再一次提出，要突出马克思主义有生命力、要永葆其青春的观点。此后，孙长江同志以4月20日的稿子为基础，改写出一稿，经吴江同志修改，于4月27日定稿，送胡耀邦同志审阅。同时，送给杨西光同志，并航寄南京胡福明同志。杨西光和吴江同志商定，为扩大影响，先在中央党校5月10日的《理论动态》发表，第二天即5月11日再由《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见报。这个安排得到了胡耀邦同志的批准。

由此可见，这篇文章的修改实际上是杨西光与吴江同志共同主持完成的。现在有一种说法，说《光明日报》当时不敢发表这篇文章，所以才拿到《理论动态》上发表的。这个说法于事实有悖，在逻辑上也是讲不通的。杨西光同志花费那么大的精力组织修改这篇文章，难道不是为了发表吗？

那么，文章为什么要先在《理论动态》发表，而后再由本报发表呢？当时，杨西光同志考虑，这篇文章只是一家发表，不会形成气候，需要其他新闻单位的支持和呼应。他当时曾和新华社、《人民日报》的主要负责同志曾涛、胡绩伟二位商量，文章发表后，由新华社发通稿，《人民日报》转载，但这样做，需要上面有人审阅这篇文章，而当时若将此文按正常程序送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负责人审，是不会同意《光明日报》发表的，更不会由新华社发通稿、《人民日报》转载。而当时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的每篇文章，都要经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同志审阅。所以，先在《理论动态》发表，此文由胡耀邦同志审定就是很自然的了，也避开了《光明日报》越过宣传部门的领导而

直接送胡耀邦同志审定的嫌疑。所以，此文由《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后，当天新华社全文转发，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一些中央和地方的重要报纸，均相继转载。这样，一场全国性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序幕就拉开了。

四

文章发表后，反响强烈，不少读者投书报社，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但也出现了不同声音和不同的意见，这是很自然的。而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同志也对这篇文章大加挞伐，这就使杨西光同志在思想上、政治上承受了巨大压力。面对压力，他是以一颗平常心来对待的，而且他对此是有思想准备的。在这篇文章修改的过程中，曾有人提醒他，这篇文章的发表会冒很大风险。他当时说，我已经老了，而且“文革”那么大的险滩都闯过来了，还怕什么呢？文章发表前，杨西光同志在一次报社负责人会议上宣布要发表这篇文章时又坚定地说：这是一场事关中国命运的尖锐的政治斗争，如果结果好，那不用说，如果因此我们受到了误解，甚至受到组织处理，由我承担责任。但我们也要相信，历史最终会公正地作出结论。文章发表后，果然风险随之而来。但他确信，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是站得住脚的，在政治上是没有问题的，它顺应历史潮流，反映了亿万人民的共同心声，维护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没有错。他一如既往地同新闻界、理论界的同志团结一致，旗帜鲜明地站在拨乱反正的前列。

为了更充分地说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为了斗争策略的需要，同时也是从《光明日报》的特点出发，这时他还组织自然科学界的中青年作者，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领域撰写文章，说明真理的发现来自于科学实验和实践。中青年科学工作者还用自然科学史上的大量事实说明，当原有的自然科学理论同新的科学实验事实发生冲突时，科学是如何突破旧理论而创立新理论，同时又在实验中得到证实的。这些文章从一个侧面配合了当时的讨论，

同时也给人以有关方面的知识，开阔了读者的视野。

真理标准讨论得到邓小平同志全力支持，并在全国产生重要影响后，人们自然要称道《光明日报》发表的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面对一片赞扬声，杨西光同志更加冷静，他一直对此不居功，不夸耀，而是强调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不可磨灭的功勋。

1984年，当这篇文章的作者问题发生争论时，杨西光同志给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文献与研究》写过一篇短文，再次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和后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在邓小平同志完整准确地认识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反对‘两个凡是’的思想指导下，以及胡耀邦同志在中央党校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评价党的历史问题推动下，针对当时思想路线斗争实际展开的。”他还提出：“关于写作的具体发展变化过程，建议由中央党校和《光明日报》当时参加写作的同志共同座谈回忆，并尽力搜集原始材料；还要请《人民日报》、新华社、《解放军报》有关同志参加，整理邓小平、胡耀邦同志在此前后的有关讲话，以及耀邦同志继续组织和推动真理标准的讨论，为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做了理论准备的全面情况写出一份较完整的历史资料。”

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杨西光同志表现出一个革命者的不屈不挠的大无畏精神；在欢呼成功的时候，他从来不提自己，而是一再强调邓小平、胡耀邦同志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支持及新闻界、理论界同志的团结合作。这就是杨西光同志在真理标准讨论中所表现出的一个共产党人的优秀品格。这也是他一贯的思想品格。

杨西光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10年了。在纪念《光明日报》创刊50周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学习他为真理而斗争的勇敢精神，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尊重科学、尊重客观规律的治学态度，继承他政治家办报的好传统，为进一步解放思想，办好报纸，阔步迈向21世纪而努力奋斗。

(1999年)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亲历记

曹勇进

1974年7月至1978年8月，我在《光明日报》社理论部工作。《哲学》专刊恢复后，在组长王强华同志的领导下，主要从事哲学稿件的编辑业务。1978年8月调《红旗》杂志社哲学史学部，继续从事哲学编辑工作。在这两个单位期间，参与过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有过一些亲身经历。

在《光明日报》社的亲身经历

大约是1978年1月间的一天晚上，我看见王强华同志从印厂拿到办公室一份校样(这就是胡福明同志最初写的关于真理标准的那篇文章的校样)。当我刚刚看完标题之后，他就将稿子收起来了。记得我当时还问了他一句：“《哲学》专刊上已发过同类的文章，起码有两篇了，为什么还要组织这篇文章？”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说：“这篇文章的针对性同那两篇的不一样！”听他这么一说，我以为这篇文章有什么大的来头；所以我再没有继续询问下去。后来，经过分析，才知道，原来已发的那两篇关于真理标准的文章，从主题到内容，主要都是针对林彪和“四人帮”的“句句是真理”的谬论的。而这篇文章则是针对性更强。而我到报社工作时间很短，又因那时还年轻无知。他大概因此而不肯向我轻易进一步交底吧！

1978年4月的一天晚上，理论部的负责人，按照惯例，手拿着老花眼镜

盒，来到理论部办公室，我们都围拢在王强华的办公桌周围，像往常一样，准备讨论、修订第二天出版的《哲学》专刊第77期大样。以往，《哲学》专刊的版面，主管理论部的负责同志与我们商量之后，就基本上拍板定案了。这次与往常不同的是，正在讨论修改时，总编辑杨西光打来电话，说要将头条关于实践标准的那篇文章撤下来，并要修改，准备放在报纸的头版发表。大家遵照杨总编的意见办了。后来的事实证明，杨总编的这个决定是非常正确的。因为早在1977年10月4日的第56期《哲学》专刊上，就发表过一篇署名正平的文章，题为《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该文一开头，就讲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接着，引用了毛泽东同志在《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一文中的那句有名的论断，即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才算真理，不然就不算。在此之前，1977年7月19日发表的马仲扬同志的文章中，也发表了用实践标准来检验一切理论的观点。但当时，杨西光同志还未调来报社工作，这两篇文章既没有从《哲学》专刊上撤下来，也没有组织高手进一步修改，更没有放在《光明日报》的头版发表，所以比起胡福明最初起草、中间经过报社和中央党校的同志加工和修改的那篇署名为“本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来，影响力就很低了！我认为，杨西光同志之所以能有此“慧眼”而及时“识玉”，并有如此勇气和胆量作出这样大的决策，主要原因是他了解到了邓小平同志批评“两个凡是”的意见和有关谈话精神。他在中央党校学习过，参加过有关真理的标准问题的议论之后不久，就调来我社当总编了。有关情况，中央党校有的同志已写书作了叙述。我要补充的一点是，一次，我到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负责人之一的孟凡同志家拜访。他说，因他同杨西光同志是老同志、老熟人、老上下级关系，所以杨西光一到党校，就自然经常同他交谈。而他是经常同当时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胡耀邦同志接触的人。胡耀邦同志则是能同叶帅和邓小平等高层领导交往的领导者。因此，杨西光同志那时自然已经知道邓小平同志对“两个凡是”的批评意见。从我同杨西光同志的接触中，深深感觉到，作为报纸的总编辑，虽然他不得不经常说一些穿靴戴帽

的套话，但他的心底里是真心拥护邓小平同志的领导的。这也可以由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得到印证。杨西光同志刚调来，一开始就大力组织阐述脑力劳动方面的稿件的，不仅在改版时发表了“辛广民”（新光明的谐音）论脑力劳动的文章，并配发了两篇有关报道，还让我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先编5大本资料，再准备连续写大块文章。当时，他曾要我通过各种关系，了解邓小平同志有关脑力劳动的讲话精神。这足以说明，在他的心目中，邓小平同志的领导地位是非常之高的。因此，看到胡福明的稿子，他马上敏感地抓住，这比他抓有关脑力劳动的文章，更能表达他对邓小平拨乱反正战略的理解。

大约就在杨西光同志提出要求的第二天中午，王强华先给作者胡福明打长途电话，听说胡福明正好在北京开会。那时的北京，交通条件并不像现在这么方便，他就骑着自行车到开会的地方去寻找。中午饭也没有赶上回来吃。当时，天气已经开始热起来，他回到报社，热得满头大汗，加之又饿又渴，累得够苦的了！今年5月份，报社开会纪念真理标准问题讨论20周年，听说，王强华同志在这个会上发言时，将他对修改这篇稿件所写的记录，连念带说明，还发了纪念文章。他在自己的这篇文章中终于道出了真相。原来，组织和发表那篇“特评”文章，指导思想正是邓小平同志针对“两个凡是”而明确提出的，即我们要世代代用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全国人民和我们的工作。正是在邓小平同志这一思想指导下，“特评”文章才应运而生。由此可见，王强华同志在组织和发表胡福明的文章过程中，的确是在邓小平同志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

把该文的题目中原来的真理前面的“一切”两字去掉，在标准前加上“唯一”二字，是哲学组成员之一的张义德同志的意见。王强华同志在征求意见时，采纳了这个意见。文章发表后，有的同志不同意用“唯一标准”这个提法，理由是逻辑同样可以证明真理。几年以后，我还亲耳听到过这个说法。因此，没有经典作家的原话，在那个“句句是真理”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清除的时候，是很难令人信服的。为此，我们当时翻阅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结果，不但在列宁著作中找到了类似的论断，而且从毛泽东同志的文稿中找到了根据。毛泽东同志是在1963年11月18日上午2点钟，在修改《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一文时，加上了“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的。这句话和其他批语，1996年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业已公开发表。其实，这句话的意思，早在1965年第11期《学术月刊》上，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中直机关发的有关学习《实践论》、反对天才论的材料中，在一些自然科学的刊物上，都曾出现过，不过那时大家并不知道这是毛泽东同志的论断，所以印象不深。在这次讨论中，由于党的主要负责人与某省的一位负责人不约而同地认为，“真理不一定都要经过实践检验，实践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一来，问题就大了。文章的标题到底对不对，有没有权威的理论根据，已经不单单是理论问题，而且涉及到政治问题了。特别针对当时党的主要负责人的错误观点而发，更具有不同寻常的政治和理论意义。我们终于找到了这一有力的论据，对驳倒对方非常有利。同时，大家都感到心里踏实。后来，邓小平同志应《光明日报》社之邀，欣然为纪念这场讨论10周年的论文集题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不仅是对《光明日报》社全体同志工作的肯定，对这场讨论的重大作用的再次肯定，而且也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这一基本原理的肯定。同时，也表明“实践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错误观点被彻底驳倒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妇孺皆知，被广大人民群众普遍接受了。我到北京一条胡同的深宅大院中串门，有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太太，居然也知道这个口号。我乘火车出差，见到车厢里竟张贴着这条标语。

胡福明同志后来说：“为这篇文章做出贡献的有一批同志，这也是集体创作。”除了中央党校的诸多同志，在我社，就有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张义德等同志，为这篇文章的修改和发表做出过重要的贡献！

大约在4月底5月初的一天下午，杨西光同志要我到中央党校去，取回党校同志修改过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到了党校，一位同志向我

说明了修改的情况。因时间长，我的印象都不深了。唯有一处，我至今还记得十分清楚。那天下午，那位同志拿出手抄的一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说是他刚刚新发现的，能不能加在文章的后面？我说，这我自己不能决定，只能回去请示杨西光同志。于是，我拿着稿子，回到报社，正好杨总编开完全社大会回到办公室，他的夫人季宝卿同志当时也在座。我将稿子送他审阅，并讲了中央党校那位同志的意见。他看完那段语录，表示可以加上去。他说，我口授，你来改。我还是坚持让他自己亲手动笔改。他说，那我就来改，你来抄吧！于是，他就动手改了起来。不过，他没有用经典作家的原话，而是把它变成自己的话写了出来：“……我们要完成这个伟大任务，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改完之后，他要季宝卿同志念，让我抄。抄完立即送印厂改样，送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杨西光同志之所以要先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登这篇文章，除了争取得到兄弟单位的更多支持之外，还有一个最大的目的，就是希望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胡耀邦同志创办《理论动态》的目的之一，是给中央领导同志了解理论战线的动态，起一个耳目作用。从第一期开始，就送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审阅。谁能料想到，邓小平同志起先还未来得及看这篇文章，反对的意见倒先冒了出来。最近我才看到，在1978年11月29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有的同志给这篇文章所列的四大问题之一是：“把‘四人帮’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同毛主席过去批判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倾向相提并论，这就混淆了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界限。文章认为，现在主要是批判教条主义，批判那些‘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的错误倾向。这就颠倒了主次，方向错了，是不符合党的十一大提出的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的任务的。”这个问题，连同“砍旗”等一大堆吓人的政治帽子，早在1978年5月12日的晚上，即《人民日报》转载这篇

文章的当天晚上，就已提出来了，并把这类大帽子给这篇文章早已戴上了，真像邓小平同志概括的那样，是被判为犯了“弥天大罪”的呀！试想，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很快出来说话，拨正航向，那不知又要冤枉多少好同志啊！

5月10日下午，杨西光同志又要我到中央党校，去取刊有这篇文章的那期《理论动态》。我到了党校，看见孟凡同志正和几位同志忙于分发那期《理论动态》。除了交给我的以外，他还要我顺便给《人民日报》带一份去。我风风火火地赶到《人民日报》（那时社址在王府井大街），将《理论动态》交给了理论部的汪子嵩同志。汪问我：“你们什么时候登这篇文章？”我回答：“听杨总编说，明天就登！”汪说：“那我们后天就转载！”我立即火速返回报社，把这期《理论动态》交给了理论部的负责同志。刚回到我的办公室还未喘口气，喝口水，理论部的负责同志又打来电话，要我查查别的报上的“特约评论员”用的几号字？因快要下班了，所以我急急忙忙跑到楼上图书馆，找到了别的报纸，翻到了有“特约评论员”的字样。可惜我到报社不久，对字号大小一概不懂，所以赶紧到文艺部的一间办公室，去向一位脸色红红、戴着眼镜的同志请教。那位同志告诉我之后，我立刻打电话告诉了理论部的负责同志。事后才知，之所以用“特约评论员”这个名义，是为了躲开推行“两个凡是”的人的审批。

1978年5月1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大文章，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光明日报》上公开发表（有的同志怀疑说，《光明日报》登的不是《理论动态》上刊载的稿子，这是不符合事实的）。12日《人民日报》转载。事后得知，12日晚上，就有人向《人民日报》提出反对意见。我社也接到许多报社或地方上的同志打来的电话询问这篇文章的背景。有的电话打到理论部来了，根据报社“没有什么背景”的统一口径，大家一一作了回答。那时，关于脑力劳动的写作班子尚未解散，每天总会听到他们从社会上听到的一些反映。每晚回到沙滩宿舍大院，那里不仅有红旗杂志社的人员，而且有老中宣部的和原中央政研室分到中央各大单位的许多领导同志。从他们

口里，我听到了正反两个方面的好多尖锐意见。在报社内部食堂里，我也听到了有的同志反映的社内外的各种意见。一天，我将这些反映来的意见向主管理论部的负责人作了汇报。因涉及到当时中央一些领导人的看法，怕不可靠，出了事惹来麻烦，所以，我特别要求这位负责同志，将这些反映千万不要向杨总编汇报。一天上午，主管理论部的负责人召集理论部的同志开会，想听听社内外都有些什么反映。尽管私下人们议论纷纷，但公开在会上谁也没敢开口。所以会开了一会儿，就散了。有一天中午，我到报社门口，碰到杨总编，他主动向我问起社内外对这篇文章都有些什么反映？我估计是主管理论部的负责同志向他提起过我听到的那些反映，觉得向他隐瞒也不好，所以就向他一五一十地倒了出来。听到赞成的意见，他并不为之兴高彩烈；谈到批评意见，他毫不为之动容。后来受到了来自上边的巨大压力，他也是以一颗平常心来对待的。不久，他要求报社的同志组织一些自然科学方面的文章，从科学实践检验真理的角度，来论证这个问题。我从学部(现在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哲学研究所找来几位作者，其中有的是他在复旦大学任党委书记时的学生。我记得有一位姓解的学生，还当面称赞过自己的老师发这篇文章发得好。当时报社自己编了一本小册子，共收四篇文章，除了那篇重头文章之外，后三篇都是从自然科学角度来论证实践是如何检验真理的文章或资料。据说，这是杨西光同志受了来自上边的压力而采取的一种迂回的策略。但支持真理标准的另一些同志则又批评他说：怎么能将一场政治斗争引向自然科学的学术争论呢！

正当形势发展不够明朗，杨总编和所有支持这篇文章的同志比较困难的时候，邓小平同志看了这篇文章，通过内部谈话和公开讲话，尤其是6月份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支持了这篇文章，领导和推动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在《红旗》杂志的所见所闻

这场讨论在北京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不久，邓小平同志去了四川和广东。9

月份，邓小平同志访问朝鲜归来，到东北三省，沿途到处讲思想路线问题。对“两个凡是”作了深刻的剖析和十分尖锐的批评；把“实事求是”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提到是整个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的高度；指出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还是执行“两个凡是”的方针，关系到是真高举还是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大问题。我认为，这些谈话，除了针对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在山东和东北各地的错误言行之外，实际上是把这场讨论由中央引向地方的重要开端。当然，在此之前，一些地方的报刊和领导人已经陆续纷纷表态，支持《光明日报》公开发表的那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尤其是辽宁和黑龙江的领导同志与省委机关，发表文章和展开讨论与公开表态，都比较早。经过邓小平同志在广州、成都和东北三省的点火，使这场讨论迅速传遍全党和全国。于是，各地的主要领导人纷纷表态，支持这场讨论。同时，这又促进了北京的讨论向着纵深发展。

1978年8月，我调到《红旗》杂志社工作。那时的《红旗》，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持“不表态”、“不介入”的态度。过了不久，则又从另一个方面“介入”了。当时，我同另一位同志一起，被指派帮助一位副总编收集材料，由他撰写《重温〈实践论〉》那篇文章。邓小平同志在吉林的那份讲话传抄稿，传到我的手里时，我送给红旗杂志社的那位副总编看过。送时，总编辑也在场。我的一位老同志对我说，“现在上面情况很复杂，斗争很激烈。您把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稿子给他们看，一旦出了问题，您会跟着倒霉的！”因此，我立即将这个讲话稿子要了回来。同时，对写《重温〈实践论〉》一文，进行了一些抵制。特别是请假回家，逾期不归，气得那位副总编大发脾气。后来他还派我拿着《重温〈实践论〉》到中央党校等单位去征求意见。中央党校的一位同志质问我：“您怎么也同意他们的观点？”我回答说：“我完全是履行公务。这篇文章中并没有我的观点，因为我起草的那一小部分，主笔人连一句话也没有吸收！”

据《红旗》印厂的一位排字工人多次对我讲，外单位的人也曾对我说过，

在《重温〈实践论〉》的一个稿子上，曾经有一段文字，是肯定“文化大革命”的，说什么必须站在珠穆朗玛峰上才能看清“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意义。在社内外同志的强烈反对下，特别在邓小平同志坚持真理标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谈话精神传到红旗杂志社里来了以后，那位副总编不仅在后几稿中删去了这些文字(我现在保留的稿子中，已无上述那句话了)，而且随着态度的转变，这篇文章也就自动流产了，未能公开发表。

11月中旬以后，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初期，《红旗》哲学史学部的有关领导同志带着我，曾去开会地点京西宾馆，约请当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任仲夷同志写文章。刚到了京西宾馆不久，总编辑就向我们打招呼，引导我们让作者按照“两个凡是”的意图写一篇文章。但作者根本不理这个招呼，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写，题名为“解放思想是个历史潮流”。我是该文的责任编辑。能不能在《红旗》上如约发表这篇文章，我心中打了问号。恰在此时，邓小平同志在关于谭震林同志为《红旗》撰写的，主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内容的文章能否发表的请示报告上的批语传了下来。随着邓小平同志支持的谭老的文章的发表，任仲夷同志的文章也同时发表了。从此，《红旗》杂志的确也阻挡不住这股解放思想的历史潮流了。由此可见，邓小平同志对《红旗》回到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上来，的确是起了最关键的作用！后来，《红旗》改为《求是》，邓小平同志为它亲手题写了刊名，这是党中央的最高理论刊物走向新生的开端。

1979年7月29日，邓小平同志在接见海军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的讲话中，对一些单位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进行补课的工作给予肯定和支持。应当说这是邓小平同志对这场讨论进行补课的动员令。从此以后，这场讨论的补课工作，迅速在全国开展了起来。

《红旗》当时也进行了补课工作，我们哲史部曾写过一篇短评，反映还可以。我去山东组稿时，该省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补课工作。他们送我的三份补课材料，至今我还保留着，翻开一看，还能感到当初的那种热烈气氛。从这些

材料和当地干部的介绍中，使我知道，不但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去山东反对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而且邓小平同志也到过山东视察，作过有针对性的重要讲话。从简报上看，山东的补课工作进行得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我还能回忆起省委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对《红旗》的那篇补课短评的评价：“这个评论写得不错，比去年迟迟不表态大有进步！”《红旗》后来的进步，我在这个单位亲身感受到，与邓小平同志对谭震林的文章的批示以及这次要求补课的动员令，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我认为，应当看到《红旗》在这场讨论中后来的转变和进步。

1980年1月16日下午，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干部大会，邓小平同志发表了《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重要讲话。其中提到真理标准的讨论，是前两年的准备工作之一。它对促进思想路线的根本转变，并确立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准备。那天下午，中央机关的大部分同志都去听了这个报告。因人太多，大家只能坐在二楼的过道里听。会上碰到光明日报社的老同事，当听到邓小平有关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评价时，我们心里都异常激动。

(1999年)



附录

1978年1月14日的《实》文原文小样

哲(四五一)七八、一、十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送审稿)

胡福明

1845年，马克思在创立新世界观时，就提出了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对象，是不是真理，不能在思维的范围内解决，不能靠理论争论解决，只能靠社会实践的检验来解决。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它的一个特征。

关

(一)

实践检验真理，就是运用关于事物的理论去指导实践，改造客观事物，一般说，如果在实践中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取得了胜利，那就证明这个理论符合客观规律，是真理；如果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失败了，那就证明这个理论不符合客观规律，是错误的理论。实践标准区别真理与谬误，证实真理，否定谬论。自然，实践标准也是辩证的。列宁说：

“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这种观点必然会导致唯物主义，而把教授的经院哲学的无数臆说一脚踢开。当然，在这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斗争。”（《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60年版第134—135页）实践是发展的。每个时代的社会实践都有历史局限性。因此，每个时代都有一些理论问题是当时的实践解决不了的，既不能证实，又不能否定。但是，今天的实践回答不了的，以后的实践一定能解决。任何理论，是真理还是谬论，归根到底要由实践来检验。社会实践是真理与谬论的试金石。只有社会实践才能彻底粉碎唯心论、不可知论和一切谬论。只有社会实践才能树立真理的权威。因为，唯有实践才能使理论与客观事物相比较，判别理论是否符合客观事物的本质。

毛主席指出：“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3页）这就告诉我们，不仅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大规模的宣传证明不了真理，许多人的赞成证明不了真理，强大的权力证明不了真理，而且已被过去实践证明了的真理，也不是今天检验真理的标准。因为，任何客观事物都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不同事物和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都有矛盾的特殊性。各门科学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反映不同对象的特殊规律。真理是具体的，是对研究对象的全面的、本质的、规律性的正确反映。关于客观世界的普遍规律的学说，不能检验各个具体的理论，因为普遍真理并不包括具体事物的特殊规律。唯物辩证法是自然、社会、思维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是指导人们研究客观事物的世界观、方法，然而它决不

论

是论证的工具。一个具体事物的真理，证明不了另一具体事物的理论，因为每个事物都有特殊规律。平面几何学检验不了里曼几何学，因为二者的研究对象不同。牛顿力学不能检验量子力学，因为各自研究范围不一样。在社会科学中，有些结论虽然不同，却都是真理。例如，对于被侵略、被压迫的国家说，保卫祖国是真理；对于侵略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说，工人无祖国是真理。这两个论点要互相证明是不可能的，都要由实践检验。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在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的结论，与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结论，都是真理，前者是在资本主义自己竞争时代讲的，后者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讲的。情况不同，结论也不同，不能用前者检验后者，它们都由实践证实。十月革命是大城市武装起义取得胜利的，中国的机会主义者以此为根据，要在中国搞大城市武装起义，结果总是失败，前者证明不了后者，只能由实践回答问题。事物是发展变化的，事物的性质变化了，理论也随之变化，过去的科学结论证明不了当前的结论，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科学原理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因为它还是在理论的范围内，不能回答理论是否符合它的客观对象的问题。如果说科学原理可以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那无非是说关于一切事物的真理都已包括在已知的科学原理里面了，这是形而上学；那无非是说实践标准“过时了”，这只能导致唯心主义。

(由)

坚持实践标准，就是坚持辩证唯物论。

毛主席指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7页）不管是自然科学理论，还是社会科学理论，都必须经过实践证明，才算真理，才算科学，否则是不算的。以自然科学为例，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在300年里一直是一种假说，尽管这个假

说具有99%、99.9%、99.99%的可靠性，尽管可以相信它是真理，但在实践证实以前毕竟是一种假说，而不是真理；而当勒维列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加勒于1846年确实发现了海王星这颗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就被证实了，成了真理。自然科学的真理，都要经过实践证实。那么，马克思主义要不要经过实践检验呢？同样必须经过社会实践检验，而且确实经

证实

过了千百万群众的长期实践的检验。毛主席说：“马克思列

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马克思、恩格斯、列

尔

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今

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辩证唯物论之所以为普遍真理，在于经过无论什么人的实践都不能

逃出它的范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9页）马克思主义

是真理，决不是自封的。它原是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派别，

一无权，二无势，开始并不出名，反动派围攻它，资产阶级

学者反对它，其他的社会主义流派攻击它，但是，长期的

了

三大革命实践证明的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终于成了国际共产

为

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20世纪初，第二国际的头面人物是考

茨基，列宁主义者是少数派。十月革命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

的实践证明列宁主义是真理，宣告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破

产。中国革命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毛泽东思想是真理，粉碎

了资产阶级理论和党内的机会主义。历史告诉我们，马克思

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新思想、新结论、新观点，都

必须经过社会实践的证实，才能成为真理。这是无条件的。

0

过去如此，现在和将来还是如此。

（二）

马克思主义的导师提出了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并自觉运用实践标准检验自己的理论，发展理论，以至修改个别结

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就是从实践获得理论、用实践检验理论、用理论指导实践的历史。

现在来看看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根据实践来检验《共产党宣言》的。1848年《宣言》发表后，他们在45年中一直根据实践来检验《宣言》，

《宣言》的⑦篇序言是生动的说明。1872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文版序言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8页）这是根据25年阶级斗争实践检验的结论。

130年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

在⑦篇《序言》中，他们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总结了一系列的新经验。特别是，他们根据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和新的事实材料，对个别结论作了修改。这里举一个例子。《宣言》第一章第一句是：“到目前为止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恩格斯在1888年的《宣言》英文版上，加了一条注释：“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状态，全部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完全没有人知道。后来，哈克斯特豪森发现了俄国的土地公有制，毛勒证明了这种所有制是一切条顿族的历史发展所由起始的社会基础，而且人们逐渐发现，土地公有的村社是从印度起到爱尔兰止各地社会的原始形态。最后，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真正本质及其对部落的关系，这一卓绝发现把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揭示出来了。随着这种原始公社的解体，社会开始分裂为各个独特的、终于彼此对立的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1页）这个为恩格斯

后来多次谈到的重要修改，把上百万年的无阶级社会与几千年的阶级社会区别开来了，说明了阶级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对《宣言》的态度，表明了他们是怎样严肃的对待自己的学说的。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学说一开头就是完美的，决没有把它看作“绝对真理”，而始终用辩证法观点看待自己的学说，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他们虚心吸取别人的科学成果，包括资产阶级学者所提供的事实材料。他们提出了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并身体力行，始终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证实、丰富、修改自己的观点。他们毫无偏见，尊重实践，尊重事实，尊重科学，是他们唯一的态度。马克思主义首先是科学，所以才能成为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态度。马克思主义与任何盲从、迷信，是水火不相容的。哪里有盲从，哪里有迷信，哪里就没有科学，哪里就没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就是承认我们的认识可能犯错误，需要由实践来纠正。如果认为认识是不犯错误的，也就取消了实践标准。毛主席指出：“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的不完全性，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9页）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才是科学真理，才能不断发展，永葆青春。

坚持实践标准，就是科学态度，否认实践标准，就陷入蒙昧主义。

检验或

（三）

机会主义以理论与实践相分裂为特征。在我党的历史上，王明、林彪、王张江姚“四人帮”表现得尤其突出。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唱得最响，反对马克思主义最为猖狂。神学家是公开宣传宗教教条，王明、林彪、“四人帮”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宣传宗教教条。他们都否认马克思主义来源于实践，否认马克思主义要在实践中受检验，在实践中丰富、发展。王明反对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否认理论与实践统一，把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当作教条。毛主席一针

见血地批判王明说：“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词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那些将马克思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8页）

王明把马克思的个别词句当作灵丹圣药，宗教教条，使革命根据地丧失了90%，革命力量丧失90%以上，使中国革命面临绝境，到此地步，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才被克服。30多年后，林彪反党集团和王张江姚“四人帮”搞得比王明还凶。叛徒林彪鼓吹天才论，否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源于三大革命实践，宣扬“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否认毛主席的指示需要到实践中检验、丰富发展，反对实践标准。毛主席痛斥了林彪的唯心论和先验论。与林彪合伙的“四人帮”，唯心主义横行，疯狂反对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根本否认实践标准。姚文元攻击“存在第一、思维第二，客观第一、主观第二”是“反动的形而上学”，宣扬精神第一的唯心主义，完全否认了理论来源于实际，否认了理论要受实际检验。他还宣扬“没有审美能力，也就无所谓美丑之别”的谬论，把主观意识当作区别美丑的标准。张春桥在一次座谈会上公开鼓吹“认识——实践——认识”、“理论——实践——理论”的反动公式，更是明目张胆地反对实践

列宁主义

他们摘取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作为论证工具。

是认识的基础。“四人帮”鼓吹“反经验主义为纲”，否认实践经验；把广大干部、广大群众的实践经验污蔑为“陈规旧习。”一句话，他们鼓吹主观唯心论，反对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否认真理的实践标准。尤其反动的是，“四人帮”肆意歪曲和篡改毛泽东思想，把毛主席的一言半语与毛泽东思想体系割裂开来；抛弃毛泽东思想体系，任意摘取片言只语，把它当作宗教教条，到处吓人、打人。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科学，还是把它当作宗教教条，这是一个根本的分歧。“四人帮”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宗教教条，跟王明把马列主义当作宗教教条完全一样。“四人帮”背叛实践标准，迷信“强权即真理”、“造谣一千遍就是真理的”法西斯哲学，使用他们控制的宣传机器，大造反革命舆论，把实践中证明了的真理攻击为修正主义，把在实践中破产了的东西吹捧为真理；全盘否定解放后17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全盘否定毛主席亲自缔造的中国共产党的50多年的伟大实践，篡改历史、颠倒是非、捏造罪名、制造谣言，陷害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革命同志。“四人帮”的真理标准就是他们篡党夺权的野心。但是，实践标准是客观的，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不仅是证实真理的最有力的手段，也是宣判修正主义和一切谬论死刑的最高权威。在亿万人民的革命实践面前，“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彻底破产了，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1978年1月26日《实》文的第一次改样

哲(四五—)七八、一、十四、一、二十六改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送审稿)

胡福明

1845年，马克思在创立新世界观时，就提出了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对象，是不是真理，不能在思维的范围内解决，不能靠理论争论解决，只能靠社会实践的检验来解决。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它的一个特征。

(一)

实践检验真理，就是运用关于事物的理论去指导实践，改造客观事物，一般说，如果在实践中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取得了胜利，那就证明这个理论符合客观规律，是真理；如果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失败了，那就证明这个理论不符合客观规律，是错误的理论。实践标准区别真理与谬误，证实真理，否定谬论。自然，实践标准也是辩证的。列宁说：

人们

地

这就是实践检验真理的含义。

“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

《列宁选集》第2卷
第142页

点。这种观点必然会导致唯物主义，而把教授的经院哲学的无数臆说一脚踢开。当然，在这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为‘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60

年版第134—135页）实践是发展的。每个时代的社会实践都有历史局限性。因此，每个时代都有一些理论问题是当时的实践解决不了的，既不能证实，又不能否定，但是，今天的实践回答不了的，以后的实践一定能解决。任何理论，是真理还是谬论，归根到底要由实践来检验。社会实践是真理与谬

终究会

论的试金石。只有社会实践才能彻底粉碎唯心论、不可知论和一切谬论。只有社会实践才能树立真理的权威。因为，唯有实践才能使理论与客观事物相比较，判别理论是否符合客观事物的本质。

毛主席指出：“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3页）这就告诉我们，不仅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大规模的宣传证明不了真理，许多人的赞成证明不了真理，强大的权力证明不了真理，而且已被过去实践证明了的真理，也不是今天检验真理的标准。因为，任何客观事物都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不同事物和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都有矛盾的特殊性。各门科学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反映不同对象的特殊规律。真理是具体的，是对研究对象的全面的、本质的、规律性的正确反映。关于客观世界的普遍规律的学说，不能检验各个具体的理论，因为普遍真理并不包括具体事物的特殊规律。唯物辩证法是自然、社会、思维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是指导人们研究客观事物的世界观、方法论，然而它决不是论证的工具。一个具体事物的真理，证明不了另一个具体事

物的理论，因为每个事物都有特殊规律。平面几何学检验不了里曼几何学，因为二者的研究对象不同。牛顿力学不能检验量子力学，因为各自研究范围不一样。

各门科学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反映不同对象的特殊规律。

在社会科学中，有些结论虽然不同，却都是真理。例如，对于被侵略、被压迫的国家说，保卫祖国是真理；对于侵略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说，工人无祖国是真理。这两个论点要互相证明是不可能的，都要由实践检验。

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在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的结论，与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结论，都是真理，前者是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讲的，后者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讲的。情况不同，结论也不同，不能用前者检验后者，它们都由实践证实。十月革命是大城市武装起义取得胜利的，中国的机会主义者以此为根据，要在中国搞大城市武装起义，结果总是失败，前者证明不了后者，只能由实践回答问题。事物是发展变化的，事物的性质变化了，理论也随之变化，过去的科学结论证明不了当前的结论，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

科学原理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因为它还是在理论的范围内，不能回答理论是否符合它的客观对象的问题。

如果说科学原理可以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那无非是说关于一切事物的真理都已包括在已知的科学原理里面了，这是形而上学；那无非是说实践标准“过时了”，这只能导致唯心主义。坚持实践标准，就是坚持辩证唯物论。

具体

毛主席指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7页）不管是自然科学理论，还是社会科学理论，都必须经过实践证明，才算真理，才算科学，否则是不算的，以自然科学为例，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在300年里一直是一种假说，尽管这个假说

具有99%、99.9%、99.99%的可靠性。尽管可以相信它是

真理，但在实践证实以前毕竟是一种假说，并不是真理；而

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

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

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加勒于1846年确实发现了海王星这颗行

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就被证实了，成了真理。自

然科学的真理，都要经过实践证实。那么，马克思主义要不

要经过实践检验呢？同样必须经过社会实践检验，而且确实经

过了千百万群众的长期实践的证实。毛主席说：“马克思列

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马克思、恩格斯、列

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

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辩证唯

物论之所以为普遍真理，在于经过无论什么人的实践都不能

逃出它的范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9页）马克思主

义是真理，决不是自封的。它原是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派别，

一无权，二无势，开始并不出名，反动派围攻它，资产阶

级学者反对它，其他的社会主义流派攻击它，但是，长期的三

大革命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终于成为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20世纪初，第二国际的头面人物是考茨

基，列宁主义者是少数派。但是，十月革命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

实践证明列宁主义是真理，宣告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破

产。中国革命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毛泽东思想是真理，粉碎

了资产阶级理论和党内的机会主义。历史告诉我们，马克思

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新思想、新结论、新观点，都

必须经过社会实践的证实，才能成为真理。这是无条件的，

过去如此，现在和将来还是如此。

（二）

马克思主义的导师提出了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并自觉

运用实践标准检验自己的理论，发展理论，以至修改个别结

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就是从实践获得理论、用实践检验理论、用理论指导实践的历史。

从认识发展的过程来说，

现在来看看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根据实践来检验

《共产党宣言》的。1848年《宣言》发表后，

他们在45年中一直根据实践来检验《宣言》，

《宣言》的七篇序言是生动的说明。1872年，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文版序言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8页）这是根据25年阶级斗争实践检验的结论。

130年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在七篇《序言》中，他们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总结了一系列的新经验。特别是，他们根据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和新的事实材料，对个别结论作了修改。这里举一个例子。《宣言》第一章第一句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从那以后，到现在又过去了100多年，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继续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

恩格斯在1888年的《宣言》英文版上，加了一条注释：“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

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状态，全都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完全没有人知道。后来，哈克斯特豪森发现了俄国的土地公有制，毛勒证明了这种所有制是一切条顿族的历史发展所由起始的社会基础，而且人们逐渐发现，土地公有的村社是从印度起到爱尔兰止各地社会的原始形态。最后，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真正本质及其对部落的关系，这一卓绝发现把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揭示出来了。随着这种原始公社的解体，社会开始分裂为各个独特的、终于

马克思、恩格斯

，还

的

彼此对立的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1页）这个为恩格斯后来多次谈到的重要修改，把上百万年的无阶级社会与几千年的阶级社会区别开来了，说明了阶级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对《宣言》的态度，表明了

他们是怎样严肃的对待自己的学说的。他们并不

（善）

认为自己的学说一开头就是完美的，决没有把它

（严肃地）

看作“绝对真理”，而始终用辩证法观点看待自己的学说，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他们虚心

毫无偏见，尊重实践，
尊重事实，尊重科学，
是他们唯一的态度。

吸取别人的科学成果，包括资产阶级学者所提供的事实材料。他们提出了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

并身体力行，始终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正

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才是科学真理，才能不断

发展，永葆青春。他们毫无偏见，尊重实践，尊

重事实、尊重科学，是他们唯一的态度。马克思主义首先是科学，所以才能成为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态度。马克思主义与任何盲从、迷信，是水火不相

容的。哪里有盲从，哪里有迷信，哪里就没有科学，哪里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坚持实践标准，就是科学态度，否认实践标准，就陷入蒙昧主义。

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就是承认我们的认识可能犯错误，需要由实践来检验或纠正。如果认为认识是不犯错误的，也就取消了实践标准。毛主席指出：“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

我们，许多理论的真实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9页）

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就是承认我们的认识可能犯错误，需要由实践来检验或纠正。如果认为认识是不犯错误的，也就取消了实践标准。

(三)

机会主义以理论与实践相分裂为特征。在我党的历史上，王明、林彪、王张江姚“四人帮”表现得尤其突出。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唱得最响，反对马克思主义最为猖狂。神学家是公开宣传宗教教条，王明、林彪、“四人帮”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宣传宗教教条。他们都否认马克思主义来源于实践，否认马克思主义要在实践中受检验，在实践中丰富、发展。王明反对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否认理论与实践统一，把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当作教条。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批判王明说：“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词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那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8页）王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别词句当作宗教教条，使革命根据地丧失了90%，革命力量丧失90%以上，使中国革命面临绝境。到此地步，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才被克服。30多年后，林彪反党集团和王张江姚“四人帮”搞得比王明还凶。叛徒林彪鼓吹天才论，否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源于三大革命实践，宣扬“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否认毛主席的指示需要到实践中检验、丰富发展，反对实践标准。毛主席痛斥了林彪的唯心论和先验论。与林彪合伙的“四人帮”，唯心主义横行，疯狂反对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根本否认实践标准。姚文元攻击“存在第一、思维第二，客观第一、主观第二”是“反动的形而上学”，宣扬精神第一的唯心主义，完全否认了理论来源于实际，否认了理论要受实际检验。他还宣扬“没有审美能力，也就无所谓美丑之别”的谬

只是毛主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对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才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

和

践

论，把主观意识当作区别美丑的标准。张春桥在一次座谈

再

会上公开鼓吹“认识——实践——认识”、“理论——实践——理论”的反动公式，更是明目张胆地反对实践是认识

再上升为

的基础。“四人帮”鼓吹“反经验主义为纲”，否认实践

和检验真理的标准

经验；把广大干部、广大群众的实践经验污蔑为“陈规旧

习。”他们摘取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作为论证工具。一句话，他们鼓吹主观唯心论，反对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否认真理的实践标准。尤其反动的是，“四人

抛弃毛泽东思想体系，

帮”肆意歪曲和篡改毛泽东思想，把毛主席的一言半语与毛泽东思想体系割裂开来；抛弃毛泽东思想体系，任意摘取片言只语，把它当作宗教教条，到处吓人、打人。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科学，还是把它当作宗教教条，这是一个根本的分歧。“四人帮”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宗教教条，跟王明把马列主义当作宗教教条完全一

样。“四人帮”背叛实践标准，迷信“强权即真理”、“造谣一千遍就是真理”的法西斯哲学，使用他们控制的宣传机器，大造反革命舆论，把实践中证明了的真理攻击为修正主义，把在实践中破产了的东西吹捧为真理；全盘否定解放后17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全盘否定毛主席亲自缔造的中国共产党的50多年的伟大实践，篡改历史、颠倒是非、捏造罪名、制造谣言，陷害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革命同志。“四人帮”的真理标准就是他们篡党夺权的野心。但是，实践标准是客观的，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不仅是证实真理的最有力的手段，也是宣判修正主义和一切谬论死刑的最高权威。在亿万人民的革命实践面前，“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彻底破产了，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1978年1月30日《实》文的第二次改样

哲(四五一)七八、一、十四，一、二十六改，一、三十，二改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送审稿)

胡福明

1845年，马克思在创立新世界观时，就提出了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对象，是不是真理，不能在思维的范围解决，不能靠理论争论解决，只能靠社会实践的检验来解决。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它的一个特征。

(一)

实践检验真理，就是人们运用关于事物的理论去指导实践，改造客观事物，一般地说，如果在实践中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取得了胜利，那就证明这个理论符合客观规律，是真理；如果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失败了，那就证明这个理论不符合客观规律，是错误的理论。这就是实践检验真理的含

义。自然，实践标准也是辩证的。列宁说：“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这种观点必然会导致唯物主义，而把教授的经院哲学的无数臆说一脚踢开。当然，在这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

(《列宁选集》第2卷第142页)实践是发展的。每个时代的社会实践都有历史局限性。因此，每个时代都有一些理论问题是当时的实践既不能证实，又不能否定的。但是，今天的实践回答不了的，以后的实践终究会解决。任何理论，是真理还是谬论，归根到底要由社会实践来检验。只有社会实践才能彻底粉碎唯心论、不可知论和一切谬论。只有社会实践才能树立真理的权威。

回答它

毛主席指出：“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3页)这就告诉我们，不仅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大规模的宣传证明不了真理，许多人的赞成证明不了真理，强大的权力证明不了真理，而且已被过去实践证明了的真理，也不是今天检验真理的标准。

要证明它，只能靠广大群众的革命实践。

在情况变化了的今天来看，未必还是真理。比如，

因为，任何客观事物都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不同事物和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都有矛盾的特殊性。真理是具体的，是对研究对象的全面的、本质的、规律性的正确反映。关于客观世界的普遍规律的学说，不能检验各个具体的理论，因为普

遍真理并不包括具体事物的特殊规律。唯物辩证法是自然、社会、思维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是指导人们研究客观事物的世界观、方法论，然而它决不是论证的工具。一个具体事物的真理，证明不了另一个具体事物的理论，因为每个事物都有特殊规律。各门科学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反映不同对象的特殊规律。平面几何学检验不了里曼几何学，因为二者的研究对象不同。牛顿力学不能检验量子力学，因为各自研究范围不

一样。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在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的结论，与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结论，都是真理，前者是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讲的，后者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讲的。情况不同，结论也不同，不能用前者检验后者，它们都由实践证实。十月革命是大城市武装起义取得胜利的，中国的机会主义者以此为根据，要在中国搞大城市武装起义，结果总是失败，前者证明不了后者，只能由实践回答问题。

事物是发展变化的，事物的性质变化了，理论也随之变化，过去的科学结论证明不了当前的结论，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如果说科学原理可以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那无非是说关于一切具体事物的真理都已包括在已知的科学原理里面了，这是形而上学，那无非是说实践标准

“过时了”，这只能导致唯心主义。坚持实践标准，就是坚持辩证唯物论。

毛主席指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

要

来检验

后来，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道路，结果胜利了。这同样证明，理论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如果把理论当成检验的标准，

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7页）不管是自然科学理论，还是社会科学理论，都必须经过实践证明，才算真理，才算科学。以自然科学为例，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在300年里一直是一种假说，尽管这个假说具有99%、99.9%、99.99%的可靠性，但在实践证实以前毕竟是一种假说，并不是真理；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加勒于1846年确实发现了海王星这颗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才被证实了，成了真理。那么，马克思主义要不要经过实践检验呢？同样必须经过社会实践检验，而且确实经过了千百万群众的长期实践的证实。毛主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辩证唯物论之所以为普遍真理，在于经过无论什么人的实践都不能逃出它的范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9页）马克思主义原是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派别，开始并不出名，反动派围攻它，资产阶级学者反对它，其他的社会主义流派攻击它，但是，长期的革命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终于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20世纪初，第二国际的头面人物是考茨基，列宁主义者是少数派。但是，十月革命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证明列宁主义是真理，宣告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破产。中国革命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毛泽东思想是真理，粉碎了资产阶级理论和党内的机会主义。历史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新思想、新结论、新观点，都必须经过社会实践的证实，才能成为真理。过去如此，现在和将来还是如此。

(二)

马克思主义的导师提出了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并自觉运用实践标准检验自己的理论，发展理论，以至修改个别结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从认识发展的过程来说，就是从实践获得理论、用实践检验理论、用理论指导实践的历史。

⑦

自己的

现在来看看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根据实践来检验《共产党宣言》的。1848年《宣言》发表后，他们在45年中一直根据实践来检验《宣言》，

《宣言》的七篇序言就是生动的说明。1872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文版序言》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第228页）这是根据25年阶级斗争实践检验的结

论。从那以后，到现在又过去了100多年，世界

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继续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在7篇《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总结了一系列的新经验，还根据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和新的事实材料，对个别结论作了修改。这里举一个例

①

了，实践证明，这个结论仍然是正确的，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实践检验，

子。《宣言》第一章的第一句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恩格斯在1888年的《宣言》英文版上加了一条注释：

《宣言》中的

“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状态，全部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完全没有人知道。后来，哈克斯特豪森发现了俄国的土地公有制，毛勒证明了这种所有制是一切条顿族的历史发展所由起始的社会基础，而且人们逐渐发现，土地公有的村社是从印

度起到爱尔兰止各地社会的原始形态。最后，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真正本质及其对部落的关系，这一卓绝发现把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揭示出来了。随着这种原始公社的解体，社会开始分裂为各个独特的、终于彼此对立的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1页）这个为恩格斯后来多次谈到的重要修改，把上百万年的无阶级社会与几千年的阶级社会区别开来了，说明了阶级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对《宣言》的态度，表明他们并不认为

⑤

为自己的学说一开头就是完善的，决没有把它看作“绝对真理”，而始终用辩证法观点严肃地看待自己的学说，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毫无偏见，尊重实践，尊重事实，尊重科学，是他们唯一的态度。他们虚心吸取别人的科学成果，包括资产阶级学者所提供的事实材料。他们提出了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并身体力行，始终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才是科学真理，才能不断发展，永葆青春。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实践标准，就是科学态度，否认实践标准，就会陷入蒙昧主义。毛主席指出：“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实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9页）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就是承认我们的认识可能犯错误，需要由实践来检验或纠正。如果认为认识是不犯错误的，也就取消了实践标准。

又指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结果必然要犯更大的错误。

也就取消了实践标准。

(三)

机会主义以理论与实践相分裂为特征。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王明、林彪、王张江姚“四人帮”表现得尤其突出。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唱得最响，反对马克思主义最为猖狂。他们都否认马克思主义来源于实践，否认马克思主义要在实践中受检验，在实践中丰富、发展。王明反对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否认理论与实践统一，把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当作教条。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批判王明说：“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词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那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8页）王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别词句当作宗教教条，使中国革命面临绝境。只是毛主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对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才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

30多年后，林彪反党集团和王张江姚“四人帮”搞得比王明还凶。叛徒林彪鼓吹天才论，否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源于三大革命实践，宣扬“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否认毛主席的指示需要到实践中检验、丰富和发展，反对实践标准。毛主席痛斥了林彪的唯心论和先验

论。

与林彪合伙的“四人帮”，唯心主义横行，疯狂反对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根本否认实践标准。姚文元攻击“存在第一、思维第二，客观第一、主观第二”是“反动的形而上学”，宣扬精神第一的唯心主义，完全否认了理论来源于实践，否认了理论要受实践检验。他还宣扬“没有审美能力，也就无所谓美丑之别”的谬论，把主观意识当作区别美丑的标准。张春桥公开鼓吹“认识——实践——再认识”、“理论——实践——再上升为理论”的反动公式，更是明目张胆地反对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检验真理的标准。“四人帮”鼓吹“反经验主义为纲”，否认实践经验，把广大干部、广大群众的实践经验污蔑为“陈规旧习”。他们摘取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作为论证工具。尤其反动的是，“四人帮”肆意歪曲和篡改毛泽东思想，抛弃毛泽东思想体系，把毛主席的一言半语当作宗教教条，到处吓人、打人。“四人帮”背叛实践标准，迷信“强权即真理”、“造谣一千遍就是真理”的法西斯哲学，使用他们控制的宣传机器，大造反革命舆论，把实践中证明了的真理攻击为修正主义，把在实践中破产了的东西吹捧为真理；全盘否定解放后17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全盘否定毛主席亲自缔造的中国共产党的50多年的伟大实践，篡改历史、颠倒是非、捏造罪名、制造谣言，陷害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革命同志。“四人帮”的真理标准就是他们篡党夺权的野心。但是，实践标准是客观的，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不仅是证实真理的最有力的手段，也是宣判修正主义和一切谬论死刑的最高权威。在亿万人民的革命实践面前，“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彻底破产了，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1978年2月2日《实》文的第三次改样

哲(四五—)七八、一、十四，一、二十六改，

一、三十，二改，二、二，三改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送审稿)

胡福明

1845年，马克思在创立新世界观时，就提出了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不能在思维的范围内解决，不能靠理论争论解决，只能靠社会实践的检验来解决。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它的一个特征。

（一）

实践检验真理，就是人们运用关于事物的理论去指导实践，改造客观事物，一般地说，如果在实践中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取得了胜利，那就证明这个理论符合客观规律，是真理；如果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失败了，那就证明这个理论不符合客观规律，是错误的理论。这就是实践检验真理

的含义。自然，实践标准也是辩证的。列宁说：“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这种观点必然会导致唯物主义，而把教授的经院哲学的无数臆说一脚踢开。当然，在这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列宁选集》第2卷第142页）实践是发展的。每个时代的社会实践都有历史局限性。因此，每个时代都有一些理论问题是当时的实践既不能证实，又不能否定的。但是，今天的实践回答不了的，以后的实践终究会回答它。任何理论，是真理还是谬论，归根到底要由社会实践来检验。只有社会实践才能彻底粉碎唯心论、不可知论和其他一切谬论。只有社会实践才能树立真理的权威。

毛主席指出：“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3页）这就告诉我们，不仅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大规模的宣传证明不了真理，许多人的赞成证明不了真理，强大的权力证明不了真理，要证明它，只能靠广大群众的革命实践。而且已被过去实践证明了的真理，在情况变化了的今天来看，未必还是真理。比如，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在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的结论，与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结论，都是真理，前者是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讲的，后者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讲的。情况不同，结论也不同，不能用前者检验后者，它们都要由实践来检验。十月革命是大城市武装起义取得胜利的，中国的机会主义者以此为根据，要在中国搞大城市武装起义，结果总是失败，后来，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道路，结

果胜利了。这同样证明，理论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如果把理论当成检验的标准，这是形而上学，只能导致唯心主义。坚持实践标准，就是坚持辩证唯物论。

毛主席指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7页）不管是自然科学理论，还是社会科学理论，都必须经过实践证明，才算真理，才算科学。以自然科学为例，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在300年里一直是一种假说，尽管这个假说具有99%、99.9%、99.99%的可靠性，但在实践证实以前毕竟是一种假说，并不是真理；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加勒于1846年确实发现了海王星这颗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才被证实了，成了真理。那么，马克思主义要不要经过实践检验呢？同样必须经过社会实践检验，而且确实经过了千百万群众的长期实践的证实。毛主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辩证唯物论之所以为普遍真理，在于经过无论什么人的实践都不能逃出它的范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9页）马克思主义原是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派别，开始并不出名，反对派围攻它，资产阶级学者反对它，其他的社会主义流派攻击它，但是，长期的革命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终于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20世纪初，第二国际的头面人物是考茨基，列宁主义者是少数派。但是，十月革命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证明列宁主义是真理，宣告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破产。中国革命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毛泽东思想的真理，粉碎了资产阶级理论和党内的机会主义。历史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新思想、新结论、新观点，都必须经过社会实践的证实，才能成为真理。过去如此，现在和将来还是如此。

(二)

马克思主义的导师提出了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并自觉运用它检验自己的理论，发展自己的理论，以至修改个别结论。现在来看看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根据实践来检验《共产党宣言》的。1848年《宣言》发表后，他们在45年中一直根据实践来检验《宣言》，《宣言》的七篇序言就是生动的说明。1872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文版序言》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8页）这是根据25年阶级斗争实践检验的结论。现在，又过去100多年了，实践证明，这个结论仍然是正确的，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实践检验，对《宣言》中的个别结论作了修改。这里举一个例子。《宣言》第一章的第一句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恩格斯在1888年的《宣言》英文版上加了一条注释：“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状态，全部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完全没有人知道。后来，哈克斯特豪森发现了俄国的土地公有制，毛勒证明了这种所有制是一切条顿族的历史发展所由起始的社会基础，而且人们逐渐发现，土地公有的村社是从印度起到爱尔兰止各地社会的原始形态。最后，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真正本质及其对部落的关系，这一卓绝发现把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揭示出来了。随着这种原始公社的解体，社会开始分裂为各个独特的、终于彼此对立的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1页）这个为恩格斯后来多次谈到的重要修改，把上百万年的无阶级社会与几千年的阶级社会区别开来了，说明了阶级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对《宣言》的态度，表明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学说一开头就是完美的，决没有把它看作“绝对真理”，而始终用辩证法观点严肃地看待自己的学说，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毫无偏见，尊重实践，尊重事实，尊重科学，是他们唯一的态度。他们虚心吸取别人的科学成果，包括资产阶级学者所提供的事实材料。坚持实践标准，就是科学态度，否认实践标准，就会陷入蒙昧主义。毛主席指出：“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的不完全性，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

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又指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9页）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就是承认我们的认识可能犯错误，需要由实践来检验或纠正。如果认为认识是不犯错误的，也就取消了实践标准，结果必然要犯更大的错误。

（三）

机会主义以理论与实践相分裂为特征。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王明、林彪、“四人帮”表现得尤其突出。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唱得最响亮，反对马克思主义也最猖狂。他们都否认马克思主义来源于实践，否认马克思主义要在实践中受检验，在实践中丰富、发展。王明反对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否认理论与实践统一，把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当作教条，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批判王明说：“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词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那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8页）王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别词句当作宗教教条，来指导革命，结果把中国革命引向绝境。只是毛主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对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才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

30多年后，林彪反党集团和王张江姚“四人帮”搞得比王明还凶。叛徒林彪鼓吹天才论，否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源于三大革命实践，宣扬“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否认毛主席的指示需要到实践中检验、丰富和发展，反对实践标准。毛主席痛斥了林彪的唯心论和先验论。

与林彪合伙的“四人帮”，唯心主义横行，疯狂反对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根本否认实践标准。姚文元攻击“存在第一、思维第二，客

10年间，“四人帮”、主观唯心主义横行，搞乱了理论，毒化了思想，严重破坏了党的优良作风，他们乱扣帽子，乱打棍子，到处设置禁区，给人套上枷锁。所以至今仍有一些同志，做工作，解决问题，既不总结实践经验，又不倾听群众意见，从概念出发，从原则出发，不问具体历史条件，把个别词句奉为教条，生搬硬套；遇到新情况、新问题，不去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个别词句作为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敢从实践中，引出新结论；判断是非，不以实践为标准，不拿事实作根据，而用片言只语作准则，总之，心有余悸，忘记了毛主席谆谆教导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为了个别词句而牺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根本，搞坏了工作，损坏了革命。因此我们必须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继续深入揭批“四人帮”，解放思想，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理论与实践结合，实事求是，把我们的工作做好。

观第一、主观第二”是“反动的形而上学”，宣扬精神第一的唯心主义，完全否认了理论来源于实践，否认了理论要受实践检验。张春桥公开鼓吹“认识——实践——再认识”、“理论——实践——再上升为理论”的反动公式，更是明目张胆地反对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检验真理的标准。

“四人帮”鼓吹“反经验主义为纲”，否认实践经验；把广大干部、广大群众的实践经验污蔑为“陈规旧习”。他们摘取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作为论证工具。尤其反动的是，“四人帮”肆意歪曲和篡改毛泽东思想，抛弃毛泽东思想体系，把毛主席的一言半语当作宗教教条，到处吓人、打人。“四人帮”背叛实践标准，迷信“强权即真理”、“造谣一千遍就是真理”的法西斯哲学，使用他们控制的宣传机器，大造反革命舆论，把实践中证明了的真理攻击为修正主义，把在实践中破产了的东西吹捧为真理；全盘否定解放后17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全盘否定毛主席亲自缔造的中国共产党的50多年的伟大实践，篡改历史、颠倒是非、捏造罪名、制造谣言，陷害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革命同志。“四人帮”的真理标准就是他们篡党夺权的野心。但是，实践标准是客观的，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不仅是证实真理的最有力的手段，也是宣判修正主义和一切谬论死刑的最高权威。在亿万人民的革命实践面前，“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彻底破产了，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1978年3月20日《实》文的第四次改样

哲(四五一)七八、一、十四，一、二十六改，
一、三十，二改，二、二，三改，三、二十，四改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一切

(送审稿)

胡福明

1845年，马克思在创立新世界观时，就提出了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不能在思维的范围内解决，不能靠理论争论解决，只能靠社会实践的检验来解决。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它的一个特征。

(一)

实践检验真理，就是人们运用关于事物的理论去指导实践，改造客观事物，一般地说，

当

时

如果在实践中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取得了胜利，那就证明这个理论符合客观规律，是真理；如果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失败了，那就证明这个理论不符合客观规律，是错误的理论。这就是实践检验真理的含义。自然，实践标准也是辩证的。列宁说：“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这种观点必然会导致唯物主义，而把教授的经院哲学的无数臆说一脚踢开。当然，在这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列宁选集》第2卷第142页）实践是发展的。每个时代的社会实践都有历史局限性。因此，每个时代都有一些理论问题是当时的实践既不能证实，又不能否定的。但是，今天的实践回答不了的，以后的实践终究会回答它。任何理论，是真理还是谬论，归根到底要由社会实践来检验。只有社会实践才能彻底粉碎唯心论、不可知论和其他一切谬论。只有社会实践才能树立真理的权威。

毛主席指出：“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3页）

《新民主主义论》

这就告诉我们，不仅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大规模的宣传证明不了真理，许多人的赞成证明不了真理，强大的权力证明不了真理，要证明它，只能靠广大群众的革命实践。而且已被过去实践

证明了的真理，在情况变化了的今天来看，未必还是真理。比如，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在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的结论，与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结论，都是真理，前者是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讲的，后者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讲的。情况不同，结论也不同，不能用前者检验后者，它们都要由实践来检验。十月革命是大城市武装起义取得胜利的，中国的机会主义者以此为根据，要在中国搞大城市武装起义，结果总是失败，后来，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道路，结果胜利了。这同样说明，理论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如果把理论当成检验的标准，这是形而上学，只能导致唯心主义。坚持实践标准，就是坚持辩证唯物论。

毛主席指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7页）不管是自然科学理论，还是社会科学理论，都必须经过实践证明，才算真理，才算科学。以自然科学为例，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在300年里一直是一种假说，尽管这个假说具有99%、99.9%、99.99%的可靠性，但在实践证实以前毕竟是一种假说，并不是真理；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加勒于1846年确实发现了海王星这颗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才被证实了，成了真理。那么，马克思主义要不要经过实践检验呢？同样必须经过社会实践检验，而且确实经过了千百万群众的长期实践的证实。毛主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

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辩证唯物论之所以为普遍真理，在于经过无论什么人的实践都

《实践论》

不能逃出它的范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

269页）马克思主义原是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派别，

开始并不出名，反动派围攻它，资产阶级学者反对它，其他的社会主义流派攻击它，但是，长期的革命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终于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20世纪初，第二国际的头面人物是考茨基，列宁主义者是少数派。但是，十月革命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证明列宁主义是真理，宣告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破产。中国革命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毛泽东思想是真理，粉碎了资产阶级理论和党内的机会主义。历史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新思想、新结论、新观点，都必须经过社会实践的证实，才能成为真理。过去如此，现在和将来还是如此。

（二）

马克思主义的导师提出了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并自觉运用它检验自己的理论，发展自己的理论，以至修改个别结论。现在来看看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根据实践来检验《共产党宣言》的。1848年《宣言》发表后，他们在45年中一直根据实践来检验《宣言》，《宣言》的七篇序言就是生动的说明。1872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文版序言》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8页）

这是根据25年阶级斗争实践检验的结论。现在，又过去100多年了，实践证明，这个结论仍然是正确的，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实践检验，对《宣言》中的个别结论作了修改。这里举一个例子。《宣言》第一章的第一句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恩格斯在1888年的《宣言》英文版上加了一条注释：“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状态，全部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完全没有人知道。后来，哈克斯特豪森发现了俄国的土地公有制，毛勒证明了这种所有制是一切条顿族的历史发展所由起始的社会基础，而且人们逐渐发现，土地公有制的村社是从印度起到爱尔兰止各地社会的原始形态。最后，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真正本质及其对部落的关系，这一卓绝发现把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揭示出来了。随着这种原始公社的解体，社会开始分裂为各个独特的、终于彼此对立的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1页）这个为恩格斯后来多次谈到的重要修改，把上百万年的无阶级社会与几千年的阶级社会区别开来了，说明了阶级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对《宣言》的态度，表明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学说一开头就是完美的，决没有把它看作“绝对真理”，而始终用辩证法观点严肃地看待自己的学说，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毫无偏见，尊重实践，尊重事实，尊重科学，是他们唯一的态度。他们虚心吸取别人的科学成果，包括资产阶级学者所提供的事实材料。坚持实践标准，就是科学态度，否认实践标准，就会陷入蒙昧主义。毛主席指出：“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的不完全性，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又指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

《实践论》

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269页）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

准，就是承认我们的认识可能犯错误，需要由实

践来检验或纠正。如果认为认识是不犯错误的，

也就取消了实践标准，结果必然要犯更大的错

误。

会

马克思主义也正是在实践检验过程中不断发展的，

不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还是我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

(三)

机会主义以理论与实践相分裂为特征。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王明、林彪、“四人帮”表现得尤其突出。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唱得最响亮，反对马克思主义也最猖狂。他们都否认马克思主义来源于实践，否认马克思主义要在实践中受检验，在实践中丰富、发展。王明反对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否认理论与实践统一，把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当作教条，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批判王明说：“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词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那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

《整顿党的作风》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8页）王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别词句当作宗教教条，来指导革命，结果把中国革命引向绝境。只是毛主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对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取得了胜

利，才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

30多年后，林彪反党集团和王张江姚“四人帮”搞得比王明还凶。叛徒林彪鼓吹天才论，否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源于三大革命实践，宣扬“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否认毛主席的指示需要到实践中检验、丰富和发展，反对实践标准。毛主席痛斥了林彪的唯心论的先验论。

，把个别词句当成一根根打人的棍子。

“立竿见影”。

与林彪合伙的“四人帮”，唯心主义横行，疯狂反对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根本否认实践标准。姚文元攻击“存在第一、思维第二，客观第一、主观第二”是“反动的形而上学”，宣扬精神第一的唯心主义，完全否认了理论来源于实践，否认了理论要受实践检验。张春桥公开鼓吹“认识——实践——再认识”、“理论——实践——再上升为理论”的反动公式，更是明目张胆地反对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检验真理的标准。“四人帮”鼓吹“反经验主义为纲”，否认实践经验；把广大干部、广大群众的实践经验污蔑为“陈规旧习”。他们摘取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作为论证工具。尤其反动的是，“四人帮”肆意歪曲和篡改毛泽东思想，抛弃毛泽东思想体系，把毛主席的一言半语当作宗教教条，到处吓人、打人。“四人帮”背叛实践标准，迷信“强权即真理”、“造谣一千遍就是真理”的法西斯哲学，使用他们控制的宣传机器，大造反革命舆论，把实践中证明了的真理攻击为修正主义，把在实践中破产了的东西吹捧为真理；

肆意践踏

全盘否定解放后17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全盘否定毛主席亲自缔造的中国共产党的50多年的伟大实践，篡改历史、颠倒是非、捏造罪名、制造谣言，陷害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革命同志。“四人帮”

马克思主义；

公然

的真理标准就是他们篡党夺权的野心。但是，实践标准是客观的，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不仅是证实真理的最有力的手段，也是宣判修正主义和一切谬论死刑的最高权威。在亿万人民的革命实践面前，“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彻底

这样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伟大的

破产了，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现在“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被彻底摧毁，但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四人帮”在革命队伍中间造成的心有余悸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毛主席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曾经批评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教条主义倾向依然存在。我们有些同志在工作中碰到了问题，往往不是去研究实际而是从革命导师的著作中寻章摘句；我们有些同志阅读一篇分析实际情况得出正确结论的文章时，往往因为文中没有引用革命导师的某些话而怀疑文章是不是有问题；我们有些同志在办事的时候，往往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概念出发，从原则出发，等等。因此，我们应当重温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应当着重学习革命导师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教导，重温毛主席关于要从实际出发的教导，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坚持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逐步地彻底地肃清“四人帮”主观唯心主义造成的种种影响和流毒，以便真正能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为完成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

10年间，“四人帮”、主观唯心主义横行，搞乱了理论，毒化了思想，严重破坏了党的优良作风，他们乱扣帽子，乱打棍子，到处设置禁区，给人套上枷锁。所以至今仍有一些同志，做工作，解决问题，既不总结实践经验，又不倾听群众意见，从概念出发，从原则出发，不问具体历史条件，把个别词句奉为教条，生搬硬套；遇到新情况、新问题，不去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进行调查研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个别词句作为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敢从实践中，引出新结论；判断是非，不以实践为标准，不拿事实作根据，而用片言只语作准则，总之，心有余悸，忘记了毛主席谆谆教导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为了个别词句而牺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根本，搞坏了工作，损坏了革命。因此我们必须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继续深入揭批“四人帮”，解放思想，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理论与实践结合，实事求是，把我们的工作做好。

1978年4月4日《实》文的第五次改样

哲(四五—)七八、一、十四，一、二十六改，一、三十，二改，

二、二，三改，三、二十，四改，四、四，五改，

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

(送审稿)

胡福明

1845年，马克思在创立新世界观时，就提出了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不能在思维的范围内解决，不能靠理论争论解决，只能靠社会实践的检验来解决。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它的一个特征。

(一)

当人们运用关于事物的理论去指导实践，改造客观事物时，一般地说，如果在实践中达到了

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个问题早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解决了的。但是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的破坏，特别是他们控制下的舆论工具进行了大量的歪曲宣传，把这个问题又搞得混乱不堪。为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有必要重温革命导师的有关论述，学习革命导师的伟大实践，批判“四人帮”的反动理论，进一步提高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标准问题

毛主席进一步指出：“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

(《新民主主义论》)这就告诉我们，

“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另立标准，疯狂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炮制了许多反动谬论、“规律”，操纵手中的舆论工具大肆鼓吹，说成是绝对正确的“真理”。但是，这些五花八门的谬论、“规律”，根本经不起革命实践的检验，一个个都像吹起的肥皂泡那样很快破灭了。这个事实雄辩地说明了，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大规模的宣传证明不了真理，强大的权力证明不了真理，只有千百万人民的实践才能证明真理。

实践是不断发展的，理论也总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因此，那些已被过去证明了的真理，也不能作为今天检验真理的标准。

我们不仅承认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而且要从发展的观点看待实践的标准。列宁说得好：

预期的目的，取得了胜利，那就证明这个理论符合客观规律，是真理；如果在实践中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失败了，那就证明这个理论不符合客观规律，是错误的理论。这就是实践检验真理的含义。自然，实践标准也是辩证的。列宁说：

“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这种观点必然会导致唯物主义，而把教授的经院哲学的无数臆说一脚踢开。当然，在这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

(《列宁选集》第2卷第142页)实践是发展的。每个时代的社会实践都有历史局限性。因此，每个时代都有一些理论问题是当时的实践既不能证实，又不能否定的。但是，今天的实践回答不了的，以后的实践终究会回答它。任何理论，是真不是理还是谬论，归根到底要由社会实践来检验。只有社会实践才能彻底粉碎唯心论、不可知论和其他一切谬论。只有社会实践才能树立真理的权威。

毛主席指出：“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这就告诉我们，不仅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大规模的宣传证明不了真理，许多人的赞成证明不了真理，强大的权力证明不了真理，要证明它，只能靠广大群众的革命实践。而且已被过去实践证明了的真理，

在情况变化了的今天来看，未必还是真理。比

如，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在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的结论，与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结论，都是真理，前者是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讲的，后者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讲的。情况不同，结论也不同，不能用前者检验后者，它们都要由实践来检验。十月革命是大城

市武装起义取得胜利的，中国的机会主义者以此为根据，要在中国搞大城市武装起义，结果总是失败，后来，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道路，结果胜利了。这同样说明，理论

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如果把理论当成检验真理的

标准，这是形而上学，只能导致唯心主义。坚持实践标准，就是坚持辩证唯物论。

总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归根到底

毛主席指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7页）不管是自然科学理论，还是社会科学理论，都必须经过实践证明，才算真理，才算科学。以自然科学为例，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在300年里一直是一种假说，尽管这个假说具有99%、99.9%、99.99%的可靠性，但在实践证实以前毕竟是一种假说，并不是真理；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加勒于1846年确实发现了海

王星这颗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才被证实了，成了真理。那么，马克思主义要不要经过实践检验呢？同样必须经过社会实践检验，而且确实经过了千百万群众的长期实践的证实。毛主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辩证唯物论之所以为普遍真理，在于经过无论什么人的实践都不能逃出它的范围。”（《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原是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派别，开始并不出名，反动派围攻它，资产阶级学者反对它，其他的社会主义流派攻击它，但是，长期的革命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终于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20世纪初，第二国际的头面人物是考茨基，列宁主义者是少数派。但是，十月革命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证明列宁主义是真理，宣告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破产。中国革命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毛泽东思想是真理，粉碎了资产阶级理论和党内的机会主义。历史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新思想、新结论、新观点，都必须经过社会实践的证实，才能成为真理。过去如此，现在和将来还是如此。

是

想、新结论、新观点，都必须经过社会实践的证实，才能成为真理。过去如此，现在和将来还是如此。

和

如此，

（二）

马克思主义的导师提出了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并自觉运用它检验自己的理论，发展自己的理论，以至修改个别结论。现在来看看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根据实践来检验《共产党宣言》的。1848年《宣言》发表后，他们在45年中一直根据实践来检验《宣言》，《宣言》的七篇序言就是生动的说明。1872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文版序言》指出：

其中包括修改《宣言》中的个别结论。

“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8页）这是根据25

年阶级斗争实践检验的结论。现在，又过去100多年，实践证明，这个结论仍然是正确的，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实践检验，对《宣言》中的个别结论作了修改。这里举一个例子。

《宣言》第一章的第一句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恩格斯在1888年的《宣言》英文版上加了一条注释：“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状态，全部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完全没有人知道。后来，哈克斯特豪森发现了俄国的土地公有制，毛勒证明了这种所有制是一切条顿族的历史发展所由起始的社会基础，而且人们逐渐发现，土地公有的村社是从印度起到爱尔兰止各地社会的原始形态。最后，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真正本质及其对部落的关系，这一卓绝发现把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揭示出来了。随着这种原始公社的解体，社会开始分裂为各个独特的、终于彼此对立的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1页）这个为恩格斯后来多次谈到的重要修改，把上百万年的无阶级社会与几千年的阶级社会区别开来了，说明了阶级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对《宣言》的态度，表明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学说一开头就是完美的，决没有把它看作“绝对真理”，而始终用辩证法观点严肃地看待自己的学说，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毫无偏见，尊重实践，尊重事实，尊重科学，是他们唯一的态度。他们虚心吸取别人的科学成果，包括资产阶级学者所提供的事实材料。坚持实践标准，就是科学态度，否认实践标准，就会陷入蒙昧主义。毛主席指出：“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又指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

一次完成的

强调在实践中对于真理
的认识永远没有完结，

不可能一次完成，就
是承认由于历史的、
认识的和阶级的局限
性，我们的认识

丰富和

的道路。”（《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是
检验真理的标准，就是承认我们的认识可能犯错
误，需要由实践来检验或纠正。马克思主义也正
是在实践检验过程中不断发展的。如果认为认识
是不会犯错误的，也就取消了实践标准，结果必
然要犯更大的错误。不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
历史，还是我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都无可辩
驳地证明了这一点。

（三）

和

机会主义以理论与实践相分裂为特征。在
我们党的历史上，王明、林彪、“四人帮”表现
得尤其突出。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唱得最响
亮，反对马克思主义也最猖狂。他们都否认马克
思主义来源于实践，否认马克思主义要在实践中
受检验，在实践中丰富发展。王明反对实事求
是、调查研究，否认理论与实践统一，把马克思
主义的个别词句当作教条，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批
判王明说：“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马克
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
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
胜利的科学。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把马克思
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词句看作现成的灵丹
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
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
该作启蒙运动。那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
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整
顿党的作风》）王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别词
句当作宗教教条，来指导革命，结果把中国革命
引向绝境。只是毛主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对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才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

30多年后，林彪反党集团和王张江姚“四人帮”搞得比王明还凶，把个别词句当成一根根打人的棍子。叛徒林彪鼓吹天才论，否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源于三大革命实践，宣扬“立竿见影”、“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大搞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伎俩，

经过歪曲和篡改了的

否认毛主席的指示需要到实践中检验、丰富和发展，反对实践标准。毛主席痛斥了林彪的唯心论的先验论。

与林彪合伙的“四人帮”，唯心主义横行，疯狂反对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根本否认实践标准。姚文元攻击“存在第一、思维第二，客观第一、主观第二”是“反动的形而上学”，宣扬精神第一的唯心主义，完全否认了理论来源于实践，否认了理论要受实践检验。张春桥公开鼓吹“认识——实践——再认识”、“理论——实践——再上升为理论”的反动公式，更是明目张胆地反对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检验真理的标准。“四人帮”鼓吹“反经验主义为纲”，否认实践经验；把广大干部、广大群众的实践经验污蔑为“陈规旧习”。他们摘取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作为论证工具。尤其反动的是，“四人帮”肆意歪曲和篡改毛泽东思想，抛弃毛泽东思想体系，把毛主席的一言半语当作宗教教条，到处吓人、打人。“四人帮”肆意践踏实践标准，迷信

乱套用以

“强权即真理”、“造谣一千遍就是真理”的法西斯哲学，使用他们控制的宣传机器，大造反革命舆论，把在实践中证明了的真理攻击为修正主义，把实践中破产了的东西吹捧为马克思主义；全盘否定解放后17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全盘否定毛主席亲自缔造的中国共产党的50多年的伟大实践，篡改历史、颠倒是非、捏造罪名、制造谣言，公然陷害周总理这样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四人帮”的真理标准就是他们篡党夺权的野心。但是，实践标准是客观的，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不仅是

在

证实真理的最有力的手段，也是宣判修正主义和一切谬论死刑的最高权威。在亿万人民的革命实践面前，“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彻底破产了，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现在“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被彻底摧毁，但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四人帮”在革命队伍中间造成的心有余悸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毛主席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时曾经批评的这种“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教条主义倾向依然存在。我们有些同志在工作中碰到了问题，往往^时不是去研究实际而是从革命导师的著作中寻章摘句；我们有些同志阅读一篇分析实际情况得出正确结论的文章时，往往因为文中没有引用革命导师的某些话而怀疑文章是不是有问题；我们有些同志在办事的时候，往往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概念出发，从原则出发，等等。因此，我们应当重温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应当着重学习革命导师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教导，重温毛主席关于^要从实际出发的教导，完整地、准确地^{学习}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坚持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逐步地彻底地肃清“四人帮”主观唯心主义造成的种种影响和流毒，以便真正能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为完成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

，寻求答案？在判断一篇文章是否正确时，首先是分析这篇文章是不是符合实际情况，还是着眼于文中有没有引用革命导师的某些语录？在处理某件事情时，首先是从实际出发，还是从概念出发，从原则出发？等等。这些都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思想路线，也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学风。华主席号召我们：“要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到新的水平。”

办事情

1978年4月14日《实》文的第六次改样

1978年4月13日，杨西光召集作者胡福明、
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
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马沛文和编辑王强华讨论后，
胡的初步修改稿。

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

胡福明

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个问题早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解决了的。但是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的破坏，特别是他们控制下的舆论工具进行了大量的歪曲宣传，把这个问题又搞得混乱不堪。为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有必要重温革命导师的有关论述，学习革命导师的伟大实践，批判“四人帮”的反动理论，进一步提高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坚持实践标准，以区别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分清路线是非，完整的准确的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解放思想，冲破禁区，

(一)

1845年，马克思在创立新世界观时，就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毛主席进一步指出：“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以实践为基础，认为一切正确的理论都来源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真理是正确反映客观实际的理论，凡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理论就不是真理。怎样区别真理与谬误呢？

实践检验理论，就是用理论去指导实践，一般说，达到预期的目的，就证明理论符合客观实际，是真理；如果失败了，就证明理论不符合客观实际，是错误的。只有实践才能回答理论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问题。实践标准

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这就告诉我们，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不能在思维的范围内解决，不能靠理论争论解决，只能靠社会实践的检验来解决。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它的一个特征。

“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另立标准，疯狂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炮制了许多反动谬论、“规律”，操纵手中的舆论工具大肆鼓吹，说成是绝对正确的“真理”。但是，这些五花八门的谬论、“规律”，根本经不起革命实践的检验，一个个都像吹起的肥皂泡那样很快破灭了。这个事实雄辩地说明了，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大规模的宣传证明不了真理，强大的权力证明不了真理，只有千百万人民的实践才能证明真理。

例如，他们炮制“天才论”，捏造文艺、教育等各条战线的“黑线专政”论，伪造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必然变成走资派的“规律”，胡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基础”的谬论，虚构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的无稽之谈，等等。

实践是不断发展的，理论也总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因此，那些已被过去证明了的真理，也不能作为今天检验真理的标准。

我们不仅承认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而且要从发展的观点看待实践的标准。列宁说得好：“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这种观点必然会导致唯物主义，而把教授的经院哲学的无数臆说一脚踢开。当然，在这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

(《列宁选集》第2卷第142页)实践是发展的,每个时代的社会实践都有历史局限性。因此,每个时代都有一些理论问题是当时的实践既不能证实,又不能否定的。但是,今天的实践回答不了的,以后的实践终究会回答它。任何理论,是不是真理归根到底要由社会实践来检验。

比如,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在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的结论,与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结论,都是真理,前者是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讲的,后者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讲的。情况不同,结论也不同,不能用前者检验后者,它们都要由实践来检验。此外十月革命是大城市武装起义取得胜利的,中国的机会主义者以此为根据,要在中国搞大城市武装起义,结果总是失败,后来,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道路,结果胜利了。这说明,理论总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归根到底,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坚持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就是坚持辩证唯物论。

这样的事实,在科学上是屡见不鲜的。门德列捷夫根据原子中的电子数目,制定了元素周期表,有人赞同,有人怀疑,争论不休。尔后,根据元素周期表发现了几种新元素,它们的化学特性刚好符合元素周期表的预测。这样元素周期表就被证实了。火星上有没有生物,这是科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宇宙火箭的探测证明火星上没有生物。在科学研究和实际斗争中,都有许多是非问题,一时解决不了,要留待以后的实践解决。我们常说:让历史来作结论吧。就是讲的实践标准的辩证性。

毛主席指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7页)不管是自然科学理论,还是社会科学理论,都必须经过实践证明,才算真理,才算科学。以自然科学为例,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在300年里一直是一种假说,尽管这个假说具有99%、99.9%、99.99%的可靠性,但在实践证实以前毕竟是一

(二)
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没有例外。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各国革命的路线是否正确，同样必须由社会实践来检验。凡是经过社会实践证实、指引革命胜利的路线，就是正确路线；凡是破坏革命的路线，就是错误路线。20世纪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俄国工人运动中，都发生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激烈斗争，那时第二国际的头面人物是考茨基，列宁主义者是少数，斗争持续了很长一个时间，俄国十月革命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证明列宁主义是真理，宣告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破产。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在一个时期内，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占主导地位。长期的革命斗争，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正确的，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都是错误的。于是，毛泽东思想成了全党的指导思想。历史告诉我们，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都是通过实践来鉴定的，也只能通过实践来检验。

(接下页)

种假说，并不是真理；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加勒于1846年确实发现了海王星这颗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才被证实了，成了真理。那么，马克思主义要不要经过实践检验呢？同样必须经过社会实践检验，而且确实经过了千百万群众的长期实践的证实。毛主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辩证唯物论之所以为普遍真理，在于经过无论什么人的实践都不能逃出它的范围。”（《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原是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派别，开始并不出名，反动派围攻它，资产阶级学者反对它，其他的社会主义流派攻击它，但是，长期的革命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终于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20世纪初，第二国际的头面人物是考茨基，列宁主义者是少数派。但是，十月革命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证明列宁主义是真理，宣告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破产。中国革命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毛泽东思想是真理，粉碎了资产阶级理论和党内的机会主义。历史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新思想、新结论、新观点，都是经过社会实践的证实，才成为真理的。过去和现在如此，将来还是如此。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别无其他标准。有人说检验真理有两个标准：一个是实践，一个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错误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科学真理，因为经过了长期实践的证明。当我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批判修正主义时，也就是用已有的实践经验去批判修正主义，而且这种批判还必须结合大量的事实分析，不仅是引证语录。光引证语录而不以事实作根据，不研究实践经验，是驳不倒修正主义的。举例说，我们用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学说去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和平过渡的谬论，是应当的，因为全世界各国的革命实践反复证明暴力革命学说是真理，粉碎了“和平过渡”的谬论。自然科学中也有类似现象。现在如果有人说生物的物种是永恒不变的，那么我们就用达尔文的进化论去反对它，这是因为实践早已证明达尔文进化论的正确，否定了物种不变的错误观点。我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批判修正主义，或者用自然科学理论反对错误观点，都不过是用已有的实践经验作根据罢了，而且这种斗争还必须分析历史的和现实的大量事实，才不致流入空洞的说教。可是，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的，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就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新事物、新问题，不断提出新的观点和理论。这些新的观点和理论由什么来检验呢？不能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检验，而只能用实践来检验。因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没有穷尽真理。例如，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说，是一个新的结论，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一般理论去检验，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实践才能证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学说的正确。研究问题的指导思想与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一个问题，是两个问题。真理是具体的，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时代发展了，就会出现新的结论代替旧的结论，新结论是否正确要由实践来证明。例如，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结论，代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在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的科学结论，由什么来证明列宁的新结论呢？十月革命证明列宁的新结论是真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唯物辩证法反映了客观世界的普遍发展规律，对于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为科学发展指明了方向，但它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论证的工具。因为，世界上的各种事物都具有矛盾的特殊性，都有特殊规律，事物内部的特殊矛盾决定事物的本质，要认识事物内部的特殊矛盾，只有依靠实践，要检验是否认识了特殊规律，只有依靠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就是坚持辩证唯物论。把检验真理的标准说成两个，就是二元论，实际上是唯心论。多年里，“四人帮”鼓吹主观唯心论，反对辩证唯物论，否认实践标准，摘取片言只语加以歪曲，以论证其反革命谬论。这种反马克思主义作风流毒深广，那种所谓的语录战就是突出的表现。

(三)

(二)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8页）130年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证明这个结论仍然是正确的。同时，他们根据新的实践经验，发展了自己的学说，并且修改了个别观点。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第251页）

陆续发现土地公有制是世界各地的原始社会的基础。特别是摩尔根在夏威夷岛土著居民中调查研究了几十年，发现了氏族的真正本质及其对部落的关系，揭示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从而证明：在阶级社会以前，有一个很长的无阶级社会；阶级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并非从来就有的。可见，说“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并不确切，因此，恩格斯作了修改。此外，《宣言》还有一个重要修改。马克思恩格斯说：“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已有很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

马克思主义的导师提出了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并自觉运用它检验自己的理论，发展自己的理论，以至修改个别结论。现在来看看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根据实践来检验《共产党宣言》的。1848年《宣言》发表后，他们在45年中一直根据实践来检验《宣言》，《宣言》的七篇序言就是生动的说明。

其中包括修改《宣言》中的个别结论。这里举一个例子。《宣言》第一章的第一句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恩格斯在1888年的《宣言》英文版上加了一条注释：“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

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状态，全部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完全没有人知道；后来，哈克斯特豪森

发现了俄国的土地公有制，毛勒证明了这种所有制是一切条顿族的历史发展所由起始的社会基础，而且人们逐渐发现，土地公有的村社是从印度起到爱尔兰止各地社会的原始形态。最后，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真正本质及其对部落的关系，这一卓绝发现把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揭示出来了。随着这种原始公社的解体，

发现了俄国的土地公有制，毛勒证明了这种所有制是一切条顿族的历史发展所由起始的社会基础，而且人们逐渐发现，土地公有的村社是从印度起到爱尔兰止各地社会的原始形态。最后，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真正本质及其对部落的关系，这一卓绝发现把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揭示出来了。随着这种原始公社的解体，

社会开始分裂为各个独特的、终于彼此对立的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1页）这个为恩格斯后来多次谈到的重要修改，把上百万年的无阶级社会与几千年的阶级社会区别开来了，说明了阶级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马克思、恩格斯对《宣言》的态度，表明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学说一开头就是完美的，决没有把它看作一次完成的“绝对真理”，而始终用辩证法观点严肃地看待自己的学说，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

尊重实践，尊重事实，尊重科学，毫无偏见，是他们唯一的态度。他们虚心吸取别人的科学成果，包括资产阶级学者所提供的事实材料。坚持实践标准，就是科学态度，否认实践标准，就会陷入蒙昧主义。毛主席指出：“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的不完全性，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又指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强调

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个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9页）在《宣言》中说，无产阶级要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以推翻资产阶级。在1848年二月革命和巴黎公社的实践基础上，马克思得出新结论说：无产阶级必须用革命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列宁指出：这是一个“重要的修改。”（《列宁选集》第3卷第201页）

给我们以很大启发。

他们并不认为凡是自己讲过的话都是真理，也不认为凡是自己的结论都要维护。他们处处以实践来检验自己的学说，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马克思恩格斯对待《宣言》的态度告诉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指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基本理论和立场观点方法，并非维护每个字句和个别结论。事实上，要维护马克思恩格斯的每一句话，每个结论，必然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

马克思恩格斯是坚持科学的典范。事实上，人类的认识过程，必然是从不知到知、从不完全不确切的认识到比较完全、比较确切的认识的发展过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强调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永远没有完结，就是承认我们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就是承认由于历史的、认识的和阶级的局限性，我们的认识可能犯错误，需要由实践来检验或纠正。马克思主义也正是在实践检验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如果认为认识是不会犯错误的，也就取消了实践标准，结果必然要犯更大的错误。不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还是我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

(四) (三)

是否完整的准确的掌握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是否正确执行马克思主义路线，都要由实践来检验。实践标准是客观的，你否认它，它仍然起作用。

机会主义以理论与实践相分裂为特征。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王明、林彪、“四人帮”表现得尤其突出。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唱得最响亮，反对马克思主义也最猖狂。他们都否认马克思主义来源于实践，否认马克思主义要在实践中受检验，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王明反对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否认理论与实践统一，把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当作教条，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批判王明说：“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词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那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整顿党的作风》）王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

别词句当作宗教教条，来指导革命，结果把中国革命引向绝境。只是毛主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对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才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

林彪反党集团和王张江姚“四人帮”大搞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伎俩，把经过歪曲和篡改了的个别词句当成一根根打人的棍子。叛徒林彪鼓吹天才论，否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源于三大革命实践，宣扬“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否认毛主席的指示需要到实践中检验、丰富和发展，反对实践标准。毛主席痛斥了林彪的唯心论的先验论。

与林彪合伙的“四人帮”，唯心主义横行，疯狂反对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根本否认实践标准。姚文元攻击“存在第一、思维第二，客观第一、主观第二”是“反动的形而上学”，宣扬精神第一的唯心主义，完全否认了理论来源于实践，否认了理论要受实践检验。张春桥公开鼓吹“认识——实践——再认识”、“理论——实践——再上升为理论”的反动公式，更是明目张胆地反对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检验真理的标准。“四人帮”鼓吹“反经验主义为纲”，否认实践经验；把广大干部、广大群众的实践经验污蔑为“陈规旧习”。他们摘取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作为论证工具。尤其反动的是，“四人帮”歪曲和篡改毛泽东思想，抛弃毛泽东思想体系，把毛主席的一言半语到处乱套用以吓人、打人。“四人帮”肆意践踏实践标准，迷信“强权即真理”、“造谣一千遍就是真理”的法西斯哲学，使用他们控制的宣传机器，大造反革命舆论，把在实践中证明了的真理攻击为修正主义，把在实践中破产了的东西吹捧为马克思主义；全盘否定解放后17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全盘否定毛主席亲自缔造的中国共产党的50多年的伟大实践，篡改历史、颠倒是非、捏造罪名、制造谣言，公然陷害周总理这样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

王明的特点是摘取马列著作的片言只语而阉割马列主义的精神实质，抛弃马列主义的体系。林彪、“四人帮”的特点是摘取毛主席的片言只语而阉割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体系。

，反对科学，鼓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

至今，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都有一些“禁区”。所谓“禁区”，是指那种不准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研究的问题，是指那种不能用实践标准去衡量是非的问题，而只能靠“信仰”去解决。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面前，没有不能调查研究的问题，没有不准研究的“禁区”。科学无禁区。凡是有“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实践标准，就没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有蒙昧主义。“禁区”是“四人帮”设置的，我们必须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武器，冲破“禁区”；冲破“禁区”就是批判“四人帮”的修正主义路线。

判断理论是非和路线是非，以事实作根据，用实践作标准，还是以片言只语为准则？

家。“四人帮”的真理标准就是他们篡党夺权的野心。但是，实践标准是客观的，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不仅是证实真理的最有力的手段，也是宣判修正主义和一切谬论死刑的最高权威。在亿万人民的革命实践面前，“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彻底破产了，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现在，“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被摧毁，但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四人帮”在革命队伍中间造成的心有余悸的问题，也远没有完全解决。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曾经批评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这种倾向依然存在。我们有些同志，在工作中碰到了问题时，首先是去研究实际，还是到革命导师的著作中寻章摘句，寻求答案？在判断一篇文章是否正确时，首先是分析这篇文章是不是符合实际情况，还是着眼于文中有没有引用革命导师的某些语录？在处理某件事情时，首先是从实际出发，还是从概念出发，从原则出发？等等。这些都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思想路线，也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学风。华主席号召我们：“要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到新的水平。”我们应当重温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应当着重学习革命导师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教导，重温毛主席关于办事情要从实际出发的教导，完整地、准确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坚持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逐步地、彻底地肃清“四人帮”主观唯心主义造成的种种影响和流毒，以便真正能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为完成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

1978年4月20日《实》文的第七次改样

经过1978年4月13日讨论，由胡福明同志初步修改后，
又经马沛文、王强华等同志修改的4月20日文章的小样

七八、四、二十改

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

胡福明

唯一

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个问题早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解决了的。但是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的破坏，特别是他们控制下的舆论工具进行了大量的歪曲宣传，把这个问题又搞得混乱不堪。为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有必要重温革命导师的有关论述，学习革命导师的伟大实践，坚持实践标准，以区别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分清路线是非，完整的准确的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解放思想，冲破禁区，批判“四人帮”的反动理论。

深入批判“四人帮”，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拨乱反正，十分必要。

(一)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以实践为基础，认为一切正确的理论都来源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真理是正确反映客观实际的理论，凡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理论就不是真理。怎样区别真理与谬误呢？1845年，马克思在创立新世界观时，就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以有力量，正是由于它们高度概括了实践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并用来指导实践。列宁曾经说过：“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列宁全集》第19卷第1页）这也说明马克思主义是对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向自然斗争和社会斗争经验总结的批判和继承。毛泽东思想也是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正因为这样，我们要非常重视革命理论，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列宁选集》第1卷第328页）理论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来源于实践，又能正确指导实践，不掌握这个精神实质，那是不可能发挥理论的作用的。

非常清楚地

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毛主席进一步指出：“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这就告诉我们，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不能在思维的范围内解决，不能靠理论争论解决，只能靠社会实践的检验来解决。

实践检验理论，就是用理论去指导实践，一般说，达到预期的目的，就证明理论符合客观实际，是真理；如果失败了，就证明理论不符合客观实际，是错误的。只有实践才能回答理论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问题。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它的一个特征。

区别于形形色色唯心论的认识论的一个根本

“四人帮”出于篡党夺

权的反革命需要，另立标准，疯狂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炮制了许多反动谬论、“规律”，操纵手中的舆论工具大肆鼓吹，说成是绝对正确的“真理”。例如，他们

大肆鼓吹种种唯心论的先验论，疯狂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炮制“天才论”，捏造文艺、教育等各条战线的

“黑线专政”论，伪造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

必然变成走资派的“规律”，胡诌社会主义生产

关系“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基础”的

谬论，虚构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的无稽之谈，等

等。但是，这些五花八门的谬论“规律”，根

本经不起革命实践的检验，一个个都像吹起的肥

皂泡那样很快破灭了。这个事实雄辩地说明了，

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大规模的宣传证明不了

真理，强大的权力证明不了真理，只有千百万人

民的实践才能证明真理。

我们不仅承认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而且要从发展的观点看待实践的标准。列宁说得好：

“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

基本的观点。这种观点必然会导致唯物主义，而

把教授的经院哲学的无数臆说一脚踢开。当然，

在这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

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

‘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

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

（《列宁选集》第2卷第142页）实践是发展的，每个

时代的社会实践都有历史局限性。因此，每个

时代都有一些理论问题是当时的实践既不能证实，

又不能否定的。但是，今天的实践回答不了的，以后的实践终究会回答它。任何理论，是不是真理归根到底要由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样的事实，在科学上是屡见不鲜的。门德列捷夫根据原子中的电子数目，制定了元素周期表，有人赞同，有人怀疑，争论不休。尔后，根据元素

“四人帮”手里根本没有真理，他们也就必然没有半点马克思主义，他们

。他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自居，实践证明他们是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政治骗子。

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是这样，自然科学以外的问题也是这样。许多原来被认为正确的东西，经过实践的检验证明是错了，也有许多原来被认为是错误的东西，经过实践的检验证明是对的。

周期表发现了几种新元素，它们的化学特性刚好符合元素周期表的预测。这样元素周期表就被证实了。火星上有没有生物，这是科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宇宙火箭的探测证明火星上没有生物。

在科学研究和实际斗争中，都有许多是非问题，一时解决不了，要留待以后的实践解决。我们常说：让历史来作结论吧。就是讲的实践标准的辩证性。

(二)

毛主席指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7页）不管是自然科学理论，还是社会科学理论，都必须经过实践证明，才算真理，才算科学。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没有例外。以自然科学为例，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在300年里一直是一种假说，尽管这个假说具有99%、99.9%、99.99%的可靠性，但在实践证实以前毕竟是一种假说，并不是真理；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加勒于1846年确实发现了海王星这颗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才被证实了，成了真理。

之所以成为真理，正是

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要不要经过实践检验呢？同样必须经过社会实践检验，而且确实经过了千百万群众的长期实践的证实。毛主席说：“马克思列宁

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辩证唯物论之所以为普遍真理，在于经过无论什么人的实践都不能逃出它的范围。”（《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原是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派别，开始并不出名，反动派围攻它，资产阶级学者反对它，其他的社会主义流派攻击它，但是，长期的革命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终于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和路线、各国革命的路线是否正确，同样必须由社会实践来检验。凡是经过社会实践证实、指引革命胜利的路线，就是正确路线；凡是破坏革命的路线，就是错误路线。

20世纪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俄国工人运动中，都发生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激烈斗争，那时第二国际的头面人物是考茨基，列宁主义者是少数，斗争持续了很长一个时间，俄国十月革命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证明列宁主义是真理，宣告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破产。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在一个时期内，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占主导地位。长期的革命斗争，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正确的，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都是错误的。于是，毛泽东思想^才成了全党的指导思想。历

也许有人会反问，这有什么错呢？当我们碰到一种新的观点、新的学说、新的理论时，不是常常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分析、判断这些观点、学说、理论是对还是错吗？我们说是的。但是，第一，我们用来分析和判断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是经过实践检验证明的真理；第二，我们的分析、判断是否正确，归根到底，也还要受实践的检验。正像毛主席指出的：“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正因为这样，在学术和理论领域，根据毛主席的教导，我们一贯主张“百家争鸣”，“百家争鸣”本身也是一种社会实践。

马、恩、列、斯和毛主席从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中概括起来的理论去批判它，用我们自己的实践经验去批判它。而且这种批判还必须结合大量的事实分析，才有说服力。归根到底，理论和事实都来源于实践。总之

史告诉我们，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都是通过实践来鉴定的，也只能通过实践来检验。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别无其他标准。有人说检验真理有两个标准：一个是实践，一个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错误的。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科学真理，因为经过了长期实践的证明。

当我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批判修正主义时，也就是用已有的实践经验去批判修正主义，而且这种批判还必须结合大量的事实分析，不仅是引证语录。光引证语录而不以事实作根据，不研究实践经验，是驳不倒修正主义的。举例说，我们用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学说去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和平过渡的谬论，是应当的，因为全世界各国的革命实践反复证明暴力革命学说是真理，粉碎了“和平过渡”的谬论。自然科学中也有类似现象。现在如果有人说生物的物种是永恒不变的，那么我们就用达尔文的进化论去反对它，这是因为实践早已证明达尔文进化论的正确，否定了物种不变的错误观点。我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批判修正主义，或者用自然科学理论反对错误观点，都

不过是用已有的实践经验

作根据罢了，而且这种斗争还必须分析历史的和现实的大量事实，才不致流入空洞的说教。可是，

是根据实践经验。而且

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的，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就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新事物、新问题，不断提出新的观点和理论。这些新的观点和理论由什么来检验呢？不能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检验，

只能用实践来检验。

而只能用实践来检验。因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没有穷尽真理。例如，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说，是一个新的结论，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一般理论去检验，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实践才能证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学说的正确。研究问题的指导思想与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一个问题，是两个问题。真理是具体的，

知

对我们有极大的指导意义，但毕竟

，它还需要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发展。

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时代发展了，就会出现新的结论代替旧的结论，新结论是否正确要由实践来证明。例如，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结论，代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在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的

，而

还要继续

科学结论，由什么来证明列宁的新结论呢？十月革命证明列宁的新结论是真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唯物辩证法反映了客观世界的普遍发展规律，对于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为科学发展指明了方向，但它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论证的工具。因为，世界上的各种事物都具有矛盾的特殊性，都有特殊规律，事物内部的特殊矛盾决定事物的本质，要认识事物内部的特殊矛盾，只有依靠实践，要检验是否认识了特

结论的正确性，就是由十月革命的实践证明的。

也

殊规律，只有依靠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就是坚持辩证唯物论。把检验真理的标准说成两个，就是二元论，实际上是唯心论。多年里，“四人帮”鼓吹主观唯心论，反对辩证唯物论，否认实践标准，摘取片言只语加以歪曲，以论证其反革命谬论。这种反马克思主义作风流毒深广，那种所谓的语录战就是突出的表现。

是歪曲马克思主义
的流毒的表现。

(三)

和

马克思主义的导师提出了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并自觉运用它检验自己的理论，发展自己的理论，以至修改个别结论。现在来看看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根据实践来检验《共产党宣言》的。1848年《宣言》发表后，他们在45年中一直根据实践来检验《宣言》，《宣言》的七篇序言就是生动的说明。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8页）130年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证明这个结论仍然是正确的。同时，他们根据新的实践经验，发展了自己的学说，并且修改了个别观点。这里举一个例子。《宣言》第一章的第一句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恩格斯在1888年的《宣言》英文版上加了一条注释：“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1页）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状态，全部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完全没

修改《宣言》的

有人知道；后来，陆续发现土地公有制是世界各地的原始社会的基础。特别是摩尔根在夏威夷岛土著居民中调查研究了几十年，发现了氏族的真正本质及其对部落的关系，揭示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从而证明：在阶级社会以前，有一个很长的无阶级社会；阶级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并非从来就有的。可见，说“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并不确切，因此，恩格斯作了修改。此外，《宣言》还有一个重要修改。马克思恩格斯说：“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已有很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个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9页）在《宣言》中说，无产阶级要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以推翻资产阶级。在1848年二月革命和巴黎公社的实践基础上，马克思得出新结论说：无产阶级必须用革命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列宁指出：这是一个“重要的修改”。（《列宁选集》第3卷第201页）马克思、恩格斯对《宣言》的态度，给我们以很大启发。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学说一开头就是完美的，决没有把它看作一次完成的“绝对真理”，而始终用辩证法观点严肃地看待自己的学说，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他们并不认为凡是自己讲过的话都是真理，也不认为凡是自己的

讲过的一切言论

作出的所有

不能改变

结论都要维护。他们处处以实践来检验自己的学说，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尊重实践，尊重事实，尊重科学，毫无偏见，是他们唯一的态度。

他们虚心吸取别人的科学成果，包括资产阶级学者所提供的事实材料。马克思恩格斯对待《宣言》的态度告诉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指的是

，即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基本理论和立场观点方法，并非维护每个字句和个别结论。事实上，要维护马克思恩格斯的每一句话，每个结论，必然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坚持实践标准，就是科学

态度，否认实践标准，就会陷入蒙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是坚持科学的典范。事实上，人类的认识过程，必然是从不知到知、从不完全不确切的认识到比较完全、比较确切的认识的发展过程。毛主席指出：“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的不完全性，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又指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强调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永远没有完结，就是承认我们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就是承认由于历史的、认识的和阶级的局限性，我们的认识可能犯错误，需要由实践来检验或纠正。马克思主义也正是在实践检验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如果认为认识是不会犯错误的，也就取消了实践标准，结果必然要犯更大的错误。不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

史，还是我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

，包括遭到“四人帮”疯狂破坏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

(四)

是否完整的准确的掌握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是否正确执行马克思主义路线，都要由实践来检验。实践标准是客观的，你否认它，它仍然起作用。机会主义以理论与实践相分裂为特征。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王明、林彪、“四人帮”表现得尤其突出。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唱得最响亮，反对马克思主义也最猖狂。他们都否认马克思主义来源于实践，否认马克思主义要在实践中受检验，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王明反对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否认理论与实践统一，把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当作教条，毛主席一针

见血地批判王明说：“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词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那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整顿党的作风》）王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个别词句当作宗教教条，来指导革命，结果把中国革命引向绝境。只是毛主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对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才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

反对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坚持了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

正像 林彪反党集团和王张江姚“四人帮”大搞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伎俩，把经过歪曲和篡改了的个别词句当成一根根打人的棍子。王明的特点是摘取马列著作的片言只语而阉割马列主义的精神实质，抛弃马列主义的体系。林彪、“四人帮”的特点是一样，特点是摘取毛主席的片言只语而阉割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叛徒林彪鼓吹天才论，否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源于三大革命实践，宣扬“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否认毛主席的指示需要到实践中检验、丰富和发展，反对实践标准，反对科学，鼓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这种唯心论的先验论受到毛主席痛斥了林彪的唯心论的先验论。的

与林彪合伙的“四人帮”，唯心主义横行，疯狂反对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根本否认实践标准。姚文元攻击“存在第一、思维第二，客观第一、主观第二”是“反动的形而上学”，宣扬精神第一的唯心主义，完全否认了理论来源于实践，否认了理论要受实践检验。张春桥公开鼓吹“认识——实践——再认识”、“理论——实践——再上升为理论”的反动公式，更是明目张胆地反对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检验真理的标准。

“四人帮”鼓吹“反经验主义为纲”，否认实践经验；把广大干部、广大群众的实践经验污蔑为“陈规旧习”。他们摘取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作为论证工具。尤其反动的是，“四人帮”歪曲和篡改毛泽东思想，抛弃毛泽东思想体系，把毛主席的一言半语到处乱套用吓唬人打人。

来 “四人帮”肆意践踏实践标准，迷信“强权即真理”、“造谣一千遍就是真理”的法西斯哲学，和

使用他们控制的宣传机器，大造反革命舆论，把在实践中证明了的真理攻击为修正主义，把在实践中破产了的东西吹捧为马克思主义；全盘否定

解放后17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全盘否定毛主席亲自缔造的中国共产党的50多年的伟大实践，篡改历史、颠倒是非、捏造罪名、制造谣言，公然陷害周总理这样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四人帮”的真理标准就是他们篡党夺权的野心。但是，实践标

公然把在实践中证明了的真理攻击为修正主义，把在实践中破产了的东西吹捧为马克思主义；

准是客观的，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不仅是证实真理的最有力的手段，也是宣判修正主义和一切谬论死刑的最高权威。在亿万人民的革命实践面前，“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彻底破产了，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现在，“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被摧毁，但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四人帮”在革命队伍中间造成的心有余悸的问题，也远没有完全解决。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曾经批评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这种倾向依然存在。至今，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都

有一些“禁区”。所谓“禁区”，是指那种不准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研究的问题，是指那种不能用实践标准去衡量是非的问题，而只能靠

还存在着亟待冲破的“四人帮”设置的

“信仰”去解决。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面前，没有不能调查研究的问题，没有不准研究的“禁区”。科学无禁区。凡是有“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实践标准，就没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有蒙昧主义。“禁区”是“四人帮”设置的，我们

必须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武器，冲破“禁区”；冲破“禁区”就是批判“四人帮”的修正主义路线。我们有些同志，在工作中碰到了问题时，首先是去研究实际，还是到革命导师的著作中寻章摘句，寻求答案？判断理论是非和路线是非，以事实作根据，用实践作标准，还是以片言只语为准则？在处理某件事情时，首先是从实际出发，还是从概念出发，从原则出发？等等。这些都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思想路线，也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学风。华主席号召我们：“要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到新的水平。”我们应当重温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应当着重学习革命导师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教导，重温毛主席关于办事情要从实际出发的教导，完整地、准确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坚持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逐步地、彻底地肃清“四人帮”主观唯心主义造成的种种影响和流毒，以便真正能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为完成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一味

其他什么

1978年4月23、24日《实》文的第八次改样

1978年4月23、24日，杨西光、马沛文和王强华同志再次讨论后修改稿。

七八、四、二十改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胡福明

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个问题早被无产是
阶级的革命导师解决了的。但是这些年来，由于问题
“四人帮”的破坏，特别是他们控制下的舆论工
具进行了大量的歪曲宣传，把这个问题又搞得混
乱不堪。为了深入批判“四人帮”，肃清其流毒
和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拨乱反正，十分必要。

(一)

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怎样区别真理与谬误呢？1845年，马克思在
创立新世界观时，就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
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
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
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
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
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
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
集》第1卷第16页）毛主席进一步指出：“真理
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

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

这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的检验来解决。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它区别于形形色色唯心论的认识论的一个根本特征。

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毛主席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实践论》）这里所说的是：“只能”、“才是”，就是说，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这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也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为标准一样。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人的社会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实践具有把思想和客观实际联系起来的特性。因此，正是它，也只有它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科学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以有力量，正是由于它们高度概括了实践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并用来指导实践。列宁曾经说过：“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列宁全集》第19卷第1页）这也说明马克思主义是对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向自然斗争和社会斗争经验总结的批判和继承。毛泽东思想也是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正因为这样，我们要非常重视革命理论，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列宁选集》第1卷第328页）。理论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来源于实践，又能正确指导实践，不掌握这个精神实质，那是不可能发挥理论的作用的。

“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大肆鼓吹种种唯心论的先验论，疯狂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例如，他们炮制“天才论”，捏造文艺、教育等各条战线的“黑线专政”论，伪造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必然变成走资派的“规律”，胡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基础”的谬论，虚构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的无稽之谈，等等。但是，这些五花八门的谬论，根本经不起革命实践的检验，一个个都像肥皂泡那样很快破灭了。这个事实雄辩地说明了“四人帮”手里根本没有真理，他们也就必然没有半点马克思主义，他们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大规模的宣传证明不了真理，强大的权力证明不了真理。他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自居，实践证明他们是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政治骗子。

我们不仅承认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而且要从发展的观点看待实践的标准。列宁说得好：“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这种观点必然会导致唯物主义，而把教授的经院哲学的无数臆说一脚踢开。当然，在这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列宁选集》第2卷第142页）实践是发展的，每个时代的社会实践都有历史局限性。因此，每个时代都有一些理论问题是当时的实践既不能证实，又不能否定的。但是，今天的实践回答不了的，以后的实践终究会回答它。任何理论，是不是真理归根到底要由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样的事实，在科学上是屡见不鲜的。

门德列捷夫根据原子中的电子数目，制定了元素周期表，有人赞同，有人怀疑，争论不休。尔后，根据元素周期表发现了几种新元素，它们的化学特性刚好符合元素周期表的预测。这样元素周期表就被证实了。

量的变化

是真理

火星上有没有生

物?这是科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宇宙火箭的探测证明火星上没有生物。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是这样,自然科学以外的问题也是这样。许多原来被认为正确的东西,经过实践的检验证明是错了,也有许多原来被认为是错误的东西,经过实践的检验证明是对的。我们常说:让历史来作结论吧。就是讲的实践标准的辩证性。

(二)

毛主席指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7页)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没有例外。以自然科学为例,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在300年里一直是一种假说,尽管这个假说具有99%、99.9%、99.99%的可靠性,但在实践证实以前毕竟是一种假说,并不是真理;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加勒于1846年确实发现了海王星这颗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才被证实了,成了真理。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真理,正是千百万群众长期实践证实的结果。毛主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辩证唯物论之所以为普遍真理,在于经过无论什么人的实践都不能逃出它的范围。”(《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原是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派别,开始并不出名,反动派围攻它,资产阶级学者反对它,其他的社会主义流派攻击它,但是,长期的革命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终于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革命的路线是否正确，同样必须由社会实践来检验。20世纪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俄国工人运动中，都发生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激烈斗争，那时第二国际的头面人物是考茨基，列宁主义者是少数，斗争持续了很长一个时间，俄国十月革命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证明列宁主义是真理，宣告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破产。

检验路线之正确与否，情形也是这样：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在一个时期内，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占主导地位。长期的革命斗争，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正确的，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都是错误的。于是，毛泽东思想才成了全党的指导思想。历史告诉我们，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都是通过实践来鉴定的，也只能通过实践来检验。

标准是什么呢？只有一个：就是千百万人民的社会实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别无其他标准。有人说检验真理有两个标准：一个是实践，一个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错误的。

也许有人会反问，这有什么错呢？当我们碰到一种新的观点、新的学说、新的理论时，不是常常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分析、判断这些观点、学说、理论是对还是错吗？我们说是的。但是，第一，我们用来分析和判断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是经过实践检验证明的真理；第二，我们的分析、判断是否正确，归根到底，也还要受实践的检验。正像毛主席指出的：“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正因为这样，在学术和理论领域，根据毛主席的教导，我们一贯主张“百家争鸣”，“百家争鸣”本身也是一种社会实践。

当我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批判修正主义时，也就是用马、恩、列、斯和毛主席从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中概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有的同志担心，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会削弱理论的意义。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凡是科学的理论，都不会害怕实践的检验。相反，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够使伪科学、伪理论现出原形，从而捍卫真正的科学与理论。这一点，在“四人帮”曾经篡夺一个时期的宣传大权、把理论问题搞得非常混乱的情况下，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

“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大肆鼓吹种种唯心论的先验论，疯狂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例如，他们炮制“天才论”，捏造文艺、教育等各条战线的“黑线专政”论，伪造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必然变成走资派的“规律”，胡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基础”的谬论，虚构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的无稽之谈，等等，所有这些，都曾经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所谓“理论”，谁反对它，就是反对马列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但是，这些五花八门的谬论，根本经不起革命实践的检验，它们连同“四人帮”另立的“真理标准”一个个都像肥皂泡那样很快破灭了。这个事实雄辩地说明了，他们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大规模的宣传证明不了真理，强大的权力证明不了真理。他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自居，实践证明他们是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政治骗子。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客观真理，它之所以有力量，正是由于它们高度概括了实践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并用来指导实践。正因为这样，我们要非常重视革命理论，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列宁选集》第1卷第241页）理论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来源于实践，又能正确指导实践，而理论到底是不是正确地指导了实践以及怎样才能正确指导实践，一点也离不开实践的检验。不掌握这个精神实质，那是不可能真正发挥理论的作用的。

有的同志说：我们批判修正主义，难道不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衡量，从而证明修正主义是错误的吗？我们说：是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批判修正主义的锐利武器。我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去批判修正主义，这些基本原理是马、恩、列、斯和毛主席从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中概括起来的，它们是被长期实践证明为不易之真理；同时我们用这些原理去批判修正主义，仍然一点也不能离开当前的（和过去的）实践，只有从实践经验出发，才能使这些原理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我们的批判只有结合大量的事实分析，才有说服力。不研究实践经验，不从实践经验出发，是不能最终驳倒修正主义的。

括起来的理论去批判它，用我们自己的实践经验去批判它。而且这种批判还必须结合大量的事实分析，才有说服力。归根到底，理论和事实都来源于实践。总之不研究实践经验，是驳不倒修正主义的。举例说，我们用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学说去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和平过渡的谬论，是应当的，因为全世界各国的革命实践反复证明暴力革命学说是真理，粉碎了“和平过渡”的谬论。自然科学中也有类似现象。现在如果有人说生物的物种是永恒不变的，那么我们就用达尔文的进化论去反对它，这是因为实践早已证明达尔文进化论的正确，否定了物种不变的错误观点。我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批判修正主义，或者用自然科学理论反对错误观点，都是根据实践经验。而且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的，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就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新事物、新问题，不断提出新的观点和理论。这些新的观点和理论由什么来检验呢？只能用实践来检验。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研究一切问题的指导思想，但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对我们有极大的指导意义，但毕竟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没有穷尽真理，它还需要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发展。例如，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说，是一个新的结论，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一般理论去检验，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实践才能证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学说的

是真理

正确。研究问题的指导思想与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两个问题。真理是具体的，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时代发展了，就会出现新的结论代替旧的结论，新结论是否正确还要继续由实践来

毛主席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7页）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证明。例如，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结论，代替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在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的结论的正确性，就是由十月革命的实践证明的。唯物辩证法反映了客观世界的普遍发展规律，对于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为科学发展指明了方向，但它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论证的工具。因为，世界上的各种事物都具有矛盾的特殊性，都有特殊规律，事物内部的特殊矛盾决定事物的本质，要认识事物内部的特殊矛盾，只有依靠实践，要检验是否认识了特殊规律，也只有依靠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就是坚持辩证唯物论。把检验真理的标准说成两个，就是二元论，实际上是唯心论。“四人帮”鼓吹主观唯心论是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流毒的表现。

革命导师是坚持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

马克思主义导师们不仅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亲自作出了用实践去检验一切理论包括自己所提出的理论的光辉榜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他们所共同创造的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文献《共产党宣言》的态度，就是许多事例中的一个生动的例子。1848年《宣言》发表后，在45年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在用实践来检验它。《宣言》的七篇序言，详细地记载了这个事实。

(三)

马克思主义的导师提出了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并自觉运用它检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以至修改个别结论。现在来看看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根据实践来检验《共产党

宣言》的。1848年《宣言》发表后，他们在45年中一直根据实践来检验《宣言》，《宣言》的7篇序言就是生动的说明。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8页）

130年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证明这个结论仍然是正确的。

同时，他们根据新的实践经验，发展了自己的学说，并且修改了个别观点。这里举一个修改《宣言》的例子。《宣言》第一章的第一句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恩格斯在1888年的《宣言》英文版上加了一条注释：“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1页）

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状态，全部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完全没有人知道；后来，陆续发现土地公有制是世界各地的原始社会的基础。特别是摩尔根在夏威夷岛土著居民中调查研究了几十年，发现了氏族的真正本质及其对部落的关系，揭示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从而证明：

在阶级社会以前，有一个很长的无阶级社会；阶级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并非从来就有的。可见，说“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并不确切，因此，

恩格斯作了修改。此外，《宣言》还有一个重要修改。马克思恩格斯说：“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已有很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随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个月

同时，他们又指出，“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新实践的不断检验，包括新的历史事实的发现，曾对《宣言》个别论点作了修改。例如，

《宣言》发表以后人们对于社会的史前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特别是摩尔根的调查研究证明：

恩格斯根据这种新实践得出的新结论，作了这个说明，修改了《宣言》的旧提法。《宣言》还有一个说法，说到无产阶级要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以推翻资产阶级。1872年，两位革命导师在他们共同签名的最后一篇序言中，明确指出

列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说明十分重视，他认为这是对《共产党宣言》的

毛主席一贯严格要求不断用革命实践来检验自己提出的理论和路线。1955年毛主席在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时候，写了104篇按语。当时没有预料到1956年以后国际国内所发生的阶级斗争的新情况。因此，1958年在重印一部分按语的时候，毛主席特别写了一个说明，指出这些按语“其中有一些现在还没有丧失它们的意义。其中说：1955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这样说不妥当。应当说：1955年是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以及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战线方面，则或者还没有基本胜利，或者还没有完全胜利，还有待于尔后的努力。”（《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25页）革命导师这种尊重实践的严肃的科学态度，给我们极大的教育。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提出的理论是已经完成了的绝对“顶峰”，可以不受实践检验的，并不认为只要是他们作出的一切结论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不能改变，更不要说那些根据个别情况作出的个别论断了。他们处处时时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论断、指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毫无偏见。他们从不容许别人把他们的言论当作“圣经”来崇拜。实践之树是常青的。正是革命导师的这种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才保证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而永葆其青春。

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9页）在《宣言》中说，无产阶级要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以推翻资产阶级。在1848年2月革命和巴黎公社的实践基础上，马克思得出新结论说：无产阶级必须用革命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列宁指出：这是一个“重要的修改”。（《列宁选集》第3卷第208页）马克思、恩格斯对《宣言》的态度，给我们以极大启发。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讲过的一切言论都是真理，也不认为自己作出的所有结论都不能改变。他们处处以实践来检验自己

的学说，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尊重实践，毫无偏见。马克思恩格斯对待《宣言》的态度告诉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指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即基本理论和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实践标准，就是科学态度，否认实践标准，就会陷入蒙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是坚持科学的典范。事实上，人类的认识过程，必然是从不知到知、从不完全不确切的认识到比较完全、比较确切的认识的发展过程。毛主席指出：“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的不完全性，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又指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强调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永远没有完结，就是承认我们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就是承认由于历史的、认识的和阶级的局限性，我们的认识可能犯错误、需要由实践来检验或纠正。马克思主义也正是在实践检验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如果认为认识是不会犯错误的，也就取消了实践标准，结果必然要犯更大的错误。不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还是我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包括遭到“四人帮”疯狂破坏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

（四）

是否完整的准确的掌握了马列主义、毛泽

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

我们不仅承认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而且要从发展的观点看待实践的标准。实践是不断发展的，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它既具有绝对的意义，又具有相对的意义。就一切思想和理论都必须由实践来检验这一点讲，它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就实践在它发展的一定阶段上都有其局限性，不能无条件地完全证实或完全驳倒一切思想和理论这一点来讲，它是又相对的、有条件的。但是，今天的实践回答不了的，以后的实践终究会回答它，就这点来讲，它又是绝对的。列宁说：“当然，在这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列宁选集》第2卷第142页）

东思想体系，是否正确执行马克思主义路线，都要由实践来检验。实践标准是客观的，你否认它，它仍然起作用。机会主义以理论与实践相分裂为特征。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王明、林彪、“四人帮”表现得尤其突出。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唱得最响亮，反对马克思主义也最猖狂。他们都否认马克思主义来源于实践，否认马克思主义要在实践中受检验，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王明反对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把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当作教条。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批判王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词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整顿党的作风》）王明反对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结果把中国革命引向绝境。只是毛主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坚持了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对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才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

正像王明摘取马列著作的片言只语抛弃马列主义的体系一样，林彪、“四人帮”摘取毛主席的片言只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林彪宣扬“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否认毛主席的指示需要到实践中检验、丰富和发展，这种唯心论的先验论受到毛主席的痛斥。

与林彪合伙的“四人帮”，唯心主义横行，疯狂反对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根本否认实践标准。姚文元攻击“存在第一、思维第二，客观第一、主观第二”是“反动的形而上学”，宣扬精神第一的唯心主义，完全否认了理论来源于实践，否认了理论要受实践检验。张春桥公开鼓吹“认识——实践——再认识”、“理论——实践——再上升为理论”的反动公式，更是明目张胆地反对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检验真理的标准。“四人帮”鼓吹“反经验主义为纲”，否认实践经验，把广大干部、广大群众的实践经验污蔑为“陈规旧习”。他们摘取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作为论证工具，用来吓人和打人。“四人帮”肆意践踏实践标准，全盘否定解放后17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全盘否定毛主席亲自缔造的中国共产党的50多年的伟大实践，篡改历史、颠倒是非、捏造罪名、制造谣言，公然陷害周总理这样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公然把在实践中证明了的真理攻击为修正主义，把在实践中破产了的东西吹捧为马克思主义；“四人帮”的真理标准就是他们篡党夺权的野心。但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不仅是证实真理的最有力的手段，也是宣判修正主义和一切谬论死刑的最高权威。在亿万人民的革命实践面前，“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彻底破了产，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现在，“四人帮”

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被摧毁，但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四人帮”在

革命队伍中间造成的心有余悸的问题，也远没有完全解决。毛主席在

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

曾经批评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这种倾向依然存在。至今，

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都还存在着亟待冲破的“四人帮”设置的一些“禁区”。所

谓“禁区”，是指那种不准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研究的问题，是指那种不能用实践标准去衡量是非的问题，而只能靠“信仰”去解决。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面前，没有不能调查研究的问题，没有不准研究的“禁区”。

科学无禁区。凡是有“禁区”的地方，就没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关于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辩证统一的观点，就是任何思想、任何理论必须无例外地、永远地、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的观点，也就是真理发展的观点。任何思想、理论，即使是已经在一定的实践阶段上证明为真理，在其发展过程中仍然要接受新的实践的检验。毛主席指出：“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的不完全性，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又指出：

“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强调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永远没有完结，就是承认我们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或最终完成。就是承认由于历史的、认识的和阶级的局限性，我们的认识可能犯错误，需要由实践来检验。几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或者不合实际的东西，就应当改变，不应再坚持。这样的事是常有的。毛主席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实践论》）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胡诌什么“一句等于一万句”、“句句是真理”。实践证明他们所说的绝不是毛泽东思想的真理，而是他们冒充毛泽东思想的谬论。

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确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有许多方面还是必然王国。我们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我们要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勇于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现实的确切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够逐步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前进，顺利地进行新的伟大的长征。

有科学，就没有实践标准，就没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有蒙昧主义。“禁区”是“四人帮”设置的，我们必须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武器，冲破“禁区”；冲破“禁区”就是批判“四人帮”的修正主义路线。我们有些同志，在工作中碰到了问题时，首先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去研究实际，还是一味到革命导师的著作中寻章摘句？判断理论是非和路线是非，以事实作根据，用实践作标准，还是以其他什么为准则？在处理某件事情时，首先是从实际出发，还是从概念出发，从原则出发？等等。这些都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思想路线，也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学风。华主席号召我们：“要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到新的水平。”我们应当重温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应当着重学习革命导师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教导，重温毛主席关于办事情要从实际出发的教导，完整地、准确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坚持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逐步地、彻底地肃清“四人帮”主观唯心主义造成的种种影响和流毒，以便真正能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为完成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

（《光明日报》社供稿，作者胡福明同志，本刊作了些修改）

1978年4月27日《实》文的第九次改样

第九次修改稿由孙长江执笔，吴江在阅定时又有增改。

第十次修改由《理论动态》编辑部完成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孟凡同志：请即排印15份〔送胡(耀邦)、杨(西光)、作者——航空发出，各一份〕5月10日那期用。吴江，四月二十七日)

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早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解决了的问题。但是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的破坏，特别是他们控制下的舆论工具进行了大量的歪曲宣传，把这个问题又搞得混乱不堪。为了深入批判“四人帮”，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拨乱反正，十分必要。

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怎样区别真理与谬误呢？1845年，马克思在创立新世界观时，就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

选集》第1卷第16页)这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
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

理，只能靠社会实践的检验来解决。实践标准是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它的一
个根本特征。

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
的标准。毛主席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
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
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
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真理的标
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实践论》）这里所说的

是：“只能”、“才是”，就是说，标准只有一
个，没有第二个。这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
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
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
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也不能到理论领域
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
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
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为标准一样。作为检
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
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人的社会实
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
东西。实践具有把思想和客观实际联系起来的特
性。因此，正是它，也只有它能够完成检验真
理的任务。科学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说明了
这个问题。

门德列捷夫根据原子量的变化，制定了元
素周期表，有人赞同，有人怀疑，争论不休。尔
后，根据元素周期表发现了几种新元素，它们的
化学特性刚好符合元素周期表的预测。这样元素

周期表就被证实了是真理。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在300年里一直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加勒于1846年确实发现了海王星这颗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才被证实了，成了真理。

公认的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真理，正是千百万群众长期实践证实的结果。毛主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原是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派别，开始并不出名，反动派围攻它，资产阶级学者反对它，其他的社会主义流派攻击它，但是，长期的革命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终于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

被承认

。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制订自己的路线时，当然要从现实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情况出发，依据革命理论的指导并且加以论证。但是，

检验路线之正确与否，情形也是这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革命的路线是否正确，同样必须由社会实践来检验。20世纪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俄国工人运动中，都发生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激烈斗争，那时第二国际的头面人物是考茨基，列宁主义者是少数，斗争持续了很长一个时间。俄国十月革命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证明列宁主义是真理，宣告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破产。

政党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长期的斗

争。在一个时期内，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占主导地位。长期的革命斗争，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正确的，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都是错误的。标准是什么呢？只有一个：就是千百万人民的社会实践。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有的同志担心，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会削弱理论的意义。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凡是科学的理论，都不会害怕实践的检验。相反，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够使伪科学、伪理论现出原形，从而捍卫真正的科学与理论。这一点，在“四人帮”曾经篡夺一个时期的宣传大权、把理论问题搞得非常混乱的情况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大肆鼓吹种种唯心论的先验论，疯狂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例如，他们炮制“天才论”，捏造文艺、教育等各条战线的“黑线专政”论，伪造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必然变成走资派的“规律”，胡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的谬论，虚构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的无稽之谈，等等。所有这些，都曾经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所谓“理论”，谁反对它，就是反对马列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但是，这些五花八门的谬论，根本经不起革命实践的检验，它们连同“四人帮”另立的“真理标准”一个个都像肥皂泡那样很快破灭了。这个事

对于澄清被

理论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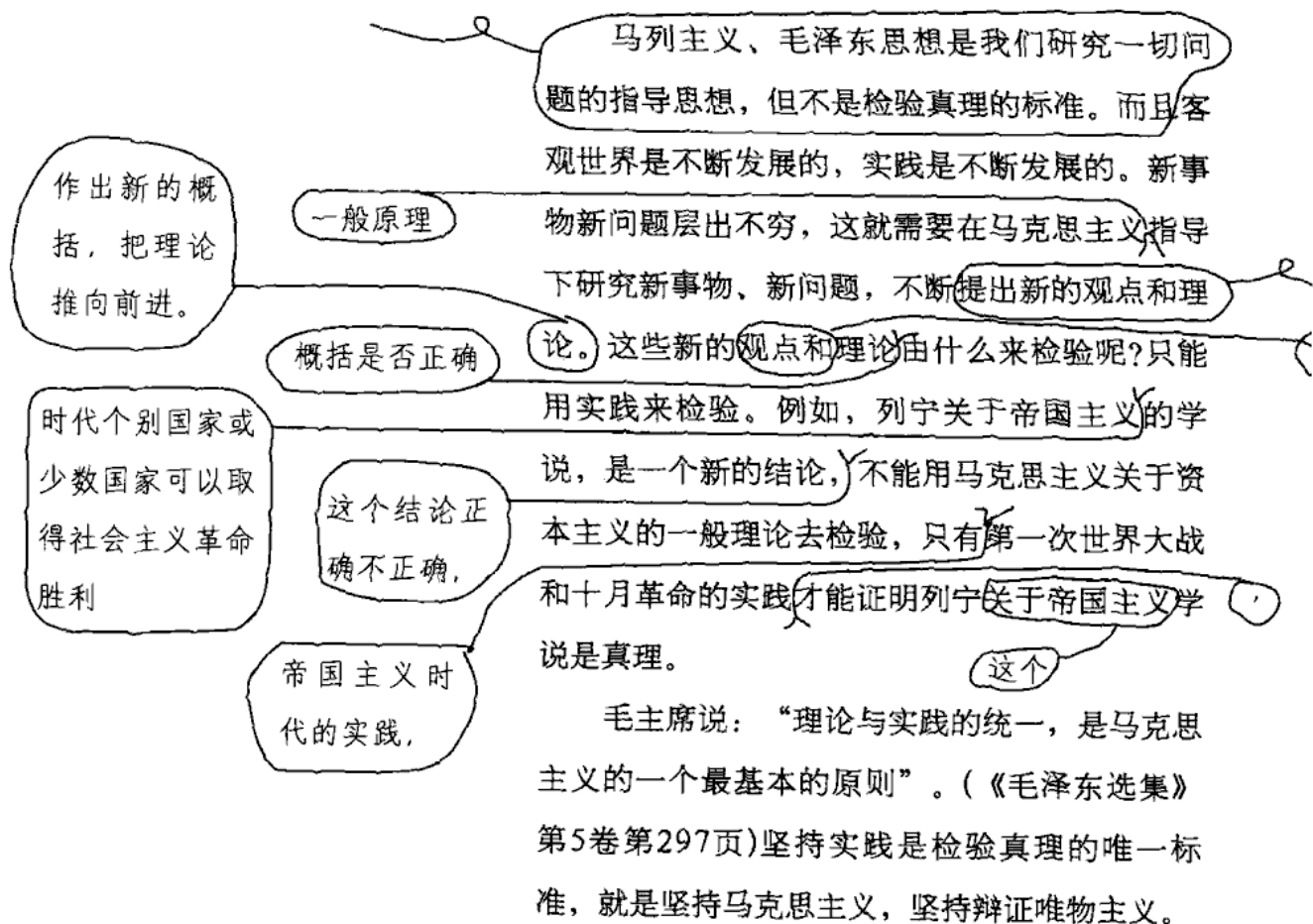
会被扣上

的大帽子

实雄辩地说明了，他们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大规模的宣传证明不了真理，强大的权力证明不了真理。他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自居，实践证明他们是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政治骗子。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客观真理，它之所以有力量，正是由于它们高度概括了实践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并用来指导实践。正因为这样，我们要非常重视革命理论。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列宁选集》）第1卷第241页）理论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来源于实践，又能正确指导实践，而理论到底是不是正确地指导了实践以及怎样才能正确指导实践，一点也离不开实践的检验。不掌握这个精神实质，那是不可能真正发挥理论的作用的。

有的同志说：我们批判修正主义，难道不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衡量，从而证明修正主义是错误的吗？我们说：是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批判修正主义的锐利武器，也是我们论证的根据。我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去批判修正主义，这些基本原理是马、恩、列、斯和毛主席从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中概括起来的，它们是被长期实践证明为不易之真理；同时我们用这些原理去批判修正主义，仍然一点也不能离开当前的（和过去的）实践，只有从实践经验出发，才能使这些原理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我们的批判只有结合大量的事实分析，才有说服力。不研究实践经验，不从实践经验出发，是不能最终驳倒修正主义的。



革命导师是坚持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

革命

马克思主义

导师们不仅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亲自作出了用实践去检验一切理论包括自己所提出的理论的光辉榜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他们所共同创造的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文献《共产党宣言》的态度，就是许多事例当中的一个生动的例子。1848年《宣言》发表后，在45年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在用实践来检验它。《宣言》的七篇序言，详细地记载了这个事实。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他们又指出，“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

正如《宣言》中所说的，

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8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新实践的不断检验，包括新的历史事实的发现，曾对《宣言》个别论点作了修改。例如，《宣言》第一章的第一句是：

的各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恩格斯在1888年的《宣言》英文版上加了一条注释：“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1页）

这是因为，

《宣言》发表以后人们对于社会的史前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特别是摩尔根的调查研究证明：在阶级社会以前，有一个很长的无阶级社会；阶级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并非从来就有的。可见，说“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并不确切。恩格斯根据这种新实践得出

发现的历史事实

的新结论，作了这个说明，修改了《宣言》的旧提法。《宣言》还有一个说法，说到无产阶级要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以推翻资产阶级。1872年，两位革命导师在他们共同签名的最后一篇序言中，明确指出：“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已有很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随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二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9页）列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说明十分重视，他认为这是对《共产党宣言》的一个“重要的修改”。（《列宁选集》第3卷第201页）

两

（毛主席一贯严格要求不断用革命实践来检

正如华主席所指出的：

“毛主席从来对思想理论问题采取极其严肃和慎重的态度，他总是要让他的著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的考验以后再来编定他的选集。”

验自己提出的理论和路线。1955年毛主席在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时候，写了104篇按语。当时没有预料到1956年以后国际国内所发生的阶级斗争的新情况。因此，1958年在重印一部分按语的时候，毛主席特别写了一个说明，指出这些按语“其中有一些现在还没有丧失它们的意义。其中说：1955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这样说不妥当。应当说：1955年是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以及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战线方面和政治战线方面，则或者还没有基本胜利，或者还没有完全胜利，还有待于尔后的努力。”（《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25页）

真理或

革命导师这种尊重实践的严肃的科学态度，给我们极大的教育。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提出的理论是已经完成了的绝对“顶峰”，可以不受实践检验的，并不认为只要是他们作出的一切结论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不能改变，更不要说那些根据个别情况作出的个别论断了。他们处处时时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论断、指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毫

无偏见。他们从不容许别人把他们的言论当作“圣经”来崇拜。实践之树是常青的。正是革命导师的这种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才保证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而永葆其青春。

、生活

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

我们不仅承认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而且要从发展的观点看待实践的标准。实践是不断发展的，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它既具有绝对的意义，又具有相对的意义。就一切思想和理论都必须由实践来检验这一点讲，它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就实践在它发展的一定阶段上都有其局限性，不能无条件地完全证实或完全驳倒一切思想和理论这一点来讲，它是又相对的、有条件的。但是，今天的实践回答不了的，以后的实践终究会回答它，就这点来讲，它又是绝对的。列宁说：“当然，在这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

毫无疑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必须坚持，决不能动摇；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关于哲学，毛主席曾经说过：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如果只有几篇原有的哲学著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那是不可行的。实践、生活的观点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

i

问题

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

(《列宁选集》第2卷第142页)

而得到补
充、丰富或
者纠正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关于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辩证统一的观点，就是任何思想、任何理论必须无例外地、永远地、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的观点，也就是真理发展的观点。任何思想、理论，即使是已经在一定的实践阶段上证明为真理，在其发展过程中仍然要接受新的实践的检验。毛主席指出：“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实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又指出：

“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强调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永远没有完结，就是承认我们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或最终完成，就是承认由于历史的认识的和阶级的局限性，我们的认识可能犯错误，需要由实践来检验。凡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或者不合实际的东西，就应当改变，不应再坚持。这样的事是常有的。毛主席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实践论》）

事实上这种改
变是常有的。

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

胡诌什么“一句等于一万句”

顶

“句句是真理”。实践证明他们所说的绝不是毛泽东思想的真理，而是他们冒充毛泽东思想的谬论。

现在，“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被摧毁，但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曾经批评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这种倾向依然存在。至今，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

《毛泽东选集》

第1卷第140页

都还存在着亟待冲破的“四人帮”设置的一些“禁区”。科学无禁区。凡是有“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实践标准，就没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有蒙昧主义。

“四人帮”都设置了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对于这些“禁区”我们要敢于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科学无禁区。凡是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确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有许多方面还是必然王国。我们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面临着许多新的

新

地

未被认识的

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我们要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

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

勇于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现实的确切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够逐步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前进，顺利地进行新的伟大的长征。

（《光明日报》供稿，作者胡福明同志，本刊作了些修改）

社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日的《理论动态》

理论动态60

内部刊物 注意保存

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

1978年5月10日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早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解决了的问题。但是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和他们控制下的舆论工具大量的歪曲宣传,把这个问题搞得混乱不堪。为了深入批判“四人帮”,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拨乱反正,十分必要。

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怎样区别真理与谬误呢?1845年,马克思就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这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

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毛主席说:“真理只有

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论》）这里说：“只能”、“才是”，就是说，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这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为标准一样。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人的社会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实践具有把思想和客观实际联系起来的特性。因此，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科学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门德列捷夫根据原子量的变化，制定了元素周期表，有人赞同，有人怀疑，争论不休。尔后，根据元素周期表发现了几种新元素，它们的化学特性刚好符合元素周期表的预测。这样，元素周期表就被证实了是真理。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在300年里一直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加勒于1846年确实发现了海王星这颗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才被证实了，成了公认的真理。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承认为真理，正是千百万群众长期实践证实的结果。毛主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原是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派别，开始并不出名，反动派围攻它，资产阶级学者反对它，其他的社会主义流派攻击它，但是，长期的革命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终于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

检验路线之正确与否，情形也是这样。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制订自己的路线

时，当然要从现实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情况出发，依据革命理论的指导并且加以论证。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革命政党的路线是否正确，同样必须由社会实践来检验。20世纪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俄国工人运动中，都发生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激烈斗争，那时第二国际的头面人物是考茨基，列宁主义者是少数，斗争持续了很长一个时间。俄国十月革命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证明列宁主义是真理，宣告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破产。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在一个时期内，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占主导地位。长期的革命斗争，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正确的，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错误的。标准是什么呢？只有一个：就是千百万人民的社会实践。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有的同志担心，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会削弱理论的意义。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凡是科学的理论，都不会害怕实践的检验。相反，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够使伪科学、伪理论现出原形，从而捍卫真正的科学与理论。这一点，对于澄清被“四人帮”搞得非常混乱的理论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鼓吹种种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例如，他们炮制“天才论”，捏造文艺、教育等各条战线的“黑线专政”论，伪造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必然变成走资派的“规律”，胡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基础”的谬论，虚构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的无稽之谈，等等。所有这些，都曾经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所谓“理论”，谁反对，就会被扣上反对马列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但是，这些五花八门的谬论，根本经不起革命实践的检验，它

们连同“四人帮”另立的“真理标准”，一个个都像肥皂泡那样很快破灭了。这个事实雄辩地说明，他们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大规模的宣传证明不了真理，强权证明不了真理。他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自居，实践证明他们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政治骗子。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有力量，正是由于它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客观真理，正是由于它高度概括了实践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并用来指导实践。正因为这样，我们要非常重视革命理论。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列宁选集》第一卷第241页）理论所以重要，就是在于它来源于实践，又能正确指导实践，而理论到底是不是正确地指导了实践以及怎样才能正确地指导实践，一点也离不开实践的检验。不掌握这个精神实质，那是不可能真正发挥理论的作用的。

有的同志说，我们批判修正主义，难道不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衡量，从而证明修正主义是错误的吗？我们说，是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批判修正主义的锐利武器，也是我们论证的根据。我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去批判修正主义，这些基本原理是马、恩、列斯和毛主席从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概括起来的，它们被长期的实践证明为不易之真理；但同时我们用这些原理去批判修正主义，仍然一点也不能离开当前的（和过去的）实践，只有从实践经验出发，才能使这些原理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我们的批判只有结合大量的事实分析，才有说服力。不研究实践经验，不从实践经验出发，是不能最终驳倒修正主义的。

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的，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就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研究新事物、新问题，不断作出新的概括，把理论推向前进。这些新的理论概括是否正确由什么来检验呢？只能用实践来检验。例如，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或少数国家可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学说，是一个新的结论，这个结论正确不正确，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一般理论去检验，只有帝国主义时代的实践，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实践，才能证明列宁这个学说是真理。

毛主席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7页）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

革命导师们不仅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亲自作出了用实践去检验一切理论包括自己所提出的理论的光辉榜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他们所共同创造的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文献《共产党宣言》的态度，就是许多事例其中的一个生动的例子。1848年《宣言》发表后，在45年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在用实践来检验它。《宣言》的七篇序言，详细地记载了这个事实。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他们又指出，“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8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新实践的不断检验，包括新的历史事实的发现，曾对《宣言》的各别论点作了修改。例如，《宣言》第一章的第一句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恩格斯在1888年的《宣言》英文版上加了一条注释：“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1页）这是因为，《宣言》发表以后人们对于社会的史前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特别是摩尔根的调查研究证明：在阶级社会以前，有一个很长的无阶级社会；阶级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并非从来就有的。可见，说“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并不确切。恩格斯根据这种新发现的历史事实，作了这个说明，修改了《宣言》的旧提法。《宣言》还有一个说法，说到无产阶级要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以推翻资产阶级。1872年，两位革命导师在他们共同签名的最后一篇序言中，明确指出：“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已有很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随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

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9页）列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说明十分重视，他认为这是对《共产党宣言》的一个“重要的修改。”（《列宁选集》第3卷201页）。

正如华主席所指出的：“毛主席从来对思想理论问题采取极其严肃和慎重的态度，他总是要让他的著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的考验以后再来编定他的选集”。毛主席一贯严格要求不断用革命实践来检验自己提出的理论和路线。1955年毛主席在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时候，写了104篇按语。当时没有预料到1956年以后国际国内所发生的阶级斗争的新情况。因此，1958年在重印一部分按语的时候，毛主席特别写了一个说明，指出这些按语“其中有一些现在还没有丧失它们的意义。其中说：1955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这样说不妥当。应当说：1955年是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以及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战线方面和政治战线方面，则或者还没有基本胜利，或者还没有完全胜利，还有待于尔后努力。”（《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25页）。

革命导师这种尊重实践的严肃的科学态度，给我们极大的教育。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提出的理论是已经完成了的绝对真理或“顶峰”，可以不受实践检验的；并不认为只要是他们作出的结论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不能改变；更不要说那些根据个别情况作出的个别论断了。他们处处时时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论断、指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毫无偏见。他们从不容许别人把他们的言论当作“圣经”来崇拜。毫无疑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必须坚持，决不能动摇；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关于哲学，毛主席曾经说过：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如果只有几篇原有的哲学著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

新的理论，那是不可行的。实践、生活的观点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生活之树是常青的。正是革命导师的这种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才保证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而永葆其青春。

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

我们不仅承认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而且要从发展的观点看待实践标准。实践是不断发展的，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它既具有绝对的意义，又具有相对的意义。就一切思想和理论都必须由实践来检验这一点讲，它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就实践在它发展的一定阶段上都有其局限性，不能无条件地完全证实或完全驳倒一切思想和理论这一点来讲，它又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但是，今天的实践回答不了的问题，以后的实践终究会回答它，就这点来讲，它又是绝对的。列宁说：“当然，在这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列宁选集》第2卷第142页）。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关于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辩证统一的观点，就是任何思想、任何理论必须无例外地、永远地、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的观点，也就是真理发展的观点。任何思想、理论，即使是已经在一定的实践阶段上证明为真理，在其发展过程中仍然要接受新的实践的检验而得到补充，丰富或者纠正。毛主席指出：“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又指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强调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永远没有完结，就是承认我们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或最终完成，就是承认由于历史的和

阶级的局限性，我们的认识可能犯错误，需要由实践来检验，凡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或者不符合实际的东西，就应当改变，不应再坚持。事实上这种改变是常有的。毛主席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实践论》）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胡诌什么“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实践证明，他们所说的绝不是毛泽东思想的真理，而是他们冒充毛泽东思想的谬论。

现在，“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被摧毁，但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批评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0页）这种倾向依然存在。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四人帮”都设置了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对于这些“禁区”我们要敢于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科学无禁区。凡是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确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有许多地方还是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我们要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勇于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现实的确切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才能够逐步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前进，顺利地进行新的伟大的长征。

（《光明日报》社供稿，本刊作了些修改）